

#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 第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 第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 第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80×1220毫米 32开 10.75印张 215千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书号 3230·73 定价 1.15 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答薛暮桥同志 .....	刘少奇 (1)
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内战时期白区工 作问题	
——薛暮桥同志给少奇同志写的报告 .....	(7)
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 .....	李志民 (20)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三) .....	(54)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罪行 .....	成仿吾 (147)
黄安县委关于黄麻暴动经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 .....	(189)
平江扑城暴动 .....	钟期光 (208)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粉碎国民党的一、 二、三次“围剿” .....	崔田民 (218)
回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前后 .....	马辉之 (259)
金粉泪五十六首 .....	陈独秀 (316)
附：简释陈独秀《金粉泪五十六首》 .....	陈旭麓 (329)

# 答薛暮桥同志

刘少奇

薛暮桥同志：

三月八日来信，我读过一遍。你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我同意！你所提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策略问题。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不能和你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但望你们能继续研究与讨论，必须把这些问题彻底弄清楚，而且要从一般原则上弄清楚，才能算得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否则，都不是布尔什维克。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战略问题就有许多是值得讨论的。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如战略有错误，策略也必有许多错误。退一步说，假定在内战时党的战略不错，而策略也有许多是错误的，甚至许多策略是与战略脱节的。党的策略在当时有许多是违反战略任务的可能性的。许多策略执行的结果，取消了战略执行的可能性，或造成战略执行更大的困难。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乡村中的基本工作方针（这里不说城市）应该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在主观客观条件业

已具备的地区——实行革命的进攻，建立革命的武装与政权（如果不违背战略方针及全国性的革命发展的话），苏维埃红军游击区即是如此。第二个，是在主观条件或客观条件还没有或不可能准备进攻的地区——就应坚决的巧妙的实行退却，利用一切改良的可能、合法的可能，以便保存后备军与党的组织，准备与聚集革命的力量，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等待新的革命的来潮。

当时的错误，就在于只有第一个方针，而没有第二个方针，即在主观客观条件均不具备的地区，也采取革命进攻的方针。因此，使许多后备军与党的组织可以保存的没有保存（如江苏、浙江的暴动最明显），可以准备好的没有准备得好。

当时的错误，在于否认一切改良的必要，不懂得利用改良的口号来发动群众运动及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这就完全是非马列主义的观点。

关于二五减租的口号，在以下几种条件之下有其不同的意义与作用：

（一）战略任务是要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而广大的农民又已起来进行没收地主土地的坚决斗争，这时二五减租的口号是反革命的，足以使群众迷失斗争的方向，违反战略指导的原则。这时应坚决反对二五减租口号，领导群众一往直前的实行土地革命。在大革命时，国民党中的反革命者提出二五减租，目的在反对群众的土地革命，而不在改良。当时我们反对这个口号，完全是对的。

（二）广大群众还没有起来坚决斗争没收土地，但有

可能起来坚决为土地而斗争，并保护斗争的胜利，这时二五减租的口号足以作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走上土地革命的过渡口号，即首先经过二五减租的口号发动与组织群众，然后提高群众到为土地而斗争。这时二五减租的口号是完全革命的进攻的口号。这时我们在二五减租运动中宣传与准备土地革命，但反革命及改良主义者则可能在二五减租中宣传取消土地革命。这是我们与改良主义者的区别。

(三) 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还完全无组织，而且在相当的长时期内群众不能举行革命的进攻，或这种进攻完全无胜利可能，这时我们应利用二五减租的改良的合法的口号，来团结与教育群众，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以便等待适当时机举行进攻。这是把二五减租当作一般改良口号来利用的。拒绝利用这种口号是完全不对的。把二五减租当作我们的一切，当作我们奋斗的目标，也是不对的。而应该一方面要二五减租，同时又向群众指出目标在什么地方。但也不是经过二五减租立即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举行革命的进攻。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改良主义者取得一致。

(四) 在我们现在的时候，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不能不放弃土地革命的战略要求，二五减租即成为我们目前的战略口号之一，而不是以前的策略口号的性质了。在根据地内实行二五减租，即是战略指导的实行之。在目前，我们不是经过二五减租到土地革命，而是一般的即以二五减租为止，在战略上不再前进（前进的阵地是还有的，将来怎样前进这里不说）。这是二五减租口号在目前的性质。

这就是说，在民族矛盾严重到如我之敌后根据地这样，对于土地问题，我们也要采取改良的办法，以便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加强与巩固封建势力）。因为这种改良，是在根据地实行的，是在军队、政权、群众团体由我们领导的条件之下实行的，而不是在地主资本家领导的政权之下，由地主资本家来实行，以加强与巩固地主资本家统治的。同是一个二五减租的口号，在各种不同条件之下，就有各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与作用。这就表明，策略问题是一个何等复杂的问题！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是何等的有害！

你的来信上所说的二五减租的条件，是属于第二或第三种条件。如把这第三种条件与第二种条件不分，亦将弄出错误。

关于你们在农研会的工作，我有以下几点感觉：

（一）你们应更进一步与乡村改良运动的团体合作，甚至在组织上与他们合并，成为他们中的一个派别——较有远见的派别（在组织上甚至不形成一个派别）。这样，你们不独在外面去影响改良主义团体，而且在他们内部去影响，起推动作用，以至影响与推动其上层，而你们又经过改良主义团体到民间去组织农民。在反动时期，应加入改良主义团体，而不应与有群众性的改良主义团体对抗。

（二）农研会不能也不应发展成为农民群众斗争的团体。农民群众团体由农民自己组织，自己斗争。农研会的个别分子（干部），以个人资格加入这种农民团体去领导农民（为了保存农研会的合法地位，它的个别分子去领导农民群众的斗争和组织，还应秘密，即在组织上农民斗争团



体与农研会无公开的关系)。如将农研会发展（或称转变）成为农民群众斗争的团体，那在反动时期的策略上即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农研会即离开了它原来研究的任务，实质上即不能再是农研会，而且要丧失农研会的合法地位。这与过去转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转变群众的文化娱乐组织为赤色工会，是一样的策略上的错误。

在你的来信上，对于以上几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弄清楚，故草此复你，望你们继续研究。你们召集当时一些人来加以讨论，是完全有益的事。至于当时你们是否有党的领导〔注〕，这不是重要的问题。也不一定要有党的秘密组织的领导，才能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结合，才能在群众中进行鼓动与进行群众的组织活动。这完全不一定就要行的。农研会的中坚可靠干部如能有周密的分工（有些人完全进行农研会的合法工作，有些人以个人面目到群众中去公开组织群众，有些人不出头的联系各方面的工作，月刊进行合法的宣传，另出一个小刊物进行对群众的鼓动及指导群众行动），即可能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在白区文化界的工作，主要的只做了合法工作与宣传工作，而没有或很少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把宣传鼓动工作与群众实际运动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极大的缺点。你们可参看我在《共产党人》上发表过的《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文章。对这个问题，你们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全党对这个问题弄清了的人也不很多。所以这还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祝好！

刘少奇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

---

〔注〕 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简称农研会)是受上海党组织领导的。

# 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及内战时期白区工作问题

——薛暮桥同志给少奇同志写的报告\*

## 一、白区乡村工作的策略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转入土地革命时期。当时，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基本方针是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广大农民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国民党坚决反对土地革命，实行对工农革命群众的最残酷的恐怖政策。但国民党中有一部分较有远见的人，主张用“二五减租”来欺骗农民，用“二五减租”来反对我们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一九二八年秋，浙江省党部颁布《二五减租条例》，规定佃租最高额为正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再按此数实行二五减租，因而规定最高租额为正产量的百

---

\* 当时刘少奇同志任中共华东局书记。我在华东参加整风学习时候，听了少奇同志关于战略策略问题的报告，读了他的两个关于白区工作的文件，曾经写信给他（此信尚未找到）报告我的学习心得，这是这封信的附件。为使读者容易理解当时情况，此次发表时少数地方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分之三七.五。但这减租条例受到代表大地主（张静江等）的省政府的剧烈反对，它通令各县政府禁止二五减租，甚至出布告宣称主张二五减租就是共产党。

到一九二九年，浙江省党部仍保持二五减租政策，并在自己的机关报上进行宣传；而省政府则继续反对。后来把这争执呈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解决，中央批准了省党部的二五减租条例。但是，政府方面对减租政策的反应并未停止。因此，只在若干县份（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有了基础的地方）部分地实行了二五减租政策；而在大多数的地方仍未真正实行。当时在各县都爆发了无数次的租佃纠纷，解决这纠纷的是地主豪绅所组织的仲裁委员会，当然结果终是不利于农民的。到一九三〇年以后，党部和政府间的矛盾解决，二五减租运动也被大家所忘记了。

一九三〇年，国民政府公布《土地法》，关于租佃关系方面采纳了浙江省的原则，规定租佃最高额不能超过正产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土地法》第一七七条），并禁止一切额外剥削。这些改良政策同样也未真正执行。一九三二年，广西省根据同一原则公布《耕地租用条例》，但这条例被各县政府以“恐怕引起纠纷”（因为他们根本反对二五减租）为理由而被收藏起来；个别的县党部把这条例张贴起来，但立刻由县政府派警察撕下来了。在其它各省，二五减租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

现在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白区乡村中间，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二五减租口号？是否应当用二五减租口号来公开动员农民？特别在浙江省，我们是否可以利用省

党部与省政府的矛盾甚至去同省党部进行妥协，建立二五减租运动的策略的统一战线？当时我们对这问题的答复似乎是否定的，我自己也模糊地反对这种妥协。当时我所持理由是：

（一）国民党政府绝无诚意来实行二五减租。所以，或者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完成土地革命，或者是继续在国民党统治下缴纳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中间的改良政策是不能实现的。

（二）一部分聪明的国民党员正想用二五减租来欺骗农民，来反对我们党的土地革命。如果我们也提出二五减租口号，会帮助这部分国民党，并模糊农民斗争的目标。

到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后，我们《中国农村》月刊才广泛地宣传二五减租，要求实行《土地法》的减租条文。当时我们认为，仅仅由于党的基本政策转变，所以我们可以提出二五减租口号，作为农民日常经济斗争口号之一。至于在这转变以前，即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是否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为着一定的目的而提出二五减租这一类的改良口号，我们对这问题仍然是模糊的，不敢下一个肯定的答复。但无论怎样，这个问题已提到我个人的考虑中来，而且按照当时我们对于改良工作的一般态度来说，我们对这问题是应当给它一个肯定的答复的。

最近听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战略策略问题的报告，看了他对白区工作的报告提纲。我确定地认为，过去无条件地反对二五减租口号，不去积极宣传二五减租，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

(一)当时除部分的乡村(苏区)有了革命的高潮以外,一般乡村中还没有离开低潮。在国民党统治最巩固的江浙,华北许多地方,甚至一九三二年以后的广西(苏维埃运动已经失败),一般农民还没有决心去同国民党政权进行武装斗争,只有公开的合法的斗争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引导他们到革命的战场上来;而二五减租正是适合农民要求的最好的斗争口号。

(二)正由于二五减租是国民党政府所绝对不能真正实行的,所以二五减租运动在它开始的时候,固然可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而取得一部分较进步的国民党员的合作;而当它继续发展的时候,必然会与国民党政府对立起来,发生严重的冲突,使农民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了国民党的欺骗手段,认识了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不可避免,而卷入土地革命的浪潮中来。

与反对减租运动同样错误的是反对参加乡村改良运动。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一般知识分子不满意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但又没有决心去参加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想找第三条道路,就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因此乡村改良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当然,不问他们的主观愿望怎样,他们客观上是帮助了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统治,成为地主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粉饰自己凶恶面目的装饰品。

但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当忽视在这些乡村改良主义团体(如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无锡的教育学院)中,是有着几千几万有良心的青

年，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着掩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为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在这里艰苦地工作着。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而喜悦，又为自己艰苦工作所获得的结果（农村破产）而苦闷，他们在矛盾中生活着，工作着，斗争着。

过去，我们《中国农村》月刊曾经大声疾呼地来批评乡村改良运动，指出他们的无希望的前途；这工作曾把一部分的改良主义青年争取过来。但另一部分改良主义青年（也许是一大部分）却对我们的批评发生反感。他们说：你们说我们的办法不对，那你们为什么不拿出具体办法来呢？为什么不具体地来实行你们自己所认为正确的办法呢？你们只会躲在租界上谈理论，却不会到乡村里来做一点实际工作。我们就有错误，但我们能够“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虽然我们不能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但总多少给了农民一些利益，比你们讲空话要好一点。

当然，我们是有具体办法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农村》月刊只能够用种种方法暗射，不能公开提出我们的具体办法（土地革命）来。我们也有几万几十万同志正在乡村中间（苏区）按照自己的办法“埋头苦干”，而且获得了比改良主义工作多出千万倍的成绩；但在当时消息封锁和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之下，白区一般改良主义青年是不知道的，甚至有人告诉他们也不相信的。他们的感觉是土地革命太可怕了，最好还是改良，你叫我们放弃改良工作，难道希望我们回到家里去吃饭不做事吗？

后来，我们《中国农村》月刊一面批评改良主义，一面要求这些青年不要离开改良工作，而要利用改良主义工作给他们的各种机会去教育农民，组织农民，甚至武装农民，准备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这种态度我觉得是正确的，而且也曾获得了相当的效果。许多改良主义团体中的优秀青年，在我们影响之下卷入救国运动的浪潮中来。但这样一个巨大任务，单靠一个公开刊物当然担负不了。我们的工作仅仅止于宣传教育，除吸收少数优秀青年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外，不能进一步去担负组织广大乡村工作青年的工作。因此，他们（乡村工作青年）就是做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准备工作的，也还是自发的，自流的，因而所收到的效果也是不大的。

我想，假使那时白区的党派遣大批优秀党员到各种乡村改良工作团体里去，用自己正确的政治主张，模范的工作态度，刻苦耐劳的生活，去影响这些改良主义青年，团结他们在自己的周围，并利用改良主义的各种合法组织（民众学校、乡农会、合作社、自卫队等无数种的类似组织），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这样我们恐怕不但能够保存，而且能够发展白区党的组织，能够在广大的白区乡村中团结农民，准备力量，并利用各种方式的斗争（例如二五减租运动），来配合苏区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特别是配合“九一八”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根据我自己两次在改良主义机关（民众教育馆）工作的经验，痛恨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青年很多，甚至包括国民党的党员，我觉得这些工作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内战时期我们在白区城市工作的失败，还可以推诿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强固（当然不能说是主要原因）；但白区乡村工作的没有成绩，不能够在白区乡村中保存并发展党的组织，那就只能承认是由于主观的策略的错误。当时国民党在乡村中的统治，一般来说是薄弱的，动摇的（因为农村破产完全无法挽救），甚至地主乡绅都不相信国民党能长久统治下去。在改良主义团体中，除一部分（例如江西）合作运动外，国民党的势力也很薄弱，在那里是有很多空隙可以让我们自由活动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在策略上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呢？我觉得主要由于我们对下列几个问题的错误认识。

（一）无条件的反对改良，反对妥协，因而拒绝任何改良运动，拒绝到任何改良主义团体中去工作。

（二）不善利用甚至不愿利用合法斗争和合法组织形式；更不懂得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配合。

（三）不善利用甚至不愿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以为利用矛盾就是帮助敌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四）不了解、不承认改良主义运动在群众中的影响，因而不主张到改良主义团体中去争取群众。

过去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提出来检讨的。因为直到现在，除少数负责同志之外，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全党同志的深刻注意和热烈讨论。我自己过去虽然参加了这一工作，并在策略问题上获得一点经验；但有系统地来研究这些问题，从原则上来检讨这些问题，只能够说直到最近方才开始。假使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结论，

那么将来在类似的情况下，过去的错误是可能被许多同志所重复的。所以我想更进一步，把我自己所做工作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 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若干青年，为着具体地来研究中国社会性质，在陈翰笙先生的领导下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工作。到一九三三年，以这一部分青年（当时已经分散各地工作）作为骨干，再加上曾经参加农村调查工作的几十个青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下简称“农研会”）。一九三四年秋天，各地负责会友在上海集合，决定出版一种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刊物——《中国农村》月刊（以下简称《中农》）。从此以后，农研会便一天天发展起来，成为与各乡村改良主义团体对立着（革命路线与改良主义路线的对立）的一个重要力量。

《中农》第一年（一九三五年年底为止）的重要工作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理论，发表若干整理过的调查材料，特别是与托派进行了半年以上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而且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后来把重要论文编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一书）。

第二年（一九三六年）一面批评乡村改良运动，把我们的影响打入乡村改良主义团体中去（后来把重要论文编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批判》一书），一面响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主张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建立乡村

工作人员的“大团结”（因为不能公开采用“统一战线”这类名称）。在那年秋天准备召集的全国乡村工作年会（晏阳初、梁漱溟、高践四等发起，已有几年历史）中，我们的主张获得了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结果，这个年会被少数发起人临时取消了（因为他们害怕在年会中公开提出抗日救国主张）。我们准备在大会中散发《中农》特辑，登载了我们与生活教育社、中华农学会等数团体所提出的共同纲领，和各重要乡村工作团体（平教会、乡建会、教育学院等）负责干部的拥护团结抗战主张的文章。

第三年（一九三七年）的上半年，我们继续宣传团结抗战主张，并进一步提出抗日救国和政治上经济上各种民主改革的具体办法。对召集国民大会，颁布《五五宪草》问题，国民经济建设问题，暑期乡村服务运动<sup>①</sup>等等，我们都曾及时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博得各地青年的同情。因为我们处处运用三民主义和中山先生言论甚至蒋介石的某些言论来作斗争工具，因此我们的宣传未被禁止，能在全国范围广泛传播。

到“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和内地间的交通阻隔，我们决定离开上海，同月二十六日我到南昌，立即出版《中

---

<sup>①</sup> 暑期乡村服务运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蒋介石为怕学生聚集在城市中举行抗日宣传，号召学生分散到乡村去“服务”。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号召学生到农村去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要求民主，要求减租减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大部分会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农村去领导农民武装斗争，他们参加新四军、八路军，对苏北、苏南、浙东、皖北、山东等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农村战时特刊》(半月刊)。当时时局突变。内地青年急欲知道今后努力方向；但有一时期上海一切刊物都不能够寄到内地。因此《中农》特刊的出版，受到内地青年空前热烈的欢迎。南京沦陷以后，《中农》迁往长沙、汉口出版，因为上海文化界向汉口撤退，同时党的《解放》和《群众》出版，《中农》的影响大大降落。这时，我们曾与晏阳初、梁漱溟(新自延安回来)等谈判建立乡村工作统一战线；但主要因为晏、梁间的剧烈冲突(争夺领袖地位)，其次由于我们自己对这工作的不够积极，没有得到结果。

武汉沦陷前后，《中农》迁往桂林出版，直到现在仍未停刊。它的态度基本上仍没有改变。

回想过去几年的工作，获得了这样几点成绩：

(一)它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公开宣传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如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问题，土地问题，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基本上没有违背党的正确方针。我们在理论上战胜了反革命的托派、各种改良主义派别，使党的主张获得广大青年群众、特别是乡村工作青年的拥护。

(二)我们批评了乡村改良运动，把他们的中下层干部几百人争取过来，成为“农研会”的会员，在“农研会”的领导下参加了各地救国工作。几年来(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后的一个时期)，我们完全依靠各地青年自动的积极的援助(投稿、捐款、负责推销等等)而把《中农》维持下来。

(三)我们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乡村工作统一战线运动，对各乡村改良团体一面作严正的批评，一面作诚恳的联

合，使全国有势力、有地位的团体，如中国地政学会（国民党最有权威的学术研究团体）、中华农学会（大学教授们的团体）、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建设研究会等，不得不来倾听我们的意见，并与我们建立各种非正式的联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政治上已获得胜利，但在组织上则没有完成。

（四）但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若干严重的弱点。这首先是我们的影响仅仅及于乡村工作青年和各地知识分子，没有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至多只通过乡村工作青年而给农民群众一点间接的影响。

那么，我们为什么获得这些成绩，同时又无法克服这些弱点呢？我觉得主要由于：

（一）我们的工作通过若干党员得到了党的政治上的领导，但很少得到内地党的组织上的支持。因为党的理论和政治主张是正确的，而我们能相当正确地把握党的理论和政治主张，所以我们能在思想斗争上获得显著的胜利。但组织上我们与内地党的联系非常不够。一方面，当时上海党的组织已经在几次破坏后弄得异常脆弱，在白区乡村中更没有党的组织来配合我们的公开宣传工作；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没有充分认识同党的组织上的联系的重要性，甚至认为不参加秘密组织反而会使我们的公开工作更加便利。因为这个缘故，使我们与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不能建立组织上的联系，不能发动一个群众的轰轰烈烈的斗争。

（二）我们能够利用一切社会关系进行公开工作，取得

合法地位，但无秘密工作与之配合。我们利用各种上层关系，使“农研会”和《中农》能够在政府和国民党党部登记（当时他们以为这是农村复兴委员会的附属团体和半官方性的刊物），能够在法租界巡捕房登记。在《中农》被禁止发行的时候，又能利用各种上层关系迅速解禁，仍能按时出版。我们使若干有声望、有地位的进步人士（吴觉农、孙晓村等）来参加“农研会”和《中农》的领导机关，若干进步的政府委员来赞助我们的工作。但这种公开工作因无秘密工作与之配合，所以至多只能够使群众痛恨现存社会秩序，并模糊地看到了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远景，而不能领导群众斗争，使这斗争向着更高阶段发展。

（三）我们能够采取比较灵活的宣传方式。如在宣传三民主义形式之下，要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工农生活；利用每一事变，以至国民党的每一号召（例如暑期乡村服务运动）来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提出我们自己的主张；利用孙中山甚至蒋介石的一切比较进步的言论（纵然这些言论目的只是为着欺骗民众），和国民政府的一切比较进步的法令来进行宣传，要求兑现，并批评它的不彻底性（如对《土地法》和土地法的《修正条例》，对《农会法》和《五五宪草》等），而最后归结到实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民主改革，动员民众力量，准备武装抗日。

（四）我们在思想斗争中一面批评了改良主义者和现状维持派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一面又批评了公式主义、教条主义者的左倾空谈（如在当时提出“土地国有”等类口号）。我们在批评地政学会的土地改良政策时候，不

斤斤于条文的挑剔，而着重指出实现这些改良政策的不可少的社会力量，而把注意力转移到组织农民、准备群众力量问题上来。在批评乡村改良运动时候，同样也不限于消极的批评，而从积极方面指导青年怎样在改良主义团体中去工作，利用这些合法组织去教育农民、组织农民。这样就连他们的一些上层领导者也对我们的主张表示相当的同情。

总结我们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我们的策略运用有正确的地方（不是根据战略策略理论研究，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所得到不自觉的结果），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但一般讲来，在当时主客观的条件下，我觉得我们的努力已经获得了应有的收获，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特别在检讨过去的关门主张、盲动主义恶劣传统时候，有些原则是值得提出来，以供同志们研究的。我的意见是否正确？希望给以批评。

# 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 和深刻教训

李志民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过“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过去，人们往往以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其实，“左”和右的倾向都是错误的，都给我们党和军队造成过很大的危害与损失。尤其是“左”倾冒险主义，拉起革命的大旗，喊着革命的口号，带有更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因而对全党的统治时间更长，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更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东方军的经验教训就是有力的证明。

## 东方军的组成及其历史背景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九月，我们红一方面军在总前委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与指挥下，连续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一九三一年底，红军又英勇出击，攻克了许多城镇，缴获敌人大批武器弹药来补



充、壮大自己，巩固、扩大了中央苏区。通过三次反“围剿”作战，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军（包括各个地区的红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指出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十六字诀是一九二八年提出的；“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八八页）

但是，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并未重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他们不了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无视敌强我弱、革命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的客观现实，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主观地认为当时苏区已经巩固，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从而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以及“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正确的作战原则，提出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党的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这种“速胜论”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六月五日的军事训令，作出了《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应迅速地求得赣江流域的连续

胜利，以夺取赣州、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城市为目的”；并要求闽西苏区“应以主力向闽北发展，造成广大的苏区，与赣东北苏区打通，成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东方一翼”。由于决议通过后不久，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开始，红军主力未能入闽去争取江西“东方一翼”的胜利，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才组成“东方军”入闽。

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同，毛泽东同志根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的新形势，积极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通过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的卖国阴谋，以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同时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仅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而错误地给他加上“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游击主义”、“右倾保守主义”等大帽子，不断排挤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他们借口政府工作的需要，让毛泽东同志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撤销他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下旬，在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苏维埃主席的同时，免除了他的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只安排他为中革军委十五名委员中的第十二名委员；一九三二年十月又免去毛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亲任“剿共总司令”，出动了五六十万兵力，对我进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开始，敌人对我中央苏区采取守势，首先围攻鄂豫皖、洪湖两根据

地，以解除我红军对武汉的威胁。接着，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又亲自到南昌督战，集中兵力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当时毛泽东同志虽然已离开了红军，但由于作为全党军事经验总结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早已深入人心，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红军中还不占主导地位，在直接参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的创建的周恩来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的正确指挥下，每次战斗仍按照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所以连战皆捷，至三月二十一日就歼灭国民党“进剿”军三个师大部，活捉李明、陈时骥两个师长，歼敌二万八千人，缴枪万余，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战斗中发展到十万人之众。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充分肯定了第四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正确和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第四次“围剿”中的惨败。为此，蒋介石曾手谕陈诚，沮丧地哀叹：“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其狼狈程度可想而知。

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在白区难以立足，被迫撤到了中央苏区。五月十二日，中革军委加委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并以军委主席朱德同志率第一方面军在前方指挥作战为由，委任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达八个月之久，指挥全国红军，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更直接地在苏区和红军中得以推行。

“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尽管每次胜利都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坚决抵

制中央的“左”倾错误指挥的情况下取得的，但这些阿Q却盲目地鼓吹这次胜利是执行他们的“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和实际工作”的结果，从而更助长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左”倾冒险主义在红军中泛滥成灾。王明、博古和项英等人本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特别是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又丝毫不吸收粉碎一、二、三次“围剿”的丰富经验，更不重视战场指挥者的实际经验，不调查研究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具体情况，盲目地主观地提出许多“左”的口号，确定了许多不能实现的紧急任务：什么“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打正规战”，“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等等，生硬照搬苏联的一套经验。博古等人还竭力依靠、抬高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十月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之后，博古、项英更是放手让他掌握红军的实际指挥权，使他成为包揽军委一切工作的“太上总司令”，从而实际上剥夺了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军事指挥权。

他们提出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就是把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两个主力部队分开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本来从一九三〇年以来，一、三军团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指挥下，从来没有分开过，并肩作战，拧成一股绳，所向披靡，形成一个无坚不摧的拳头砸向敌人。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决策下，两个主力部队被分割，打击敌人的力量被分散。一九三三年夏，他们害怕根据地的坛

坛罐罐被敌人打烂，以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于江西的宜黄、乐安、南丰一线，正面牵制崇仁、金溪之敌，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使它失去机动灵活歼敌的机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又一度以一军团为主改组为“西方军”，节节阻击“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同样失去机动作战的机会）。同时，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下令，以三军团（暂缺红六师）为主，包括福建的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滕代远同志为政委。为配合作战，还命令红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部分分区的地方武装亦统归彭、滕就近指挥。东方军组成后，七月二日，三军团即率红四、五师由江西广昌的头陂地区出发，分两路经新安、丹溪和驿前、石城向福建进军，于七月五日到达宁化以西地区集结，执行收复闽西沦陷的连城、新泉苏区和开辟闽北新苏区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当时因为没有一军团的协同配合，东方军虽然奋力苦战，但孤军奋斗，搞得疲劳不堪，未能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 东方军的历史功绩永垂青史

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在红一方面军周恩来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的正确领导下，在东方军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滕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因病调离后，杨接任政委）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艰苦奋斗，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仍然打了很多胜

仗，歼灭了大量敌人，打开了一些城镇，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充了红军，筹集了大量物资，部分地解决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穿衣、吃盐等等困难。东方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东方军向福建进军之后，几乎每战都是经过周、朱、彭、滕诸同志与“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在往返电报中反复争论，甚至激烈斗争才取胜的。入闽第一仗是拔除宁化县的泉上土堡。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地处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建宁数县毗邻之处，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个土堡墙高约二丈五尺，厚二丈余，相当坚固；驻有国民党军阀卢兴邦师第三〇七团，并有宁化、清流、石城、长汀四个县的残余地主武装四百多人；储有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数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反动堡垒，威胁着附近苏区的安全，也是东方军向东运动、扩大苏区的极大障碍。所以东方军决定首先拔掉这个钉子。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当时心目中只有中心城市，即使一时打不了大城市也要打县城，完全不把小小的泉上土堡放在眼中。所以，他们不顾实际情况，下令东方军首先攻打清流县城。

当时的争论，给东方军作战造成极大困难。七月四日，彭、滕电请第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转中革军委项英代主席，提出：“清流、泉上、嵩口仍为卢逆，共四团无变化。首先消灭泉上之敌，后再同时攻击嵩口、清流之敌。此举我有集结主力随时打击增援敌之便。”

同时说明，清流城堡坚固，敌人利用天险加修工事，袭击万一不克，要延误时间，再从火线撤下打增援之敌，将影响士气。这些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的战斗部署，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战术原则，很快取得朱、周同意。七月五日，朱、周回电指出：“如敌情无变化，三军团应首袭泉上，占领后迅速取得归化，以一部断嵩口通永安联络，相机截击永安或连城来援之敌。”但是，七月六日项英回电，却极端主观地认为：“对东方军目前的行动，如就来电所云，事实上仅能消灭泉上、归化之敌，即转移北上，绝无可能打击连城援敌。”“泉上、归化均属城围，工事虽较清流易攻坚，则我意仍以清流为攻击目标，坚决消灭三团人，连城敌有增援可能，若消灭援敌对东南、西南战线有大影响。”

正当周、朱、彭、滕与项英争论之际，七月九日，卢兴邦部的旅长张兴隆率第三〇九团从清流增援泉上。彭德怀、滕代远同志根据原定“围点打援”的战术原则，除令红五师主力继续包围泉上，努力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外，即令红四师在离泉上三十余里的延祥设伏，准备歼灭援敌。

泉上通延祥的小道上，两旁均为高山峻岭，中间是一狭长洼地，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点。这一天，敌三〇九团刚进入伏击圈，红四师张锡龙师长、彭雪枫政委立即发出攻击命令。红军战士先是从两侧山上居高临下以火力杀伤敌人，然后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只一小时激战，就干净利落地全歼敌人这个团，无一漏网。接着，红四师乘胜追击，进占清流东北的嵩溪；独立红七

师进占清流西北岭下、田背一线；红三十四师进占清流西南的雾阁地区，从而切断了清流与泉上的联系，进一步孤立泉上敌人。同时，红五师第十三团也乘胜东进，歼灭归化守敌一个营，解放了归化城。

延祥伏击战的胜利，为攻克泉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证明“围点打援”战术的正确。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急于要进攻清流和连城守敌，七月十日又电令东方军“只留一团围攻泉上，并由该团抽出一连为基干，领导归化东北游击队，巩固归化”；同时命令主力部队大部分立刻转移到清流南面，准备消灭清流撤退之敌，或配合三十四师打击连城增援清流之敌。

在此情况下，七月十一日，朱总司令、周总政委不得不给项英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指出先袭泉上后逼清流才易于打击敌人增援部队，不能采取积极进攻清流域的办法；并指出以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及令红十九师渡将乐河南下都是不妥当的，因目前多雨，山水时涨，闽省各河流急水深，大兵团运动不便，加以天热多病，三军团沿途已留下五百多病员，请项英“决定部队行动稍稍顾及此点”。在另一封电报中转达了彭、滕的意见，力言即刻移兵清流南岸，“围攻泉上巩固归化留一团兵力万万不足，因泉上敌之兵力超过八连人。我主力南移，连(城)敌如不动，清流敌可北向，解泉上围，我成隔岸观火，迂回过河须三天行程，现三军团每日搜山征发，只吃两餐稀饭尤不利这样行动”，并明确表示已复电令彭、滕依预定计划有步骤地争取胜利，要求项英：“请勿急，尤请勿直接命令彭滕，使他们



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其不能机断专行。”次日，彭、滕又将围攻泉上、清流、连城的意见电告项英，强调指出：“泉上土围敌八个步兵连，机、炮各一连，地主武装百余人（注：后查明有四百余人），一团围一团是不够的。况反动的童子军、大刀会在外面扰乱，因此再无力顾及归化。”在朱、周、彭、滕据理力争下，项英等人才缓和口气，回电朱、周并转彭、滕，解释说：“我送电你们不是命令，而是提出某一阶段中作战意图……。”但仍软中带硬，固执地坚持己见。

七月十四日，在东方军围攻泉上土堡，并接连取得延祥、归化战斗胜利的有利形势下，红三十四师在清流与连城之间的安乐、雾阁一带也积极开展游击战，配合主力切断清流、连城之间的联系。盘踞清流的卢兴邦主力三个团慑于我军的威力，弃城向永安撤退，红三十四师经安乐向秋口截击未获，于雾阁与马屋附近击溃从连城增援清流的敌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个团，乘胜占领了上堡。红四师第十团、十一团和独立七师乘胜进占了清流域；红四师第十二团亦向嵩口坪、秋口推进，牵制连城守敌。

此时，敌七十八师还有两个团在雾阁附近的四堡。项英获知这一情况，并得悉连城敌人还可能派出三、四个团增援四堡的情报，没有通盘考虑整个战局，七月十六日便匆忙以“十万火急”电令东方军放弃泉上，立即南下配合三十四师歼灭四堡敌人这两个团，并准备歼灭连城援敌三、四个团，同时严令“部署中应注意不使该两团撤回连城固守，而成相持之势。”

周恩来总政委接到项英这“十万火急”的电令后实在感到为难，马上复电提出意见：“泉敌不应放走，围攻至少要两团（两团无外围敌有突围可能），立即以四团兵力配合三十四师袭击四堡（四堡有工事），打增援队则火力不足。”“调十九师接围泉上，以三军团全部南移则须延迟三天，泉上到四堡三天又恐四堡之敌情有变化。”但周总政委在提出意见的同时，为了执行军委项英的“十万火急”电令，还是尽最大努力，命令在将乐县白莲地区的红十九师迅即南下，两天以后赶到泉上去接替三军团围攻泉上的任务，以便三军团腾出手来，集中兵力全部南下，同时，命令三军团除留足兵力继续围攻泉上，等待十九师来接围外，其余主力部队立即集中清流，经安乐、雾阁之西，秘密运动，配合三十四师袭击四堡。事实证明，不待我三军团南下，四堡两团敌人早已撤回连城，项英“十万火急”电令只是主观臆想而已。

七月十九日拂晓，围攻泉上土堡的红五师第十五团完成了坑道作业，把土硝装在棺材内，推进坑道炸开土堡围墙，趁硝烟弥漫之际，勇猛冲入堡内，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干净利落地全部歼灭守敌一个团。至此，延祥和泉上两战共毙敌四百余人，其中团长一人；俘敌一千二百余人，其中旅、团长各一人，营长三人。缴获步枪一千一百余支，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七挺，驳壳枪六十支。此外，俘虏宁化新旧县长二人，宁化、清流、归化等县逃亡地主恶霸及地主武装三百余人，缴获大批现款、粮食、食盐等物资。

东方军首战告捷，拔除了泉上土堡，解放了清流、归化两县大片土地，军威大震。为了总结入闽以来几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周恩来总政委于七月二十日特地就“关于打泉上战略部署的争论问题”致项英一封电报，批评项英等人不顾实际情况和可能，连日频频来电，喋喋不休地催促部队攻打清流及南下打连城，并严肃指出：“我们争论并非意图不同，更非不认识主要突击方向或总攻下泉上即应北上与东向”，“我们不同，乃在我们判断连（城）敌援不是如你所料，不主张三军团主力立刻过清流河及南下……而你主张分兵南下，这是战略实施在战术上的问题，须估计到当时当地敌情、地形与我兵力、给养条件等，我坚持执行已定步骤（每一步骤是有前后接应的）达到胜利”。周恩来同志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语，对“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主观主义的指挥方式是个有力的批评。这些事实也足以说明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的正确和英明，足以说明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

东方军军事上的胜利，为开辟新苏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盲目要求扩大战果。他们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就提出：“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把古田会议确定的红军三大任务缩小成只有打仗一项。所以解放这些地方后，不待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新区，

便匆忙命令部队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必须由北向南进攻。他们坐在江西瑞金，不了解福建连城的实际情况，不接受攻打泉上作战部署争论的教训，仍在那里瞎指挥。

连城、新泉原为我闽西苏区，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被十九路军侵占。所以，当我东方军围攻泉上土堡时，红三十四师及红四师一部分兵力已先后奉命进至连城周围，准备待机收复。

当时十九路军的六十师沈光汉部驻在龙岩至新泉一线；七十八师区寿年部驻在连城及四堡周围；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则驻扎闽中的泉州、永春一带作为机动。区寿年师是这次进犯我闽西苏区的先头主力师，辖两旅六团，师部还配有炮、工、辎重、特务等直属分队，总兵力约万余人。该师全系德式装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数第一流的军队，战斗力较强，又据守着连城坚固的野战工事，确是易守难攻。但项英全然不顾这些实际情况，命令东方军当即攻取连城，并按地图所标示的位置，给东方军划定了由北向南进攻的路线。

那时正值七、八月天气，闽西天热如焚。彭德怀同志为弄清敌情，亲自带领侦察排到第一线侦察了一天，发现按项英的规定由北向南进攻连城，我军完全处于仰攻地位，地形对我十分不利，连攻击点也找不到，实在无法完成任务。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距离连城东南约七十里的莒溪，驻有区寿年师丁荣光的四六七团大部，另以该团之黄康营驻守离莒溪西北二十里的朋口，守卫龙岩至连城和龙

岩至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口要道，作为丁荣光团的前哨营。如果我军选择朋口作为突破口，必然可以调动莒溪及连城之敌出援，在运动中消灭它。但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给前线指挥员一点机动权，谁也不允许改变他们的作战计划。面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滕代远同志以革命利益为重，还是实事求是地将情况电告朱、周转报项英，要求改变作战方案，经过反复争论，才获得批准。

七月二十八日，我东方军红四师和红十九师分别包围朋口、莒溪守敌，先后发动进攻。红五师和红三十四师则在外围担负牵制连城敌人、打击增援部队的任务。区寿年闻讯马上从连城派出四六六团钟经瑞部火速增援莒溪、朋口。我红五师第十三团早于二十九日清晨就抢占了朋口东侧的高山，控制制高点，敌钟经瑞部也企图争夺这个制高点。红十三团立即以一营迂回敌后，猛烈夹击，将援敌钟经瑞团全部歼灭。接着，全力围歼朋口、莒溪之敌，将敌四六七团丁荣光部和所属黄康营全部歼灭。

八月一日，东方军所属红四师、五师、十九师、三十四师于连城东面的下堡胜利会师，欢庆建军六周年。在庆祝大会上，彭德怀司令员和政治部袁国平主任都讲了话，鼓励全军指战员继续英勇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当晚还举行庆祝晚会，三军团和各师宣传队演出文艺节目，锣鼓喧天，歌声飞扬，全军上下一片欢腾。

区寿年得悉其四六六、四六七两团全部被歼，急电请示漳州十九路军总部。十九路军总部恐区师被我全歼，八月二日即电令区师放弃连城撤至永安，并令驻闽中之六十

一师毛维寿部派出一个旅赶到大田、永安，掩护区师撤退。八月三日，区师尚存的四个团及师直属部队刚撤至连城县的姑田镇，我东方军红四师、十九师、三十四师追击部队已经赶到，一阵猛打猛冲，区师顿时大乱，纷纷丢弃枪械、行李、辎重，夺路而逃。我军直追到小陶，再歼区师一个团，打得敌人惊慌失措，草木皆兵，一昼夜狂奔一百七十里逃至永安，狼狈不堪。

敌六十师沈光汉部闻讯，恐被我歼灭，迅即从新泉一线缩回龙岩；六十一师毛维寿部驻扎泉州、永春一带，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一仗，我东方军共消灭敌七十八师区寿年部一个旅三个团，俘敌官兵二千余人，其中旅长一人，团长二人，缴枪二千余支，军粮一千五百担，对国民党十九路军震动极大。这是十九路军参加反共内战史上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击。从而使该军认识到反共只有自取灭亡，也是以后该军政治上从“反蒋反共抗日”转变为“联共反蒋抗日”方针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出所料，我东方军攻下朋口后，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连城、新泉苏区，并乘胜追击，开辟了泉上、清流、归化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完成了第一阶段在闽西的作战任务。东方军利用这个时机在连城进行十天整训，补充兵员，准备执行第二阶段向闽北进军的战斗任务。但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只让部分地方部队开展一些宣传活动，仍不让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巩固胜利成果，八月十三日电令主力部队立即北上进攻洋口、延平（今南平）。所以在闽西占领的地区虽然不小，已有八、九个县，

但都似猴子摘苞米，摘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下来。

八月十六日，东方军除留红三十四师驻守连城外，其余部队即挥师北上，开始第二阶段的作战。我们从连城出发，经清流、归化到沙县境内，解放了夏茂、高桥等广大乡镇，于八月下旬攻占了闽江上游的两个主要商埠——顺昌县的洋口和延平县的峡阳，击溃蒋军五十六师刘和鼎部三个团，缴获机枪四挺，火轮三艘，食盐十五万斤，和大量其他军用品。接着，东方军的红四师、五师、十九师又将顺昌、延平隔断并围攻两城。红六师（原兴国模范师）及红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也从江西黎川及福建泰宁南下，包围将乐县城。此时，第一方面军指挥部已从江西东移，经建宁抵达泰宁县城组织指挥。至此，刘和鼎之五十六师即被我分割包围，如惊弓之鸟，在延平一面拼命加固工事，一面不断向十九路军发出求援急电。

八月二十七日，彭德怀司令员亲临顺昌城外观察地形，了解到顺昌城三面环水，只有北面可以进攻，而北面炮楼却很坚固，砖厚楼高，不易接近，且城外二、三十里房屋极少，不便于进行坑道作业接近爆破。同时，据侦察员报告，将乐县城也是三面环水，西北面又有高山，可以凭险扼守；延平这座山城素有“铁延平”之称，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根据这三座县城的地形和敌我态势，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决定仍坚持采用“围城打援”的方针，加紧佯攻延平，把水口、沙县十九路军这条大鱼钓出来，消灭增援之敌。

可是，当时十九路军蔡廷锴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益尖锐，蔡廷锴为保存实力，不愿积极增援延平刘和鼎部。我东方军在洋口、峡阳等地多次欲诱敌深入，歼灭其增援部队均未能实现；我围攻将乐、顺昌的部队又久攻不克，所以整个战局自八月中旬开始就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八月底，蔡廷锴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才开始部署增援延平的兵力：令第六十师沈光汉部由龙岩进至永安，第六十一师毛维寿部由泉州经大田县向沙县集中，他亲率补充师谭启秀部进至水口、尤溪口两岸地区，小心翼翼地向着延平方向接近。九月三日，我东方军一部沿闽江北岸直奔水口方向，准备截击援敌。行至夏道镇北岸时，俘敌前卫排，从审俘中得知敌人分乘数艘汽轮，拖着十几条木船到夏道码头，有的上岸做饭，有的还在船上。彭德怀、滕代远同志听汇报后，即令红四师第十团从上游渡江，红五师第十三团一部就地渡江合击敌人。渡江部队迅速抢占对岸山头，然后两岸部队以机枪、迫击炮猛烈夹击，消灭敌人一个营，余部向水口奔逃。我红四师乘胜追击到福州北四十里之水口，又击溃敌两营。这一仗我缴获重机枪三挺，步枪百余支，汽车二辆，汽轮八艘，子弹四轮船，食盐七万斤。

这时已到九月中旬，东方军又转到延平的西芹，待机歼灭来自沙县的援敌。当时敌十九路军最精锐的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已经进驻沙县，企图以部分兵力先占西芹，掩护主力继续增援延平。我东方军闻讯即令红五师第十三团连夜出发，截击来敌。九月十八日晨，与敌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郑为辑部及七十八师一个营、五十二师一个营共五个



营在木芹山遭遇。木芹山是茅草丛生的大荒山，为抢占制高点，红十三团战士不顾一夜行军疲劳，奋勇抢占了木芹山主峰。敌人也拚命争夺主峰，战斗十分激烈，最后在山巅上展开肉搏战。在我红色战士勇猛冲杀下，敌人溃不成军，一批批缴枪投降，我军乘胜直追数十里。号称十九路军中最有战斗力、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三六六团，这一仗就被我东方军红十三团全部消灭。我军创造了一个团的兵力在运动中歼敌一个团的新战绩。东方军全体指战员士气十分高昂，热烈欢庆胜利；苏区群众听到捷报，个个喜气洋洋。

## “左”倾错误领导严重削弱 东方军的战斗力

一九三三年秋，正当东方军频繁作战、连续取胜的时候，犯“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不仅在军事上继续推行一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而且在组织上也竭力推行极左政策。他们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过分强调红军领导骨干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分子，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搞乱了干部队伍。当时部队绝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除了长沙、安源的一些矿工外，手工业工人也照样提拔起来，而且一下就提为团、师政委，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这样，就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指挥和政治工作。同时，他们还大

搞查田查阶级运动，查到谁是地主出身，不问是否属实，表现如何，斗争历史多久，就说谁是阶级异己分子，将他们开除出红军，摧残了许多有用之才。

他们刚进行过“肃反”运动，又以反“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各种罪名，大搞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对不坚决执行他们的错误主张、而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的好干部则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批地进行惩罚和撤换，随意提拔同他们气味相投、只知随声附和的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作风。家长制横行，一言堂成风。尤其是在福建、江西和红军中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打击面更宽，影响更坏，危害也更大。

事实真相是：一九三三年，罗明同志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并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以指导前线的工作。他对闽西情况比较熟悉，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大胆地向党中央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谈到要积极坚持岩（龙岩）永（永定）杭（上杭）地区的游击战争，这个边沿地区条件比较困难，“赤化千里，筹款百万”应因地制宜，所有土地税款等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留一部分作为地方的机动费用，否则脱离生产的游击队等人员无法维持生活。还谈到“创造百万铁的红军”也应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除动员一部分兵员补充主力红军外，还应动员一部分兵员补充地方武装，以锻炼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更好地保卫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扩军”工作中，也要量力而行。因为苏区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几年来动员再动员，扩大再扩

大，究竟要动员、扩大到什么程度，需要有个限度；不能无止境地扩大。如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罗明同志虽然一再写信给省委转告党中央，说明前线这些实际情况，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根本不予考虑，仍坚持要边沿游击区上缴一切税款和扩大百万红军，并认为罗明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是反对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于是在组织上普遍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并错误地认为在红军党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尤为重要，只有肃清红军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保障最大限度地巩固与扩大铁的红军，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这样就把地方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大到红军中来，引起东方军内部的严重混乱。当时，不少同志不明真相，被“左”倾空喊的口号所蒙蔽，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更有认为罗明就是“反革命者”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甚至罗明同志从前线回来，连炊事员也不给他做饭吃。他去理发店理发，刚坐下，理发师傅听说他是罗明，马上把他撵走，不给理发。罗明同志被撤了职，还有很多好同志、中高级干部也受到诬害、牵连。如保卫黎川的是我们闽赣军区一个五、六百人的独立团，蒋介石以三个师进攻黎川，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放弃黎川以保存有生力量是必然的。但“左”倾冒险主义者根本不体察实情，硬是给前线指挥员加上“退却逃跑”、“违抗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等罪名，撤销职务，开除党

籍，并拘捕交军事检察所公开审判。他们大搞惩办主义，以对罪犯和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党内斗争，使许多地方干部和部队干部均受到打击，搞得人人自危，党内、军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现象十分严重，大大削弱了东方军的战斗力。这场斗争的实质就是为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进一步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因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调动了五十万大军，分四路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北线部队已自临川、南城、贵溪等地向我进攻，侵占我黎川，形势十分紧张。

恰在此时，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闽北军阀刘和鼎、卢兴邦等部失去十九路军的支持，顿时陷于孤立。在这个对革命十分有利的新形势下，彭德怀同志发了电报给中央，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七、九军团出苏区，向闽浙赣地区进军，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并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这个正确意见未被犯“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采纳。博古还批评这个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其实彭德怀同志这个建议和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说过：“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

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一九页）

毛泽东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的正确建议未被采纳，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错误方针，他们震惊于九月二十八日黎川一城之失守，不考虑在闽北的东方军当时正值消灭孤立无援的刘和鼎敌军，向无敌人堡垒区大力发展苏区，粉碎敌人“围剿”计划的大好时机，命令东方军立即返回北线，企图收复黎川。

在“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下，十月初，作为东方军主力的三军团只好从延平、将乐、顺昌前线撤回泰宁集中，然后转向黎川方向前进。十月七日，当三军团行军到达江西洵口时，不期与敌遭遇，经过三天激战，消灭了敌军赵观涛第六师第十八旅（三个团缺一个营），生俘旅长葛仲山。当时，敌十八旅残存的一个营据守在山顶土寨子，虽然山很陡，不易爬上去，但山上无水，我们再围困它半天，即可迫使该营就歼。这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不待困死之敌被消灭，便命令立即向黎川以北白区敌人的巩固阵地硝石进攻。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正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

中心。当我军奉命进入硝石时，发现已钻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而且，泰宁以北之敌发现我主力在黎川方面，将向我泰宁进攻；黎川、南丰、南城之敌，亦将向硝石夹击我军。在这危急关头，彭德怀同志当机立断，连电陈词反对上述命令。最后总算复电允许三军团撤出硝石返回洵口、莲塘一线，才避免遭受严重损失。

十二月十二日，敌以一个师守黎川，三个师向福建、江西交界的德胜关推进。我三军团预先在半路埋伏好，当敌进至团村我伏击圈时，一声号令，我主力部队同时猛烈突入敌阵，敌军大乱，向黎川城内逃窜。我方四个师共约一万二千余人，击溃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共约四万余人。战斗虽获胜利，但俘虏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一个“击溃仗”。这一仗，从战略上看，“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实际意义并不大。据彭德怀同志以后回忆：“如果当时一军团在，我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 “左”倾错误领导造成东方军功败垂成

一九三三年十月初，三军团奉调返回江西之后，东方军没有主力支撑，在福建发挥不了作用，而三军团在“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指挥下，虽奋力苦战于黎川周围的硝石、团村地区，并一度转战于浒湾、琅琚、珀玕一线，但打的

大多是消耗战，未能机动自如地打击敌人。而正在此时，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正主动找我军联络，酝酿和发动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这对于我们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为有利。可惜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同样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没有积极支援十九路军，坐失了一个打击、消灭蒋介石反动军队、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时机。

这里要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与十九路军通过斗争求得联合的一些历史情况：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进攻上海，发生了淞沪战争。驻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官兵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国浪潮的推动下，违抗蒋介石不准抗日的旨意，奋起应战。从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打了三十三天，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在战斗中，由于蒋介石驻苏浙嫡系部队六十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坐视十九路军孤军苦斗，且克扣其军饷及海内外同胞捐赠的款项物资，使十九路军的抗战更陷于困境。三月三日，国际联盟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求之不得，马上逼迫十九路军撤离阵地，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与日本侵略军和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将上海变为“自由市”，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等等，实际上出卖了上海，牺牲了国家主权。

停战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抗日的非嫡系部队十九路军加以整肃。他本想把十九路军先调离京沪，然后进行

肢解，未达目的，乃改令十九路军到福建打红军，阴谋以十九路军消灭红军，或假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或使两败俱伤，他好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间，十九路军调到福建之后，背靠大海无处可走，面向苏区进退两难。当时十九路军广大士兵要求抗日，不愿打内战。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也知道“剿共”不能取胜，但从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出发，还妄想排除共产党和红军势力出闽西，在福建搞个“模范省”，统一全闽政权，联络广东、广西新军阀，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势。所以，他们在漳州、厦门登陆立足后，仍然服从蒋介石的调遣，利用我主力红军在江西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斗、闽西武装力量薄弱的时机，以七十八师区寿年部为先头部队，六十师沈光汉部后续，并调动闽西、闽南的土著军阀杂牌部队和反动民团，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行动，不断进犯、蚕食我闽西苏区和闽南游击区，于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侵占我龙岩，四、五月间又占我连城、新泉等大片苏区，并积极准备进攻我汀州城。一九三三年七月，我东方军围攻泉上，威逼清流卢兴邦部时，驻连城的七十八师区寿年部派出一个团增援清流，被我击溃；八、九月间，我东方军围攻延平国民党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时，十九路军又令六十一师郑为辑团前往增援，蔡廷锴还亲率补充师谭启秀部进至水口、尤溪口一线待机增援，均被我击溃。由此可见，当时他们虽有反蒋抗日的愿望，但在实际行动上仍然是反共与屈从于蒋介石的。经过我东方军消灭其区、毛、谭师各一部后，铁的事实教育了十九路军领导人，使



他们认识到继续反共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而要反蒋抗日，只有联合共产党才有可能，遂决定把“反共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反蒋抗日”。事实说明，东方军对十九路军作战的胜利，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东方军进军福建后，连战皆捷，造成了威逼福州的形势，蒋光鼐、蔡廷锴害怕十九路军被消灭，于九月中旬亲自写信并派过去是共产党员的陈公培为代表到前线找东方军联系，表示愿意和谈，共同抗日，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陈公培在延平附近的王台见到了东方军彭德怀司令员，陈公培表明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彭德怀同志开导他们说：“对，抗日必须反蒋，因为蒋介石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只有抗日才能停止内战。”谈完话请他吃了饭，留宿一晚。彭德怀同志又给蒋、蔡写了回信，对十九路军响应我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宣言，愿和红军合作抗日的态度表示欢迎，对十九路军过去反共压迫人民的行动，也作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正式谈判。陈公培走后，九月二十三日，彭德怀同志立刻将上述情况电告了中央。

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收到彭德怀同志回信后十分高兴，立即又派陈公培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到瑞金正式谈判。陈、徐到瑞金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晓以抗日救国大义，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反蒋抗日的决心。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

怀等同志对十九路军采取了联合、教育的正确方针，促使陈、蒋、蔡等人进一步酝酿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部署，在十月二十六日和我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之后，他们更感到无西顾之忧，遂于十一月二十日揭起义旗，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举事后不久，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聚会，感到放弃了国民党，没有个组织，处境不利，于是另行组织了“生产人民党”。原在十九路军中有活动、有发展的“第三党”后来声明解散，很多第三党人也参加了“生产人民党”。

无疑的，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一场斗争。他们的反蒋抗日行动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完全应该利用他们的矛盾，支援十九路军，一面发展抗日力量，一面牵制蒋介石的兵力，粉碎其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但是“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却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福建事变，错误地认为“第三党”与“生产人民党”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还反动，更带欺骗性，武断地认定：“‘人民革命政府’存在以来一个月多的事实，证明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这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要维持这个统治，为了阻止和妨碍中国民众胜利的反帝国主

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就这样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毛泽东同志、彭德怀同志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出苏区，威胁京、沪、杭，掩护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和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计划的正确建议未被采纳，坐失了有利的战机。

福建事变后，我红军未积极主动支援十九路军。阴险狡猾的蒋介石却看准了这个时机，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由北线抽调八个师的兵力沿光泽、邵武、顺昌一线，并从其他路线进攻十九路军，使刚刚诞生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面临覆灭的危机。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三十六师自抚州出发，到金溪停留两天，准备粮食，并规定每个官兵必须自带五天的粮食，非万不得已时不准食用。自金溪到邵武，都是崇山峻岭，坑深路险，敌人行军二十天，天天提心吊胆，对红军十分害怕，但红军始终未拦腰截击，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之后，蒋军嫡系第十师、八十三师又沿着三十六师的行进路线到达顺昌，红军也同样未予袭击。这样好的歼敌战机都被“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丧失了。

一九三三年底，蒋介石部队逼近延平，并以狂轰滥炸威胁十九路军官兵，用金钱、地位收买十九路军中一些将领，加剧了十九路军的内部分化，有的部队自行溃散，有的部队投降叛变，“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这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才开始有了“唇亡齿寒”之感，恐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后，会加紧对我进行“围剿”，因此下令再以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第二次入

闽，援助十九路军，但为时已晚。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遇事不是主观武断，就是优柔寡断，而且不给前线指挥员临机应变之权，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每次战斗都要由坐在瑞金的李德按作战地图进行部署，甚至有时连一门炮、一挺机枪应配置在什么位置上，都要由李德在电话里按地图标定。正因为他不了解情况，经常朝令夕改，来回折腾，搞得前线指挥员手足无措，经常延误战机。周恩来总政委对此十分气愤，不得不给博古、项英发电，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予部署命令之全权。电称：“连日电令屡更，迟在深夜始到。……使部队运转增加困难。请在相当范围给予我们部署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这才为东方军和其他部队争取了一些主动权。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三军团指挥机关奉命回师福建建宁，红四师、五师、六师亦于二十七日先后到达江西广昌的头陂集结。同时，军委令七军团指挥机关与红十九师指挥机关集中福建泰宁进行整编，合并为七军团，并将红三十四师划归七军团建制，全部拨归东方军指挥。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东方军编组就绪后，彭德怀司令员、杨尚昆政委发布“向东突击动作的命令”，一月四日，三军团由头陂一带出发，经安远、泉上、归化、夏阳，于一月十日到达沙县的富口地区待机。七军团的红十九师、三十四师也先后从泰宁南下配合行动。一月十一日，东方军开始包围沙县城。此时，蒋介石慌忙派其主力第四师由延平前来增援，我东方军红四师马上奔赴青州附近迎击敌人，将该师击溃，毙敌团长二人、营长四人，毙

伤敌军二百余人，取得第二次入闽的初战胜利。

打沙县是一次攻坚战，沙县城墙很厚，守敌新编五十二师卢兴邦部两个团的兵力防守严密，火力很强。我军决定爆破攻城。彭德怀司令员、杨尚昆政委和邓萍参谋长亲自部署并指挥工兵连挖坑道。彭德怀同志亲手教战士们用土硝、硫磺等配制好炸药，又带领战士们潜伏到城墙底下挖好坑道。一月二十五日拂晓总攻开始，一声巨响，把西门城墙炸垮了一角，我英勇的红军战士趁势冲进城内，勇猛冲杀，到早上七点钟沙县就被我占领，守敌全部被歼，共消灭敌人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一千三百余人，缴获步、机枪一千四百余支，炮八门，子弹十万八千余发，炮弹二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我军攻占沙县的当天，马上利用缴获的敌电台和密码，以卢兴邦的名义要蒋军指挥部空投弹药增援，果真第二、三天，蒋军连续派飞机空投了大量弹药、钞票，均为我缴获。同时，我军乘胜攻占尤溪县，缴获卢兴邦的一个兵工厂。红军战士们边忙着运送缴获的物资和兵工厂的机器，兴高采烈地唱起欢庆胜利的行军小调：“红军向东行，围攻沙县城，城里驻有两团兵；沙县有个卢兴邦，干净消灭两团兵……”个个手舞足蹈，笑声朗朗。这歌声笑语冲开了萦绕在沙县上空硝烟，驱散了压抑在人们心头的闷气，使整个沙县城更充满着胜利的欢乐。这次缴获的兵工厂机器搬回瑞金后，为部队修好了不少武器，翻造了大批子弹，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此时，敌人有两个纵队已向我泰宁、建宁方向运动，

似有袭取我建、泰的意图，因此，一月二十五日彭、杨即令红四师以三天半至四天的行程先赶回泰宁，配合一、九军团阻击南进之敌，一月三十日，红五师、六师亦撤回归化待机，仅留下七军团的红十九师、三十四师驻守沙县。

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东方军红六师攻克将乐县城，十一日西撤泰宁待机。二月十八日，为阻击进犯中央苏区之敌，三军团又返回江西广昌的头陂一带准备投入反“围剿”新的战斗。至此，以三军团为主的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胜利结束了。

但是，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作战的胜利，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对于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都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蒋介石迅速击败十九路军，“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很快失败。一九三四年三月，蒋介石回过头来，又重新布置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东方军两次入闽的胜利成果不仅未能巩固下来，而且被全部葬送了。但是东方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战斗，周恩来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的正确领导，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等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的作战原则，呕心沥血卓越指挥的功绩，将永远为人民所纪念。东方军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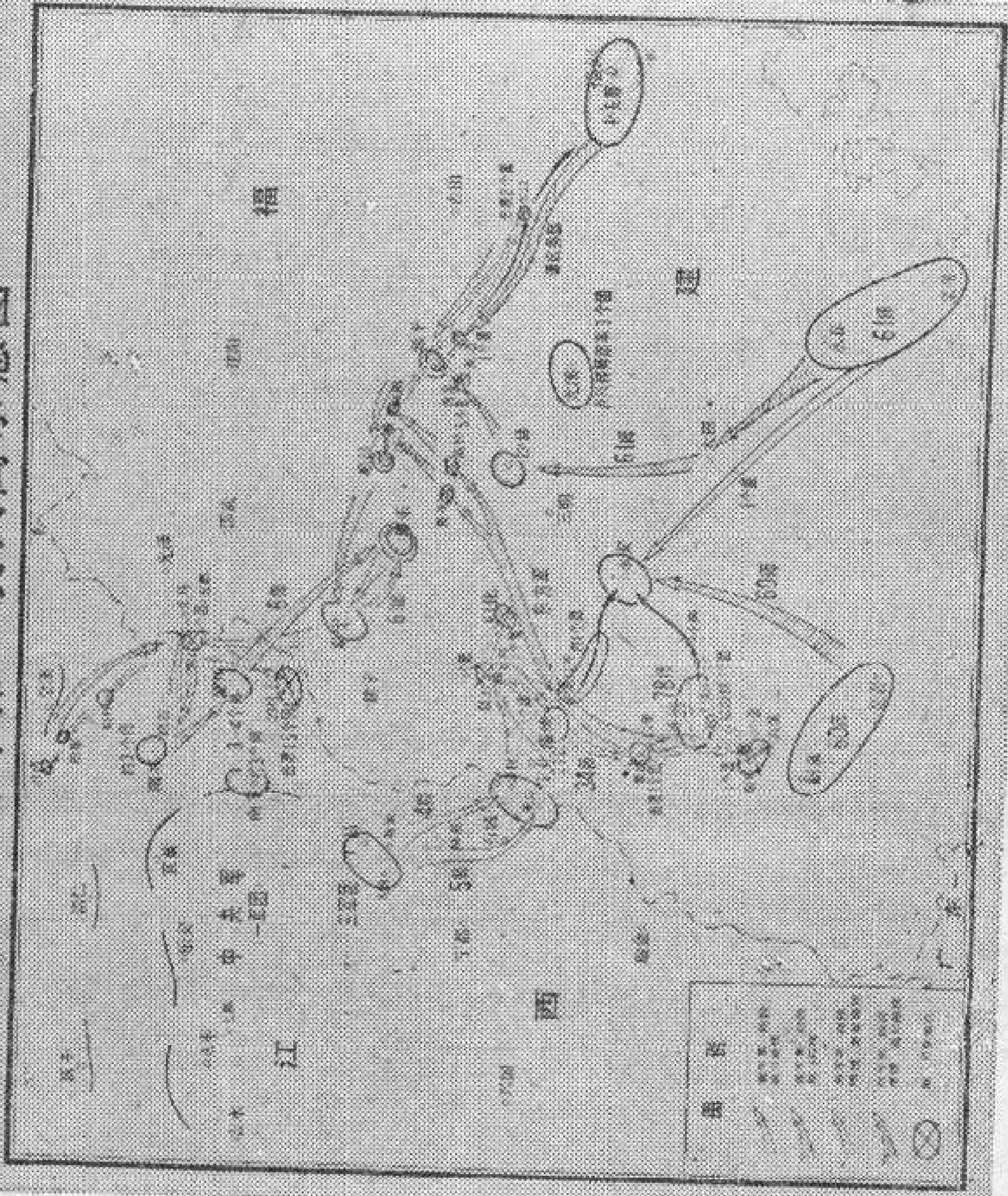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领导者，不总结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更不总结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的经验教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部署上又犯了严重错误。在政治上过分夸大自己的力量，轻视敌人的力量，忽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的特

点，提出“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苏维埃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口号。在战略上否定运动战、游击战，采用阵地战、正规战。抛弃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打歼灭战”的方针，采取以堡垒对堡垒，主力对主力，分兵把口、短促突击的办法，使自己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当时，敌人掌握着整个国家政权，动用五十万军队“围剿”，还有帝国主义的帮助。我中央苏区只有二十一个县，中央红军只有十几万，加上赤卫队才近二十万人，武器、弹药则更不如敌人。总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敌人拚消耗、打阵地战，正暴露了我之短处，发扬了敌之长处。虽然我英勇的中央红军给了敌人以不少打击，但自己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且完全陷于被动，不能自主地消灭敌人。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我非常不利，最后只剩下一条路，不得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被迫长征。

在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中，东方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给我们党和军队造成的严重损失和深刻教训，我们也决不能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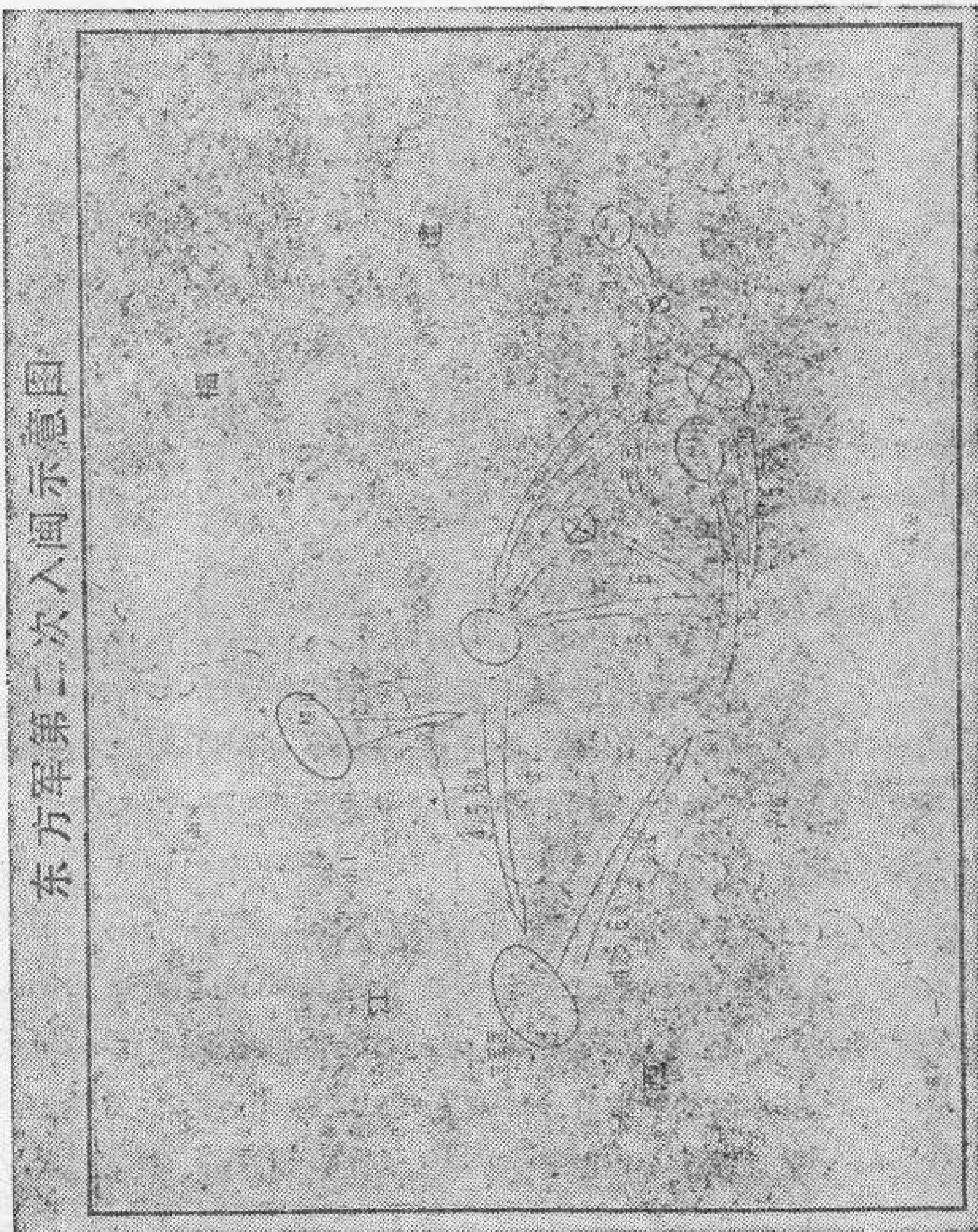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

# 东方军第一次入闽示意图





东方军第二次入闽示意图



#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三）

——外交部八年

（1950.1—1958.10）

## 一、随访莫斯科及中苏关系初记

（1950.1—1955.5）

### 新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我为外交部的苏联东欧司司长。任命名单已在十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上公布。和我同时被任命的还有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亚洲司司长沈端先（即夏衍，但他未到任，改由陈家康担任），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美洲澳洲司司长柯柏年，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和情报司司长龚澎等。当时外交部部长由周总理兼任，副部长开始是王稼祥、李克农和章汉夫。与苏联建交后，王稼祥同志又任我国第一任驻苏大使。张闻天同志是未能赴任的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他也是外交部副部长。

我从一九三一年自苏联回国，在军队工作了近二十年，经历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参

加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眼看祖国大陆上的战火已趋平息，军事工作的任务开始有所缓解，我却转到新的又是很紧张的外交战线上来了。这次工作调动高岗同我打过招呼，说中央正考虑调我到外交部工作。直至看到报纸上的任命名单，才知道这事已经定了。还没有等我办理调动的手续，连在军区的工作都没有交代，又正在探家过程中，我就奉命提前到京执行第一次新的外交任务。

我赶到北京后，马上找周总理报到。他向我交代的任务是跟随他到苏联去，会同正在苏联的毛主席进行中苏会谈。由于我的俄文比较好，去协助他做一些会谈中的具体事务性工作。因为时间紧迫，服装都来不及做，我就到估衣店买了几件合适的现成衣服。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我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军装，换上了西服大衣，戴着一顶高加索式的黑皮筒帽子，就随周总理离京赴苏了。

这是我国建国以来与苏联的第一次最重要的正式外交会谈，不仅将讨论和决定中苏两国之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还将对世界形势特别是远东形势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国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我作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参加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成员有李富春（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叶季壮（中央贸易部部长）、吕东（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张化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赖亚力（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还有何谦、沈鸿、苏农官、欧阳钦（当时是旅大市市长）、柴树藩、程明升、聂春荣、常彦卿等有关人士和工作人员。随毛主席第一批到达苏联的已有陈伯达（当时任毛主席的政治秘书）和毛主席身边

的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等，师哲为毛主席作俄语翻译。后来又增加了从新疆来的赛福鼎和邓力群、马寒冰等人。驻苏大使王稼祥，武官边章五和参赞徐介藩、戈宝权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谈或有关的工作。

我们也是乘火车出国的，列车穿过了我所熟悉而又久违的茫茫西伯利亚，在路上走了整整十天，一月二十日，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毛主席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到达莫斯科的。为什么中间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又由周总理等赴苏会谈？我当时和事后逐步了解到其中一些背景情况。

### 第一次中苏会谈前夕

毛主席这次赴苏，是他第一次出国和会见斯大林同志。据说，苏联将毛主席所乘专列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巧妙地安排在中午十二点整，列车刚一停靠月台，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就“当当”地敲响了。除斯大林（按惯例他是从不外出迎送客人的）以外的苏联最高党政军领导人，几乎全体到车站欢迎。由于毛主席进入苏联后，不适应当地的严寒气候，途中曾经发过一次病。因此，车到莫斯科后，莫洛托夫关照把欢迎仪式予以简化，尽量缩短在车站停留的时间。照例要进行的同各国外交使节和欢迎行列的握手见面，全都免了，只检阅了一下仪仗队，发表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简短演说，很快就上了车，送往特别为毛主席安排的休息地点——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一处郊外别墅。同时在莫斯科市内，又为毛主席安排了另一处

住所。

毛主席到达的当天，略为休息后，下午六时，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了毛泽东同志。他一见毛泽东同志，不等介绍就上前紧紧握手，高兴地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年轻和健壮！”人所共知，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出过一些不正确的主意。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自己找到的，是违反斯大林的意志的。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同志的道路是正确的。斯大林本人自然也是心中有数，所以他对中国领导同志说：“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在此以前，即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党赴苏与斯大林商谈我国建国问题时，斯大林就向中国同志表示过，他们过去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革命，他曾说：“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斯大林能作这样的自我批评，虽然是在内部谈话中作的自我批评，在他看来是很不容易的。受共产国际（实质上是斯大林）支持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曾经打击压制过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对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双方都心中有数，所以斯大林似乎想以高规格的接待，来弥补这一点。在为斯大林祝寿的大会上，斯大林让毛泽东同志居于各国兄弟党领导人之前，紧挨自己并肩站在一起。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苏联对我国的情况特别是某些方针政策是持怀疑态度的，例如，过去我们不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主意，斯大林就怀疑我国走“南斯

拉夫的道路”。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因此，苏联在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态度又是冷漠和怀疑的。只是在此后，苏联方面才谈到双方签订友好条约的事。毛主席认为签订友好条约是两国政府间的事，因此他让周恩来总理作签订条约的具体工作，他自己不直接参加这一会谈。

周总理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后，出发以前就对有关人员说，此行要把中苏的合作往前推进一步，使我国的外交气象一新，取得更好的条件来对付帝国主义。赴莫斯科的途中，他又同毛主席通了电话，就即将举行的缔结中苏条约的工作交换了意见。在火车上，周总理还把他准备到达莫斯科时在车站上发表的演说稿，交给我事先翻译成俄文。由于是长途旅行，大家都相当疲乏，可是周总理却一直在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

由于毛主席到苏联后，有一段时间没有进行什么公开活动，于是苏联用塔斯社记者问的方式，公布了毛主席在苏联的活动计划，其中主要是准备缔结中苏同盟条约。苏联报纸也陆续发表了毛主席在列宁格勒参观访问一些地方的消息。周总理及我们一行到达莫斯科时，毛主席也从列宁格勒回来了。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

周总理率领我们于一月二十日到达莫斯科，米高扬（部长会议副主席）、维辛斯基（外交部长）、罗申（驻华

大使)及王稼祥、陈伯达等到车站欢迎。周总理在车站发表了简短演说,由我作了俄语口译。周总理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奉毛主席的指示,来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国邦交的会商,以促进两大国之间的友谊团结和世界和平事业。车站的欢迎仪式结束后,苏联安排我们下榻在莫斯科郊区的一所高级别墅里。我们到达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二日,斯大林在维辛斯基陪同下,接见了周总理和王稼祥大使,会谈工作很快就开始了。起初,周总理也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他每天都要向毛主席汇报和商谈问题,来去太费时间,后来就索性搬到毛主席那儿去住了。由于毛主席不直接参加会谈,只由周总理以外长身份出面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会谈。我国正式参加会谈的还有王稼祥、李富春、叶季壮等同志,师哲同志担任翻译。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则在会下为会谈和将要签订的条约准备各种文件和有关资料。

条约最初的文本是由苏联草拟并提出的,同后来通过并公布的条约虽无原则上的变动,但是在文字上却作了很大的修改。这一工作是周总理直接领导和亲自动手进行的。他将条约的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要求人人都开动脑筋,贡献力量。他自己更是格外认真和精细,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防止出漏洞,以后吃人家的亏。周总理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条约全文的实质性文字还不到一千字,但是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思

考。每一个同志，特别是周总理，都为它付出了心血。例如条约原文中有一段说：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总理觉得还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推敲，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其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更明确了。为这几个字的改动，就讨论甚至争论了很长时间。

我参加了条约的一部分文字翻译工作，也提出过一些技术性的意见。如条约的俄文本上，按照俄文的倒装句的习惯，将我国国名排为“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Китая”。直译就成了“人民共和国中华”。按俄文和英文的语法，本来也是可以的，我认为应该按照中国习惯改过来，把中华排在前头，在俄文中也是完全通顺的。苏联方面接受了这个意见。在正式的俄文本中就写成“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这就与我国习惯一致起来了。条约文字定稿后，还由代表团去的陈秉臣同志用毛笔恭楷手抄了两份正式的中文本。陈秉臣原在军委办公厅工作，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写得一手好字，他手抄的两份中文本，不仅要每一份无一错漏，字迹清楚端正，还要两份写的一模一样，完全相同，真是很费了一番功夫。签字用的正式文本要用中俄两种文字各铅印二份，我和赖亚力同志亲自到苏联的外文印刷厂里，帮助那里的排字工人，一字一字正确无误地排印出来。苏联的排字工人确实有点本领，虽然他们不懂中文，但看一个中文字，很快就找到那个铅字，一一排出来。正式文本只印二份，将分别交两国政府收执。我国的一份中文排在前面，我国国名也列在前面，交苏联



的一份则反之。中文部分的文字排列格式，也是根据我的建议，按中国传统习惯由右至左竖排，区别于俄文本的由左至右的横排格式。正式签订条约时，苏联人用他们惯用的钢笔、墨水，我们则用自己民族的“文房四宝”，这一套纸墨笔砚还是由我自大使馆送到克里姆林宫，交给师哲安排到签字桌上的。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和毛主席、王稼祥、陈伯达等中国同志，出席了仪式。周总理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分别在两份条约上签了字。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缔约双方不得参加反对其中一方的任何同盟、集团、行动和其他措施，缔约一方如果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那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在战争中未受损伤的美帝国主义者正在扶植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苏两国的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所以中苏两国作出这样的条约保证，不仅对于缔约双方，对于当时的远东及世界形势，也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在签字仪式上，周总理兼外长和维辛斯基外长先后讲了话。周总理说，缔结中苏条约的根据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东方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条约的签订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挑拨中苏两国的企图完全失败了。维辛斯基说，中苏条约表明了两国友谊合作和各国人民和平安全的愿望，“也证明了苏联外交政策的伟大”等等。

与同盟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长铁路和旅大都是沙皇俄国逼迫中国清朝政府“同意”由俄国修筑、经营和租借的，这原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结果。至新中国成立后，中长铁路还由苏联为主、中国参加管理着，旅大驻有苏联军队，建有军事设施等。按照新的协定，苏联应将中长铁路的经营管理权，旅大的苏军根据地及其他设备，全部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只是鉴于当时远东及世界的形势，双方协议在对日和约缔结后，预计在一九五二年底以前才实现这一移交。同时签订的第二个协定是《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据此协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总数为三亿美元的贷款，每年利息为百分之一。中国利用此款购买建设所需之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等等，并在十年以内，即一九六三年底以前，用原料、茶、现金及美元等偿还付清上述贷款及利息。除这两项协定外，双方还协议将苏联在东北从日本获得的财产及苏联过去在北京的兵营房产等（也是沙俄留下的）全部无偿移交给中国。这些协定和协议对于维护我国的独立主权及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也由周总理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了字。上述条约及协定签字后，两国又共同声明，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与中国原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各项条约与协定，均失去效力。

关于中长铁路问题，其实日本在占领东北期间，已经向苏联付款买下了铁路的主权。虽然钱少了点，但是总算给过钱了。苏军进入东北和日本投降后，苏联重新占有了

中长铁路主权,我国政府建立后,苏联本应无保留地移交铁路主权,但是因为他们经过中长铁路到海参崴,比走本国的远东铁路要近得多,所以苏联还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共同享有中长路的主权与利益。苏联实际上多占了便宜。由于当时我国尚无足够的经营管理和技术能力,在此情况下暂时由两国共管共用,对我国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仍然同意中长路由两国共享权益。协议中还说苏联应将在我国东北,从日本手中获得的财产,也就是一批工厂、矿山及其机器设备等等,无偿地移交中国。但是实际上苏联军队在撤离东北时,已将所有能拆卸运走的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等,几乎全部搬到苏联去了,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和小丰满发电厂等地方,只是“无偿地”移交了一些空房子,连日本高级官员和军官家里的钢琴、沙发和好家具等等,还有其他大批缴获物资,都被他们搬回苏联去了。在这方面他们的风格是不高的,暴露了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同他们口头上宣称的并不是一回事。不过当时我们还是以大局为重,从大处着眼,没有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同他们计较争执。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对我们的态度还是相当热诚的,他们对我国的建设还是给予援助的。

二月十四日签字仪式后,由王稼祥大使夫妇出面,举行了盛大的鸡尾酒会,庆贺中苏条约签订和毛主席、周总理访苏成功。斯大林出席了这次酒会,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布琼尼等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及各部部长、各界代表、各国使节共五百余人参加了酒会,毛

主席、周总理和王稼祥夫妇亲自迎接和招待客人，我国代表团全部人员出席作陪。隔了一天，即二月十六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又盛宴招待毛主席、周总理和我国代表团全体人员，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等又几乎全体参加了。在这两次欢宴中，斯大林情绪很好，席间不断同客人说话甚至开玩笑。当时越南领袖胡志明同志正在莫斯科，也参加了宴会。席间胡志明向斯大林说起对他有什么指示时，斯大林笑道：“我怎么能指示你，你是‘总统’，官比我还大呢！”胡志明又向斯大林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咱们也订个条约吧！”但是因为胡志明这次来苏联是秘密的，斯大林说：“那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呢？”胡志明道：“那好办，你派架飞机把我送到天上转一圈，然后再找些人到机场欢迎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行了。”斯大林笑道：“这倒是你们东方人特有的想象力。”这时的斯大林，确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我二十年代在莫斯科学习时，曾经几次看见过斯大林，当时他才四十多岁。几十年内患外战接连不断，特别是卫国战争这些年，是够消耗精力的，这时他已是古稀之年，须发花白，面部皮肤松弛，明显地衰老了。但是苏联国家的面貌，也明显地兴旺发展了。这次到苏联，同我二十年前看到的已大大改观，中间虽然经历了那么大的战争灾祸，但在莫斯科已看不出多少战争痕迹，可见恢复之快，说明其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很好的。加之这几十年来，不仅在苏联国内党内，就是在国际共运和世界进步人士心目中，已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几乎享有了至高无

上的权力和威望。所以这时斯大林虽然已经进入暮年，但是仍然表现得踌躇满志，心情舒畅，并且很注意自己的健康和安<sub>全</sub>，始终维持着他特有的风度和气派，讲起话来依然是他那套习惯，吐字很慢，用词准确，态度也相当友善谦和，至少在这个宴会上，不是西方所宣传的那种“暴君”、“独裁者”的可怕形象。在宴席上，斯大林有一瓶独自专用的酒，他只喝这瓶里的，不喝别人斟给他的酒，他那瓶酒也不斟给别人。其实那瓶里未必是什么特别的好酒，而是一种度数比较低的酒，恐怕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他周围的那些苏联领导人，在他面前都是毕恭毕敬。他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同志，还是相当尊重和客气的，他对我国的关心和支持，看来也是真诚的。至于说斯大林担心我们会走铁托的道路，同他们闹独立性，他们的怀疑，是鉴于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坚持自己独立的立场，不符合斯大林的意见，触怒了斯大林，由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一项决议，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并与南斯拉夫中断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件事完全错在斯大林方面。但他们对此特别敏感和警惕。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夕，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就是针对他们的这种疑虑的。通过这次中苏会谈，包括建国以前我党与苏共领导人的多次秘密会谈和接触，双方的主要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斯大林对我党的各项政策都是表示赞同的，并未出现什么原则的分歧。在两次宴会上，双方在席间不断地互祝两国领袖的健康，不断高呼“中苏友好万岁”，欢宴的时间也很长，直到半夜才散席。

在会谈期间，苏联还为我国代表团组织了一些会外活动，如瞻仰列宁墓，参观飞机工厂、汽车工厂和集体农庄等等，代表团还参加了列宁逝世二十六周年的纪念活动。毛主席因不直接参加会谈，参观游览的次数多些。莫洛托夫等还陪同毛主席、周总理等观看了芭蕾舞剧《天鹅湖》，原来还准备请我们看另一个叫《红罌粟花》的芭蕾舞剧，这是一个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作品，但是这个舞剧的内容及表现手法却歪曲了中国革命的形象，因此代表团的领导同志都没有去看，只派师哲等去看了看，向他们提出了我们的意见，据说他们修改了这个舞剧，以后又停演了。这也算会谈过程中出现的一次“疙瘩”，事情虽然不大，但也表明了我们是坚持原则的，对有损我国革命和人民利益的事是决不迁就的。

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周总理、欧阳钦、师哲、叶子龙、汪东兴等先期回国，李富春、叶季壮和我们一些人，则留在莫斯科继续进行经济性的会谈和订立一些单项协定。毛主席、周总理离开莫斯科时，苏联方面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苏联方面有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和王稼祥等我国大使馆全体人员，李富春等中国代表团留下的全体人员，还有各国使节等，都到车站送行。毛主席检阅了苏军仪仗队，发表了告别演说，他说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是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为基础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不仅要影响两国本身的繁荣，还将影响到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将来，表示新中国的建设将以苏联为榜样，并感谢苏联政

府、苏联人民及其领袖斯大林的热情接待，最后在高呼“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万岁！”的口号声中，登上了归国的列车，胡志明也与毛主席同车经中国返回越南。他们离开莫斯科时，沿途又参观了乌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地的工厂、农庄，苏联外交部派了一位副部长和一位司长陪送中国客人到苏联边境。专车到达中国境内时，毛主席等又在东北几个城市停留几日，作了参观和视察，直到三月上旬，他们才回到北京。毛主席这次访苏，用了三个月时间，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出国旅行中的第一次，也是最久的一次出访。

### 不是一帆风顺

毛主席、周总理等回国后，我们由原来的别墅搬到莫斯科大旅馆，主要同苏联外贸部门继续进行经济性的谈判，苏联出面的最高负责人是米高扬，谈判地点就在苏联外贸部内。这次一进行到关系两国利益的实际问题时，谈判就不那么顺利和谐了。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和争执，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两国货币即我国人民币同苏联卢布的比值应如何定。按照国际惯例，只要根据双方主要几种产品的价格，如布匹、成衣、粮食、肉类等生活必需品的售价，综合起来作个平衡，得出指数，与对方的指数作比较，算出差距，就可据此定出双方货币的比值，这本来并不是难办的事。但是苏联人却想恃强压我们一头，他们将自己的卢布比值定得很高，而将我们的人民币比值压得比较低。我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坚持自己

的立场，双方出现了争执，我们每一个参加谈判的人，心里都很不高兴。但是鉴于当时的状况，真闹翻了也不太有利。最后在请示国内并得到同意后，只得由我们作了些让步和妥协，实际上是在相对不平等的条件下，定下了两国货币的比值。从这次争执中，我们比较明显地感到苏联存在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他们为了本国的利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不顾别国的利益，即使是他们亲密友好的兄弟国家。苏联后来成为富有侵略扩张性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推行霸权主义，不是偶然的，在斯大林时期就存在了这种苗头。五十年代初期，虽然在大肆宣扬中苏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为两国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一些种子。

从二月到四月，我们除了取得上述关于货币比值的协议外，还签订了一系列各种经济性和专业性的协定，它们是关于两国间建立电报、电话和互相交换邮件、包裹的两项协定，关于在我国新疆创办中苏石油公司和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公司的两项协定，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和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两项协定，还有关于一九五〇年贸易换货的协定和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苏联供应中国工业设备及器材的议定书等等。其中关于创办中苏合营的民航公司和新疆石油公司及有色、稀有金属公司的协定，都强调两国平权合股的原则，利润和产品双方平分，公司的领导也由双方轮流担任，双方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义务，如苏联负责提供上述公司所需的机器设备、作业器材和有关技术，中国负责提供地段、厂房、建筑设施及建筑



材料。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还是互利的，我们那时无钱、无设备、无技术，但是我们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新疆的油田有二十多处，早在三十年代苏联就已同当时的新疆当局协议参加这些油矿的勘探和开采。新疆的有色及稀有金属的矿藏也很可观，许多地方盛产黄金及砂金，以阿尔泰和塔城等地的藏量为最丰富，当时估计纯金储量为六千万两以上。南疆各地还盛产铜、铅、铝、钼、锰、锡等各种金属，储量都非常丰富。但是我们当时还没有条件把它们都弄到手，只得求助于苏联，虽然他们从中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对我们也还是有利的。关于创办新疆这两个公司的协定和有关的文件，是由我作的文字翻译，在这些协定的签订会谈中，我们强调了两国之间的真诚合作，互相不占便宜，不使对方受到损失，我国保持独立而不依赖，苏联尽力帮助而不剥削。这些协定由王稼祥、李强、苏幼农等同维辛斯基等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及有关方面签字，并在报纸上一一予以公布。

从中苏同盟条约到这一系列协定的签订，不仅在我国国内，在国际上也是影响很大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很有利的。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采取封锁禁运政策，只有苏联和东欧几国愿意支持帮助我们。中苏合作期间，西方国家造了不少谣言，说什么“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企图“控制中国”等等。这些条约和协定一经签订公布，表明了我国是独立地充分行使着主权的，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是平等的，连西方国家官方人士和通讯社惊呼中苏条约“必然会成为反殖民地宣传的

强有力武器”，“拆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台”，美国“国务院方面伤心地承认了这是一个事实”，说这是“最黑暗的噩梦”。这说明，我们的会谈及其结果，使帝国主义者的挑拨离间阴谋不攻自破，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这些历史事实还表明，一个国家既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努力维护自己的主权，又要有适当的外援，必要时也得以小的妥协换取长远的利益。但是完全依赖外国以至损害民族利益，也是不允许的。当时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总的方面是平等互利的，同时也是既讲友好又有矛盾，既讲团结又有斗争的。在我主管苏联东欧方面工作的任期内，也是按照这个精神办事的。

### 在中苏友好的“蜜月”中

一九五〇年四月，上述协定签订以后，李富春和我们一些同志第二批回国，叶季壮等同志作为中国贸易代表团，留在莫斯科继续进行一些未了的会谈和订约工作，他们直到五月中旬才回到北京。我们是乘火车经过满洲里回国的，路过沈阳时我下了车，回到东北军区，因为我调离军区就任外交部新职的命令早下来了，但是却一直未办调动手续，对军区的工作也没有办个交代，就乘此机会回来办理一下有关事宜，也把家重新安顿一下。

五月四日，我带着全家来到了北京，走上了外交战线。组织上让我们在和平门内松树胡同一个院子里安了家，这是我调到北京后的第一个居住地点。我解放以后的工作变动，正好都是八年一次，第一个八年在外交部，第二个

八年中联部，“文化大革命”受审查又是一个八年，出来后回到军队工作，正好也近八年。一九五〇年初的这次出国访苏和调来外交部，是我第一个八年的开始。

当时正处于建国初期，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一共只有二十来个，其中主要是苏联、东欧几国和蒙古、朝鲜、越南等兄弟国家，其余是亚洲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尼等邻邦。欧洲的各个主要国家，只有英国出于本国在华利益的需要同我们有个代办关系，还有瑞典、瑞士、芬兰、丹麦等几个中立国家，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西德等国还不承认我国，南、北美洲和澳非诸国，同我们更是一片官方往来也没有，所以那时外交部的工作，相当一部分是同苏联和东欧几国打交道。那些年中，同这些国家的外事往来接连不断，从政府到民间的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地来回访问，接待、会谈和出席各国的各种节日及纪念活动，十分频繁。那时毛主席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常常亲自接受各国大使递呈的国书，也经常亲自出席各国使馆的国庆等活动。凡有这些活动，照例都是我去陪同，并为他们翻译，所以那一段同毛主席的接触比较多。我主持的苏联东欧司，也是外交部中的一个热门单位。最近翻了一下资料，五十年代初期的三、四年中，我们同苏联及东欧诸国签订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和其他各种专业的专项协定和议定书等等，共达一百一十多种，而与其他国家订立的各种协定，总共才二、三十件，可见同苏联和东欧几国打交道的频繁，关系之密切。

不过就是在那时，我们同苏联也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是那么完全一致的，免不了还有过一些齟齬。例如新疆的中苏合营石油公司，苏联单方面提出要扩大油田的勘测范围。按照协定，油田的地段是作为我国的投资的，如果扩大了油田范围，等于我国增加了投资，相应地苏联也应该增加投资，即增添油田的设备。我同主管新疆工作的王震同志向苏联大使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却不想增添设备，只要我们单方面扩大油田范围，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坚持按协定的原则办事。还有一次，苏联向我们推荐一部影片，片名是《旅行家普尔热瓦斯基》，内容表现一个俄国“旅行家”到中国“探险”的故事。我们事先看了这部影片，发现其中把我国人民表现得十分穷困和愚昧无知，影片中的满清政府官员在俄国人面前更是一副卑躬屈节、逢迎讨好的丑相，而俄国人则都是那么高尚文明，对中国人搞些小恩小惠的“慈善”行为，施舍点稀饭等等，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者架势。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一部为沙皇时代的扩张主义者张目，侮辱我国人民的影片，决定不接受这部片子。领导上让我同周扬同志一起，会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对他说，我们认为这部影片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是不利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的，通知他们我国政府不同意进口这部片子，罗申听了也无话可说。这是中苏友好期间的有矛盾斗争的两件事。

按照中苏同盟条约，旅顺和大连的苏军根据地及其财产、设施，应于一九五二年末以前移交中国。但是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朝鲜战争正在进行，对日和约尚未缔结，

经两国协议将移交期限适当延长，驻旅大苏军也暂缓撤出。为此，一九五三年二月，周总理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在苏联建军三十五周年节日前夕，专程前往旅大市，慰问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代表团中有我国海军司令萧劲光，空军司令刘亚楼，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我这时是外交部副部长，也是代表团成员。当时的苏联大使潘友新，也同我们一起来到旅大。我们是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乘专机到达的，当天下午就分四个会场同时举行慰问大会，周总理在一个主会场讲话，萧劲光、刘亚楼和我分别在几个分会场同时讲话，讲稿都是一样的，主要讲延长苏军撤退旅大的时间，是为了巩固这一远东的战略要地，代表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向驻旅大苏军表示亲切慰问。在大会上还向苏军授了旗，赠送了纪念章。苏联大使和领事、驻旅大苏军将领和旅大市长欧阳钦等也参加了大会。代表团还带去了总政文工团等五六个文艺团体，会后分别向苏军进行慰问演出。周总理还率代表团全体向苏军烈士塔献了花圈，参加了当地苏军庆祝自己建军节的宴会，并设宴招待了驻旅大苏军将领和有关人士。二月二十五日代表团返回北京，几个文工团留在旅大继续进行慰问演出。

### 两次外国葬礼

五十年代初期，我曾经出过几次国，一次是一九五〇年冬，我作为我国政府的特派代表，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在安理会作了控诉美国侵华罪行的发言。这一段我将另作专题回忆。一九五一年又去了一次朝鲜板门店，这也

在下面再说。另两次出国都是为了参加外国领袖的葬礼。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初，蒙古领袖乔巴山逝世，他是一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病故的，二十九日他的灵柩运回蒙古，准备在乌兰巴托为他举行葬礼。二月八日，我国派出了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前往蒙古参加葬礼。代表团成员有乌兰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和我（外交部副部长），还有阎宝航（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及我国驻蒙古大使吉雅泰。我们到乌兰巴托后马上到乔巴山灵前献了花圈。二月九日，蒙古为乔巴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在大会上，聂荣臻同志代表我国政府致了悼词，会后由泽登巴尔等蒙古党政领导人，苏联代表布琼尼及我国代表等，抬着乔巴山的灵柩送入陵墓，当时又放礼炮，又奏哀乐，又鸣汽笛，我觉得这个葬仪真是够庄重气派的了，没有想到，下一年我又参加了一个规模更为宏大的葬礼。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我国立即组成了以周总理为团长的吊唁代表团，三月七日乘专机前往莫斯科，参加对斯大林的追悼活动。代表团成员包括了党、政、军、工、青、妇以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科技、文化等各界知名人士，其中有李富春、张闻天、罗瑞卿、叶季壮、伍修权、郭沫若、刘长胜、蔡畅、廖承志、章伯钧、李德全、钱俊瑞、钱三强、周立波、张宗逊、王秉璋和罗舜初，连工作人员共有数十人，是我国派出的一个人数最多、代表面最广的吊唁代表团。三月八日我们到达莫斯科，只见到处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中。当天晚上，我国代

代表团全体和大使馆人员一起来到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的斯大林灵前，献了花圈并瞻仰遗容，周总理领着我们列队向斯大林遗体鞠躬致敬，并同使馆人员一起分成六个队肃立遗体两旁守灵致哀。

三月九日，在莫斯科红场上，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追悼大会和葬礼。苏联党政军领导人首先将斯大林的灵柩抬到工会大厦门口，安放到红军守护着的炮车上，然后向红场步行进发，还将斯大林生前获得的各种勋章、奖章等，别在红色天鹅绒垫上，走在送殡队伍的前头。我们也跟在灵柩后面，同苏联领导人及各国代表团一起，步行送殡至红场。当时，苏联人民和领导者们对斯大林的崇敬，和为他去世表现出的悲哀，给了我十分强烈的印象。尽管斯大林在世时有过错误，肃反中错杀了很多人，但是我看到人们的沉痛是真诚的，是出自内心的。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红军战士们喊着“为了斯大林”的口号冲向敌人阵地，这并不是偶然的。其中当然有个人崇拜的成份，但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的发展和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人们赞颂和拥护自己的领袖也是很自然的。

中午十二时整，苏联领袖们和各国代表团团长登上主席台，这时，礼炮齐放，各地所有的工厂、车辆和船只，汽笛齐鸣，红场上聚满了静默的人群，挂满了低垂着系着黑纱的红旗，人民群众送的花圈从工会大厦门口，一直放到红场四周和附近的大街上。为了防止无组织的市民拥向红场，影响大会秩序，几处街口都用卡车堵住了。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致词以后，莫斯科卫

成部队列成方队正步前进，向自己的领袖告别，同时苏联空军飞机编队从空中掠过，随后成百万的人民群众，在哀乐声中沉重地通过主席台前。那个场面和气氛，真是令人难忘。在各国的葬礼中，可能迄今也是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

回想二十年代我第一次看见斯大林，他那时正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壮年人，三年前我参加第一次中苏会谈又见到了他，虽然看到他显出衰老现象，却未见他有什么病态，我们还多次为他的健康干杯，多次向他高呼“万岁！”想不到他却这么快离开了我们。那时候，不仅在苏共党内，就是在国际共运甚至是世界进步人士的心目中，确实造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人们已经把他大大神化了，他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的象征。他的突然去世，对苏联以至国际上，都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和感情冲击。虽然我们明知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出过错主意，办过些错事，在苏联国内政策和党内斗争等方面，也是问题不少，但是我们心里仍然对他充满了崇敬，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他领导苏联人民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经济封锁、政治抵制和军事包围下，在内外敌人不断的公开挑衅和秘密破坏中，战胜了重重困难，将苏联建成了一个与世界帝国主义相抗衡的斗争堡垒，成为吸引、影响和指导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特别是伟大的卫国战争，他又坚定不移地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最终消灭了德国法西斯，解放了东欧各国，人们不能不归功于斯大林。



可惜斯大林在晚年也如他自己在三十年代初说过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加上被赫鲁晓夫之类的野心家、阴谋家包围着，也犯了许多错误，在他自己的历史上留下了污点，后来又被赫鲁晓夫之流利用，扩大了他的错误，把苏联演变为一个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霸权国家，从而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之间的分裂，导致了世界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其后果和教训是严重的！我感到即使象斯大林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当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缺乏自知之明，陷入主观臆断，欣赏和制造对自己的吹拍捧场，以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包围封锁，最终也会造成了国家和个人的悲剧，这是很值得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深思的惨重教训。

当然我们并不是当时就意识到这一点的。但是即使在那时，也预感到斯大林的死，必将对国际国内的许多方面造成巨大影响。因此，在追悼过程中，人们的心情确是沉重甚至是惶惑不安的。可能正由于斯大林逝世对于人们感情的冲击，他的葬礼刚完，前来参加葬礼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也突然在莫斯科去世了。我们代表团全体又到捷克驻苏大使馆进行吊唁。接着，周总理和郭沫若又专程赴布拉格，参加哥特瓦尔德的葬礼。周总理自捷返苏后，三月二十四日率代表团大部分回国，李富春、叶季壮等同志则留在莫斯科进行一些经济上的会谈。

### **中苏关系开始变化和难忘的周总理作风**

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关系开始了微妙的变化。这当

然主要是由于赫鲁晓夫之流上了台，改变了斯大林时代的内外政策所致。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因素。至于两党在理论上的分歧，我不具备评论这方面问题的修养。

不过在当时这些矛盾还未表现出来，相反，在公开场合还在努力维护和宣扬中苏两国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在此以前，苏联曾向我国提供了一百五十余项工程的长期援助，可见那时还是支持我们的。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等来访，同我们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大多数苏联同志对我们的态度还是十分友好的。这次是赫鲁晓夫第一次来中国，当时他对我国的地大物博，风景壮丽，羡慕得要命，赞美不已。当然我们对他们的接待也是热情丰盛的，礼仪周到。苏联代表团这次来访时，我国政府又同他们签订了一系列重要协定，发表了重要的会谈公报和联合宣言。其中关于对日本关系还专门有个联合宣言。公报和宣言主要针对当时的世界形势，指出美国继续占领日本和支持台湾蒋介石的危害性，希望早日同日本关系正常化，以消除战争危险。宣言重申并强调中苏之间和对其他各国都是遵循的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几个协定分别议定将苏军自旅大撤退，其海军根据地等完全移交中国，将原来中苏共管的新疆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和大连造船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移交中国，还签订了关于科技合作，修建兰州——新疆——阿拉木图铁路及中蒙、中苏铁路联运等的联合公报。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间的矛盾也逐步加深，终于发展到关系破裂。当年辛辛苦苦订立的各种协定等等，被赫

鲁晓夫之流一一撕毁了。

我初到外交部时，是苏联东欧司司长，一九五一年一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同志接任了东欧司长。在此期间，苏联首任大使是罗申，他于一九五二年离任后，一年中连续换了三个苏联大使。第二任是潘友新，他只干了三个来月就奉调回国。第三任是库兹涅佐夫，一九五三年四月初与参加斯大林葬礼的我国代表团同机来华，他原来是苏联工会主席，出使中国据说只是为了熟悉一下外交工作，他在中国也只呆了半年左右就回国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去了。第四任大使是尤金，他是个哲学家，据说一九五〇年毛主席同斯大林谈到给中国派政治顾问时，斯大林就推荐过尤金，他这次来华，也有就近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用意。

总的来说，五十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还是团结友好的，但是已经存在了分歧和分裂的因素。我当时主管的苏联和东欧的工作，如果有些成绩，那是认真执行了中央特别是周总理指示的结果。当然后来我由于出使南斯拉夫，中止了这一工作，但就个人来说，还是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的。也是在这一任期内，一九五四年我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大。我是湖北人，又从未在四川工作过，因为四川人口多，按人口比例的代表名额也多，于是我就被选为四川省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当人大代表每月还有五十元“车马费”，作为外出视察和开会往返的津贴，这原是中央政府礼宾司司长余心清同志提出来的，后来有人说这是国

民党的一套办法，我们每个代表都有本职薪金，不需要这些钱，就把它取消了。这算一段录以备考的往事。

从我调到外交部到一九五五年出使南斯拉夫，有五年多时间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三十年代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也一直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周总理的为人品德和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国以后，他不仅保持了过去的作风，实际上是更为操劳和紧张了。他当时兼任外交部长，尽管别方面的工作量大得惊人，但是外交部的工作仍然管得很具体、细致和深入。由于工作繁忙，他常常是白天忙于别的活动，到晚上才安排时间同我们研究外交部的工作。每次谈话之前，事先定好讨论的问题，到了他那里就开门见山，把各自准备好的意见和材料拿出来，干脆利落地一一讨论落实，从不拖泥带水，不说虚词空话。我们都自觉地遵守着这个惯例，虽然每次都多想多听听他的指示，但是又不忍心过多地消耗他的时间和精力。问题解决了就马上告辞出来，让下一拨人再进去。每一个晚上，象这样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工作交谈，他至少要安排三、五批，都定好时间排了队等着。前一批在同周总理交谈，后一批就坐在外间等着了。既紧张热烈，又有条不紊，办事效率很高，工作秩序很好，充分体现了周总理特有的作风与才能。

周总理不仅找我们谈话，对我们起草的各种外交文件都要亲自审查修改，他看得非常认真细致，许多经他审阅的文稿上，都留下他批改的字句和阅读时作的记号。我们常把他批改过的文件，拿回来一字一句地研究学习，看看

总理怎么改的，又为什么要这样改，从中领会总理的思想和意图。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种很宝贵的学习机会，它不仅使我们学到了周总理的工作精神和态度，也学到了他的思想方法和文风。在这样的领导人身边工作，确实是幸福愉快的。

周总理还特别注意启发群众智慧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由我国首先提出的，并得到世界各国赞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在他领导下制定出来的。一九五三年，他和外交部的同志一起讨论如何开展亚洲的工作，他亲自主持会议，提出了一些方针性意见，让大家议论了几次以后，陈家康同志根据议论的结果，起草了一个稿子，周总理拿去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审查和定稿，最后送给了毛主席。经毛主席批准并指示照此执行。这就是我国对亚洲各国也是处理所有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周总理首先向印度、缅甸提出了这一原则，很快为对方所接受。以后又把它带到万隆会议上，把五项原则的精神更具体化了，变成了十条，写到了会议文件中，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关系的准则，迄今还为大多数国家遵循。应该说，这个闻名于世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提出的。

周总理的品德、作风和精神，对于我们许多同志影响是很大的，教育是很深的。我一生都在要求和鞭策自己，按照周总理为我们作出的榜样那样去工作和生活。他堪称我们革命和为人的楷模。我感到欣慰的是，周总理的优良作风在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同志身上也体现出来了，他们

也象当年的周总理那样，昼夜不辍，勤奋不倦，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在操心劳碌着。把周总理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创立的优良传统，很好地继承、发扬和传下去，确实也是我们其他老同志义不容辞的重大使命。

## 二、联合国之行

(1950. 11. 14—12. 30)

### 严重的国际事件

一九五〇年六月，新中国成立才几个月，爆发了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帝国主义者纠集了包括美国 and 南朝鲜在内的十六个国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公开干涉朝鲜内政，武装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年十月，美国把战火烧到我国边境，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严重威胁。面对这一形势，中国人民被迫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并在全中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还悍然宣布，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我国台湾海峡，借口“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同时下令加强驻菲律宾美军，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形成对我国的军事包围圈。在此命令下，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和以各种“顾问团”、“考察团”名义出现的美国武装人员，纷纷进驻台湾；美国远东军司令兼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亲自飞到台北，与蒋介石密商，美蒋“共同防守”台湾，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台湾蒋军，将逃出大陆的蒋介石集团直接置于美国武装力量的庇护之下。美国当权者又制造并散布“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由联合国考虑”等谬论，以图使其侵略行径“合法化”。

美国政府这一系列公然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的罪行，激怒了中国人民。我国政府为此向美国连续提出了严正抗议，并诉诸国际舆论。

美国侵略朝鲜和占领台湾这两个严重事件侵犯了我国的主权，直接关系到新中国的安全，也引起了国际上的严重关注。那时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为了抵制美国势力侵入东方各国，对我国表示全力支持；印度等友好邻邦对我国的处境也十分关注和同情，力图缓冲和调停这一紧张局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则竭力为其侵略行径辩护，企图扩大其侵略战果。这样，官司就打到了联合国讲坛上。八月，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我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使其撤退侵略军。美国政府则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于是在当年联合国的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是由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一是美国为反诬我国而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鉴于这一规定，安理会于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九日通过决议，同意由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一决定由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于十月二日正式通知我。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决定，因为尽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但是在美国控制和影响下的联合国组织，仍然企图无视我国的存在，虽然我国政府早已任命张闻天同志



为常驻联合国代表，但是我国在联合国的正式席位却被美国庇护的蒋介石集团“代表”占据着，张闻天代表一直未能赴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我们还很不了解，因此，首次派出代表到世界最大国际组织——联合国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我国以至全世界，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 祖国交付的重任

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经过郑重考虑，决定由我作为特派代表去联合国，并确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我得到通知时，不由想起一段往事：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即联合国将成立时，我党中央就曾决定派我随同董必武同志等一起，作为解放区的代表，参加同国民党联合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当我们到达重庆时，国民党政府看来对我抱有戒心，找了个很可笑的借口不让我出国，说是按照国际惯例，有砂眼的人不能出国，而我被检查出有所谓“砂眼”，被他们借故留下，后来由董必武等同志和国民党代表宋子文等一起去了联合国。那次我没有去成，想不到事隔五年，我却作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特派代表，又受领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使命，我的“砂眼”也不成为问题了。倒是当年曾经找岔留难过我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却只能寄身台湾一隅，这不能不引起我“天翻地覆慨而慷”之感。

中央作出决定以后，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同志找我和代表团主要成员谈了话，确定了此行的方针大计，交代了出国前后的具体任务。在他的直接指示下，我们开始了

各项准备工作。十月二十三日，周总理以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他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电报开列了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名单。除我和乔冠华外，他们是龚普生、安东、陈翹（即陈忠经）、浦山、周砚、孙彪和王乃静。通知还说，代表团成员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要赖伊负责为我们办理赴美的入境手续。由于我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要求将入境签证地点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我们将由那里转赴美国。

联合国的这一决定当然是违反美国的意愿的，但是美国出于自己的政策需要，又很想同我国进行某种外交上的接触和试探，好摸摸我们的底，同时视可能情况拉拢一下我们，不使我国完全站在苏联一边反对他们。所以他们虽然作出了反对我国出席联大的姿态，实际上又采取了一种半推半就的态度。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美国要真的坚决反对我们去联大，他们操纵了联合国的多数，是可以将我们拒之于门外的，他们所以没有那样做，是因为还想通过这次机会同我们作些“对话”。因此他们一方面并不断然拒绝我们去，另一方面却又不肯让我们顺顺当当地去，即使去也想把我国推到“被告”的位置上，所以他们先策划在我国代表未到联合国之前，就讨论诬蔑我国的所谓“控诉对大韩民国（即南朝鲜）侵略案”。说什么对于共产党中国代

代表团的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提法，不应该是“邀请”，而应该是“召唤”。当时同我们友好的苏联等国代表批驳了美国代表的提法，认为“召唤”一词完全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其奴仆发号施令用的字眼，根本不能用于新中国这样一个管理着几亿人民的主权国家，新中国的代表当然应该是联合国邀请来的。争论的结果，美国的提案只有蒋介石代表和古巴的支持，被否决了。为此，联合国又于十一月八日重申了对我国的邀请。美国代表又想把我国代表的权限限制在讨论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特别报告”范围内，以逃避我国代表就台湾问题对美国的控诉。针对美国这一阴谋，周恩来外长又于十一月十一日复电安理会，要求将我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同美国侵略朝鲜问题合并讨论，我国代表也将同时就这两个问题发言，不然我们将不接受安理会十一月八日又发出的邀请。周外长还严正声明，我国从不承认侵朝美军的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提出的所谓“特别报告”是非法的，其内容是别有用心和片面的。这使得美国的阴谋又一次宣告破产。

正当联合国内就我国代表出席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时，我们在国内的准备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周总理指示我们，到联合国后的具体活动，可以由我们代表团相机行事；主要发言则要在国内写好和审定；各种有关资料也都要整理好并译成外文。浦山和周砚（女）担任代表团的翻译，浦山是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生，得过经济学博士学位，英文是第一流的；周砚的英文、俄文都很好，我在东北军调部执行小组时，就同她在一起工作过；正当我们的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也接到了办理赴美入境签证的通知。

十一月十四日，我们代表团离开北京，向联合国所在地——美国纽约成功湖出发了。我和代表团全体同志登上了去苏联的民航班机，张闻天、彭真、李克农、章汉夫等同志和全国工、青、妇、和大、友协及北京市各界的代表都到机场欢送。我们对于自己能作为新中国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一面觉得十分光荣和兴奋，一面又觉得肩头担子很重，内心是不平静的。我们每个人在国内都是党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从现在起，我们就将代表着伟大的新中国和近五亿已经站起来的人民；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将为世界各方人士所瞩目。我们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已从炮火连天的战场转到唇枪舌剑的讲坛，直接向当时还是十分强大、不可一世的头号帝国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的面对面斗争。这无论对于我们个人还是我们国家，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肩负着崇高的使命，胸怀着庄严的感情，频频回首眺望着祖国大地，挥手告别了委我们以重任的祖国人民。

飞机穿云破雾，经过蒙古和苏联的伊尔库茨克，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遇到了漫天大雪，飞机飞不了，被迫降落在当地机场。这使我们心急如焚，因为我们在途中的过多延迟，将使我国代表团失去同美帝国主义者斗争的有利时机。我们这种心情苏方也是很了解的，他们采取了种种措施，使我们的座机及早起飞，很快到达了莫斯科。我们在那里稍事停留，马上转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十一

月二十日，我们飞抵布拉格，捷克副总理费林格和外交部几位副部长，还有我国驻捷大使谭希林同志、联合国驻布拉格办事处代表里特尔等，都到机场迎接。

我们在布拉格办理签证手续等了三天，利用这段时间我们请一位去过联合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女副部长塞卡尼诺娃，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联合国的情况。十一月二十三日晨，我们由布拉格搭飞机经瑞士到达伦敦，换乘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转赴纽约。当天晚上，我们的飞机就横越浩瀚的大西洋，一直飞向美洲大陆。这架飞机相当大，除了普通座位，还有一些睡铺，我们代表团也定了一个铺位，用来“优待”我，我也接受了同志们的好意，为着战斗的明天，在空中安心地睡了一觉。

### 纽约的头条新闻

第二天破晓，我们乘坐的飞机飞临美国上空，老远就看见纽约市区的一片灯光。我们的目的地终于到了。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里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历史会记下这个日子的，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纽约时间六时十三分，一架载有新中国的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飞机，在纽约机场着陆了。由于美国政府顽固地拒绝承认我国，我们同美国并无外交关系。但是，在这时，我们九个中国的共产党人，持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护照，正气凛然地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美国纽约当局还不得不表示对我们“欢迎”。我们走下飞机时，首先受到苏联代表马立克和波兰、捷克斯洛

伐克等国代表的欢迎，负责接待我们的联合国礼宾联络科长等，也到机场迎接。我们同欢迎者一一握手问好，同马立克等在机场合了影，接着又对在场的各国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谈话，宣布了我们代表团的使命，并通过报界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在熙熙攘攘的纽约机场上，这个欢迎仪式当然算不得盛大隆重，但是它却标志着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的人民，正迈开巨人的步伐，登上了左右世界形势的政治舞台。

有一位在场的美国记者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和他自己的心情，“对我来说非常的荣幸，作为一名记者，安心地在机场等待一架飞机的到临，它将第一批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载到了我们的国度。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我站在显得很空旷的机场上，晨风是冷飕飕的，头顶上飞机正在低飞降落。进口处，在一排警察的监视下，三五成群站在那儿的一百多个摄影师、记者和政府官员们，起了无声的骚动，……服务人员将红地毯一直铺到飞机降落的地方，照像的灯光和汽车的强光直射着飞机门，使黑夜如同白昼。联合国的汽车都发动起来了。

“由飞机中走出来七位男的和两位女的，在耀眼的光亮下，我们目送他们慢慢走向海关，……这些旅行者使他们周围的历史气氛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现在我们中间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真正代表。也就是世界四分之一人类的代表啊！我想起我睡在小床上的孩子，这飞机从东方带来了久久盼望着的和平使者们，他们是为了我的孩子，也是为了所有别的睡着了的和醒着的孩子们。在历史上，

这是中国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美国发言。中国将会证明她的人民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创造和平的人们最坚强最忠实的好朋友。”

“伍修权代表向挤在扩音机前的记者和摄影师们说：‘中美两国人民从来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愿趁这个机会，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

这位美国记者说，他同另外三个美国人同中国代表握了手，他写道：“我们的欢迎在数量上是不足道的，但是它是美国人民盼望和平心情的流露。它将祝福和成功带给了这七个男的和两个女的，他们由远方带来了关系着我们整个国家命运的和平信息……”

除了上述官方代表和记者们，在机场入口处，还聚集着一些美国进步人士，他们是自发地来欢迎我国代表团的。但是他们进不了机场，甚至根本不能接近我们，只能在我们将要通过的地方守候着。在我们走出机场时，看到他们远远地就向我们挥手致意，有的还捧着小型的标语牌。据说其中有教师、工人、美共党员和美国和平组织成员，有的还是浦山过去在美国的友人，如毛德·勒索尔女士，她是美国民间组织对亚洲协会的负责人，还有艾拉·盖洛宾等。他们近几年都曾来我国访问，但在当年中美关系正紧张时，敢于在美国反动当局的严密统治下，在宪兵和警察的直接监视下，公然对我们表示热情欢迎，我们看到不能不为之感动。他们这种无畏的精神和对新中国的友好感情是十分可贵的。

我们正是这样在美国人民和各国友好人士的欢迎和希

望中来到了联合国。我们代表团下榻的地点是纽约最大的华尔道夫·阿斯多利亚旅馆，这是一家十分豪华的旅馆。我们代表团九个人住在第九层一个大套间里，除了各人的房间以外，中间还有一间办公室，在我们看来，这当然是非常讲究的了，其房租也贵得惊人。我们在那里住下后，一般不常出去，每顿饭都是由饭店服务员送到我们房间里来吃。旅馆附近有个公园，我们有时到那里散散步，并在那里交谈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估计旅馆内很可能被安了窃听器，在房间里谈话还不如到公园里边散步边交谈方便安全。由于我们身处异国，不得不时时提高警惕，以致连看到地毯上因静电作用冒出火花，也以为是有什么特殊装置。当时美国反共反华的气氛很浓，我们在那里当然是很不自由的。纽约警察局还给我们派了几个美国彪形大汉作保镖，他们就住在我们这个套间的门外，那里象传达室似的日夜不离人，我们有些对外活动可以预先通知他们，由他们去报告有关方面并作出安排。我们也知道，他们实际是一身二任，既要保护我们，又要监视我们。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能禁绝美国人民对我们表达他们对新中国的友好感情，也不能完全制止美国进步人士同我们的友谊接触。

我们到达纽约不久，美国一些工人组织和友好人士就给我们代表团送来了许多鲜花，把我们的住处装点得花团锦簇，一片芳香。有不少美国和英国的进步团体，给我们代表团发来电报信函，对我们表示欢迎和致以祝愿。一个“美国妇女保卫和平代表团”向我们发表声明说：“我们欢



迎你们来到这里，因为我们希望你们的出席（联合国大会）对世界和平将有贡献，这是我们最关切的事情。”美国“马里兰和平委员会”六十五位著名人士联合给我发来电报，希望我们代表团能促成朝鲜停战谈判。这些团体和人士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和平的善良愿望，也说明了我们国家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在成功湖的活动虽然受到种种限制，却反而更加引起了各方面对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格外的注视，连我们通过的门口和过道上，都常常被一群热心和好奇的人堵住了，人们都想亲眼看看中国人民使者的风度和面貌。我们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都成了记者们的热门新闻题材，被刊登在美国以及各国报纸上的要闻栏里，我们几个人一时间也成了“头等新闻人物”。

情况确是如此，我国代表团来到纽约，是与当时的世界紧张形势特别是朝鲜战局密切相关的。就在我们即将出国的时候，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经悍然宣布，他们将很快占领全朝鲜，结束朝鲜战争。美国报纸上以大字标题登着麦克阿瑟的话：“士兵们可以回家过圣诞节”。但是，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以后，很快将已进犯到我国边界的侵朝美军打退到三八线一带。就在我们代表团到达纽约时，美国报纸上又登出了美军在朝鲜“全线溃退”的大字标题，这对美国和西方各国震动很大，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败仗，使他们的统治集团十分狼狈，想在战场以外寻求挽救败局的方法，所以很注意我们代表团的活动和姿态。广大人民一面为新中国的军队敢打败号称

“联合国军”的强大军队而惊讶，一面又担心战争不断扩大，引发新的大战，也密切地注视着我们。也正因此，我们代表团一出现在纽约，就成为各方面人士关注的焦点。

### 初登国际舞台

对于我国代表团的到来，美国当权者是十分尴尬的。就在我们代表团到达纽约的当天，美国代表仍然在联合国内对我国代表的顺利出席会议继续进行着阻挠破坏和无理纠缠。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的联大政委会上，美国代表明知我国代表团已于早晨到了纽约，他还企图使邀请我国代表出席大会的决议不生效。美国代表的这一行径，只得到蒋介石集团及南美几个国家代表的支持，其中有个代表坚决反对新中国的代表出席联大，竟说什么如果共产党中国的代表出席了大会，等于在国际上承认了新中国。倒是埃及代表说了公道话，他说讨论有关某个国家的问题，让这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符合联合国规章，并且已有先例，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联合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委婉地反对了美国代表的意见。经过辩论，大会才又作出决议，重申对中国的邀请，并通知中国政府。周恩来外长马上复电说，中国代表已在纽约，随时可以参加会议。

谁知美国代表又使新花招，强求大会在二十四日当天，即趁中国代表团刚刚赶到，还来不及参加会议时，马上讨论有关中国的提案。当会议将有关的讨论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时，美国代表又无理取闹地提出，由于他个人有事，二十七日不能参加大会，企图阻挠会议的如期举行。

这位顽固敌视中国人民的美国代表不是别人，就是以反共反华最坚决著称，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当时任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的杜勒斯。他被各国人民称为“战争贩子”。我们来到联合国，就将同这个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面对面较量了。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主席的邀请下，首次出席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会前，外界探知我们将出席今天的会议，许多人都千方百计地弄到大会的旁听证，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侨和华裔人士，其中有著名的教授、学者，还有在美的国民党官方人士，例如他们的驻纽约总领事宗维贤等人，都设法来到会场旁听。有一位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博士，在会议厅刚开门时，第一个来到会场，占据了旁听席上最前排的中间位置早早地静候着我国代表的到来，好倾听祖国同胞的声音。因为听众突然增加，这天的会场特别拥挤，气氛也比以前任何一个新代表团来到时更为热烈。会场内人们的眼睛早就注视着门口，期待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我们进入会议厅时，会议已在进行，正在发言的是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他一见我们来到，立即中断了自己的演说，临时插进了一段对我们表示欢迎的话，他说：“请原谅，我暂且中断我的演说，我以我们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在主席的邀请下，现在正在会议桌前就座的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权先生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致敬，并祝他们今天在联合国组织中开始的活动获得成功。”我到纽约后同他互相拜会时，他也曾向我表示，苏联

在联合国内很少得到支持，常常感到孤立，很希望能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联合国内同他们并肩作战。

我们在联合国官员的引导下，走到为我们安排的位置上，顺序入座，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字样的席位标志。这个牌子虽小，但是在这个大厅里，却显得十分触目，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承认我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对新生的人民中国，采取了拒不承认的“鸵鸟政策”和敌视态度。然而现在，我国的国名和代表正式出现在这个世界最大国际组织的会议厅里，杜勒斯之流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存在。说来好笑得很，我坐的位置很巧，隔着英国代表杨格就是杜勒斯，相距也就一米左右。可是这位死硬的帝国主义分子，明明知道我到了他身边，却强作镇静地装作根本不注意我们的样子。我倒是满不在乎地瞧了这个美国头面人物一眼，只见他满脸僵冷木然的表情，嘴角生气地使劲往下拉，藏在眼镜片后边的两眼，直楞楞地呆视着面前，连抬头看一下我们的勇气都没有。对于他这种对新中国及其代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顽固态度，我们看了真觉得既可气又可笑。

在二十七日的会议上，我没有发言，实际上只是到大会上去亮一下相，正式宣告了人民中国代表的到来。会议一结束，一群记者和摄影师立即蜂拥而上，对我们又是照相又是拍电影，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的，他们“这是照下了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面目”。我想杜勒斯和蒋介石之流，一直把中国共产党人描绘为一群青面獠牙可怕的

“土匪”，现在正好让世界人民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坦然自若的态度和端庄正直的仪表，就是对诽谤者无声的驳斥和有利的回击。

### 中国人民的声音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我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在这次会上，我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了长篇演说。

我在发言中首先说：“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接着我针对美国散布的“台湾地位未定”、“需由美国”“托管”或“中立化”等谬论，引用一九四三年的开罗宣言、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公告和一九五〇年一月杜鲁门自己关于台湾属于中国的言论，一一予以驳斥，又进而揭露道：“美国的实在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发言又针对美国代表奥斯汀说“美国未曾侵略中国的领土”等话道：“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

我在发言的最后一部分又揭露说，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走的正是一八九五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一九五〇

年究竟不是一八九五年，时代不同，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侵略经验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定能驱逐一切侵略者，恢复属于中国的领土。最后，我又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了三项建议，第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第二，使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第三，使美国和其它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这个发言共约二万多字，讲了近两个小时，各国代表通过同声翻译听到我的发言内容。事后有人说我演说时的嗓门很高，劲头特足，不论是发言的内容，还是演说的声音，都把会场给震动了，就象把中国人民憋了多年的气，一下子吐出来了。我倒没在意自己用了多大的嗓门，只觉得我讲时全场鸦雀无声，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代表和蒋帮“代表”，都以各种不同的感情和神态在凝神谛听，我讲得相当顺利，中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演说结束后，许多人上前来同我热烈握手，向我们表示欢迎和祝愿，其中还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名记者斯诺，他和华裔学者麦仁德教授一起听了我的讲演后，又挤向前同我紧紧握手。当时我自己也相当激动，感到近五亿中国人民是决不会孤立的。即使在帝国主义者直接控制着的地方，我们的朋友也是数不胜数。人们对我们的演说的强烈反应和热情支持，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在我发表演说的过程中，美国的电视台还作了实况转播，第二天各报又发表了有关我国代表团发言的消息和演说的内容摘要，可见其影响是不小的。

安理会会议厅的设计不太一般，十一个安理会理事国的代表，还有被邀请出席大会的各国主要代表的位置，都

并列坐在一条马蹄形的长桌后面，每个位置上都安有听同声翻译的耳机和选择不同语言的开关，面前的桌上放着小话筒，发言时可以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直接对话筒讲话，同声翻译则随时将代表的发言译成不同的语言，传播给各国代表及旁听者。同声翻译室就设在会议厅后面的楼上，里面的工作人员通过一排很大的窗户，直接观察会场内的情况，以便及时配合。会议席长桌前稍低一些的地方，是会场记录、电传打字和录音等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位置。再向前隔着一道木栏，是一排排好象剧院观众席似的座位，那是各国旁听者和新闻界的人士的位置。那里的人们都全神贯注地观察和倾听着会议席上所发生的一切，使得这个安理会会场，从内容到形式上，成了个名符其实的“国际舞台”，我们这些人也成了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串演着各自的“角色”。

由于会议席是半园形的，与会代表虽然是并排坐着，却可以互相看到。我的座位是长桌右首第一个，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蒋廷黻则坐在长桌左首第四或第五个位置上，正好同我遥遥相对。当时我们所持的立场和所怀的心情，也恰恰是完全对立的。我在这一头慷慨陈词，满腔义愤地控诉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及庇护蒋介石残余集团等种种罪行，蒋廷黻却在那一边连头都抬不起来，一直耷拉着脑袋，并且老是用手遮着前额，不让别人看见他的脸。有记者形容他当时“面部带着一种丧家犬的神色”，也许他面对着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多少有点自惭，不大好受吧！这些场景都拍了照片和纪录影片，当时的美国报刊，发表了

不少有关的报道和图片。我记得有一期美国《生活》画报上，并列登着好几张我和美国代表奥斯汀在会议上的照片，一张是我在挥手怒斥美国的侵略罪行，奥斯汀在尴尬的歪着嘴听着；另一张是奥斯汀在作强辩发言，我则侧目抿嘴蔑视地瞧着他；样子虽不好看，神态却很逼真。尽管有的报刊照例污蔑了我们一顿，说我如何“作了二小时尖刻而强硬的谩骂式讲话”，甚至我的衣服料子和内战时留在脸侧的枪伤，也被攻击性地描绘了一番。电视实况转播时，还曾把镜头对着乔冠华正随意晃动着的腿并歪曲解说道：中国代表虽然讲得气势汹汹，其实内心也很“紧张”，他们有人的腿就正在“神经质地发抖”。这些褒贬各异的宣传报道，都从侧面和反面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不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报刊，都十分重视我国代表的发言。

当时的纪录影片后来在我们国内也放映了，我的孩子看到后说我在会上发言时的样子很“厉害”，同我平时的样子判若两人。我当时倒未有意作什么样子，只是觉得我面对的是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者及其同伙，他们已对我国侵略欺压了一百多年，无论是我个人还是亿万同胞的心灵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如今我们好不容易赶走了外国侵略者打败了国内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者却又处心积虑地图谋颠覆和消灭我们新中国。他们如此可恶可恨，我们对他们当然没有什么客气可言，只有毫不留情地同他坚决斗争。我还想到，过去我们同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在战场上刀对刀、枪对枪地斗，如今却站在美国本土上，指着美国当权者的鼻子，面对面地痛斥他们，尽管他们恼怒万



分，却只能硬着头皮听着，奈何我们不得。这在旧中国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今天却成了现实，这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意义。也正因此，我们有着很大的勇气和信心，在联合国进行着这场艰巨斗争。

十一月二十九日，安理会继续开会。这次会议开始是讨论美国诬蔑我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安排了南朝鲜的代表第一个发言。我们为了表示抗议，拒绝参加这种讨论，入场后有意不到会议席就座，而坐在大会的贵宾席上，只参加旁听。南朝鲜代表发言后，蒋介石的代表蒋廷黻接着发言，我们为了便于同他进行斗争，又坐回到会议席上，准备伺机予以反击。蒋廷黻的发言除了照例攻击辱骂我们一顿，又为其美国主子的侵略罪行辩解开脱，硬说美国从来没有侵略中国，甚至以他们自己的小学教科书上没说美国是帝国主义来作证明，其论据十分荒谬可笑。他的发言形式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辫子”，他口口声声“代表”中国，发言时使用的语言却不是中国话，从头到尾都用英语。待他发言完毕，我马上就向会议主席举手，要求临时发言。主席对我们还是尊重的，允许我作了个即席讲话。我首先揭露他们只是国民党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人民，我们不屑于理会他们。接着我又抓住他发言不讲中国话的“小辫子”嘲笑挖苦道：“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这下弄得那位蒋家“代表”十分狼狈，也给了与会者深刻的印象，按照规定，华语是联合

国的正式工作语言之一，中国代表讲话可以直接使用华语；但蒋廷黻却不说中国话，老用英语发言，实在有丧国格，我们去后理直气壮地使用着祖国的语言，并为此“敲”了蒋党“代表”一下子。这是一段即席插话，事先没有稿子，只由大会的同声翻译临时译成外语并广播出去。当时翻译这段话的是位中国女同胞，名叫唐笙，曾经在英国受过教育，英语很出色。我这段话，她翻译得顺畅准确，带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听说因为蒋党“代表”发言都用英语，使她这个英语翻译长期没事干，这次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工作机会，又是大长中国人民志气的事，所以她翻译得特别起劲，就在我们这次发言后的几个月，唐笙也回到了祖国，一直在国内工作，前几年又由我国政府推荐，重新去到联合国机构担任工作。

十一月三十日，安理会继续就我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的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进行讨论。美国代表奥斯汀极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朝鲜问题上，企图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提案，最后又操纵表决机器，否决了我们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美军自台湾和朝鲜撤退的提议。对会议的这一无理决定，我再度作了发言，用美国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的事实，朝鲜战争以来美军飞机侵犯我国领空，毁坏中国财产，杀害中国人民的确凿数字，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支持蒋介石进行血腥内战的历史，责问美国代表道：“我要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这是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又向会议表达了我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坚强决心，“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我要告诉奥斯汀先生，美国的这种威胁是吓不倒人的！”

### 会场以外有“战场”

十二月七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多数通过了决议，将诽谤我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我们在这一颠倒黑白的提案通过后，愤怒地离开了会场。美国在这一图谋得逞后，又操纵联合国组织，在十二月十五日决定：联合国大会无定期休会，并于十二月十八日又通过决定：宣告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也无限期休会。

联大的这些决定，实际上取消了我们利用联合国讲坛同美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机会，我们便适时地采取了别的斗争方式，把在联合国会场内的斗争，转移到会场以外来。十二月十六日下午，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在地成功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对各国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是为争取和平来的，我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种种合理建议，“但是不幸地、虽然并非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集团的操纵下，拒绝了我国政府这个合理的和平的建议，对此，我们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我说，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联合国未能继续讨论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使我们至今未能就此问题在大会继续发言，“但是，我们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是应该被全世界听到的，因此，我把准备在政治安全委员会的发言，在这里分发给大家。同时，我们对于美国政府如此操纵联合国，不让我们有继续发言的机会，表示

愤慨。”最后我又通过记者们向用各种方式对我们表示欢迎和友好的美国人民表示衷心感谢。深信中美人民定能战胜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政策，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下去。

在我谈话后，我们就将已事先译成英文的发言稿和各种资料，一一分发给各国记者。资料中有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材料，还有我人民解放军自蒋军缴获的美国武器图片集，朝鲜战争以来美国飞机对我国轰炸、扫射实况的图册，和其他各种美帝侵华史料。我们的这次谈话以及散发的文稿资料，被好几家外国报刊发表和引用了，这成了使各国人民了解我国立场和态度的一条重要渠道。

在联大会议期间，我们代表团除了同一些与会国家代表有外交往来，还同有的美国进步人士进行了友好接触。龚普生同志过去在美国受过教育，认识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我们在纽约时，龚普生同志曾几次去罗伯逊家拜访，向他转达了中国人民的问候。我们原拟邀请他访问我国，但考虑到美国政府正采取敌视我国的政策，在国内实行着严厉的反共反人民措施，在当时的处境下，罗伯逊不便于接受我们的邀请，双方这一美好的愿望就未能实现。在中美建交后，罗伯逊却已去世多年，当年的这一愿望就成了永远的遗憾。但是罗伯逊对我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却令人难以忘怀。

除了这些友好人士，还有一些美国人怀着不同目的来找我们，有的是想同我拉关系、套近乎，有的则是大公司

的推销员，找我们拉生意来的。我们通过他们也买了一点国内有用的东西，其中有不少资料性书籍，单是大百科全书就有几部，都由跟我们的美国保镖帮助搬回了旅馆。只是由于美国对我国的敌视政策，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冻结我国在美国银行的全部存款，我们代表团去时，也将带去的用费存在纽约银行里，真要冻结住，可就麻烦了。幸好我们事先得到消息，在银行即将关门时，赶去提出了全部余款，没受到影响。倒是苦了有的推销员，他们拿了我们的支票没有马上去取款，结果取不出钱来了，满头大汗地跑来求我们想法，我们只得又付了一笔钱给他，收回了原支票。好在被冻结的钱早晚还是我们的。

会议的空隙时间里，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和那几个美国保镖，还陪同我们游览了纽约市容，参观了大铁桥、摩天大楼和一些新型设施，接触了一下美国的现代技术和文化。后来我们分送了一点小礼品给包括几个保镖在内的美国人和联合国工作人员，作为一种友好的表示，他们也十分高兴。美国保镖同我们熟悉以后，也常同我们谈美国情况和自己的事，对我们表示了一定的友好感情。联合国派给我们的联络员是一位姓吴的华侨，我有时也同他谈谈心，向他讲讲“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后来他果然抛弃了在联合国工作的优越条件，返回祖国参加工作，只是听说在十年动乱中他不幸去世了，十分可惜。

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代表团内部工作相当紧张，但是相互团结一致，配合得十分协调，每人按照分工，工作得很有秩序。有的发言稿及有关资料，是到纽约后临时写出的，

又从那里发回国内审查。得到国内的修改稿后就日夜加班地翻译和找地方打印出来。每次发言前后，都在代表团内部讨论和征求意见，以求更好地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由于工作劳累，加上美国做的饭菜不合口味，大家饭量都减低了。我们买到一些墨西哥小辣椒和华侨做的豆腐乳来开开胃。吃饭时还互相开开玩笑，生活既紧张又活跃。我们套间里还常开着收音机，不论是报道新闻还是广告宣传，都在不断地“收听”。其实并不是在欣赏什么节目，而是为了干扰可能的窃听。陈忠经同志分管了许多对外联络的工作，经常同联合国办事机构和美国的有关方面打交道，干得十分认真尽职。负责机要通讯工作的同志，一直坚守岗位，很少出门活动，保证了和国内的联系。同志间相互也是很关心照顾，做到了思想上的团结和行动上的一致。

### 强大的后盾 巨大的反响

我们在联合国工作得紧张的时候，也正是朝鲜战场上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装备着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武器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我们主要靠步兵、轻武器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打击下，一败涂地，不断南逃。这造成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和混乱。美国本来希望利用我们代表团到联大发言的机会，同我们进行接触，看看是否有妥协的可能，但是我们去后态度一直很强硬，除了公开斥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外，不作任何妥协的表示，也不同美国当权者有任何来往。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捞不到的好处，在

我们这儿同样什么也得不到。相反，朝中军队在战场上打得越好，我们在联合国的态度也越强硬。看起来我们只有很小的九人代表团，但是却同朝鲜前线的朝中大军密切配合着。有他们作我们的后盾，我们同样无所畏惧，坚决奋战。

对我们在联合国的行动，祖国人民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声援，党和政府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与关注。除了对我们作了许多直接的指示和支持外，从我们代表团一离开北京，国内的报纸就以显著位置，连续发表有关我们代表团活动的消息、文章和图片。《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几篇社论，我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安理会的首次发言，三十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都从一版到二版用大字标题整版地刊登了有关消息和发言全文。《人民日报》在当天的社论中开头就说：“我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声明，反映了我国人民为保卫祖国独立与世界和平而奋起反对美国侵略的坚强意志，同时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日益高涨的要求和平的正义呼声。它与我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部队在朝鲜前线的英勇作战，同是对于制止美国扩大侵略战争，与维护远东和平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

我后来翻阅当时的报纸时看到，有的工人读了我的发言全文后说：“伍修权同志真是我们的好代表，他的话就象是我要说的话一样，读完后，心中就象出了一口恶气，痛揍了美帝一顿似的。”一些大学教授说，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的叩头外交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的真正意志已从自

已代表的言语中充分表达出来。”青年团中央也发表声明，说我们的发言“是近百年外交史上表现了中国人民正气和民族尊严的文献，使得美国帝国主义万分狼狈，除了使用表决机器作无耻的否决外，更无词答辩……”。

国外的反映也是这样。苏联报纸曾经评论说：“联合国中第一次响彻着中国人民代表的声音，这个声音所代表的政府，其稳固与人民对它的拥护在中国历史上是无比的。”特别是一些海外侨胞，从我们的活动和言论中，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们感到扬眉吐气，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增添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正如作家聂绀弩当时在香港写的文章所说，在一九五〇年的世界十大新闻中，第一条是朝鲜战争，“第二条大新闻，无疑地应该是伍修权将军在联大对美帝侵略台湾的控诉。那控诉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自不用谈，最重要的却是这样指着帝国主义的鼻子直斥他的罪行，不但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该是第一次。”正是在我们发言的直接影响下，好几位著名的中国学者，例如那位最早赶到安理会会场，旁听我的演说的吴仲华博士，还有后来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原国民党政府派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代表李铁铮，包括那位驻纽约总领事宗维贤，在旁听了我们演说后，都作出了返回大陆的决定，克服重重阻难，先后回到了祖国。各国的资产阶级报纸，对于我国代表首次出现在联合国讲台上这一当时的“头条新闻”，当然不能不闻不问。有一家美国杂志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中国的代表来到联合国后，“美国人民的目光就都转到成功湖来了”。有的报刊则歪曲报道，说什么“红



色中国在成功湖蔑视联合国”，使美国压服中国的“希望破灭了！”甚至吓唬美国人民“不要抱什么幻想”，叫嚣要同中国“打一场战争”。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说，中国代表的发言，使“我的政府感到不愉快，……尤其不赞成这种攻击”。“战争贩子”杜勒斯懊丧地自供他当时“被一种悲哀的情绪支配着自己的感情。”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我们发言后马上恼火地说：中国代表的控诉“猛烈而完全荒谬”，威胁说“要对中共采取行动”，“一切武器都必须加以考虑”。美国的这种态度，正说明我们的斗争击中了美帝国主义者们的痛处，这更增强了我们斗争的决心与信心。

###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时至十二月中旬，面对美国操纵联合国无限期休会的情况，我国政府发表声明说：“伍修权将军及其随员已无留在成功湖的必要，故已命令伍修权将军等于本月十九日启程回国。”行前，我们将原拟在联大第一委员会发表的关于美国侵略中国案的发言稿，正式提交给联合国秘书处，要求他们将此发言列入大会文件。我们在纽约机场向报界发表了声明，首先就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和一九五一年新年，向美国人民表示了祝愿，接着声明，我们为和平来到美国，虽然我们的有利于和平的提案被美英统治集团加以拒绝，可是我们并不失望，我们将为和平继续奋斗。当天，我们按照赴美原路返回。次日下午，我们飞抵伦敦。我又向记者发表了简短谈话，再次对美帝的行径进行了揭露。二十二日到布拉格，二十五日到达莫斯科。近一个月的紧

张工作，这时候才感觉到了疲劳，周砚同志到布拉格后，一下子就连睡了十几个小时，可见她困到什么程度。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我们一行九人分批离开莫斯科回国。为了能让我们赶回国欢度新年，国内专门通知驻伊尔库茨克的我国民航办事处，要那里的中国民航班机留出几个位置，等我们代表团赶到以后再起飞。我们及时赶上了回国的班机，机组的同志见到我们也很高兴。这样，我们便在新年前夕顺利地回到了祖国首都北京。当我们走出机舱时，机场上一片欢腾，各界代表都来欢迎我们的胜利归来。郭沫若（他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致欢迎词：“我们的特派代表在成功湖，……把美国和他的仆从国的外交阵线打得落花流水了。我们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感谢伍修权代表的负责传达，已经响遍全世界。”

我在欢迎者高呼“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万岁”等口号声中，也兴奋地讲了话，以感谢祖国对我们代表团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欢迎，我简要说了我们执行党和人民交付的崇高任务，受到美国人民热情欢迎的情况，又即兴地说：我们代表团到达纽约的第二天，恰巧碰上一场大风暴，我们看到当时的纽约，一切都笼罩在昏暗阴沉的气氛中，感到它正象征着帝国主义的末日。然而今天，当我们飞回祖国的时候，天气却格外晴朗，我们在西伯利亚的上空，就看见光芒万丈的太阳正从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冉冉升起。我说，这也是一种象征，它预示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

民主世界正在崛起，世界上的条条大路，都在走向人民的胜利。

我们在祖国迎来了一九五一年元旦。至此，我们历时四十七天(在美国二十六天)的联合国之行，胜利结束了。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在国际讲坛上当面痛斥了美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罪行，阐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其影响和作用都是很大的，也为以后同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外交斗争，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我们代表团全体同志，受党和政府的委托，在美国本土同当代的头号帝国主义者面对面斗争，也是一次极为难得的锻炼和学习，大家都感到很有收获。回来以后，我们向中央和外交部的同志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刘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分别听了我们的口头汇报。周总理详细询问我们在联合国的各方面情况，对我们进行了鼓励，少奇同志也对我们的活动表示赞赏，指示对这次联合国之行要广为宣传。于是在一九五一年初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代表团的几个同志，应全国政协、和平委员会及北京大学等许多单位的邀请，先后去作了多场报告。天津市市长黄敬同志也在天津组织了上万人的群众大会，专门请我们去报告联合国之行。我们从人民群众的热烈反映中深深感受到一点，饱尝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华民族，一旦能扬眉吐气地说出自己要说的话，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自豪感情。也正因此，我们的联合国之行，在诞生刚满一年的新中国，成了人人关心、万众瞩目的一件大事。我们个人由于参加了这一工作，一时间也颇受

人们的注目。但是我对此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每一个同志，在某种意义上，也相当于一个演员。我们执行一项任务，也就象演员担任一个角色，既然上了台，就要演得象个样子，把各自的角色演好，决不能马马虎虎。但是下了台就不再是那个角色，而是普通一员了。我总是以这个想法来提醒自己，时刻不忘自己只是一个执行党的任务的普通工作人员。

以上叙述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自那次联合国之行以来，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政府终于改变了对我国的态度。一九七一年十月，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席位，接着尼克松总统访华，签订上海公报，一九七九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关系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尽管在目前和将来还会有着这样那样的障碍和曲折，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中美两国人民必将同世界人民一起，把当年杜勒斯之流的反动政策和超级大国独霸世界的图谋，永远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同样，台湾回归祖国的呼声也日益深入人心，我们同国民党的许多人士，虽然在国内战场和国际讲坛上都曾交过手，但那毕竟已经成为历史，并且我们也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现在应该既往不咎向前看，为着子孙后代，早日结束台湾同大陆的分裂局面，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 三、开城一月 (1951年冬)

一九五一年夏，朝鲜战争逐渐将战线固定在三八线一带，双方都很难向对方作较大的推进，战争处于僵持状态。讲求生意经的美国当权者也看出，如果要实现他们预期的侵略目标，“取得那种胜利同付出的代价（人员损失）相比，它的价值还不如付出的代价。”如果继续北犯，反而会延长补给运输线并加宽战线，“再说满洲和中共国土幅员辽阔，凭美国的资源和能力是根本不能治服的”（见侵朝美军司令李奇微的回忆）。同时，国际上要求在朝鲜实现停火的呼声很高，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也认为，如果在原来发起战争的三八线附近实行停战，这对美国来说也不算太丢面子。双方经过外交往来，决定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一日起，在朝鲜开城举行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一方，以所谓“联合国军”和李承晚伪军为一方的停战谈判。我方公开出面进行谈判的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和李相朝中将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开始是邓华将军，以后是边章五将军等；朝、中双方在谈判中是配合得很融洽，很紧密的。在内部掌握和指导这个谈判的是我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乔冠华等一大批同志也在那里协助这一工作。当年冬天，谈判正在紧张进行中，李克农同志得了很重的气喘病，中央担心他的身体不能支持，决定派我到朝鲜去替换他，让他回国休息和治疗，同时派外交部美澳

司司长柯柏年同志去，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我和柯柏年同志，李克农同志的秘书和护士等分乘两辆吉普车，由我国东北直接开往朝鲜，那时朝鲜前线正处于阵地战阶段，朝中方面虽有一些空军，但是作战力量还很有限，只能在平壤以北接近我国的地区内活动，“制空权”基本上还在美军手里。敌人就用空军在我军后方进行所谓“绞杀战”，不断轰炸破坏，企图切断我军的运输补给线，那时美国飞机整天到处侦察和投弹扫射，白天根本没法行动，只能利用夜色掩护开车前进。由于时常有敌人夜航机出现，汽车还不能开灯，只能摸着黑慢慢开进。当时正是十一月间，一弯如钩下弦月斜挂在天空，借着淡淡的月光，我们看见一路上中朝军民人来人往，绵延不断，许多交叉路口上，都有朝鲜人民军和我国志愿军战士在指挥交通，呈现一派紧张严肃的战争气氛。我这个打了很多年仗的老兵，重回到久已熟悉的战争环境中，不由得也很兴奋愉快。

正在我欣赏战地夜色时，突然一声枪响。这是防空哨的报警枪声。许多车辆有的马上冲过封锁区，有的就地分散隐蔽，只听敌机哼着飞过来了，漫天空撒下一串串吊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原来隐蔽在夜色中的山岗、丛林、河流和道路，一齐显露了出来，那照明弹的光芒飘忽不定，此明彼灭，光下的景物也就时隐时现，变幻万千，显得十分好看。这种平时少见的奇异景色，虽然使人赏心悦目，但是却隐藏着一种战争的恐怖，要是谁不小心暴露了目标，可不是好耍的。我们在路上也遇到了轰炸，一队夜航敌

机不知发现了什么目标，向不远处翻来复去地又投弹又扫射，在已经烧焦了的土地上又燃起一片大火。志愿军战士们把美国侵略者戏称为“钢铁公司老板”，他们正在朝鲜拚命“倾销”自己的钢铁“产品”。我们看着这批敌机把它们带来的炸弹都“倾销”完毕，又哼着飞回去时，马上重新发动车子，奔赴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们日宿夜行地赶到了北朝鲜首都平壤后，那里已被战争破坏得不象个城市了。在一处山沟里的大掩蔽部里，找到我们的大使馆，大使是倪志亮同志。他接待了我们后，就陪我和柯柏年同志去见金日成首相。金首相住在平壤郊区一个很隐蔽和安全的地点，我们通过层层哨位，见到了闻名的朝鲜领袖金日成同志。会见中，我向金日成同志说明了自己此行的任务，请他作指示。他向我说，朝鲜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党和政府同人民怀着同一心愿，也希望这次战争早日停下来，使人民摆脱战争灾祸。但是停战的实现，必须在双方都能接受、可以取得一致的条件下才行。还指出，停战线应该维持在三八线一带，不能接受美方的无理要求。他希望参加谈判工作的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紧密团结，通力合作，共同战胜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都嚣张蛮横的美国侵略者。最后他预祝我们的任务能圆满完成。

在平壤稍事停留了解了一般的情况以后，我们就乘原车向谈判地点开城驶去。越接近前线，道路越难走，来回的车辆也越多，许多军车司机，把车开得又快又猛，弄得我们十分紧张。因为仍是夜间行车，途中碰到了一次惊险的事。我们的吉普车正在紧张行驶时，因为没有打灯，走

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了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向我们迎面闯来，定睛一看，原来是对面开来的一辆大卡车。就在两车几乎相撞时，我们的司机把车头向右猛一拐，只觉身下一颠，吉普车腾空而起，我们几个人一齐从车里抛了出来，没等我们意识过来怎么回事，呼通通几声就摔了下来。那股力量也不小，我们要是摔在石头上或树干上，不粉身碎骨也得头破血流或断胳膊断腿。可是巧得很，我们竟被擦在一个水坑里，只觉身上一阵冰凉，才知一身十分讲究的呢大衣都被冰水泥污浸透了。我们忙爬起来，互相一看，谁都没有受伤，真是万幸。转身一看，吉普车已反扣着翻了过来。前面走的一辆车，见我们没有跟上，又返回来找我们，才知已经出了事。他们就同我们几个人一齐动手，把车子翻转过来，司机上去一试车，又是喜出望外，车子一点也没坏，仍然可以开动，我们不由得互相庆贺起来，人和车都没有损伤，虽然身上湿了，也就算不得什么了，我们高兴地重新爬上车去，格外小心地开车继续前进。一场富有惊险色彩的奇遇就这样过去了。

因为穿着湿衣服不好受，同时也因为车里油不够，就决定半路上找一个地方处理一下身上的湿衣服，再设法加些油，结果找到一处志愿军警卫部队的驻地。那是一个半地下堡，隐蔽在山坡下，里头住了一排部队。我们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告诉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要到什么地方去，虽然没有说明我们的具体身份，但是他们从我们的服装和态度上，看出我们是一些负责干部。志愿军战士们热情地迎接和招待了我们，把我们安置在自己住的掩蔽部



中休息下来，给我们的车加了油，还帮我们把衣服烤干刷净了。这批“最可爱的人”的可爱形象，长时间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当夜天亮时，我们到达了开城，见到了李克农等同志，向他们表示了慰问。当我向李克农同志谈了我要替换他下去休息和治病时，他却表示了一个态度，说是“临阵不换将”。他虽然身体不太好，但是熟悉谈判工作的全部情况，已经摸清了各方面的规律，如果现在中途换人，一切又得从头来起，对整个工作不太有利，因此他建议在他身体还可以支持的情况下，不马上换人。我们觉得他这个想法也有道理，对他这种带病坚持工作的顽强精神也很敬佩，就向中央反映了这个意见。请示的结果中央同意李克农同志的建议，仍然由他负责掌握谈判工作的进行，如病情无发展就不换人。

我为了再观察一下李克农同志的健康状况，又可以趁此机会了解一些谈判的情况，也暂不回国，就在这个世界瞩目的地方留下来，每天各处走走，观察和调查朝鲜战争及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当时，朝鲜北部在美国等十六国军队的狂轰滥炸和践踏蹂躏下，几乎所有的城市和村镇都被战火摧毁推平了，我们进入朝鲜以来，几乎没有见到一座完好无缺的房子，只有开城还有一些比较完整的房子，可以看出朝鲜当年的生活习俗和民族文化。开城位于战线北侧，除了这个圈子里，到处都是炮火连天的战场。为了便于识别，在开城四周，白天放着几个大气球，夜晚亮着几盏直冲天空的探照灯光柱，距离很远就能看到，敌人的

飞机和炮火都不准侵扰这里，等于是战场中心的一块小小的和平绿洲。别处可就不大一样了，整个朝鲜北部，不论是军队还是人民群众，都过着半穴居的战地生活，战争破坏了和平与幸福，但是却没有摧毁他们的意志，人民军使用着简单的轻武器和少量的重武器，抗击着武装到牙齿的自吹不可战胜的美国侵略军。工农群众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生产劳动，努力支援前线。朝鲜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人民同甘共苦，为祖国的解放和远东及世界的和平事业，忘我地斗争着。他们的顽强精神和英勇形象，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

由于开城处于我方的地区内，参加谈判的美方人员必须打着白旗才得进入。我们每天都看到一些美军和李伪军的人员车辆，插着小白旗在开城来来去去。他们虽然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都是我们的敌人，但在我们的地区，对他们仍然以礼相待，负责他们的安全，同时对他们保持着一定的戒备与警惕，不断揭露他们的破坏活动。也正由于他们常搞破坏，后来将谈判地点改到军事分界线上的板门店，不准美方人员再到开城来了。在开城谈判中，双方一直在进行无休止的扯皮。我们的原则是，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也别想从谈判桌上得到。敌人想通过军事压力为他们的谈判代表撑腰，所以前线的一举一动无不反映到谈判桌上来。谈判桌上的紧张斗争，密切配合着前线的激烈战斗。李克农同志虽然身体不好，但却长期坚持着，如同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前线指挥员，顽强战斗，不下火线。我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见他毫无倦意，并且病情逐

渐减轻，身体已有起色，考虑到国内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就又同柯柏年同志一起，带着在前线获得的深刻印象和振奋心情，乘原车返回祖国。不料在归国途中，又发生了一次危险的巧遇。

我们的吉普车正通过沙里院一带的敌机封锁地区时，只见公路两侧到处都有被敌机打坏的汽车，有的四轮朝天，有的歪倒一边，有的烧得只剩残骸，有的车身炸得稀烂，东一辆西一辆地使人触目惊心。我们想赶紧通过这片危险的地区，可是偏偏在这时，吉普车却突然抛锚了。司机急得满头大汗，车也挪不了半步。这里前不靠村，后不靠店，别说找人修理配零件，方圆多少公里内连人烟都不见。司机打开车盖一检查，丧气地说，是车上的风轮坏了，不换新的根本走不了。可是在这个鬼地方，到哪里去换新的风轮呢？只听到敌人的飞机又远远地哼着过来了。我们想，要在这里被敌机发现挨一顿炸才冤枉呢！就分散开来隐蔽。正在大家走投无路无计可施时，司机忽然高兴地喊了起来，原来他从一辆同一型号的坏吉普车里，发现那辆车别的部分都炸坏了，唯独我们车上缺少的风轮却完好无损，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忙帮着司机把那个风轮拆下来，安装到我们的车上，一试车，没问题，就象专门为我们预备的一样。于是，我们的吉普车就同一车人一样，又欢快地前进了，那段飞机封锁的危险地带，很快就抛得远远的了。事后有人开玩笑说我算得一员“福将”，一生中常常碰到这类逢凶化吉的奇遇，这大概是托人民之福和马克思在天之灵吧！

## 四、出使南斯拉夫

(1955.5—1958.10)

### 中南关系的建立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现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最早承认我国的国家之一，早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即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天，他们就致电我国政府，表示愿意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由于一九四八年六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南共已被苏共及欧洲九党开除出兄弟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它与苏联及东欧几国之间的关系，正处于全面破裂的紧张状态。当时我党为要保持与苏联等国政治上的一致，我国政府对于南斯拉夫并表示，采取了既未接受、又未拒绝留有余地的态度，把同南斯拉夫建交的问题搁置起来了。当时虽未马上建交，南斯拉夫对我国却一直采取着友好和支持的态度，坚决主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多次在联合国等国际讲坛上，公开反对外国对我国的侵略，投票赞成有利于我国的各项提案。南共对我国用枪杆子打出来的革命经验及独立自主地不照搬外国做法的建设道路，也表示十分赞赏。虽然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南两党两国之间还隔阂较深，但是两国人民之间还是存在着友好感情的。南斯拉夫人民不断传颂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奇迹，中国人民对南斯拉夫的游击战争也很佩服，

这些都是中南两国建立和发展友谊关系的良好基础。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国内外政策发生了一股“解冻”之风，这股风也吹到了冰封多年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上。一九五三年六月，即斯大林去世刚三个多月，苏联就主动派出了新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打开了长期僵持的苏南关系的局面。一九五四年秋，苏共中央派他们中央国际部的特别代表专程来华，向我党陈述他们对于恢复和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解释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毛泽东同志亲自接见了他们，我担任了这次会谈的翻译。他说苏共中央认为一九四八年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不公正和有错误的，继续保持与南斯拉夫的紧张关系，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们希望各兄弟国家都恢复和建立与南斯拉夫的正常关系。为了与各兄弟党协调一致，建议我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相应地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会谈以后，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等同志商谈了苏共的建议，认为这个意见是合理的，我们可以同意。由于建国初期我们虽未同意与南建交，但也未断然拒绝，当时这种留有余地的做法，倒为以后的改善关系提供了方便。经过政治局讨论并同意，我国政府作出了与南建交的决定，并将此决定通知南斯拉夫。我们的态度，马上得到了南斯拉夫的积极响应。双方经过接触后，一致同意建立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发表了中南两国建交公报，公布了两国外长的电报。

建交问题一确定，我国首任驻南大使的人选就成了一

个重要问题。周总理兼外长亲自主持外交部的碰头会，同几位副部长和各司司长商谈此事。会上大家说南斯拉夫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同他们的交道将是相当复杂的，这个大使的任务将比较艰巨，不大容易当好。讨论中大家都未提出具体建议，有时是一阵沉默。后来周总理正面问我道：“伍修权同志，你去当这个大使，怎么样？”这对我当然是突如其来的问题，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就对周总理说，我要好好考虑一下。周总理说：“那好，你回去考虑考虑，明天再答复我。”我回去后认真地考虑了总理的意见，我想到了两点：第一，我既然在搞外交工作，老蹲在国内是不行的，应该到外面去走走，积累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感性知识，这次出使南斯拉夫，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机会；第二，南斯拉夫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情况复杂，任务重要，领导上既然已经考虑到我，我就不应该犹豫和推辞，而应该勇敢地挑起这副担子来，在实际工作中来锻炼自己。我决定接受这一任务。第二天就向周总理报告了我考虑的结果，表示自己乐意去南斯拉夫工作。周总理也很高兴，鼓励地说，他相信我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问题就这样决定了。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我国政府公布了毛主席任命我为我国首任驻南斯拉夫特命全权大使的决定，国务院同时免去了我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同月十日，南斯拉夫也发表了任命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为首任驻华大使的决定。

至此，中南两国之间的外交活动和友好往来正式开始了。一九五五年四月，南斯拉夫派来以贝柯维奇为首的工会代表团，一面参加我国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

一面就中南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进一步商谈。我国由邓小平同志与他接谈。当时虽然两国都有了改善关系的愿望，但是毕竟还处于“解冻”的初期，加之本来就缺少互相了解，所以会谈时双方的态度都比较严肃，贝柯维奇认真地向我们介绍了南斯拉夫的情况和南共的立场，特别对一九四八年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作了大量的解释。我们过去对许多事情确实不太知道底细，对贝柯维奇的话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他们还就“五一”节游园中的一幅世界地图上，将南斯拉夫画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并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向我们表示了不满。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让有关部门把那幅地图取掉了。

我被任命为驻南大使后，就全力着手于使馆的人员组成和筹建工作。我首先找到周秋野同志为使馆的政务参赞。周秋野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同我在八路军延安总部一起工作过，解放战争初期，又一同在东北工作过，相互比较了解和信任，他的爱人张月同志也和他一起到驻南使馆任二秘工作。接着我们又物色了使馆的全套人马。由于有了周秋野同志作建馆的具体准备工作，我就利用机会同徐和同志（编者注：系伍修权同志的夫人）一起去南方转了一圈，在远离祖国以前了解一下国内的情况。我们先回到武汉老家，看看老母亲和其他亲属故友，接着到长沙和韶山，首次参观了毛主席故居。离湖南后又去了广州，看了看这个历史上的革命名城。返回北方时又绕道杭州和上海，顺便欣赏一下久已闻名的“人间天堂”景色，并到上海进行出国前的置办服装。在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那

时俞沛文同志在上海任外事处长，他派了一个对上海情况很熟悉的同志带我们到各家有名的公司，购置了服装和各种生活用品。当我们回到北京时，使馆的组建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周秋野同志又以我国使馆代办的身份于四月十三日先期赴南，到贝尔格莱德做进一步的建馆工作。

当时，苏联与东欧各国已先后与南斯拉夫复交，苏南两国关系正在迅速发展着。在此以前已经当权的赫鲁晓夫写信给铁托，承认苏联过去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是错误的。铁托则复信说，不听空话，要看行动。为此赫鲁晓夫决定亲自去南斯拉夫访问，加紧作弥合苏南关系的工作。赫鲁晓夫定于本年五月二十六日到南访问，已与南复交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都要参加机场的迎接，我就于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去南赴任，赶在赫鲁晓夫到达以前的当天上午，在我国使馆周秋野参赞和孙清淮同志及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即外交部长）科查·波波维奇、总统办公厅秘书长、典礼局长等陪同下，向铁托总统呈递了国书。我在致颂词中首先代表我国人民和国家领导人，对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人民表示敬意和祝愿，并表示将在自己的大使任期内，尽其全力来发展中南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铁托总统在答词中说，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国书，深信我的出使对发展和巩固中南两国关系及国际合作事业，都具有很大意义。事实上也是这样，南斯拉夫是早就期待着与我国建立友好关系的，从我个人来说，也确实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努力促进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没想到，几年以后又“风云突变”，我们的愿望又一度落空了。



## 中南友谊如春潮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到达贝尔格莱德。这不仅是苏南复交后第一次重要访问，在整个苏南关系史上，也是一个不同往常的行动，过去苏共惯于让别人上他们那儿去接受指示，这次却是苏联主要党政领导人亲自到被他们骂了多少年的小国来，本身就带着“赎罪”和赔礼道歉的意味。我上午刚向铁托总统递交了国书，下午就在各国使节的行列中，参加了机场的欢迎仪式。赫鲁晓夫一下飞机，就在他的机场讲话中，公开承认他们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衷心地感到遗憾，并且要坚决消除这个时期中的一切芥蒂。”由于当时他还没有公开批判斯大林，他把造成苏南关系恶化的责任归罪于贝利亚等“帝国主义代理人”和“人民的敌人”身上，他说“笼罩着阴影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赫鲁晓夫哇喇哇喇地念着早已准备好的稿子，边讲边向铁托频送秋波，铁托却似乎无动于衷地站在一边听着。等赫鲁晓夫讲完，他却不置一词，连照例的欢迎词也没作，就邀赫鲁晓夫等人登车离机场而去，表现出对苏联态度和赫鲁晓夫讲话并不在乎的高傲姿态，倒是赫鲁晓夫表现出一副讨好铁托的卑恭样子。

苏联代表团在访南期间，与南共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最后，于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签署了苏南两国联合宣言（贝尔格莱德宣言），苏联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表示两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建立正常关系，并

在一切方面扩大合作。在宣言中关于两国外交政策的部分，共同表明了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正确的立场。六月三日，苏联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答谢宴会，招待南斯拉夫领导人及各国使节，我也应邀参加了宴会，又观看了苏联去的一个艺术团的演出，感受到苏南两国之间一股不咎既往、重修旧好的热烈气氛。对于这次访问，我国党和政府是取支持和欢迎态度的，认为这是当时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也说，苏南两国领导人的这次会谈，“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次年二月，铁托又应邀访苏，与苏共重建党与党的关系，并签署了苏南关系的《莫斯科宣言》。这一宣言与赫鲁晓夫等在南签订的《贝尔格莱德宣言》，确定了处理苏南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我们正是在这种友好气氛下，抱着团结的愿望，开始了在南斯拉夫的工作。我到任后几天，苏联代表团正在那里时，铁托总统又一次约见我并作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向铁托总统赠送了礼品。铁托对我这个大使还是很满意的，特别是我在大使任期内当选为我党八届中央委员，他认为这反映了我党中央对我的重视，也是对他们的重视。所以我到南以后，工作比较顺利，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十分融洽。在我赴任的同时，南斯拉夫首任驻华大使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也到达北京，拜会了周总理，向毛主席呈递了国书，双方都对新建立的友好关系和两国的独立自主及建设成就，表示了赞赏和祝愿。

在我国驻南使馆的筹建过程中，南斯拉夫政府给予了

许多帮助和方便，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条件很好的馆址，把原来由他们高级干部住的一幢相当讲究的有着大理石柱子的三层楼洋房，腾出来给我们作使馆的办公地点，他们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去了中国，就将他的房子空出来改作我们的大使官邸。波波维奇的房子也是一幢小楼，房子虽不豪华，设备却很齐全，相当舒适实用，并且我们的人也不多，就我们夫妇二人，加上司机和照顾我们生活的同志。整个使馆连武官处、商务处等共约五十人，主要成员除我和周秋野同志外，还有武官丁甘如、商务参赞李琢之、文化参赞卢耀武等同志。那时我们同南斯拉夫关系很好，所以大家工作得也很愉快，内部团结协作也好，都兢兢业业地为发展中南关系而贡献着各自的力量。

我们出国之前，对南斯拉夫的情况了解很少，国内也没有多少可资参考的现成资料，主要靠我们到南斯拉夫以后通过实地调查考察，来了解和研究他们党和国家的情况。这也有个好处，就是对他们没有什么成见。当然过去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对我们也还有着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要看看到底真相如何。南共的同志好象很了解我们的心情。南共中联部长、曾经担任过少共国际书记的弗拉霍维奇，亲自向我们介绍南共的、特别是与情报局冲突的详细情况。当他向我们讲到苏联发动和组织对南斯拉夫政治上的围攻和军事、经济上的封锁，使他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的困难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说，南斯拉夫被苏联逼得没有办法，只得接受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不然真是别无出路。他说情报局的错误

决议，反而激起南斯拉夫党和人民团结一心，顶住压力，渡过了难关。我们听了这些情况，也感到斯大林做得太过分了，引起了对南共和南斯拉夫人民的同情和尊敬。我们后来了解到的事实确是如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根据自己的调查所得，陆续写了一些报告发回国内，据说这些报告很受称赞，认为反映的情况具体生动，材料也很丰富，对于认识和了解南共，很有价值。国内鼓励我们继续进行调查研究，还准备对我们的工作加以通报表扬。

中南建交以后，两国间的友谊往来，真如解冻后的春潮一样川流不息，我国派出了一个又一个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体育的不同的代表团，来到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其中有以彭真为首的人大常委和北京市人委代表团，以刘宁一为首的工会代表团，以邓华为首的军事代表团，以廖鲁言为首的农业代表团，以孔原为首的贸易代表团，以严济慈为首的科技代表团，以及其他许多的代表团和考察组，甚至还有聋哑协会代表团等等，都接连不断地来到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也相应地派出了各种性质的代表团前往中国。南斯拉夫的科罗民间歌舞团到我国各地访问演出了两个多月，我国的艺术团带着杜近芳、张云溪的京剧和《荷花舞》等歌舞节目，在南斯拉夫的建国十周年国庆活动期间，也访问演出了两个来月。这一期间双方共同签订了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协定，报纸上也连续不断地发表了各个代表团来访的消息与中南两国政治活动和建设成就的报道。每个代表团的来往和活动，事先都

要有大使馆作出计划安排，重要的代表团来到以后，我都要出面接待和陪访，铁托等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接见我国代表团，观看我国的艺术演出和参观展览时，我当然要陪同。一九五七年一月，铁托接见彭真为团长、李济深、章伯钧、胡子昂为副团长的中国人大代表团和北京市人委代表团全体成员，接着又同彭真同志单独作了长时间的交谈，都由我陪同会见。我和大使馆的有关人员先后应邀访问了南斯拉夫的各个联邦共和国和一个自治省，参观了他们的主要工业基地、革命纪念地和名胜游览地。卡德尔和兰科维奇等南共领导人，还几次设家宴招待我和周秋野同志两家，进行不拘形式的交谈和友谊往来。

除了正式的礼仪外，铁托总统也同我们有一些友好接触。他爱好狩猎活动，每年都利用一个机会，邀请我和各国大使同他一起到多瑙河畔的猎场去打猎。这既是一种很好的体育运动，又是一种形式活泼的友好交往。那里平时是禁猎的，每年冬天才开放，狩猎收获也是南斯拉夫的一宗出口物资，猎物还是不少的。狩猎中铁托总统邀请我在他的右侧同他一起打猎，这是一个荣誉的位置。以前我没有打过猎，第一次打猎没有出成果，第二次打猎就有收获了，打中一只狐狸和一只野鸡。打猎结束后举行便餐和小联欢，铁托欢迎各国大使每人来一个小节目，许多人就又唱歌又跳舞，真是活跃得很。轮到我时，我觉得跳舞唱歌都不大合适，一时兴起，来了一段京剧，其实我连唱词都记不全，所有在场的人除了我自己外，谁也不懂我唱的是什么，但是大家还认为我的节目别具一格，很有民族特色，

因而受到了人们格外的欢迎，我也算是顺利地过了关吧！我还几次去过铁托常住的位于亚得里亚海上的布里俄尼岛等名胜疗养地，那些岛上气候宜人，风景优美，果树成荫，意趣盎然。最特殊的是那里有一种泥土，能治关节炎，据说铁托也因为有此病需做泥疗，才常去那里的。那岛上除了高级别墅和宾馆之类，没有老百姓住，实际上是个禁区，各种建筑和设施，都是为住在那里的高级领导人和外宾服务的。我们到那里时，铁托还请我们参观他的酒窖，品尝他收藏的名酒，据说能享受到这种友好待遇的人不是很多。我参与的这种种活动，到十年动乱中，都成了我“勾结南修，里通外国”的可怕罪状，不过我并不因此而后悔，我们当时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个人也获得了不少知识和经验，其收获和成绩还是主要的。

### 关于“南斯拉夫道路”

一九四八年以后，经常听到关于“南斯拉夫道路”的说法，而且一提总说成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南斯拉夫到底走了什么样的“危险”的道路呢？通过我们在南斯拉夫长时期各方面的观察和了解，近几年又接连去过那里，从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看来，他们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做法，但是似乎也并不都那么可怕和可憎，相反有不少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例如在苏联和中国以至整个国际共运中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问题，南斯拉夫就没有完全重复这些错误。铁托在国内的威信很高，但是在我国常见的

那一套搞法却很少见，他的称呼就是“铁托同志”或“铁托总统”，没有什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之类头衔，也不喊什么“万岁万万岁”，不是到处都挂他的画像，他的意见和讲话，也不叫“指示”，只说是建议或倡议，开大会时不是他作报告就不坐在主席台上，同普通人一样坐在台下听，台上只有几个主持会议的人，按照欧洲习惯，主席台前侧有个专门的报告席，铁托要发表演说，也是到那儿去讲，讲完就回到台下听别人讲。有时在广场上开大会，他就同群众一样坐在下面听。他平时很少在首都呆着，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各地转，发现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还经常出国访问，一方面扩大本国的影响，促进国际间的友好互利关系，一方面了解和汲取别国的长处，加以借鉴和运用。他的工作方式比较灵活，自己基本上只管制定方针大计，在原则上确定后，具体问题并不多管，放手交给执行机关去办，不象有的国家权力过分集中。铁托比较注意发扬民主和实行集体领导，自己该休息就休息，反而松轻自在，所以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康。

铁托的思想相当活跃，他有些观点看来同我们是相通的。例如关于谁是历史的动力问题，他曾经说：“伟大人物从来不是历史的动力，人民才是历史的动力，是他们鼓舞着领袖，而领袖只不过是组织者和人民思想的系统整理者。”他认为：“伟大人物只有在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并且同人民打成一片的条件下，才能创造历史，并且在其中起巨大的作用。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同人民割裂开来，而且总想被高高在上地供起来，那么他只会引起畏惧和仇恨。”

这些说法我以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他的思想也体现在党和国家的制度和政策上，他认为党的作用只应该是领导，而不能是统治。党只管确定方针和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干涉行政事务，因此从中央到地方以至每个企业单位，都是党政分开，各司其职。党组织主要管党员，掌握思想动向，宣传党的政策。工厂不设党委，只有归所在地方党委领导的支部，支委会成员不脱产也不固定，主管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起着保证作用，不干预生产管理。人们可以对政府的政策方针进行讨论以至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因此他们的政治生活比较活跃，开起会来常常很少讲成绩，着重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把真实情况如实告诉人民，发动群众来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政府在困难时期，总是注意稳定经济，保持人民生活水平不下降，因而很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们的宣传工作也是强调用理论来指导实践，而不是只用理论来解释和证明现行政策。他们还注意做犯错误的人的工作，不搞无情打击，不把人整得太狠，撤掉领导职务后，还可以从事写作和研究，生活待遇也安排得比较好，这已形成为制度，对内部的稳定和团结很有利。南斯拉夫是主要靠自己的力量通过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所以他们很注意革命传统教育，全国各地都有许多革命纪念馆、纪念碑和纪念地，每个地区的斗争事迹和烈士名单都被记载和展示出来，革命老战士很受尊重，对后代的教育和影响都很大。

他们的党和政府机关都比较精干，党中央机关一共只有二百几十人，就在一座楼里办公。行政机构有联邦主席



团、议会和议会执行委员会，统称为政府，都在同一座楼里。当时党中央的办公楼前是一个公园样的草坪，门口没有哨兵，看起来很松，但是传达室就有内务部的人，外人去后得通过他们找你要找的人，由有关的人来接见你。办公时间很紧张，职责分明，不允许拖拉推诿和扯皮闲泡。各级机关都很精干，有的县委从县委书记到打字员一共只七个人，可是一个人顶一个人用，效率很高，遇事都是负责干部亲自动手，附属工作人员很少，政府部长要参加什么活动，一个人夹着皮包就来了，我国去的代表团，他们由一个高级干部出面接待，从会谈、访问到食宿旅行，都由他一人包办了，连飞机票都是他自己去弄。

他们的干部对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都敢于负责，出面同外国代表团谈判的干部，在国家方针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自己可以决定问题，直接答复和处理有关事项，不必请示这个等待那个，更不上推下卸和逃避责任。干部的任用得经过严格的资格（不只是资历，主要是学历）审查和业务考核，负责干部还要有基层工作经验。南共有一项工作做得很好，就是胜利以后，把经过战争的老干部都先后送到学校深造，每人都受过专业训练，所以他们的负责干部都是自己所管事业的专家，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本身就是经济学家，解放以后提上来的干部都受过高等教育，县委书记和县的主席必须是大学毕业生，他们除了从事实际工作，还能进行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干部任期和军官服役都有年限和年龄限制，到时候就自动让位，军官满了服役年龄，一过生日就脱军衣。这方面制度很严，干部本人也

乐意这样做，因为他们退職以后还可以当学者、教授，写文章、搞研究，中央的部长任期满了，还可以到下面当厂长或经理。国家对退休干部也安置得很好，用于这方面的经费超过联邦行政机构的开支，仅次于国防费，所以退休的老战士、伤残和退伍军人及退休干部生活待遇都很好，又享有很高的荣誉，因此根本没有赖着不走的事。

在南斯拉夫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最为重要和独特的是工人自治制度，后来又发展为社会自治。这是为体现“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的思想而制定出来的，现在已在整个国家各个领域内实行，当时还限于由工人直接管理本企业的生产大计。在他们的社会组织中，工人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按照南斯拉夫的制度，所有企业单位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本企业的工人大会，平时则由工人委员会负责。工人委员会无专职机构和工作人员，委员全部不脱离生产，由他们根据市场需要和本企业生产能力制定生产计划，各项大事和本厂劳动定额、分配、奖励和福利等等，都由工人委员会讨论决定，然后交给厂长去执行。厂长有任用和解雇人员的权力，但是厂长本身也有任期规定，工人和技术人员可以自由招聘，不合格者可以解雇解聘。他们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区别，不用“工资”“利润”等提法，只称“收入”和“价值”等，各人的收入首先根据每个人的学历、专业水平、工龄和工作条件来评定相对固定的基本工分，再根据各人劳动的数量、质量、成本消耗、设备损耗等等随时评定浮动的计件性工分，超过定额越多工分越高，不够者则扣除，每人的收入同本厂的产值

直接关联，如果本厂产品滞销，产值减少，工分就随之下落，所以全厂工人自然地关心和监督全厂的生产状况，增强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关心全厂的自觉性。南斯拉夫在农业上不强求形式上的集体化，有点象我们现在的生产责任制，看起来还是个体生产为主，但是实际上还是有组织的，国家统一计划和协调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的销售，提供农业所需的肥料、种籽、农具和耕作机械等，还在土壤研究等科学技术上，给农民以帮助指导，农民与国家相互间组织协作，订有合同，实际是一种农业生产的联营合作性质，只是没有采取苏联和我国的形式。南斯拉夫国营农场所耕种的土地，不到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但却提供了很大比例的商品粮。他们不分什么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统称为社会所有制，与我们的所有制在原则上是一回事。当然他们的这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在不断改进和发展中并且如同每个国家都有其阴暗面一样，南斯拉夫的社会里，也存在些不正常现象和不健康成分。对于这些问题，他们也是在不断克服中。

南斯拉夫对自己国家通常的提法是“自治的、不结盟的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他们对外政策最突出的是坚持民族独立，反对霸权政治，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一九四八年以后，美国等国家以为这是把他们拉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好机会，向他们提供粮食贷款和物资援助，南斯拉夫基本上都接受了，他们面临民族危亡之际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被任何一个大国所控制，保持了“既不当西方仆从，也不做东方卫星国”的立场，在外交上实行

着“同人人做生意，不同任何人结盟”的政策，后来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倡导国之一。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公开反对斯大林后，接连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和波匈两党采取了种种措施，平定了这些事件。铁托和卡德尔等南共领导人对此相继发表演说，公开批评了苏共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引起了苏共和一些兄弟党同他们的争论，我党中央则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中一面对南共的态度表示可以理解，一面对他们全面否定斯大林和把斯大林的错误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等观点，“向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提出兄弟般的劝告”。不过当时铁托的不少论点是正确的，例如他说应该把国与国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讨论同国家合作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反对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尤其反对苏共干涉其他各党各国的内部事务。南斯拉夫正是这样做的。

### 中南关系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南斯拉夫的内政政策，本来已引起了我国的注视和赞赏，毛泽东同志后来就说过，铁托象铁一样坚强，不怕压迫。一九五七年一月，彭真同志率领我国人大常委及北京市人委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从莫斯科打来电话，通过我们大使馆找到彭真同志，周总理指示他利用这次访问单独会见铁托一次，向他转达我党的建议，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的问题。由于这时

苏共的名声很不好，没有哪个党肯听他的话，所以由中共和南共发起较好。彭真和铁托的这次会谈，是周总理指定我亲自担任翻译，会谈中铁托表示，关于召开各国党代表会议问题很重要，要在他们中央讨论一下，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以至多边的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世界各国党的会议。后来他们中央经过讨论以后，答复我们的就是这个意见。于是，这次会谈，除了“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双方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外，这个问题就算结束了。事后彭真同志专门向周总理报告过。

由于这次秘密会谈是我担任翻译的，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了我的一条“重要罪行”，专案人员多次追逼我交代怎样与彭真一起“里通外国”的，他们说当时有专职的翻译，为什么却由我亲自去翻译，并且只有铁托、彭真和我三个人密谈，其中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逼我交待当时到底搞了什么鬼。后来听说还为此事一再逼周秋野同志“揭发”我们，周秋野同志顶回了这种无理纠缠，他对专案人员说，彭真等与铁托的这次会谈，是根据周总理指示进行的，由伍修权大使作翻译，也是上面指定的，会谈内容有记录可查，事后又向周总理写了书面报告，都保存在外交部的档案中，专案组可以去查看，更可以去问周总理，根本不存在什么“勾结阴谋”。事实正是这样，在我参与的同南斯拉夫的交往中，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地方，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在经过一定的调查研究之后，我们认为，南共根据本国的特点和需要，制定了独立的方针政策，探索自己发展

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机械地搬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不照抄外国经验，坚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其精神是可取的，在实践中也是有成效的，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与我们党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作法，但在其基本方面是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他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说过，中南“两国人民有着保卫世界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并且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在此基础上本来可以不断扩大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以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内外种种因素的发生作用，中南两国关系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相反发生了急剧的逆转。苏共利用一九五七年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机会，召集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提出了所有各国党及社会主义国家各党的两个宣言。出于维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我党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支持并签署了这两个宣言。但是南共只有保留地赞同了世界六十四党共同签署的《和平宣言》，拒绝在社会主义国家各党的《莫斯科宣言》上签字。他们不同意宣言中关于划分世界两大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首的观点，更不同意宣言中对南共的不点名的批评。南共的这一行动，触犯了以“老子党”自居的苏共领导集团，从一九五七年底开始，便发起和组织了对南共的新围攻，“批判”南斯拉夫内外政策的文章充斥了苏联和东欧的报刊。

一九五八年初，南共为准备他们的“七大”，提出了南

共纲领(草案),在草案公布以后,我党中央电示我们大使馆迅速将纲领内容及我们对他的看法报回国内。我们立即组织大使馆的全体人员,将十万多字的纲领草案全部译成中文,馆内同志大致研究后,由我起草并签署了一个《对南党纲领草案的初步意见》,连同译好的纲领全文送回国内。在此以前,我们还就南共邀请我党派代表参加他们的七大,向党中央提出了建议,并草拟了供国内参考的对南共七大的祝词初稿。在起草这些报告和祝词初稿时,我们曾按照十二国党的《莫斯科宣言》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九条共同规律与南共纲领及国内情况,一条一条作了对照,我们认为在这九条共同规律中,南共至少有六条,即实行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农联盟、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实现民族平等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等方面,是符合这些共同规律的,只有二、三条与《宣言》所说的不完全一致,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一致问题,南共纲领却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的平等原则,反对任何国家的党搞垄断和霸权。这个观点现在看来当然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公然这样说,并且写在党纲里,却是对一脑袋霸权思想的苏共领导的直接冒犯。我们使馆的同志对苏共领导集团的霸权主义面目还没完全认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认为南共纲领那样说不妥。其次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等方面,南共也坚持自己与众不同的做法,这本来也是可以允许的,可是当时盛行的观点是:只要与我们和苏联不一致的地方,就是“修正主义”的。但是对整个纲领草案,我们

还是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我在报告中说，纲领草案许多部分反映了正确的观点，在几个问题上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认为有革命的、议会的及其他斗争方式的前途，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内部矛盾，必须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等等，与我党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我在报告中提出：“虽然我们同南共同志在一些问题上，在看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南斯拉夫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渴望和相当的干劲也是事实，而且这是最本质的问题，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在我草拟的对南共七大的祝词稿中，同样肯定和赞扬了南共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且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根据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制订出你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新的领导形式、方法和作用，这是很自然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集体贡献”，并且提出“如何使民族特点同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严重责任。我们彼此间将继续交换这方面的经验，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获得更快的前进。”

我满以为自己的想法会得到中央的赞同，谁知我却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形势估计得也太乐观了。首先是苏共提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不派正式代表出席南共七大，只派观察员列席旁听，不致祝词。我们党赞同了这个建议，我草拟的祝词稿子也就没有用上。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南共七大在卢布尔雅那开幕。我和苏联、东欧几国大使以观察员身分列席了大会。由于苏共发动的对



南共纲领的批判和对南共七大的抵制，更激起了南斯拉夫人对苏联的反感，在一些报告和发言中，都愤怒地谴责苏联干涉别国的党内事务。苏联大使和我们曾一度退出会场，表示抗议。只有一家例外，就是波兰大使，他们显然同情南共，而不愿同苏共一致行动。大会的发言和代表们的情绪，反映出了对苏共的强烈不满。我在会场上看到这些情景时，心中非常不安和沉重，恢复不久的南斯拉夫与苏联及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关系，又不存在了。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我当时很不理解，情况也不清楚，更没有想到自己很快为此受到批评以至贬斥。

### 中南关系的逆转

南共七大一闭幕，我就奉命应召回国述职，走得很急，我预感到有了问题。一下飞机就知道了，我是被调回来受批评作检查的。原来我写的关于南共纲领的报告和对南共七大的祝词稿发回国内后，由中央某些人看了，被认为是错误的，说我已经同修正主义者唱了一个调子。当时国内即将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我被指定到大会上去汇报自己在南斯拉夫的工作，并就自己对南共的错误态度作出检讨。

这里得补叙一件事。一九五六年九月，我曾回国参加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我党八大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至今还闪耀着光辉的会议。这次大会明确地提出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

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党的任务已经从领导阶级斗争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大会又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贯彻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的任务。关于外交政策也指出，巩固和加强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合作，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有利的国际条件，对我国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也作了肯定。这些方面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以后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凡按照八大正确的方针路线去做的，就取得了进展和胜利，而发生的各种挫折和失误，往往是由于我们违反甚至抛弃了八大正确方针。

也就在这次大会上，南共派出了维塞林诺夫（南斯拉夫最大的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党的书记）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代表南共对我党作了热烈的赞扬和祝贺。他说，南斯拉夫的党和人民及铁托本人，一直非常敬佩中国党过去的斗争业绩和现在的建设经验，认为两党两国所走的道路有许多共同点，这都是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从各国具体情况出发的结果，这是对马列主义学说的发展和新贡献。他们希望这种创造和中南两国两党之间的友谊能得到发展。他的这些观点和愿望，其实同我们也是一致的。可是后来我们却没有这样做下去。不久，中南关系就起了变化。这股在国内继续强调阶级斗争、在国际上展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浪潮，也冲到了我个人身上。

一九五八年五月我奉召被调回国内，一到家就先在外

交部把我批了一顿，因为我是八届中央委员，又责成我到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检讨。我听了对我的批判，又重新看了我从南斯拉夫发回来的几个电报，自己也觉得同国内的调子相距太远了，我的报告肯定南斯拉夫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南共纲领中有着符合马列主义的正确的一面。而国内的论调却把南共纲领说成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南斯拉夫已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尤其使我难以理解的是，这次会议竟然重新肯定“一九四八年情报局关于南共状况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方法上有点缺点错误。我对这些说法起初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小组发言时，仍然讲了一些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但是我的个人看法改变不了上面定的调子，当时康生和陈伯达对这事就特别起劲，他们又写文章又作报告，大骂“以南共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开始我觉得自己的检讨文章很不好作，老是下不了笔。后来有些比较熟悉的老同志来提醒和劝说我，他们是从爱护我出发的，都是一片好意。我接受他们的意见，写了一个检讨，先请有关的领导同志看了，他们觉得太空，应该充实些具体内容。我只得又把在南斯拉夫接触到的有问题和错误的事例，也就是任何国家任何党都会有的“阴暗面”列举了一些，作为对南共具体的“揭露批判”加了进去，我在检讨发言的最后说：“在各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并不是所有的人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危害性都有充分的认识和清醒的头脑，我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以前的认识就是很不够的，在大会的进程中，我认真地进行了

学习，认识上才有了初步的提高”。这也是实话，如果不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气氛下，我的认识是很难“提高”，很难改变的。

我本来是“回国述职”的，但是实际上却是不辞而别地就离任了，把通常的外交礼节都抛掉了。我的回国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逆转。不久，南斯拉夫也将他们的驻华大使召回国内，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南友谊就这样被冲得一干二净。这场本来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快发展到国家关系上，两国外交关系规格降低到代办一级，我国驻南使馆就留下了周秋野等同志。开始他们对国内的情况既不了解，又不理解，弄得很为难。五月九日晚上，周秋野同志去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一个招待会，到场以后，许多南斯拉夫同志都一反常态地不理他，他开始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就在当天，我国播发了第一篇点名批判南共的《人民日报》社论。南斯拉夫的人比我们大使馆先得了这个消息，他们对此当然很不满。我们使馆的同志也一时不知怎么才好，尽管他们也不大想得通，但后来也只有服从国内的要求做自己能做的工作。

### 回首往事瞻望将来

即使是在中南两国关系恶化期间，南共领导人尽管对我们很有意见，仍然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在外交场合仍然对我们很客气和尊重，人员过境不受留难，照常不受检查，在联合国等国际讲坛上，一直支持并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铁托在这方面是有远见的，对我们的一些做法也

能够理解和谅解。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作用不同于别的国家，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应该特别慎重才是。后来又正是他主动提出与我们改善关系。他们这种态度是有历史渊源的，他们一直认为中南两国的革命道路，即通过游击战争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是十分近似的；建国以后不照抄苏联样式，坚持同苏联的平等地位，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与南共的做法也很近似。两国之间共同点很多。所以虽然两国关系发生了波折以至逆转，他们相信早晚总是能重新走到一起并友好相处的。以后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十年动乱中，由于我在南斯拉夫工作过，并在对南共问题上有过“错误”，当然也在劫难逃，不能幸免了。康生之流挑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多次批斗我，专案人员反复追查我怎样“里通外国”，并且宣称我的这些“罪行”，是“证据确凿，不容抵赖”的，当时我也是有口难辩，有理难说。不过康生之流也干了一件“好事”，就是他们把我怎样如实反映南斯拉夫的情况等问题，都写成大字报上了街，公之于众了。听说南斯拉夫大使馆把这些材料都搜集了去。他们原来看到中国批判南共，总以为是我这个大使没有起好作用，回来汇报了不真实的情况，看了这些大字报，才知道真相。他们说，原来伍修权大使还是如实反映了南斯拉夫的情况。所以我重新工作以后，几次去南斯拉夫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南斯拉夫要有代表团来中国，也常来看望我，表示一番友好之情。一九七七年铁托访问我国，还送给我一支猎枪，表明他一直记着曾同我一起打过猎的事，

可见他们是很珍视同中国党和人民的友谊的。

我作为中国首任驻南大使，参与建立和开展中南两国的友好关系，现在又看到了这种友好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一九八二年六月，我接连两次又到南斯拉夫，还荣幸地参加了南共十二大，看到南共正领导全国人民，在“坚持铁托道路，发展铁托道路”的方针下，不断前进，我从内心感到欣慰，并且希望此生还能为促进中南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再做些有益的事。

# 张国焘在鄂豫皖 根据地的罪行

成仿吾

## 一、鄂豫皖边区党和人民英勇奋斗 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根据地处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积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块大根据地。早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党就先后在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黄陂、黄梅、孝感、麻城、黄安、商城、六安、霍邱等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一九二七年五月，仅鄂东十县，农民协会会员就达七十多万人。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先后爆发了黄（安）麻（城）、商（城）南和六（安）霍（山）起义。由于大别山区统治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地势有利，特别是有党的长期工作基础和经过斗争锻炼的革命人民，因此在上述三次起义的基础上，逐步行

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它当时是一个模范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

黄安、麻城在一九二七年春就分别成立了中共县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并建立了县的农民自卫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两县县委与省委失去了联系。九月初，黄安县委派郑位三等到武汉找到了长江局机关，罗亦农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要他们立即回黄安组织武装起义。十月间，省委先后派王志仁、吴光浩等一批政治、军事干部到黄安，成立了以王志仁为书记的中共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麻两县的武装起义。十一月三日，鄂东特委召开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以两县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为骨干，夺取黄安县城。十一月十三日，黄麻两县起义部队和数万农民，一举攻克黄安县城，消灭了反动武装，活捉伪县长，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曹学楷当选为政府主席，这是三省边界地区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工农政权。起义后建立起来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由潘忠汝、吴光浩任正副总指挥，戴克敏为党代表，是三省边界建立起来的第一支红军正规部队。十二月五日夜，国民党反动派派一个师突击黄安县城。由于敌众我寡，四百多人的鄂东军突出重围后，只剩下七十二人、五十多枝长短枪，县委书记王志仁、总指挥潘忠汝等壮烈牺牲。这支红色武装从挫折中开始懂得了必须依靠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在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的领导下，部队转移到黄陂木兰山，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一九二八年春，在木兰山和黄冈的大崎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



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清剿”、围击。四月间，工农革命军重返黄麻地区，在流动游击斗争中，党组织和部队逐渐感到，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单凭流动游击，是不能坚持长期武装斗争的，弱小的革命武装，就有可能被优势的敌人吃掉。经过对敌斗争实践中正反经验的总结，摸索出了一条武装割据的道路。在鄂豫两省黄麻光（山）三县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柴山堡地区，依靠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势，开始实行武装割据。为了适应红军和地方工作的发展，七月间，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十月间，重组鄂东特委，王秀松任书记。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党中央派巡视员曹壮夫到鄂豫边区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六大”肯定了当时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形势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并对机会主义、盲动主义进行了批判和发布了十大政治纲领，“六大”还提出党在红色区域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最大限度地扩大红军，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等，这些对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九二八年冬，鄂东特委根据半年多边界割据斗争的经验和军事上的需要，提出“学习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准备创造东起皖西英山霍山、西至武胜关鄂豫边界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这使边界斗争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和地方工作的开展，到一九二九年五月间，鄂豫边界割据发展到纵八十里横一百三十里

的区域，边界地区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已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鄂豫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为了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进一步贯彻“六大”的决议，五月三十日鄂东北特委（四月间由鄂东特委改组，徐朋人任书记）召开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及三十一师师委第二次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临时土地政纲》和形势任务、扩大游击战争、政权问题等决议，把鄂豫边的红军游击战争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实行土地革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正当鄂豫边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的时候，一九二九年五月九日立夏节在豫东南爆发了商南起义。

商城在一九二六年就有了党的县委，在国民党叛变革命后的白色恐怖下，一九二八年春，商城县委整顿恢复了商南的党组织，并召开了党团员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选举产生了南邑区委。八月，南邑区委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会议决定由詹谷堂、廖业琪等负责发动群众的工作，派周维炯、漆德伟等乘伪县区扩大反动武装的机会，打入民团内部开展士兵运动，伺机夺取敌人武装。从此，农运、兵运同时并进。一九二九年，党的“六大”决议传达到商南，当地党组织随即根据“六大”决议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培养起义骨干力量，革命主观力量在不断增强。当时的客观形势也很有利。自一九二八年秋冯系军阀侵入豫东南后，苛捐杂税更加繁重，加上一九二八年大旱，秋收仅二、三成；商固一带呈现严重春荒，群众对革命的要求更加迫切。冯系军

阎在豫南兵力薄弱，且与流窜商固一带的土匪李老末时有冲突。

由于商城县委遭敌破坏，一九二九年二月，豫南特委同鄂东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商南党组织由鄂东特委领导。鄂东特委曾先后派徐子清、徐其虚等到商城帮助工作，这时又成立了中共鄂豫皖特别区委，由徐子清任书记，积极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

一九二九年春，反动政府派出“清乡委员”，督导各地加紧“清乡”，同时在民团内部清查所谓可疑分子，党组织和起义计划时有暴露危险。鉴于这一紧张形势，鄂豫皖特别区委于五月初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在五月六日立夏节发动武装起义，趁敌人忙于过节，打它个措手不及。计划由周维炯等在丁家埠、李家集民团内部发动革命兵变，结合广大群众，消灭乐、和两区反动民团，夺取敌人武器建立革命军队，实行武装割据。并成立了指挥部，由徐子清、肖方任正副指挥，周维炯负责军事，廖炳国负责各处联络。这次起义由于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秘密斗争积蓄力量，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计划周密，时机得当，因而迅速取得了胜利。周维炯等在立夏节晚上，酒席筵间夺取了乐区民团团总杨晋阶部的武装，其他地方行动也很顺利，士兵起义和农民起义作到了紧密配合，一夜之间，起义武装便控制了乐、和两区。起义武装于五月九日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漆德伟任副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并随即开展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到八月，在豫东南地区初步形成了一块

纵横六、七十里的根据地。

继商南起义胜利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又爆发了皖西的六、霍地区的总起义。

早在一九二五年，六安就建立了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派舒传贤等一批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六、霍，同在当地活动的党员周狷之等汇聚一起，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派员到六安，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及临时省委的决议：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秘密农会和工农武装，准备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元月，六安、霍山两县合并，成立六霍县委，立即开展了组织整顿工作，又抓住六霍地区大旱的时机，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债的斗争。县委还采取了争取团结大刀会下层的策略，使大刀会内部很快起了分化，会众日益倾向革命。一九二九年四月，共产党员打进并掌握领导的诸佛庵民团起义，编为县委直接掌握的游击大队。七月，六霍县委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专门研究了武装起义的问题，并决定报请中央，成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辖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寿县、合肥六县），并成立六霍暴动总指挥部。十月六日，召开六县党代表大会，传达党的“六大”决议，讨论和检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大会正式选举了六安中心县委，舒传贤任书记。

十一月八日，独山起义取得了胜利。六安中心县委九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区及邻近各县迅速组织武装起义。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爆发了西镇起义、七邻湾与流波碰

起义、徐集民团起义以及桃源河起义。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日，起义的游击队胜利会师，中心县委召开县委常委和游击队党团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徐百川任师长，姜镜堂任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三师、三十二师结合赤卫队及广大群众，积极扩大游击战争，不断获得胜利，形成了纵一百八十余里，横约百里，人口三十余万的皖西根据地。

这样，从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三〇年春的两年半中，在党的“八七”会议总方针和“六大”路线的指引下，在毛泽东创造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影响下，鄂豫皖边区党组织领导人民在举行了黄麻、商南、六霍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在这个地区创建了三支红军和三块革命根据地。“当时，这三个地区还是分散的，没有联成一片；党的组织相互虽有联系，尚未统一起来；红军虽有统一建制番号，并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但却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郭述申同志谈鄂豫皖苏区的概况，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三〇年初，在鄂东北、豫东南巡视工作的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到上海向周恩来“汇报了三省边界地区的情况”（同上）。不久，周恩来召集郭述申、许继慎和熊受暄开会。“周恩来同志讲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谈了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宣布了中央的决定：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红军的军事指挥，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部。宣布了对我们三人和没有到会的曹大骏

同志的任命（我任特委书记，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同上）四月，郭述申等到黄安后，在黄安北部的箭厂河召开了鄂豫边区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根据中央决定，宣布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由郭述申、何玉琳、王平章、徐朋人等九人组成，郭述申任书记，统一了三块根据地的领导。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红军合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委，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并组成了红军前敌委员会。当时党和军队还不是一元化领导，重大行动由特委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开联席会议决定。六月召开的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特委的建立和红一军的组成，使鄂东北、豫西南、皖西北三块革命根据地，包括二十多个县的革命斗争的领导统一了起来，使虽有统一建制、番号，而实际上没有统一指挥的三支红军部队，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领导的正规红军。这对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〇年五月，蒋、冯、阎军阀大混战爆发了，根据地周围敌人的兵力因而大为减少。红一军乘这一统治阶级内部破裂的时机大举出击，在京汉路连战连捷，在皖西作战也取得了胜利。从六月到八月三个月中，先后攻克霍山、英山、罗田、云梦、花园等城镇，歼敌七千余人，扩大了根据地，红军到十月间也发展到五千余人，并以缴获的大量敌人的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在军事、政治、后

勤工作上，也都有进一步的加强。

这段期间，鄂豫皖区也受到了第二次“左”倾路线的影响，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迅速地停止了这一“左”倾路线。十月十八日，党中央向鄂豫皖特委发出《关于党务、政治、军事综合指示》，把第二次“左”倾路线在这里的主要错误基本纠正了。十一月，中央派曾中生到鄂豫皖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统一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曾中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一九二七年夏他从武汉到南昌和蒋介石辩论，文武双全，很有才能”（郭述申同志谈鄂豫皖苏区的概况）。他在中央军委工作过一段，对毛泽东领导中央根据地的情况很了解。这时，正值敌人对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攻，他于是召开了原鄂豫皖边区特委和临近各县县委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在会上撤销了行动委员会，建立了鄂豫皖临时特委和军委，统一领导反围攻斗争，并决定了反围攻的正确方针。一九三一年二月初，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了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会议进一步纠正了第二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总结了经验，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

敌人在一九三〇年冬和一九三一年三月先后开始的对鄂豫皖边区的一、二次围攻，虽然每次都使用了十个师左右的兵力，但由于以曾中生为首的鄂豫皖特委加强了党的领导，制定了对敌斗争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大大发挥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英勇斗争的精神和光荣传统，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军民的共同奋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一和第二次围攻。

第一次围攻胜利后，红一军与蔡申熙领导的红十五军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长竹园会合，合编为红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辖两师一个独立团，第十师师长蔡申熙，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这支红军的情况，邝继勋在四月十五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全军官兵夫共一万二千人，战斗员九千人以上，质量比较健全。“党员一千六百人，……成份大多数都是翻身的农民，……党能起核心作用，意志统一，政治上党员能相当的动员。中下级干部都是由斗争中产生的”（邝继勋：《关于部队合编后的情况与行动方针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可见，红四军是党领导的由人民革命斗争中产生的人民军队。革命形势也一派大好，“三个赤区都分配了土地，建立了政权，创建并扩大了工农红军，都在扩大与发展，而且正在企图打通着相互的联络。赤区的政治影响，特别是红军的政治影响，的确使特区周围几十里都有望风响应之概。赤区的工农生活确实改善了，肃清了苛捐杂税，得到了土地，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平等都确定了。他们热烈起来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精神上物质上农民都能自愿的来帮助红军与政权。围绕着赤区的工农群众，都望着红军来，过去参加过红枪会、大刀会、联庄会、剿共会的都自动一批批的解散，连反动的民团也说红军来了我们就缴枪。”（曾中生：《关于反“围剿”作战及部队合编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在第二次敌人围攻前，红四军曾正确地组织了进攻作战，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三月的奔袭双桥镇，全歼



了敌人的一个整师，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五千余人，取得了空前大捷。

经过两次反围攻斗争，主力红军发展到四个师，成为有两万多人的正规兵团，地方武装也有很大的发展，根据地也扩大为东西长三百余里，南北宽一百五十余里的广大地区，已拥有人口二百五十万，红军的战斗素质愈来愈提高，根据地愈来愈巩固，作战、建军、根据地建设等各项工作，也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 二、张国焘其人和他是怎样爬上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地位的？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党内一个著名的老机会主义分子。他在参加党的初期曾为党做过一些工作，但他是一个野心家、两面派、阴谋家，因此后来堕落成为叛徒和国民党的特务并不奇怪。党内出现张国焘、王明、林彪、江青这类野心家、阴谋家，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是沉痛的教训。这些野心家的罪恶行径，同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研究揭发这些野心家，是为了取得历史的教训。

张国焘开始曾做过工人运动，在工作中即进行无原则的小组织活动。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他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路线。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又

是当时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的左右手。大革命失败后，他曾阻挠南昌起义，并对革命表示极大的动摇，同情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

张国焘不仅是一个犯错误最多的老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一九二四年五月他在北京被捕后，就曾可耻地出卖了党组织，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据解放后查获的北洋军阀政府内部档案〔1001〕3499，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是共产党在北方的领袖，并供出张昆弟、黄日葵、高君宇、范鸿劼、陈佩兰、缪伯英等多人为共产党员。北京政变后，党乘机救出了京津等地狱中的工会领导人。张国焘被营救出狱后，一直对党隐瞒其叛徒面目和可耻的叛卖罪行。他在《我的回忆》中，甚至还把自己打扮成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说他在受刑时“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敌人审问他时，“概以‘不知道’三字答复他”，使“他们一无所得”。张国焘的无耻谎言，决不能掩盖铁的历史事实，只是更暴露了其丑恶的灵魂而已。

张国焘在莫斯科住了三年多，一九三一年一月下旬回到上海时，正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在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依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强行夺取了中央的领导。为了贯彻他们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在所谓“反右倾”的纲领下，提拔“左”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干部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并有系统地派遣代表，逐级夺权，在党内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发展了机械过火的斗争。张国焘在莫斯科时，和王明等人有过矛盾和冲突。据盛

忠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了彻底失败”。张国焘回国后，看到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米夫作后台，他为了借助王明等向上爬，费尽心机来弥合他们间以往的裂痕。于是，张国焘便拚命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拢。他急急忙忙于二月七日和三月五日，连续在《实话》上发表了《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两篇文章，宣扬“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彻底批评了立三路线，……反对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革新了党的领导机关，指出了党的当前任务，要求全党在实际工作中揭发立三路线和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吹捧王明“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为了取悦王明等人，他还大肆叫嚷：“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他攻击反王明路线的人，是“企图利用派别观点来掩盖他们反党反国际的行为”，“就是借所谓反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他还给反王明的人戴上“右倾分子”和“立三路线残余分子”的帽子，主张对他们进行“严重打击”和“深入的肃清”。张国焘大肆宣扬“只有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才是真正拥护国际路线，才能把国际路线执行出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他竭力向王明等表白他愿意充当他们的小伙计。王明等人对张国焘这种“虔诚”的态度很赏识，并认为他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他是中国党最早的党

员之一，在党内仍有一定的影响，可以拉他到小宗派里来，作为推行他们极左路线的得力工具。因此，王明等把持的中央，任命张国焘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派他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夺权。在五月六日发出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局的负责人应当是中央在当地的直接的、唯一的代表，他有权否认党委的决议，甚至有权力解散党委，……领导党委帮助党委工作。中央局应指定鄂豫皖区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此区的一切武装力量。（《中央关于成立鄂豫皖分局、省委及根据地与红军建设等问题的指示》）就这样，张国焘就成了王明等在鄂豫皖的“钦差大臣”，他积极地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王明路线的各种过左政策，以罪恶的“肃反”乱杀革命同志，以及在军事上的军阀主义和退却逃跑主义。结果，丧失了党和人民英勇斗争所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但是，张国焘却在《我的回忆》中无耻地吹嘘：他是“披荆斩棘，艰难缔造”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园丁”，并把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说成是由于他“推行新政策”、“整肃”等“种种努力的结果”，而对第四次反围攻的失败，则说成是“领导政权和军队”、“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的“先天缺陷有以致之”。他把鄂豫皖根据地的丧失归罪于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不值得一驳的，因为中国革命就是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取得胜利的。但是，为了彻底揭穿张国焘的上述种种谎言，除了在前面已简述了一下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是怎样在党的“八七”会议总方针和“六大”路线的指引下，在毛泽东井冈山斗争的影响下，在当地起义

后又接着实行了武装割据而发展起来的外，还有必要把张国焘的种种错误和罪行(即他所谓的“种种努力”)及其恶果加以揭露，以还他老机会主义者、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的本来面目。

### 三、张国焘的积极贯彻第三次“左”倾路线和在军事行动方针上的错误

正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时候，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到了鄂豫皖。他们到达前，红四军打开了新集，使鄂豫皖根据地有了一个中心点(后来是鄂豫皖分局的所在地)，这是红军的功绩。张国焘却作威作福，坐着轿子到新集，在欢迎会上，他和陈昌浩坐在台上，摇晃着身子，神气十足。五月十二日，正式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这标志着张国焘积极贯彻第三次“左”倾路线，并阴谋建立他对鄂豫皖党和红军的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的开始。面对一派大好形势，他虽然不得不说几句“好话”，如说：“这一苏区是有了相当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已产生了强有力的红军”。“群众对红军是非常拥护的”。第二次反围攻的胜利，就是由于“红军、苏维埃已经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并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当地同志和红军将士英勇的奋斗，由奋斗已获得伟大的成绩”。(张国焘：《关于第二次反“围剿”及其他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他承认曾中生等到后“有

了相当的转变”(同上)，说曾中生“努力对付敌人之‘包围会剿’获得一些成绩”，“纠正了一些立三路线最明显的错误”，“团结了整个干部而得到当地同志一些信任”等等。但张国焘说这些是为否定鄂豫皖根据地的党和红军打掩护，他说上面的那些成绩“不能证明党内路线已经是正确的了”，曾中生等“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同上)。甚至说：“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路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这样，就完全否定了鄂豫皖根据地过去的成绩。因此，他强调“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中作彻底的转变”。(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他积极贯彻王明路线的过“左”土地政策和其他过“左”的政策。

鄂豫皖根据地的黄安部分地区，一九二八年冬就开始了土地革命，一九二九年六月的鄂东北《临时土地政纲》，和十二月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这两个早期的土地革命的文件，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结合当地的土地革命经验制定的，对没收土地的范围和各阶级的政策和“六大”决议的有关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一九三〇年春，根据地在后一文件指导下，全面开展了土地革命，后来虽曾受过立三路线反富农斗争和办集体农场等“左”倾政策的影响，但曾中生到根据地主持工作后，就纠正了“左”的偏向，进一步开展了土地革命，正是土地革命的胜利，为鄂豫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红军的发展和壮大、反围攻斗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但是张国焘却对鄂豫皖土地革命的成果视而不见，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召开的鄂豫皖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出了“重新分配一切土地”的决议。接着便开展了一个贯彻王明路线“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重新分配土地的运动。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一日鄂豫皖军委政治部发布的怎样分配土地问答提纲中，全盘否定了过去的土地革命的成果，说“因过去路线上的错误（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土地革命的利益大部分被豪绅地主和富农窃去了，雇农、贫农、中农、工人（要土地耕种的）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因此，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富农土地包括在内），重新分配一切土地，是党目前领导广大农民深入土地革命的紧急任务”。这个提纲还极力宣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说：“地主阶级的土地被没收后，不能取得丝毫的任何土地；富农如果要种田地，可以给以较坏的劳动份地，但必须自己劳动去耕种”。张国焘还在九月一日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总结中提出：“对反动家属可以罚他做苦工，否则驱逐出境，不得分土地”。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就会使他们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影响根据地的安定，而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就会影响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在重新分配土地中还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这首先表现在实行打乱平分，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土地。其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十四日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第七号规定：“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分别，主要的是在是否有剥削性”。按照这一规定，就把一些有轻微剥削

的富裕中农划为富农。这样作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对中农的团结。

在经济政策方面，实行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在“把捐税的负担移至有财产的剥削阶级身上”的政策下，对民族工商业课以重税。规定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青工六小时，童工四小时；工人每星期休息三十六小时，每年休息四星期，工资照发等等过“左”的劳动政策。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造成工商业店铺的倒闭，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极大的困难。

在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张国焘认为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不可能存在第三派或中间营垒，他的这种形而上学观点，看不到国民党的中央军和西北军之间的矛盾，对蒋介石和西北军的矛盾也未加以利用。例如西北军的吉鸿昌被蒋介石派到鄂豫皖地区“剿共”，因受红军影响不愿与红军作战，被蒋介石勒令“解甲归田”。当时，吉鸿昌曾化装到过鄂豫皖根据地，听到群众反映红军好。因此，吉鸿昌派人与红军联系，张国焘竟拒绝与吉联合，并将吉部来使杀害。知识分子是革命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3页）而张国焘却对知识分子采取歧视的态度，他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

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攻后，张国焘在军事行动方针问



题上，时而右倾保守，时而“左”倾冒险，对他的错误方针，红四军的领导人进行了抵制。

当时，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攻，对鄂豫皖区暂时取守势，这正是红四军转入进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建议：以一部分力量留在“亲区”〔注〕做发动群众工作，肃清“亲区”的反动武装，大部兵力要迅速向外发展，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恢复原十五军所在地区，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攻斗争，同时解决经济和粮食困难，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所谓“巩固苏区”，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命令红四军主力到“亲区”剿匪。结果，在“亲区”方圆数十里的山区，反动地主武装分散打游击，“全军大军云集，已无用武之地，给养更成问题，加以两次‘围剿’以来，全军不仅没有发过一个零用钱，而且衣服草鞋都弄到非常困难的地步。”（《徐向前、曾中生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动方向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因此，红四军的负责同志一致向中央分局建议，主张两团兵力留在“亲区”，继续工作，以主力打下英山，直取圻水，巩固阵地发展，以配合中央苏区。张国焘不仅再次拒绝接受这一正确建议，而且还指责这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同上）直到七月间，周围敌人仍无

---

〔注〕 亲区，称“清区”，位于河南省商城县南部一个方圆数十里的山区，当时为顾敬之团匪盘踞，阻碍鄂豫边的新集和皖西金家寨之间的联系。

进攻迹象，同时由于援助中央苏区反围攻任务所迫和红四军领导同志的一再坚持，张国焘才同意向外发展的意见，而由于他的阻挠，贻误了五十多天的南下向外发展的时间。张国焘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专横跋扈，因此，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这时他虽然同意了向外发展的意见，却又从右倾保守转向“左”倾冒险，竟限令红四军在一个月內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

七月中旬，红四军军部（此时徐向前调任军长，邝继勋调任十三师师长）率领六个团南下，八月一日一举攻克英山，全歼守敌一个团。根据当时的情况，徐向前、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认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发展上紧迫的配合中央苏区的行动，占据敌人要点，尤其是要打击敌人的主力，分散和牵制去江西的军力。可是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不能不郑重估计敌人的力量与布置行军的地利与群众的基础，和自方力量之大小与敌方之对比。（九月五日曾中生给中央分局的信）。从这些原则出发，红四军领导同志还详细研究和比较了潜山、太湖、安庆地区和圻、黄、广地区的情况，估计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革命基础和配合中央苏区之敏捷，均不如转到出击圻(春)、黄(梅)、广(济)，直捣武穴为好。（徐向前、曾中生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给中央的报告）而且这一地区的根据地恢复以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因此，红四军乃一面报告分局，一面举兵南下。

由于坚持了正确行动方针，红四军“从八月一日英山

之战到九月一日止，共计一月，行动中获得的结果：在军事上，占领英山、浠水、广济、罗田及沿江之一带，消灭敌人七团以上的兵力，尤其是（消灭）徐源泉两旅以上兵力为更有意义，缴步枪在四千以上，迫击炮二十八门，机关枪二十六挺，侦信机（无线电）一架，子弹炸药刺刀无算，俘虏官兵五千以上。”（九月五日曾中生给中央分局的信）同时牵制了敌人原拟调往江西的部分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攻斗争，并直接与江南湘鄂赣红军配合中央根据地的行动联系了起来。在地方工作方面，黄、广、英地区的工作，得到了相当的恢复，组织了八百余人的地方武装，农民纷纷起来斗争，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大力支援红军作战，在经济方面，缴获和筹集了银元七万元，黄金二十余斤，白银一千六百余斤，以及南下部队的全部军装，解决了部队的经济困难，大大减轻了老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正当红四军大力开辟当地工作，寻找机会再行歼敌的时候，张国焘却处心积虑地要排除异己，对红四军的领导进行宗派主义的“改造”。他虽然不得不承认“红四军在英山、圻水、广济一带行动，在军事上获得了大的胜利，相当地发动了这一带的群众工作与游击战争，部分的进行了分配土地的工作”。（张国焘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上作的结论）但又指责红四军领导“在政治上重复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放弃援助中央苏区”，“违抗分局命令”，强令北返。红四军除执行分局指示外，对南下和东进的是非曲直向党中央和中央分局作了申诉。徐向前、

曾中生八月二十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在长期斗争中深深感到了红军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广大的工农政权维系着，则如此艰苦困难的生活任何人都受不了的，因此红军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治的坚定问题，一切英雄的个人单纯军事观点的领导，在此要完全失掉作用，同时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果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都忘却了巩固根据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到中央根据地胜利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的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主力军缩在根据地范围来防御敌人计划是根本不同的”。在曾中生九月五日给中央分局的信中，针对张国焘指责红四军“放弃援助中央苏区”说：配合中央苏区的行动，是要以占领敌人的要点打击敌人主力两者并重，而且在今日技术拙劣的红军，其战略目的应后者越过于前者，同时要能真正巩固自己的阵地，向敌人作有把握有准备的进攻，尤其是要整个苏区有全盘的计划与准备工作，才能集中主力向外发展，而更有全盘部署进攻有力阵地，如此才不致因局部的问题而伤全盘的计划，这样与那绝对没有准备而发命令去占大城市，和高喊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主张丝毫不相同的。信中还批评打安庆的错误说：安庆之取是不能离开全国形势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城市及近郊党的力量是根本没有关系，英山到安庆四百里的非苏区是山地，又有清（民）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探、干部又无多少的

准备，只有一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近于夸大狂了。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安庆之命令有什么分别了！但是，张国焘却完全不顾红四军南下的正确方针和胜利的事实，竟以红四军改变了他的东进计划，“违抗分局命令”，将军政治委员曾中生撤职。接着又借口肃反，排除异己，以便在党和红军内建立他的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

#### 四、张国焘排除异己，乱杀革命同志的罪恶“肃反”

张国焘为了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和建立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下车伊始”就全盘否定过去工作的成绩，胡说鄂豫皖红军在第二次“左”倾路线时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红军中没有真正的党。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诬蔑鄂豫皖根据地“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把黄麻地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说成是“土匪行为”；说商城党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帜‘脚踏两只船’的国民党”，而且“土匪流氓都被纳入党”；皖西“六、霍、寿县等处的党组织，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等等，以此来为他的“路线转变”、别有用心的“改造”和排除异己的“肃反”制造舆论。他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竟宣称：党委之间发生意见分歧以书记意见为准，

为其独断专行制造理论。他专横跋扈，肆意打击敢于抵制错误路线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余笃三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被撤销红四军政委的职务；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写文章反对在根据地内过分提高工人工资影响工农联盟，被扣上不可救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加以批判和撤职；鄂豫皖特委委员徐朋人反对富农分坏田和春耕大忙时期反复平分土地影响生产，被戴上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织分子帽子开除出党；中央分局委员曾中生、舒传贤，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曹大峻、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委庞永骏、原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等，也都因抵制了张国焘全盘否定鄂豫皖党和红军的工作成绩，推行王明路线的过“左”政策，和在军事行动上的错误方针，而受到围攻和打击。黄麻地区的八个县委书记，也被撤换了七个。

我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抵鄂豫皖根据地的。党中央派我到鄂豫皖省委任宣传部长。当时，张国焘为了独揽大权于一身，把苏维埃政府完全搞成一个空架子。省苏维埃主席兼黄梅县委书记、代主席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新集的苏维埃主席也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便于他操纵政权，使苏维埃政权成为他个人专政的工具。

张国焘特别急于争得他个人的兵权，红四军北返途中，他迫不及待地派陈昌浩赶去接替曾中生的政治委员职务。陈昌浩九月十三日到麻埠接任后，就坚决贯彻张国焘“改造”红四军的指示，开始进行“肃反”。本来，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是革命斗争中一个重要的任务，鄂豫皖边区各

地的党组织，一开始就把肃反锄奸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并在斗争中取得了成绩，保证了党和红军的巩固与纯洁。但是张国焘却是要把“肃反”作为宗派主义的排除异己的手段，以便建立他在党和军队内的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八月，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所谓“AB团”的组织，张国焘就借此硬说鄂豫皖革命队伍中“必然有一个反革命大组织”，于是保卫局滥行捕人，严刑逼供。敌人施行反间计离间红军干部，更成为张国焘在红四军中开展大肃反的根据。

英山解放后，国民党特务头子曾扩情，以黄埔军校同学的旧关系，派了两个小特务到英山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并带有诡称许继慎已和敌人勾结，表示欢迎许投奔蒋介石的信件。两个特务到后，许继慎马上将他们逮捕起来送交军部，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及时对来人进行审问，并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认为“许不会有什么问题”，“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遂将特务和伪造信件以及军部意见送分局处理。

许继慎是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的智勇双全的名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的组建者和领导人，是一个才华出众，屡建战功的优秀红军将领。他一九〇一年出身于安徽省六安县土门店的一个中农家庭。他在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时，就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安徽学生界的领袖。一九二一年初，他首批加入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秋，他遭反动派通缉而逃亡上海，入上海大学旁听。一九二四年春，考入广州黄埔陆军

军官学校第一期。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黄埔军校党所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骨干，坚持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在国民革命军中历任排长、连长、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参谋长，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参加过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英勇善战，屡立战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一九三〇年春，他受党中央委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组建红一军，担任军长和鄂豫皖特委委员，他对红一军的组建和发展、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均有突出的贡献。在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两次反革命围攻中，他屡出奇兵，克敌制胜，常使敌人闻风丧胆。一九三一年五月，许继慎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分会主席兼十二师师长。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他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意见，主张红四军主力南下，他还经常批评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因此为张所怀恨，特别是张国焘要夺取兵权，所以当时正要寻机对许继慎等进行打击和迫害。张国焘接到送来的特务头子曾扩情的信件后，根本不问事实真相，主观主义地把许继慎等主张红四军主力南下的正确主张与特务的信联系起来，在后方逮捕了红二十八团团长江潘皈佛之妻和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用刑审、逼供、诱供等恶劣手段，逼出许继慎、熊受暄等人“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准备投降蒋介石”的所谓全盘反革命计划，诬蔑说“红四军的南下是曾中生受了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这样，张国焘就把军事行动的争论问题和反革命问题混在一起，以便借此来打击大批持正确意见的同志。



陈昌浩赶到麻埠红四军军部后，首先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沙炳佛等二十余人，当夜严刑拷打追问，没有得到什么口供，这说明逼供出来的所谓许继慎等准备把队伍拉到长江边投敌的全盘反革命计划是毫无根据的。但陈昌浩却在部队西进中，边战斗边捕人，把许继慎、周维炯等部队领导人逮捕了起来。九月底，部队移住白雀园地区，张国焘亦由新集来到白雀园亲自主持大肃反，几乎把参加领导黄麻、商南、六霍起义，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同敌人血战中久经考验的干部，以所谓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罪名，都无辜地加以杀害。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不仅极力掩盖他的罪行，说：“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慎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而且还把自己打扮成为制止了肃反扩大化的正确领导者。他说：“其时军中弥漫着肃反的狂热”，他“立即设法制止”，下令“不得擅自捕人”，“禁止用刑逼供”，“才抑制了这股狂热的泛滥”；还说什么“切不可任意株连”，“已被捕的嫌疑人犯，……多数均须按照情节，予以较轻的处罚或无罪释放”。但是，谎言决不能掩盖历史的真实，张国焘的几句谎言也决改变不了他的这一段罪恶的历史。据陈昌浩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鄂豫皖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的讲话（这个讲话张国焘当时曾多次的介绍）中所说的，这次肃反中被他们戴上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帽子，作为反革命分子杀害的，仅在红四军中，就“有两个师长（许继慎、周维炯），

一个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八个团长，五个团政治委员（团长潘皈佛、吴云三、高建斗、王则先、肖方、王明、魏孟贤、曹光南，团政委封俊、江子英、袁皋甫、吴精赤、刘性成）两个师政治部主任，十二个团政治部主任，各级经理处、参谋处副官亦有许多，连排长亦有一部分。”“这次共计肃清‘叛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百人”。这就是说有二千五百多排以上干部先后被逮捕和被杀害了。

关于地方机关的“肃反”情况，据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英山中心县委给中央的报告，各级领导机关成员几乎都成了反革命，“皖西北整个特委只剩下方英同志和一二事务员，少共特委、军事委员会分会几乎完全是的；英山党团中委会只剩下党团书记、妇委书记及交通，其余全是的。各县如六安、霍山、商城只剩下少数同志其余全盘都是。英山的苏区八个区委只剩下一个区委书记，非苏区的三个区委完全皆是，党的团的同志加入第三党的几乎有三分之一。”郭述申在回忆中说：“白雀园‘肃反’以后，张国焘又把军队中的那套‘肃反’搬到地方上，又杀了很多在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我在陂孝北任县委书记时，县苏维埃主席魏祖圣同志（大革命时是孝感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是当地的农民领袖，一九二七年配合黄麻起义破击京汉铁路就是他带领农民协会会员干的），我在陂安南工作时，第二任县苏维埃主席陈金台同志（第一任县苏主席是李先念同志，李带领陂安南参军的大队到红军中工作去了），都是被张国焘搞‘肃反’杀掉了。张国焘是通过‘肃反’，达到他排除异己

的目的。”（郭述申同志谈鄂豫皖苏区的概况，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这次“肃反”是在张国焘直接控制的保卫局系统进行的，别人是管不了的。我当时是新集县委书记，但根本管不了，我的秘书也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抓走，给肃掉了。新集是一个三千多人的镇子，“肃反”搞得晚上没有行人，白天不敢一个人走路。我去鄂豫皖时同行的有六个人，其中三人被张国焘杀掉了。

徐向前和倪志亮所写的《豫鄂皖苏区红军历史》中，对这次大肃反写道：“四军移白雀园后，张国焘亦由新集亲来白雀园主持肃反，……在这一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肃反中，红四军中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幸免者外，几乎都一网打尽了。以前逮人还在上级，这时捕人已深入下层了。在这一大肃反中，……主力四个师共十二团的干部中今天屈指可数者只剩下倪志亮、王树声二人，其他都被捕杀了。据程世才个人回忆，在肃反过程中，三十团换过三次团长，政委主任也换过二三次，……有的换过四次。这大批撤换的各级干部，都是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名义逮捕了，有的送到后方保卫局，有的就在前方枪毙，或用石头打死。如以三十团在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上干部，估计起来大约有五百人上下，其他各团，并不少于三十团，这些被逮捕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几个放出来未杀，或仍回军队工作外，一般都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而杀害了。又如徐琛吉同志回忆，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这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这说明当时在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

很厉害的，究竟有多少人，当时很少人知道的”。当时“在苏维埃政权中，党的各级机关中、工会中与群众中逮人杀人的现象也和军队内一样，例如罗山群众领袖郑新民、麻城群众领袖王宏学，县委书记雷绍全，孝感县委委员刘纪云，过去特委书记徐朋人，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东革命军党代表戴克敏，红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定侯，黄安党的发起者王秀松、戴季伦，商城县委书记李悌云及皖西道委书记方英，……至于群众中被捕杀的人更难于计算”。“由这一大肃反的结果，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知识分子军政干部被杀的已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领导者也捕杀了。这一肃反的危害，不仅捕杀了大批大批的军政党群众的领袖，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肃反的同志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之何时将至。由于这一大肃反，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知识分子有军事知识，有战斗经验，勇敢而机智的大批干部被肃掉后，使红四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造成极端反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使红军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了”。“捕杀红军中的优秀的有战斗经验的大批干部后，一方面在军事指挥上战斗上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在红军干部中由于对肃反的恐惧，也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情绪。比如反四次“围剿”已经开始，还在逮捕人，如逮捕徐向前的老婆，收集徐向前的“反革命”材料，这怎能不造

成红军干部中的恐惧呢？……的确，在大肃反中，在红军和地方上的党政民中捕杀了不少的优秀干部，造成恐怖情绪，损伤了自己的元气，也是反四次“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张国焘的罪恶“肃反”，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把肃反和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相结合，采取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方法，以排除异己，实现其军阀主义统治。广大红四军指战员是忠于革命事业，忠于党的，在张国焘大量杀人捕人的情况下，红四军仍然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地和敌人战斗，不断取得胜利；在不知道明天是否把自己当做改组派捕去杀掉的恐怖情绪下，甚至明明知道要被逮捕，逮捕后一定要被杀头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动摇逃跑；当被捕的指战员被暂时放出来编成突击队时，则毅然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地打击敌人。如果张国焘不是从个人野心出发，争个人的兵权，不是搞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为什么上述情况竟没引起他们的一点反省与注意呢？张国焘的罪恶“肃反”，还强调要“到处从发展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去寻找反动线索”（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鄂豫皖分局给鄂豫边特委的信），提出“从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中”、“从日常生活的表现中”去发现反革命，别有用心地将日常生活问题、思想意识问题、一般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混淆在一起，实行严刑逼、供、信。“由于这一肃反的结果，把许许多多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与敌人血战中久经考验过的干部，竟以反革命罪名——改组派、AB团、第三党——而肃掉了，使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的骨干含冤地下

久而莫伸，其惨痛直令人不能卒书，其罪恶也令人难以笔墨形容。”（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这就是张国焘当时所吹嘘的“可以为全党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的肃反“经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这段骇人听闻的悲惨的历史事实，是张国焘的几句谎言绝对掩盖不了的！

## 五、盲目轻敌到右倾逃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四次围攻中几被断送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共有红军三万人。

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二年五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反对敌人第三次围攻的口号下，利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统治发生危机的有利形势，举行了黄安、杜付店、苏家埠三次进攻战役，歼敌正规军约五万余人，取得了鄂豫皖红军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计划，因受到红军这一严重打击而破灭。这一胜利也使红军和根据地在原有基础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红军发展到五万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四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余万。为什么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大肆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并实行军阀主义统治后，红军还能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根据地还会有这样大的发展呢？这是因为：

第一，当时客观形势极为有利，根据地和红军又有着良好的工作基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高潮，国民党内部的不少地方派系，也表示同情抗日或借机反蒋。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又遭到惨败。蒋介石的统治发生了危机，客观形势十分有利，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在第一、二次反围攻中取得胜利，形成了一派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根据地在两次反围攻胜利后进一步扩大，能以巨大的力量支援红军作战；红军发展到三万人，战斗素质有进一步的提高，已经能够以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成旅成师的敌人。

第二，作战指挥的正确。在进攻作战中，总指挥徐向前没有机械地执行鄂豫皖分局决定的“占领一二中心城市”，准备短期内“造成湘、鄂、赣、闽和河南、安徽整片赤区的基础”这一过高的，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而是从实际出发，充分运用和发展了“围城打援”战术，因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第三，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

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攻前，赤卫军已发展到二十多万，并掀起了参军拥军的热潮，仅六到八月，就有七千四百六十人参军，群众支援的军粮达四万余石，现金十一万元，鞋袜四万余双。在反围攻中，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正确地组织了红军进攻作战，在战斗中干部党员冲锋在前，起着模范作用，人民群众积极参战支前，游击队地方武装大肆袭扰敌人，充分发挥了根据地和红军的巨大威力。在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和根据地人民全力支援配合下，终于取得了三次战役的巨大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一段的进攻作战，在王明“左”倾路线开始贯彻和张国焘军阀主义个人统治开始建立以后之所以还能取得胜利，是由于客观形势十分有利，过去有良好的基础，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正确指挥，党的广大干部党员和广大军民的努力奋斗。至于张国焘，由于他积极推行王明路线，大搞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不仅对胜利无益，而且还影响了胜利的发展和巩固，并且在鄂豫皖分局的决定中还包含了非常危险的冒险主义的要求，由于方面军总指挥部实事求是的正确指挥，才避免了危险，取得了胜利。张国焘竟把这些胜利吹嘘为他领导的结果，这完全是徒劳的。事实上，正是由于他在土地政策、肃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的错误，他的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



他对形势的“左”倾估计，和在军事上极端片面地提出了所谓“坚决进攻”的战略，不仅影响了第三次反围攻的发展和巩固，而且招致了第四次反围攻的失败。

一九三二年六月间，蒋介石在出卖了上海爱国军民“一二八”抗战后，又集中五十万大军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围攻，蒋介石坐镇武汉亲自指挥，组成了左、中、右三路军，除左路军专门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外，中、右两路的二十四个师另两个旅全力围攻鄂豫皖根据地。敌人这次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攻，不仅兵力庞大，而且进攻部队中有三分之一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并进行了充分准备；在战术上采取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企图“聚歼”红四方面军于长江北岸。虽然敌人这次围攻情况比过去严重，但是，也存在着粉碎敌人围攻的有利条件：红四方面军在取得第三次反围攻胜利后，部队更加壮大，士气高昂，械弹充足；根据地猛烈地扩展，使红军作战有更广阔的回旋余地和更广大的群众支援；而敌人屡遭挫败，心有余悸；因此，如果主观指导正确，是有可能粉碎敌人的围攻的。

但是，第三次反围攻的节节胜利，张国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反围攻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方针。

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黄安战役胜利的当天，鄂豫皖中央分局就在《为庆祝黄安大捷输送新兵和粮食的紧急通告》中，把这一胜利说成是“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并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一九三二年

一月十日，张国焘又在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宣扬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了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是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一月三十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因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而被迫迁都洛阳后，张国焘的轻敌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二月十七日鄂豫皖省委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就提出了“偏师”说。决议说：“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者所直接担负，而国民党的洛阳政府和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同时，日本的积极进攻武汉，将使鄂豫皖苏区要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冲突。摆在各苏区尤其在鄂豫皖苏区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快要和帝国主义直接战争”。“同时就向鄂豫皖苏区党提出了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消除苏区向南方发展的障碍，夺取武汉门户，与湘鄂西取得联系，造成红军在长江边与京汉路线行动自如与苏区包围武汉的形势”，“以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战争和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个荒谬的“偏师”说，连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在三月六日给鄂豫皖分局的信中也批评说：“是不顾事实的胡说”。但是，张国焘在三月给临时中央的报告中，还一再重复他的机会主义观点。三月二十六日，他在《关于红军在皖西作战行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四方面军已

率第四、第二十五军共五师十二团之众向六、霍行动，决心拿下六、霍，配合全国红军大举向敌进攻，积极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三月三十一日，他和陈昌浩在《关于豫南、皖西战况给中央的报告》中又说：“现在我们不但以打破敌人‘包剿’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中心口号，并在三月前即提出与帝国主义作战为中心口号”。苏家埠大捷后，张国焘在六月十八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他根本不承认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这一基本特点，不相信围攻与反围攻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他对新的严重的围攻到来毫无准备，仍然继续其“坚决进攻的战略”。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思想上放松了反敌人第四次围攻的准备工作，因而在军事上、群众动员上都没有完成应有的准备。六月上旬已发觉敌人积极部署第四次围攻，党中央六月五日的军事训令，也已将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围剿”总司令，大军云集汉口等地，准备向鄂豫皖根据地大举围攻的情况作了通知。张国焘不是适时地转入反围攻的准备，而是继续向京汉路出击。七月初，分局开会讨论军事行动方针，徐向前又在会上提出暂时停止进攻作战，将连续作战七个月的、十分疲劳的红军主力在适当地区集结休整待机，并肃清根据地内小块白色区域的反动武装，进行反围攻的准备。张国焘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要红军南下夺取麻城，以实现其威逼武汉的计划，这就使敌主力得以从容展开，向根据地内推进。张国焘又无视已十分严

重的敌情，反而进一步提出“打下麻城、宋埠、歧亭、黄陂、……打到武汉去，实现数省政权的首先胜利，完成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先决条件”，“很快把武汉拿到手里来”等“左”倾口号，并又命令四方面军主力二次围攻麻城。八月上旬，敌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全力向黄安七里坪猛扑，张国焘才被迫决定撤麻城之围。这时他又不实行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却命令红军主力仓猝迎击进犯的敌人主力，他以为这样就可以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一举而粉碎敌人的围攻，事实上，他的这种错误的战略思想指导，使红军更陷于被动地位。这样，从六月上旬到八月上旬两个月的反围攻准备的时间，也就被张国焘白白地浪费掉了，使红军、根据地人民，甚至党员和党的领导机关对敌人的严重围攻，在精神上、组织上、物质上完全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深刻地批判这种“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

次“围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张国焘的“偏师说”和“坚决进攻”的错误战略方针，是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攻失利的主要原因。而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军阀主义和进行罪恶的“肃反”，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也是反围攻失败的重要因素。张国焘把红军看成是他个人的，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干部战士不进行政治教育，大搞惩办主义，不仅士兵，就是师一级的指挥员，稍有冒犯，也是一顿毒打；吞并地方武装，在敌人进攻时，使主力红军由于地方武装削弱而缺乏必要的配合；主张和优势的敌人硬拚，一次在七里坪他对我说：“我们的军队一往无前，整整齐齐地前进，把敌人打退了。”这种错误方针，使红军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却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只能打得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张国焘不爱护、不关心红军官兵。例如，由于不注意卫生，有九十个连，九千多人发生了烂脚病，而张国焘为了行动方便，竟将烂脚的红军锁在房子里，他自己带着队伍走了，把同志送给了敌人。有一个叫金仁的朝鲜女同志，在莫斯科留学时反对王明路线，在新集对张国焘有意见，也被张国焘在燕子河丢下不管而牺牲了。张国焘忽视群众利益，破坏军民关系，特别是他的罪恶的“肃反”政策，“捕杀了大批地方党、政、民兵干部，造成地方上的恐怖情绪和苏区群众对苏维埃的怀疑与不信任，……对军队的

消极，如敌人打到河口一直进逼黄安外围，黄安县政府与军队还不知道，如果是过去群众对革命负责积极，早已自动来报告了”。（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

撤麻城之围后，红四方面军八月中旬在冯寿二、七里坪与敌人进行了两次激战，发挥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指战员前仆后继，奋勇冲杀，浴血苦战，反复与敌展开肉搏，给敌以惨痛打击，共毙伤敌官兵五千余名。但是，当面敌人恃重固守，战局形成对峙。张国焘再次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在二十九日给中央关于黄安战斗的报告中说：“进攻黄安之敌……两次被我击溃……敌被击溃后，已无斗志，军阀又起冲突，敌经济恐慌急剧，全国群众革命情绪更为高涨，我全国红军应趁此时机起来消灭‘围剿’，迅速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正是由于对形势的这一错误估计，未能使红军避开敌人主力，实行有效的机动作战。红四方面军虽多次击溃敌人，但因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未能扭转战局。在敌人大军压境，前堵后追的严重情况下，张国焘由盲目轻敌、狂妄自大一变而为右倾恐敌。他认为“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有打一仗，没有打二仗的力气”。九月十三、十四两日，他连连电中央告急，要求“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中央根据地在接到党中央转去的张国焘的十三日的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作了对红四方面军冲破敌人第四次围攻的指示，指出：“红十六军在通山、咸宁两次胜利，一方面军北向发展胜利的开始，均是对鄂豫皖的配合策应行动”；敌人对鄂豫皖区的第四次围

攻，“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央区之并进长追，并益以坚守据点，稳扎稳打”；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攻的战略与战术经验，“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红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并“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们的地方，掩护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迅速转移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敌人‘围剿’”。当时，张国焘已失去了打破敌人围攻的信心，他没有贯彻这一指示来挽救危局，在燕子河召集会议，提出“出潜（山）、太（湖）打游击”的计划，正迎合了敌人包围压迫红军于英山以南长江岸加以消灭的战略目的，这一错误主张，幸而由于多数同志的反对而被否决了。张国焘惊慌失措，右倾逃跑，带着红军主力部队从鄂东北、绕过豫东南、皖西北又转回鄂东北（有人讽刺说，这是张国焘搞的一次“武装游行”）。到十月初，鄂豫皖根据地已损失了六分之五，这时张国焘完全丧失了粉碎敌人进攻，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信心，产生了向四川逃跑的心理。他认为，鄂豫皖根据地处于津浦、平汉路之中、濒大江之侧，是敌人必争之地，是站不住脚的，不如四川天府之国可以割据。十月十四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

上，沈泽民同张国焘作了面对面的斗争。张威胁说：我是分局书记，我能解决你的问题。傅钟当时说：好好说，不要用威胁口吻。这时张国焘虽然已决心西逃四川，但为了掩人耳目，他大耍两面派，说红军向外线转移，只是让主力跳出包围圈，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再三声明他决不走，决不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十月十五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四个师越过京汉路转至外线。正如徐向前所指出的：“这时如有照顾全局的战略计划，打破围攻仍有可能”（《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但张国焘只是张皇失措，率四方面军主力向西逃跑，他把四方面军的四部电台全部带走，完全置鄂豫皖根据地于不顾，这就终于造成了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攻的失败，使根据地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灾难，使革命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张国焘仓皇西逃，敌人侵入鄂豫皖根据地后，提出了“血洗大别山、七紫两区”的反动口号，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据一九三三年的上海报纸统计，仅黄安一县就有十余万人被屠杀或饿死。但敌人的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倒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人民，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英勇战斗，直到全国解放，革命的红旗一直在大别山上飘扬。

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千秋功罪，人民自有公断。在鄂豫皖根据地犯下了严重错误和罪行的叛徒、野心家张国焘，已受到历史的审判，人民的唾弃，而党和革命先烈、革命人民在鄂豫皖边区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所创建的伟大历史业绩，则将永远为人民所传颂。



# 黄安县委关于黄麻暴动经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

编者按：这份报告是湖北省红安县党史资料编写办公室提供的，对研究黄麻暴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全文发表。凡编者订正处用〔 〕表示。

## （一）斗争之开场锣鼓

斗争发生在黄安北乡之七里坪区与紫云区，麻城北乡之乘马岗区。七里坪、紫云、乘马岗都是山多地瘠的地方，从国民革命军来武汉以后，那里就产生了农民协会的组织。有了农民协会之后，都先后受了夏斗寅、魏益三的光顾，知县大人也特别关心到了“贫苦之乡”，乡下有马褂子的老爷都集合城内同县长打商量。他们的光顾、关心和商量就是杀戮、压迫和怎样根本摧毁这个“可恶”的农民协会。

夏斗寅、魏益三都是恶狠狠地很简单的办法：“杀、烧房子、搜索”，各个玩了一套，分别的跑了（据说他们的成绩都不大佳）。知县老爷和乡下有“马褂子”的老爷，他们的办法就多些，而且复杂些了。他们最初是请河南“打

不死”的红枪会来替他们打“不穿裤子游街的公妻赤化党”。打得一个漫山遍野，烧房子，牵耕牛，杀赤党（赤党即老百姓之别名，此事报纸曾有记载，就是五、六月间的“麻城惨案”）。后来他们因为“可恶”的农民协会的伙计还是存在（听说后来查办的结果，土劣受了一点打击），并且又在北乡兴起“党部”来了。北乡有马褂子的老爷和“爹”〔字〕辈与财主都各想办法了。各处“打不死”的枪会都风起云涌：麻城东北乡黄土岗有红枪会，麻城南乡白果、宋埠有金枪会，黄安南乡八里湾及西乡与桃花到宋埠一带有金枪会、白枪会、黑枪会，这都是“打不死”的群众，是阔人老爷预备了“保家”、“保身”、“打党部”、“保卫圣人之道”的力量。这些力量都不时帮请许许多多远方“打不死”的先进〔生〕和朋友来围攻北乡党部。

来得乌天黑地，打得兵连祸结，可怜的“党部”、农民协会的穷朋友一直是采取的“兵来将挡”的政策。他们也“打得死”、“杀”、“放炮都来”，这是一般穷朋友们的心理和办法。打去打来迄无停止。

在混战中，半空里来了一个炸雷：“党部与民众团体停止了活动”。阔人老爷们都安身了些。“你们从前闹错了！”这是阔人老爷们的宣传。“不亏苦你们，照去年纳租（去年八成收今年四成收）！”这是阔人老爷们的大道和实惠。“打不死”的朋友（也可以说死不完的朋友）仍然是猛打。“还是不打不能安身”，“不打平不能安身”，“放炮都来，各带刀矛”，“打来福枪”，“协会还是要”，这是农友们共同的倾向和办法。冒牌C. P.的朋友却有一些“明哲保身”的，逃

之夭夭了。

咸宁、蒲圻（农民不晓得鄂南）闹起来了！穷朋友闹得更是兴高采烈！好事的或者是不懂得策略的C.P.

（高等C.P.语），也还有一些真正的群众，提出了模仿咸宁、蒲圻的“杀……抗……没收”的办法，把穷朋友们闹得一个争先恐后，还想打出一个穷人的天下，真的杀……抗……没收，并且“分”起来了！

## （二）斗争之种种色色的组织和武装

阔人老爷们有阔人老爷们的组织，穷苦的朋友有穷苦朋友们的组织。

阔人老爷的最有力量的组织是枪会，并且起初都是“打不死”的群众，也有些“爹”字辈的阔人老爷、户首、族长们号召子弟兵（借用名词），也是放炮都来，锋不可当。穷苦朋友们的组织是协会（乡人称农民协会为协会），秘密的“胁富会”，有刀枪和来福枪的“防务会”、“义勇队”或专门杀土豪劣绅的没有名义的团体（如麻城，但近亦改名义勇队）。

黄安、麻城现在都没有土豪劣绅武装的人民自卫团和民团，这些人民自卫团（如黄安南乡之八里湾与麻城南乡之白果铺）的快枪都已被魏益三拿去扩充实力去了，那些团长都各个官封连长或营长。这些阔人们都各延老师兴办红学（即枪会）而变为学东。黄土岗的豪绅相继办了好几十堂红学，这些红学受过县长的嗾使去打过乘马岗云“赤党”，

县长帮助过他们十八支快火〔枪〕，宋埠、白果街上的大老板和乡里有钱人各自竭尽全力大批雇佣和强迫学徒、雇农、长工以及站柜台的先生们学习，要锻炼出“打不死”的本领，以为阔人老爷们“保身保家”，“打倒赤党”，“压迫造反的佃户和长工”之用。

“协会”是只对敌枪会，各乡都好象没有听着什么“停止活动”似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纷纷成立乡农协会和“分部”（国民党区分部之意），也不管这些“明哲保身”的冒牌C. P. 先生们跑与不跑。记得麻城有一个很苦的佃农，约了几个他自己很可靠的朋友，把自己的老板杀了，他打了一夜锣，召集他那一乡的人要来开协会，第二天他又亲自到各家邀请开会，如是者再，而乡人均各持武器前来，并且很高兴的接受他的主张和办法。黄安也有很热心的穷苦朋友要召集协会开会，没有开成，他非常气愤的对符向一说：“同志！我们众农友，无产的干净，又不明亮〔了〕主义，开了三回都开不成！请同志讨论一下！”他们从模仿咸宁、蒲圻的办法以后，差不多各乡都有正式的协会与黑腿杆子的农民代表会，还不到二个月的时光。

“胁富会”这个东西更是表现出最贫苦的佃农、雇农之组织的天才，也可以表示农村组织之神秘性。这个东西的发生可以说是贫苦农民感受野蛮的待遇和十二分贫困之反映，也是贫苦农民直觉的组织之一种形式。他们是顶贫苦的农民的集合，简直是有一亩田的都不要加入，这个组织是鬼也不知的秘密形式，他们有自己的“俚语”，以保其秘密。在黄安，这个组织直到农民政府成立还是存在和发展

的，在一个“反对富人”的观念之下，它的革命情绪实在是比任何人都坚决些。

“防务会”和“义勇队”现在在黄安已经普遍了北乡之七里、紫云两区，而发展到城区、桃花区，甚至于极南端之八里区。“防务会”每区有一个，区下之乡又有一个“分会”，它的组织是在血战中最勇敢的而被协会或代表会所推举指定的，它管理它的区域内之军事和筹划武装并指挥义勇队。“义勇队”是含有军队色彩之组织，每个义勇队员都有来福枪一根及管刀一把，以为冲锋陷阵之用。每乡至少有义勇队员二十名。到临战时则全乡男丁都武装从征，甚至女人亦拿竹杆之类的武器在后面“呵火，呵火”……的喊杀。

最后，阔人老爷们更是妙想天开地说：“你们兴共产，这是不好！我兴无政府，我兴保产！比你们还革命些！”这些阔人老爷又请了几位受过上面教育的大学生组织了一个什么无政府保产党，以与贫农的组织相对抗。

### (三) 斗争经过之概述

1. 杀豪绅地主及其工具红学〔与〕减租。在麻、黄两县今年未停止活动之农协曾有宣传，县长和豪绅也各自出名闹成了一个减租宣传委员会（其中也有冒牌的C.P.）。但是地主的答复是：“不亏苦你们，照去年纳租！”豪绅资产阶级利用国民党的改良主义的好听政策以欺骗农民。农民说：“今年不纳租刚够吃！”“横竖我们是杀过人的了！”

“咸宁、蒲圻的办法好!”“不完租! 杀人!”农民如此觉悟。杀! 杀! 杀红学! 杀土豪劣绅! 不完租! 分土地! 革命! 争先恐后的杀! 好象今天二区带了两个土豪杀了, 我这一区只杀了一个, 是很落后的! 若是一个也没有捉着和杀死, 是不名誉的。许多人一定要因为这件不名誉的事而不瞌睡!

杀土豪劣绅, 杀土豪劣绅的红学。只有比红学长些的枪和短刀, 鸟枪还不大好, 他们因为红枪会之枪杆甚短, 备置了一丈多长的枪杆, 与红枪会接战时用“硬戳”办法, 故红学戳不到农民而农民之长杆枪可以戳死红学, 因此红学说: “农民会的枪为龙枪”, 又说: “农民协会的犁头旗为龙旗!” “我们龟蛇五虎将一定打龙不赢!” 来福枪打得远些, 每人都想打一支来福枪, 要打来福枪就要去找土豪劣绅出钱, 去捉土豪劣绅。我走到麻城北乡第十三乡农会时, 十几个农民正在烤火开会, 讨论打枪和开大会, 到了天将亮的时候捉来了两个土劣, 据说这是昨晚议定了从二十里以外捉来的, 当时两个土豪仍绑在树上挨吊挨打。

黄安的农民和麻城北乡的农民杀红学杀了差不多一年, 杀来杀去杀了三十多次, 杀了红学近一千人, 这是农民十分勇敢的铁证。但是土豪劣绅的宣传说是: “党部打红学! 不了解 C. P. 的政策!” C. P. 也不知道明确的指出农民革命之出路去领导农民, 只知道附在农民的尾巴杀红学 (他们也很勇敢可敬)! 以后咸宁、蒲圻的办法来了, 农民才知道他们的办法了! 他们不分昼夜的去捉土豪劣绅, 他们捉土豪劣绅不分大小, 均是科罚、烧房子、分田 (主

田归佃户)。他们很勤快的侦探反动派，很敏捷的捉土豪劣绅，很勇敢的打土豪劣绅的红学，闹得土豪劣绅大的络绎不绝的跑到汉口作寓公和“告状”，小的也纷纷逃奔戚〔亲〕属或者跑到土匪窝里求保镖。结果只剩下一部分很乖觉的土豪劣绅摇身一变而钻进了农民协会，甚至钻进了C.P.

(麻城、黄安都有二三百亩田的C.P.)，以求得其个人之保障，而做土劣之复兴运动(比如农民因田亩发生争执，他们说：“横竖天下还没有一定，争么事!”)。这些想做三朝元老、复兴大将的土豪劣绅，现在农民也很不客气的砍了几个，还在设法搜索中。总之农民对土劣并没有丝毫姑息之心，只要乡协或分会说这是反动派，便是要对他不起的。他们已经废除极深的宗法观念，他们彼此称呼是“同志”。

2. 红学内部的分化及我们的策略。以后，农民把“打红学”加了“学东老师”变成了“打红学的学东老师”。红学的打不死的群众也觉得“打不死”是骗人的(已经打死了千把人)。同时学东老师打了赤党，结果收稞租还更厉害些。“打不死”的群众说：“谁说打不死”！又说：“乘马岗、七里坪他们打了不完租又有田！”于是红学群众造反了！杀学东老师！

十一月二十日，光山红学派代表三十余人向农民会求和，并且表示愿受农民会的指导，特委乃派同志用农民会代表名义前往接洽，并向他们做了一个详细的政治报告，指示贫苦农民的出路，只有暴动起来，杀尽土豪劣绅地主，没收其土地与财产。他们听了报告后非常高兴，要求派专

人指导他们的工作。至此，我们愈信枪会系贫苦农民的组织，内部宣传其群众的工作十分重要，我们的政策也就改变一个方向。

3. 攻七里坪。农民与红枪会经过了许多次的斗争，到底收伏了红学，其胆愈大，其气愈壮。一日探报来说：“三十军有一营人在七里坪。”在座农民连忙告奋勇说：“我们去缴枪！”乃决定于十一月十日由麻城调一部分快枪帮助黄安农军去缴七里坪三十军一营的枪。当时三十军部队弱兵极多，战斗力极弱。我们准备于十日晚召集农民携带快枪队扒城围缴该军的枪械，到观〔音〕阁（离七里坪十里），马夫走漏消息，三十军早有准备，一面派人赴城求救，一面开南门逃走了。

次日，我们进城（七里坪的城）杀豪绅地主反动派。在这次暴动第一次进攻军队之时，农民群众愈加看出敌人的软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革命勇气更加百倍，同时引起他们进攻的决心。县城所驻之三十军一团见七里坪农军声势浩大，不敢抵御，抱头而逃黄陂。

4. 攻县城。十一月十三日，由河口侦探回来报告说，三十军又来一团人开到县城。我们准备于该团到县城时缴枪，因为他们远道疲乏，又值进县城毫无布置，我们可以少数力量对付一切。其实我们已令麻城派一部分快枪前来帮助，又于紫、七两区召集千余精锐义勇队，于晚十时出发行至离县城十里地，办〔搬〕了四个梯子，于翌早四时由县城西北缘梯而上，由盒子炮快枪队打先锋。（农民精神非常兴奋，内中红学农友在离城半里之途均饮水拍肚，挺



枪横行，直爬城上，此次只牺牲农友一人)。义勇队继其后，令熟悉敌情者探得敌军驻扎所在，开始缴械，放枪数响毫无动静，始知该军还没有到，仅派副官差遣数人来城布置驻军地点。结果只缴了公安局的枪三十余支。捉到县长贺守中，司法委员王治平，改组委员三人，土豪劣绅十五名，并没收县署改组委员会等一切赃物（子弹九十箱、被子百余床、军钞数百元），张贴鄂东革命委员会布告，宣布此次暴动的意义，要商家照常贸易。到下午四时得西边侦探报告，说三十军之一团已进离城二十里的地方，我们感觉一日一夜的疲劳，同时县城群众尚未起来，恐难抵御，故决定首先将枪支、子弹、被窝等运往后方七里坪，同时将贺知事、王委员等执行枪决。至晚六时我军由北门出城，而三十军刚由西门进城。三十军听到我们出城消息，非常惊恐，马上把守四城，宣布戒严。因各机关破坏，无人招待，士兵四出抢米抢柴。是夜三十军通宵未睡，全副武装守城，时时吹号，以防我军反攻。

5. 农民政府之产生成立及其影响。我军自第一次攻县城回七里坪以后，组织黄安农民政府筹备处，目的在借此对全县农民作一政治的号召。筹备处由特委和县委指定由各农协首领委员(共九人)组成。十五日得县城侦探报告，城内驻军畏我军异常，当晚逃跑，临走时在商家搜刮了很多洋钱。次日我军很有秩序的，并准备许多标语，而且组织了宣传大队，宣传大队走前，沿途向农民演讲，贴布告和标语，其主要之内容为：暴动杀尽土劣贪污〔官〕，暴动夺取政权，组织农民政府，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拥护共产

党，打倒武汉政府等等。我军离城一、二里之地，将要进城的时候，市民群众鸣炮欢迎，我军大呼口号，声势赫赫的前进，一般市民（小商人等在内）亦高呼“拥护农民革命军！拥护鄂东革命委员会！拥护中国共产党！”以和之，革命空气非常高涨。

十八日开农民政府成立大会，到会群众万余人，农民政府各委员（委员九人全系同志，佃农四人）正式宣布就职。主席曹学楷演说：“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完粮饷送钱把大老爷，或者是被土劣贪官抓着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以外，再不敢进大老爷的衙门，但是今日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点证明我们革命的力量，证明现在是劳农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演讲时各处拍掌并杂以呵火之声。旋又有鄂南〔应为鄂东〕革命委员会（只要招牌，现已决定不要）代表刘某等演说，报告全国各地暴动情形。继则有党的代表符某演说，说明此次暴动是C. P.领导的，并报告本党的暴动政策，工农只有C. P.能为他们谋解放，只有C. P.是工农救苦救难的菩萨，本党欢迎劳动农友加入本党云云（当时在会场报名入本党者数十人）。至此会场热烈已达极点，农民自动起来演说者十余人，最后高呼农民政府万岁！拥护鄂东革命委员会！杀尽土劣贪官！拥护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等等口号。将散会时枪决土劣数人示威，群众痛快异常。

当日，农民政府发出通电，告民众书，鄂东革命委员会县党部（？）均有告黄安农民书约数万份。红布标语布满

全城，把个黄安城变成了红城。第二、三日黄安各区纷纷开庆祝大会，在七里坪、紫云区到会两万余人，均带武装；在紫云区有三百多农妇参加；桃花区到会万余人，惟武装不甚齐备。统计各区庆祝大会的群众约七万余人。麻城农民闻黄安农民政府成立后，派二十一个农民代表（三两个知识分子，余均农民，同志只占六人）前来庆祝。农民政府与司令部及党开了许多欢迎大会，代表到七里坪即欢迎起，彼此革命情绪异常热烈。麻城代表说：“你们已经抓到了权柄，故有今日这样的好处，我们回去也一定照你们这样去抓到权柄！”又说：“黄安办得这样好是兴共产兴得好，我们不怕共产，只有共产能够代表我们的利益，不赞成共产我们不得来，来了不怕，我们都愿‘上名字’（加入共产党）！”在党的欢迎大会上，农民代表全体签名入党。

此时农民政府的成立，给附近各县农民以非常的煽动，黄冈、罗田及河南商城县等处农民都纷纷准备派代表前来庆祝。

6. 向南发展。县城南路八里区与永河区一带与长江接近。黄安县之大土劣、地主等都集中在这个地方，常常利用贫苦农友组织红枪会，以保守其财产，阻止革命风潮之侵入。与黄冈迫近之处即肖耀南家所在。肖宅有田五百石（每石收谷共二十石），枪械极多，听说有一千枝埋在地下。县南土劣地主组织非常厉害，我们派人工作很难生效，并且此地土劣地主等格外聪明，手段毒辣异常（无政府保产党即发现于此间），看见七里坪农民抗租，他们就欺骗一

一般佃农说道：“今年的租不要你们还！”一般佃农均受其蒙蔽，发生对他们主人“慈善”的幻觉。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认为向南发展，如果不用快枪队去作南路农民的先锋，绝对不能发动南路的农民，以消灭豪绅地主的势力。其时符某已去麻城，黄安工作仅有刘某负责，刘由北方七里坪带义勇队百人分为两队，先到县十人。

十一月二十六日，特委命令鄂东军第一路司令潘某率领全路快枪七十余枝并驳壳队，准备了农民政府许多的宣传品，组织了宣传大队，很有组织、有计划的向南发展。同时，特委命令南下各同志准备一个星期的工作以组织多少农民，杀多少土豪劣绅，烧多少土豪劣绅地主的房子，没收多少财产土地四项为结算标准，并且鼓励他们积极斗争，于最短期间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南路诸同志很告奋勇的出发，经桃花区至八里区烧了几家土劣的房子，并且捉了一个大土劣家属男女老小七人，并没收了三四千块洋钱，当即回县城。这个土劣是黄安最大的土劣之一，故农民政府决定罚他七万元之后并斩其首级。

此时，南路农民见农军南下非常高兴，各持手棍、矛子、扁担之类协同农军打土劣。次日与八里湾土劣的红枪会一堂（约百余人）作战，我农军攻打红枪会素有经验，当日打死红枪会过半，并缴了它的枪五十余枝。此地红枪会素未经过战争，他们以为红学可以抵当炮子，刀枪不能入，此次战争后，死之过半，迷信既破，该红枪会组织亦因而瓦解。

八里湾有三四千农民开会，举行暴动，四处杀土劣，烧土劣的房屋，甚至不论老少男女，以至南路一带土豪劣绅纷纷逃命。

7. 农民政府成立后之第一次危险的度过。农民政府初成立之时，许多同志，许多农民，很观望很犹疑，以为政权不久就要塌台的。黄陂三十军原想占领黄安，屡被我军驱逐。当我军南下之时，城内空虚，仅刘某带六十个义勇队和麻城调来十八杆枪守城。因我军实力太弱，乃虚张声势，将义勇队分为四大警备队，把守四门，快枪队时常在街上逡巡。当时盒子炮只有两根，各队长轮流佩带，上街招摇。城内秩序异常安宁，次日下午四时得河口坐探回报，说河口土匪买了许多草鞋，准备开差，当由刘某召集在城负责同志磋商办法，预料该土匪等向西北南三方均无出路，他们一定是趁我军南下，县城空虚，趁机进攻。是日决定下午四时半闭城戒严，至九时刘某巡查各门步哨，至西门时，听见近城乡村群犬狂吠至一点钟之久，同时犬声越来越近，竟到城外街边，甚至有几个狗叫到城门口来了。刘某用手灯一照，只见有一、二人影乱跑，此时已证明土匪业已至城下，遂立刻下令各队长严防，并令城门钥匙由队长保管，非得留守司令的命令，不得开城。同时又令各队长多放步哨，时常巡查，并不得擅离本位，切实负责执行以防不虞。及至十一时刘某巡视各门时，犬声已息，推知此时匪已达到目的地，当在休息，作攻城的准备。五时半天将亮，并未见土匪动静，刘某乃下令八时开城(平时六时开城)，命令刚刚传到西南门，西北门已有两

个土匪，各挑一担箩筐，冒充义勇队招待处的大司夫，〔师傅〕声称要出城去买萝卜。南门也有十几人背着包袱，声称出城赴省，催开城门。守城义勇队答，已奉到刘司令命令，八时开城，此刻时候未到，不能开城。不久（约六时）土匪已在西南门攻城，当时刘某集合快枪队，其时司令部卫兵已受伤（中枪弹），始以为土匪已全体进攻，继接西门探报知土匪尚在西门攻城，当令快枪队廖队长前往抵抗，西门有廖队长可以无忧。再南门进攻甚急，恐有闪失，刘某遂留五个快枪队救护南门，及至中途遇着南门吴队长报告南门非常危险，刘即迅赴南门，见有四五十个土匪，一面打枪，一面带五个梯子扒城。当时吴队长向敌人打了一排盒子炮，打死了两个土匪。但土匪仍是很勇敢的扒城，当此万分紧急之时，刘某将所带之手榴弹一枚，向土匪投炸，炸弹虽未响发，但将土匪勇气打消，并吓跑，各避逃城外街巷，才将这危险解除。

怕土匪计攻西南两门，而使我主力军应付，乘机由东北门扒进。当时刘某赶到东北两门，这两门还好，负责人尚未逃散，命他严防。

当时南门土匪将城门口的毛栅推倒烧城门，全城士兵见之异常恐防〔慌〕，但这火力甚薄，难以将城门烧开，刘某当此危险之际，即大作宣传云：南门我一炸弹打死了土匪十余人，并将毛栅炸烧，土匪飞不过来，不要紧，你们莫慌。这样很快的在城围跑了三个圈，将我们的义勇队和农友同志的心安定了。

同时，用白布吊下两个同志报信求救，一个走七里

坪，一个走八里湾。

继则马上跑到大街上去，只见少数义勇队同志及农民政府、县委办事员，不要命的乱跑。当时义勇队同志各归各门去，至于农府的办事员，一起召集拢来，要他们立即办到以下几点工作：（1）赶快召集城内工人纠察队，各持大刀，巡查大街小巷，如有不法之徒，与以就地正法之权。（2）赶快令农民政府下戒严令，……。（3）赶快准备许多芝麻饼子、油条等类点心及热茶沿城送给守城同志吃，同时继续造饭。

这样，我们农军在城上，土匪在城的南、西门外的小街及小丘山上，轰轰的对敌。我们已经打死了土匪十几个，打伤很多。我们看得城下打死的土匪的枪，不敢开城去拿。同时那天也打伤五个同志，不过受伤很轻，马上就送到基督教医院去诊治。

直到下午四时，土匪还未跑，同时他们在城外休息、烧饭，将向北门移动。我们知道当晚土匪定有个大的总攻击，这时候我们的士兵同志已非常感觉困苦了，也在这种情形之下，恐慌起来。

当时刘某在农会召集紧急会议，出席者有农府、农协及总工会诸负责同志。刘某立向到会各同志说：“今晚土匪不退，并似有准备反攻之势，各同志怎样？”各同志面面相观，默无一言，刘某始提出“死守”的主张。刘某说：“今晚如果我们要弃城而逃，我们未必能够安全退出，若要技术工作做得好，那么还可以守住。同时，我们就这样的弃了城，明天北方的农友来了和南下的军队回来了，岂不是笑

话么？各位同志！今晚只有死守才是出路，各位听我的计划：(1)将东、南、西三门，用砖土塞起（限一小时办好），因三十军攻宋埠城是用洋油烧开的，如用砖土堵塞则不容易烧开；并各门用几个杀猪桶贮水预备着。(2)将商店所有洋烛、灯罩买集拢来，多多益善。(3)令工人纠察队在大街小巷时时巡查，以防藏在城内土匪作乱内应。(4)令店户今晚门首各悬灯烛。(5)多备茶水、点心、纸烟。

不觉已七时了，天黑无星，土匪定觉此是攻城的良夜。我们当即令将灯火、腊烛一齐点着，于城上每间六堞点火一枝，用小方砖将火托着使火光照耀于城外，可照一百米达以外之远，于两火之间置义勇队同志一人，不打枪只伏于城上黑处，望着城外有无动静，并以北门楼为总指挥部，所有农府、农协长衫子同志，组织巡查队，轮班巡查。于巡查时大呼口号：打倒土匪，农民政府万岁！共产党万岁！并大喊“呵火、呵火！”这样一可使土匪不敢轻进；二可使守城同志没有瞌睡。

这样空城计的布置果然吓住了土匪，他们以为城内有好的军事准备，不敢动作。是时城内乌黑，城外光耀，如同白昼。九时许，土匪猛击，经半时许始止，以后则都是慢放，下半晚一、二时于城外各山林常发现手电之光，我们益加严防。

早五时许，闻城外枪声数十响，当即防敌拂晓攻击，至六时天已大明，始知土匪已退走了，城外旗帜已完全不见，同时城外小商人群来报告：“土匪走了，昨晚在这里吃了许多东西，没有给一文钱！某店某店都抢得一空，同时



他们死尸运走了啊！”

七时半只见北门外“呵火！呵火！”崩山倒海似的武装农友各持来福枪、长矛、大刀、台炮来了。原来由城吊下到七里坪报信的那个同志已被土匪杀了。这次来的许多农友都是他们听说土匪攻农民政府的消息，自动召集，星夜飞来援救的。我们马上开北门迎进，武装农友络绎不绝的到了一万多人，差不多将个小小的黄安城塞满了。那天商店也放了不少鞭炮来表示欢迎。所到武装农友都异常高兴，同时非常愤恨土匪，说信太迟了，不然早天来，已将土匪解决了呵！甚有主张去追的，农府特别招待，决定明日八时开大会示威。并决定将城内前公安局警察二十余人，此次勾结土匪攻城，在内响应，全数捕来，于大会正法。

是日下午四时，南下的军队亦回，他们自得了吊下城的同志的报告，马上飞跑的来救。

农民政府自此次将四百余土匪（号称一旅）打溃以后，农友已认清自己的力量，知道武汉反革命政府派一团兵不敢来，派两团兵打不进，派一师未必有。同时，许多对乡村政权存观望之心的农友，在这时候也觉得农民有力量。农民政府可巩固了，他们也同样干起来杀土豪劣绅，开铁匠会造武器。

在土匪攻城那日，有土豪劣绅率领流氓百余人乘机进攻七里区之古峰岭防务委员会，当时我们只有八个义勇队守会，这八个义勇队各执大刀、来福枪死抵，卒将流氓打溃并杀死他几个。

8. 对任司令之“防御”。黄安农民轰轰烈烈闹了这么一回，三十军滚蛋了！但是卧榻之旁却有一任司令（12A，土人称任司令）在焉！一般同志或不注意任司令，或者怕任司令，有省巡视员去黄安后才在麻城、黄安一带宣传要缴任司令的枪，以鼓起农民勇气，并具体计划经济封锁（集中粮食）和怎〔么〕对付的方法，并决定先解决麻、黄两县间张店任司令部队（并派一刘某去视查地形和征调附近之农民，决定五日行动）。因为对任只有以攻为守才是办法，空口防御是防御不了的。

#### （四） 结 论

黄安这一回事是一个很广大的群众行动，它的历史和发展是能给我们现在乡村工作以很多经验而值得我们乡村工作研究的。这个报告因作者多在仓促之间，未能详尽，特先声明。

在这一回暴动中，证明中央扩大会的暴动的策略是绝对正确。这回暴动是一个自发的群众暴动。这回暴动是群众英勇的斗争。在这个暴动中表现群众需要暴动，需要夺取政权（黄安城攻下时农民毫不犹豫的杀官吏豪绅，坚决的要建立农民政府），以解决其痛苦。从暴动起，群众没有丝毫妥协畏缩的心理，也没有丝毫改良主义的倾向。这给我们乡村工作者多大的兴奋。

在这一回暴动中，党的责任未能完尽（真正有党的雏形直到现在不过四十多天），尤其是党未能使这一自发的暴

动达到最高的组织性（中央总策略输入黄安不过二十多天），致暴动中表现很浓厚的无政府的状态。特别是政权形式的建立与工人之组织与兵士之宣传问题的不完备，使黄安暴动减少了不少的意义。而为以后乡村工作者之准，得特别注意。

（1927年12月14日）

# 平江扑城暴动

——回忆湘鄂赣边区史实之一

钟期光

这里回忆的“平江扑城暴动”，不是彭德怀等同志领导的那个已为历史所肯定、人民所熟知的“平江起义”（国民革命军独立五师第一团和第三团三营的武装起义），而是“平江起义”之前，在共产党领导下，平江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动进攻，直到几十万人攻打县城。这是曾使革命人民欢欣鼓舞、反动派胆战心惊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平江人民称这次暴动为“二月扑城”。

## 一

平江党组织的建立，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最早。一九二二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找平江鞋工出身、五四运动前后从事工人运动的陈蒞章和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军官余贲民等人谈话，介绍他们加入共产党。随后，以这些同志为种子，在平江发展组织，建立了平江第一个共产党小组。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我党利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当年四月成立平江特别支部，由李则鸣任书记。一九二五年成立中共平江地委，由余本健任书记。一九二六年改为中共平江县委，凌署霞任书记。这时候，东、南、西、北四乡的各区和平江中学、平江师范、启明女师等学校，都建立了党的支部。全县有好几十个支部，我所在的肥田区是第二十一党支部，邱平川所在的思村区是第二十七支部。到一九二七年，县委书记由毛简青担任。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五月，湖南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何键、许克祥大肆屠杀工农群众，屠杀共产党员。平江杀了工会负责人陈弗章和在新化搞工人运动的周得一。这是平江最早牺牲的两位共产党员，震动很大。湖南省委派夏明翰（共产党员，平江长寿街人，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长）、张启龙（当时是浏阳县委负责人，因浏阳靠长沙近，省委指示多经浏阳传达到平江），会同罗纳川、邓神生等同志，传达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批判陈独秀不要武装、害怕武装斗争的错误，整顿和健全党的组织，决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随后，为了加强县委领导，成立了上东乡、中东乡、南乡、西乡、北乡五个党的特委，分别由吴钦民、罗纳川、邱平川、刘宗义（后来叫张蓴青）、胡筠（女）担任乡特委书记。乡特委下面建立区委，如献钟区党的负责人是李国清、张若清（又名张警吾）、曾荣贵（人称“荣贵子”，组织武装斗争很有才能，打仗很勇敢）；嘉义区委负责人是喻俊

清，黄耀南；长寿街的吴钦民、赵德鑫是区委负责人（赵以开鞋店作掩护，店名“鑫工鑫”），在党的领导下，广泛深入开展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

## 二

早在建党初期，陈弗章、刘肱臣就创办县工会；余贲民、余本健创办县农会；陈景潜、吴梦潮、吴溉之（当时叫武涛）等举办工人、农民夜校。在我党的组织与影响下，平江的工、农、商、教四界，充满了进步的空气。党通过各种群众团体，采用李六如编写的《平民课本》，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教育和团结工人农民，使党和进步的力量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湖南制宪，平江选举县议员时，进步力量占了绝对优势。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达湖南后，县工会改为总工会，由李则鸣任会长；农事公会改为农民协会，由余本健任委员长；共产党员吴克坚（当时叫吴黑撑）担任了县教育局局长，并兼任我党领导的秀野学校校长。国民党也公开成立县党部，由共产党员陈弗章、李俊章为常务会正副主席，其他委员也多系共产党员，县党部的组织部长就是共产党员、总工会会长李则鸣。我是一九二四年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的。那时，我是国民党的区党部常务委员，又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还是中东乡特委的秘书，不久任县委组织部长。当时，主要是利用国民党常委的合法身份，做我党的组织工作，发动群众，搞武装斗争。我

党通过国民党和工农团体，在各城镇乡村普遍成立女界联合会、儿童团和各种参战组织，如向导队、担架队等。各界群众参加各种团体的人数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并广泛开展了农民减租减息、工人增加工资、妇女反对压迫儿媳等斗争。这样，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普遍提高，为武装暴动准备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 三

在党的领导下，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平江的武装斗争犹如隆冬的山火，借助寒风，越烧越烈。

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各地农民积极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取和收买零散武器。有个工会负责人叫梁正廷，在献钟渤头开饭店，对搞枪是有功劳的。当时吴佩孚的北兵走得疲惫不堪，又没有饭吃，他趁此机会在饭店里摆了两桌好饭菜，“慰劳”北兵。当他们吃得正欢的时候，事先埋伏好的和冒充服务人员的辜家洞的纸工，在工会负责人黎慕芳的指挥下一拥而上，把这些北兵全部干掉，一下夺得十六支步枪和部分子弹。有了这些武器，就成立起农民自卫军去打民团，扩大农民的武装。

余贲民是平江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他是个曾参加辛亥革命巡防营的军官，后来又当上了国民党平江团防局的局长，获得了当时平江唯一武装部队的领导权。他有很高的革命觉悟，也有军事才能，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平江很有名望的人物。一九二七年五月，“马

日事变”的消息传出后，湖南人民义愤填膺。毛泽东等同志将长沙四乡及平江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统一改编为工农义勇军，准备攻打长沙。后因认识不统一，未能实现。当时，余贲民领导的平江工农义勇军已有二千余人，奉命东调参加南昌起义，中途受阻，折回湘东。八月底，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湖南省委组织秋收起义，将平江、浏阳工农义勇军的主力 and 武汉警卫团等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成为后来到井冈山建立红四军的基础之一。

秋收起义部队离开湖南以后，反动派加紧压迫革命。国民党派旅长阎仲儒、县长王紫剑到平江“清乡”，屠杀我党同志、进步青年和左派国民党员五百余人。户户搜“暴徒”，村村杀“共党”，街头巷尾，挂满人头，河滩塘边，血染沙土。农民把阎仲儒和王紫剑称为“两个活阎王”，痛骂“阎王到境，农民遭殃”。群众称“清乡”为“清箱”（指翻箱倒柜，掠夺农民财物）。

敌人的镇压虽然使革命势力遭受较大损失，少数害怕武装斗争的党员离开了平江，逃亡外地，个别“软骨头”经不起考验，成为革命的叛徒，但更多的共产党员和广大工农群众并没有被镇住，被吓倒，武装斗争的烈火迎着血雨腥风不但没有熄灭，反而熊熊燃烧。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不能象绵羊那样任人宰割，要以武装暴动回答白色恐怖”；“梭标亮亮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抓许克祥”。在以罗纳川为首的县委领导下，各级党员干部隐蔽乡村，扎根在群众之中，组织游击队同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我



家所在的中东乡(包括嘉义、猷钟、三眼桥)成立了一个游击队，由俞庚、李楚平负责。在我家所在的福星墩，我物色了一个人，叫余降祥。余降祥过去当过护国军，打仗很勇敢，当了游击队的中队长，后来编到正规红军里去了。长寿街金矿局有三十几支枪，由吴钦民、侯经武负责，成立上东乡游击队。南乡游击队的负责人是钟绍秋、邱平川。西乡的刘宗义(张蕻清)、杨深如组织游击队活动在平西，由北乡游击队胡筠担任队长。还有上北乡一个游击队，自称“黄去由”游击队。“黄”字去掉中间的“由”字就是“共”字，意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长叫方国民。

一九二八年春，湘桂系军阀混战爆发，我们又乘机搞枪，扩大武装。游击队到处袭击敌人零星部队，收买和夺取散兵游勇的枪支，举行了一系列乡村小暴动，向地主豪绅的基层政权和区乡挨户团进攻。反动派为了对付共产党，压迫农民，先是搞“十墩联防”，后来搞保甲制度。例如我们肥田区，将福星墩、新胜墩、托莲墩、仁凤墩等十个墩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挨户团。十墩的领导都由豪绅地主霸占，他们欺压农民，最为农民痛恨。游击队发动农民进攻挨户团、警察所。开始多在夜间秘密集结搞暴动，几十人、几百人不等，干完就散开。后来力量大了，就在白天暴动。先后将猷钟、思村等敌人基层武装一个个搞掉，夺来武器壮大自己。湘东有个著名土匪叫邱国轩，盘踞长寿街作恶，平江义勇军东调参加南昌起义时，邱匪曾以诈降“合作”为计，反戈设伏，袭击义勇军。游击队决定消灭这股土匪，经数小时猛烈战斗，歼灭其一部，余部被击溃

逃窜。游击队追击时，农民群众自动参战，追到嘉义附近，邱匪自觉难以逃脱，便沿线丢银洋，企图趁机逃跑。我们的战士和农民不捡银洋，在喊杀声中紧追不放，终将邱国轩活捉，俘获人枪三十余。后来将邱匪公审处决，大快人心。就这样，全县游击武装很快拥有步枪三百余支和大批梭标，大刀、松树炮等武器。一九二八年二月，正式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司令部”，总队长是裁缝工人出身的余本健，党代表是罗纳川。

开始，反动派嘲笑我们：“平江农民真好笑，松树挖空做大炮，鱼叉丁铲打冲锋，梭标鸟铳逞英雄。”但很快他们就尝到了这些土枪土炮的厉害。特别是鱼叉，一叉夺命，土豪劣绅见了都发抖。面对革命武装的壮大，敌人基层武装一个个被消灭，豪绅地主惊恐万状，他们见势不妙，只好夹着尾巴逃跑。到一九二八年春，东、南、北三乡和西乡部分地区的反动分子全部窜聚县城，或逃往长沙；乡间普遍赤化，已无敌踪。于是革命群众兴高彩烈，各区都召开群众大会，恢复农民协会，烧田契，焚租约，分田分地，分斗争果实；部署对县城反动派实行封锁，断交通，设步哨；各乡青壮农民、妇女、学生分别组织起来，一边生产、劳动、上课，一边练兵习武，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为了消灭龟缩平江县城的敌人，夺取革命的更大胜利，一九二八年三月（农历二月），县委决定组织群众武装扑城，成立“平江工农暴动总指挥部”，由罗纳川、余本健负责。事先密令各区乡编好农民自卫军队伍，作好动员准备。每个乡都编有搜索队、破坏队、敢死队、肃反队、

救护队等，以棕绳和稻草绳系在腰间作标记，在竹竿上扎条草龙作战旗。除了游击队的步马枪外，农民群众每人都有一件土造武器，大部分是梭标、锄头、斧头、钩刀、扁担、木棍等等，特别是各乡都做了许多松树炮。在暴动总部号召下，乡间工农壮丁，几乎全部踊跃参加，只留妇女在本地担负警戒，全县动员了二十多万群众，带着三天干粮，分四路包围县城。离城五里之内断绝了交通，组织了递步哨、检查站，侦察员沿途联络。为了迷惑敌人，群众队伍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化装，挑担的、推车的、耍龙的、唱戏的，五花八门。在前一天按路途远近分别出发，星夜赶赴县城附近的指定地点集结。原定主攻北门，佯攻东西两门，拂晓全城发起攻击。但是，由于当时的组织指挥水平不高，农民缺乏作战经验，队伍虽然浩浩荡荡，十分庞大，但协同动作不好；游击队因混杂在农民队伍中间，致未能充分发挥主攻作用，且火力过少；加之正要全面攻城，敌人增援部队赶到，城内敌人查明虚实，猛烈反攻，以致扑城没有成功。只有俞庚那个游击队打进了北街岭上画桥，与敌巷战；东乡、南乡的群众只打到了城边；有的队伍离城尚远。进攻受挫后，我们主动撤出战斗，退回乡村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电影《怒潮》所反映的，就是平江人民这一段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过去有人对《怒潮》妄加“批判”，说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这是完全歪曲历史的。因为这里写的是“平江扑城”，而不是“平江起义”。）

## 四

从一九二二年成立平江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到一九二八年三月扑城暴动，是平江人民一段光辉的革命斗争历程，其影响重大而深远。第一，“扑城”虽然没有成功，但从此揭开了武装暴动的序幕，取得了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游击队退回乡村以后进行了整编，划分了活动区域。全县编成五个大队：第一大队长钟绍秋，在南乡活动；第二大队长俞庚，在东乡活动；第三大队长胡筠，李宗白，在北乡活动；第四大队长武涛（吴溉之），在西乡活动；第五大队长侯经武，在上东乡活动。这五个大队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打击反革命清乡武装，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第二，这次扑城是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的先声，也为扩大起义部队创造了条件。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等同志发动国民革命军平江起义后成立了红五军，共五个纵队，其中第一纵队和第三纵队的全部及其他纵队的部分成员，都是参加二月扑城暴动的游击队和工农骨干，不少同志成为我党我军的优秀领导干部。第三，锻炼和壮大了党的组织。平江县委从斗争中大量吸收农民入党，使党的组织在各乡区更加普遍发展，尤以东南两乡发展较快。

总之，平江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唤醒和锻炼了革命人民，锻炼了党，锻炼了革命武装，为建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

后，我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暴动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重要实践。

**“平江暴动”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五日）**

#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 发展和粉碎国民党的 一、二、三次“围剿”

崔田民

## 一、陕北党、团组织发展简况

陕北最早的共产党员是李子洲同志，名登瀛，绥德县人。一九二三年春，他在北平师大哲学系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季毕业回陕西，先后在三原中学、渭北中学、陕北榆林中学任教员，宣传马列主义。一九二四年秋，到绥德县省立第四师范任校长，教务主任为杨明轩，训育主任为常汉三。他到校后聘请了王懋廷、蔡楠萱、罗端先、田伯荫、王复生、关中哲、赵少西等进步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任教。从一九二四年秋到一九二五年初，他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发展了第一批党、团员，有李瑞扬、王兆卿、乔国贞、白明善、杜振亭、杨璞、霍世杰、霍学光等，建立了党、团特别支部，党的支部书记是王懋廷，组织委员是田伯荫，宣传委员是李卓然，还有委员王复生等同志，直接归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同志领导。

一九二五年春，绥德特别支部派王懋廷、白明善（白乐亭）等同志去榆林一中发展党、团员，于五月正式建立了党、团支部。团支书是张肇勤，组织委员是刘志丹，宣传委员是曹必达。党团员还有王子宜、曹力如、杨国栋、汤登科、刘景象、李含芳、周家干、焦维帜、董耀卿、周梦雄、高子钰、庄培、武开章、刘文蔚、郭洪涛、马云程、柳寿青、王乃平、王俊让、霍作霖、王怀德、王建民、刘绍让、张训谦、白作宾、周发源等。一九二五年上半年，绥德特别支部又派田伯荫、呼延震东等同志去延安四中发展党团员，于一九二五年秋冬建立了党、团支部。党支部书记是王超伯，组织委员是易厚庵，宣传委员是陈玉庭。一九二五年冬至一九二六年春，绥德县特别支部再派李瑞扬、杜振廷、杨璞等同志去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下石谦营（以后扩大到旅），协助该部连长、共产党员谢子长、李象九和史未然等同志开展工作，并介绍阎揆要、阎红彦、杨仲运、雷恩钧等加入共产党，发展了党的组织，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支部。

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共北方区委派耿炳光同志为陕北特派员。六月，绥德特别支部改为地委，蔡楠萱为书记，何寓楚为组织委员，关中哲为宣传委员，领导绥德、清涧、安定、佳县四个特支，一个工人支部，一个军队支部。至同年秋天，榆林特别支部亦改为地委，马云程为书记，刘景象、郭洪涛先后为组织委员，周家干为宣传委员。至同年冬，延安特支改为地委，书记为田伯荫，组织委员为易厚庵，宣传委员为陈玉庭。

一九二七年春成立陕甘区委，领导绥德地委、榆林地委、延安地委、石谦军支部，在陕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给陕北广大群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陕北党、团组织发展的主要情况。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陕北军阀井岳秀约于八月间开始“清党”运动，封闭学校，解散工会、农会、商会等群众组织，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时值暑假，各校学生和党员都离校回家，分散在各地，有的被捕，有的被杀，有的自首，有的消极，故当时有些党、团组织一度处于混乱停顿状态。

一九二七年七月，陕甘区委改为陕西省委。十月，团省委派焦维帜为陕北特派员，到陕北整顿组织，先后恢复了绥德、榆林共青团县委。不久在榆林成立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是焦维帜，组织委员是贾拓夫，宣传委员是刘绍让。十二月，省委派杜衡为陕北特派员，到陕北整顿党组织，从南往北，先后建立了延安、延长、清涧、绥德、米脂等五个县委。一九二八年二月建立榆林县委，书记是李文芳，组织委员是白福堂，宣传委员是叶先英，领导榆林、横山两个区委（榆林区委书记是张德生，横山区委书记是×××）和榆中、女师、街道三个支部。杜衡又被派到神木、府谷恢复和建立了这两个县的党组织。到一九二八年三月，陕北特委领导八个县委（延安县委书记是王化成，延长县委书记是朱明，清涧县委书记是师应三，绥德县委书记是赵通儒（后改为白明善），米脂县委书记是景



仰三，榆林县委书记是李文芳，神木县委书记是杨和春，府谷县委书记是李来宾)、两个直属区委(安定和镇川)、两个直属支部(保安和三边)，安塞只有通讯员。其他未建立县委的党组织，归附近县委领导：宜川归延长，延川归清涧，吴堡归绥德，佳县归米脂，横山归榆林。

一九二八年四月，在米脂苗家坪南丰塞古庙召开了陕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陕北首届特委。会议由杜衡主持，开了三天三夜，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及陕西省委的指示。出席会议的有团特委书记焦维帜、绥德县代表赵通儒、榆林代表李文芳、米脂代表景仰三、清涧代表师应三、神木代表张浊清、府谷代表柴培桂，延安、延长代表未赶到。特邀代表有杨国栋、冯文江、马瑞生、张鸿禧、白明善、苗仰实等(特邀代表有些未到会)。会议选出七个委员组成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杜衡为书记(省委指定)，冯文江是组织兼农运委员，马瑞生为宣传委员，焦维帜为青年委员，杨国栋为军事委员，委员还有白明善、赵仰普(即赵通儒)。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下旬，陕北党、团特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在米中和米脂北街小学分别秘密举行(原定八月在米脂举行，因杜衡、焦维帜、贾拓夫、李文芳等八月十五日被捕，未开成)。党特委二次代表大会由代理书记杨国栋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冯文江、白明善、刘澜涛等。因特委代表大会由贾拓夫主持(贾被捕不久即被保释出狱)，参加会议的有马文瑞、刘绍让、李文芳、吴伯霄，常应黎等。两个会议都传达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

神，选举杨国栋为特委书记（有的人说杨国栋一直是代理书记），贾拓夫为团特委书记，其他委员基本未变。

一九二九年春，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第一次特委扩大会议，会议由杨国栋主持，贾拓夫、白明善、李文芳等参加了会议。为反对井岳秀封闭米脂中学，决议组织米脂中学护校委员会。但是未起作用，米中停办了好几年。

一九二九年六月，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杨国栋、刘志丹、贾拓夫、白明善、冯文江、刘秉钧等。会议批评了杨国栋的单纯交结白军军官的“军事工作”观点和不发动群众等错误，改选了特委，白明善为特委书记，刘志丹为军委书记（也有人说刘志丹为特委书记，九月刘志丹要求省委同意他回保安县专搞军事工作），冯文江、李连菲、苏醒民、刘澜涛、贾拓夫为委员。团特委书记是贾拓夫，组织委员是李文芳，宣传委员是赵觐龙。

一九二九年十月，陕北特委书记是吉国贞，他的公开身份为榆林中学语文教师。不久，吉国贞调绥德师范任教师，特委也迁到绥德。特委其他成员都无正式职业作掩护，只有刘澜涛在绥德师范教导处工作。

一九三〇年五、六月间，杜衡（这时杜已出狱，任陕西临时省委书记）从西安来陕北视察工作，在绥德县五里湾大庙召开了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吉国贞、白明善、刘澜涛、贾拓夫、常应黎、李文芳、马文瑞、刘发岗等同志。杜衡传达了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要求继续贯彻六大精神。他宣布，为了健全陕西省委领导

机关，调贾拓夫到团省委工作，常应黎代理陕北团特委书记，调吉国贞回省委工作，派王林任陕北特委书记（王林未到职）。七月，改派赵伯平任陕北特委书记。七、八月间，北方局派孔祥祯和李杰夫到陕北特委传达中央将陕北特委划为军事暴动区，划归北方局领导的指示。这是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三〇年七、八月间归省委领导时期的主要情况。

一九三〇年八、九月间，赵伯平由西安出潼关经介休到陕北，接任陕北特委书记后，在绥德县合龙山古庙里主持召开了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伯平、刘澜涛、白明善、苏士杰、张德生、杨仲运、常立德、惠作人、崔玉瑚、张肇繁、霍维德等二十余人。从北方局来的孔祥祯和李杰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谢子长、刘志丹是否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说法不一，有的说参加了，有的说未参加）。会议传达了立三路线的有关文件，决定党、团合并为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芳为常委兼秘书，孔祥祯为常委兼军事委员，常应黎为常委兼青年委员，谢子长和刘志丹为行动委员会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但是，会议还未结束，敌人就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刘澜涛、张德生被捕（后经组织营救释放）。于是会议转到义合镇附近霍维德家举行。当时因暴动条件不成熟，所以立三路线在陕北很快就破产了。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王林以北方局特派员身份到达陕北特委，代表北方局接收陕北特委的关系，传达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并传达了赵伯

平继任陕北特委书记的决定。同年底，恢复了党、团的正常活动。

一九三一年二月初，北方局（河北省委）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派白明善，省委派杨璞同时到陕北特委。白明善代表筹备处指责王明领导的中央路线完全错误，杨璞代表省委指责罗章龙派反党搞分裂，各说各的理。陕北特委不好表态，决定派赵伯平、刘澜涛、常应黎、王林组成代表团去天津找北方局请示，留孔祥祯为代理书记（有的说，代表团是由孔祥祯〔代表特委〕、常应黎〔代表团特委〕、马明方〔当时是绥德县委书记、代表基层〕三人组成，赵伯平和李文芳在特委主持工作。后因榆中学生逮捕事件，赵在榆林站不住脚才去了北平）。

代表团到天津后，向北方局孔原等同志汇报了陕北工作及白明善、杨璞到陕北的情况。北方局作了指示，并决定孔祥祯调北方局工作，常应黎另有任务。任命张资平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马明为组织委员，鲁学曾（即鲁笨）为青年委员，崔逢运为秘书。赵伯平遂即返回陕北。

一九三二年秋，赵伯平离开陕北，陕北特委书记由马明方代理。以上是陕北党、团组织从一九二四年春到一九三三年六月高起家洼特委扩大会议这一阶段的发展变化的主要情况。

自从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陕北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了农村。先是秘密发展党、团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接着就逐步开展了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全省、全

国的革命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影响，一九二七年十月清涧石谦部的起义，一九二八年五月的渭华暴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甘边的游击活动，一九三一年九月阎红彦、杨仲远等同志率领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以及一九三二年冬红二十六军的成立等等，都极大地推动和鼓舞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促进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诞生、发展和壮大。

## 二、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 第一支红军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的农历二月八日（公历三月十二日），高朗亭、刘善忠同志徒手缴获清涧县怀义湾民团的六支枪，组织起有九人参加的游击队。二月十六日，游击队在绥德县南区留仙嘴，打了大地主兼士绅白登高，然后转移到清涧、延川、安定之间的青坪川、永平川一带活动。到三月，队伍扩大到百余人，枪五十多支。四月十八日消灭永平镇民团，缴枪十七支。当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简称先锋队，公选刘善忠同志为司令员，高朗亭同志为政治委员。当日，哥老会分子叛变，刘善忠同志被害，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暂时受到了挫折，处于混乱状态。中共绥德县南区区委（在铁筋坪，区委书记崔文宪，即崔田夫）于农历二月中旬听到有红军在留仙嘴打了大地主兼士绅白登高，立即选派张承

忠、崔正冉等同志分头寻找。因当时游击队的行动极为秘密，近月时间没有找到。到夏季，高朗亭同志主动找到清涧县小岔子党支部（支部书记惠子明），并派惠世温（即马万里）同志来区委报告工作，区委即与先锋队取得了联系。接着，区委派张承忠、马万里、崔正冉、雷合、韩生杰等同志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工作，同时报告特委。特委即派李成荣、艾龙飞、贺吉祥等同志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工作。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日，特委委员毕维舟（毕洪波）同志在延川县高家格塔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任命高朗亭同志为支队长，艾龙飞同志为政委、王保民同志为副支队长、张承忠同志为经济员（管理经济财政供给工作）。这是陕北特委领导的第一支游击队。

一九三三年的一月间，陕北特委又任命强世清同志为第九支队副支队长。在安定（今子长，下同）县的栾家坪桥头打死国民党安定县县长刘述铭。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名义发了事先写好的布告，历数刘述铭的罪状，宣判死刑，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打倒国民党。

一九三三年四月间，特委将第九支队改为第一支队，任命强世清同志为支队长（高朗亭同志调特委分配工作），艾龙飞同志为政委。五月一日，第一支队从安定西区出发，南下陕甘边，去找红二十六军取经学习，经安塞真武洞、瓦子川到耀县照金根据地与二十六军会合。二十六军派杨仲远同志到一支队任政委（原政委艾龙飞离队回陕北）。六月初返回陕北途中，在平顶川与马丕勋同志领导的

南梁游击队(有二十余人,四、五匹马、十余条枪)会合,并将其编入一支队。这时,第一支队共计五十余人,枪三十余支,强世清同志任队长,马丕勋同志任副支队长,杨仲远同志任政委。以杨仲远、强世清、马丕勋、王大宏等同志组成队委会。回到陕北后,第一仗打董家寺,全歼敌军巡逻队,缴枪十九支。当我游击队转到淮家塔休息时,敌军两个连反扑,杨仲远同志随骑兵掩护游击撤退时英勇牺牲。一支队转到杨沟,经过休息调整,强世清同志仍任支队长,马丕勋同志仍任副支队长,李成荣同志任政委,王大宏同志(现名张毅忱)任经济员。下设五个分队。一分队长白德胜,二分队长李均胜,三分队长王孝增,四分队长李盛堂,五分队长谢绍安,部队扩大到百余人。七月间,敌军八十六师李含芳团向我安定地区围攻,一支队留白德胜一个分队就地坚持斗争,强世清、马丕勋、李成荣等同志率领二、三、四、五分队二次南下陕甘边,到薛家寨与红二十六军会合。九、十月间先后作战两次。第一次,九月二十一日配合甘肃正宁地区游击队攻克张洪镇(旬邑县政府所在地),歼敌五十余人,打死伪团总,活捉伪县长,开仓济贫。第二次十月十七日攻克合水县。我军士气高昂,连续打了两个歼灭战,共缴获长短枪五十余支。二十六军又派魏武同志任一支队政委(原政委李成荣同志留陕甘边区不久回陕北),十月下旬率部胜利返回安定地区;副支队长马丕勋同志由陕北特委派往佳、吴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一支队返回安定后,在十一月二十日没有搞清敌人防

守工事的情况下，偷袭驻守枣树坪敌军八十六师一个连没有成功，队长强世清同志负重伤，在王家庄养伤时不幸被敌人搜捕，英勇就义。不久，白得胜、任志贞亦被捕，英勇牺牲。随后又因再打折可达民团失利，政委魏武同志牺牲，贺吉祥、栾新春、任玉林等同志被俘（经组织批准，他们即留在敌民团当团丁，进行敌军工作。以后在战场上配合作战，带武器回到部队）。至此一支队失去了领导，部队受到严重挫折，十一月下旬把枪支弹药埋藏，人员化整为零，第一支队暂时停止了活动。

### 三、中共陕北特委一九三三年六月扩大会议

一九三三年六月（公历七月二十三日），陕北特委在佳县高祁家洼高禄孝同志家秘密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原特委委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舟、王兆卿、常学恭、崔逢运（崔运）、鲁笨等同志外，各县参加会的还有：崔文宪（崔田夫）、崔逢吉（崔田民）、高明朗（代表游击队）、张达志、高长久、张岗，赵福祥、高禄孝、贾怀智、王国昌、魏刚等同志共二十余人（有的说十八人）。会议在绝对秘密的条件下开了三、四天，中心议题是讨论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与创造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会议认为，第一，陕北地薄民穷，苛捐杂税奇重，十年九荒，民不聊生，且有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和革命的光荣传统，特别是



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和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影响，广大劳苦群众迫切要求革命，这是陕北革命形势已经成熟的客观条件；第二，陕北地处西北，交通不便，地广人稀，反动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薄弱，这也是革命的有利条件之一；第三，陕北党组织自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只有个别人被捕，特委机关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一直坚持活动，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第一支队一年多的活动（从第九支队开始算起）证明，陕北有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因此，会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安定扩大一支队，绥、清建立二支队，神、府建立三支队，在安定，绥、清，神、府三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会议还补选了张达志、高长久、崔文宪、崔逢吉等四同志为特委委员，崔文宪为特委书记，马明方为宣传委员，崔运为组织委员，王兆卿为军委书记，马文瑞为团特委书记。这次会议对创建陕北红军、开展陕北游击战争、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 四、陕北革命游击战争迅速发展

陕北特委六月扩大会议闭幕后，由于董培义叛变，特委机关遭到敌人袭击，特委委员毕维舟、王兆卿和高禄孝、王守义、崔德勤、高寿等六同志，先后在镇川堡和米脂县城被捕牺牲。但是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同志在米脂县姜家新庄突围成功，未受损失，他们很快把特委机关转移到佳、吴地区，继续坚持工作。新选特委书记崔文宪

同志迅速辞去长工，到特委主持工作。各县参加扩大会议的同志都安全回到各县，坚决贯彻扩大会议的决议，陕北革命游击战争迅速发展起来了。主要情况是：

### （一）安定地区恢复和扩大了第一支队

为了恢复第一支队，特委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派崔正冉、张爱民、李相海、苏力厚等同志，由清涧东区出发，化装为走江湖的，穿扬道褂，绕怀义湾，上老君殿，下黑窑沟，与黄弯楼黄秀英接上关系，去景家坪取出一支队埋藏的十三支枪。十二月上旬由原道返回清涧东区。农历腊月初八（公历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王家山王巨德同志家中开会，有崔逢吉、张承忠、王巨德、白雪山、崔正冉等同志，会议后即恢复了一支队。次日拂晓，张承忠、崔正冉同志率一支队回到安定。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同志，从北平回到陕北，先到清涧县，由二支队派人护送到安定，先将一支队失散回家隐蔽的一些干部（薛兰岗、南贵成、李盛堂、刘子清、谢绍安等同志）集合在一起，又取出一支队埋藏的六支枪开始活动，并很快和从清涧恢复返回安定隐蔽活动的一支队会合。谢子长同志任命李盛堂同志为支队长，谢绍安同志为副支队长，刘明山同志为经济员，部队扩大到人枪二十余。不久，贺晋年同志到一支队任政治委员，配合刘约三同志领导的庆阳游击队，歼敌张建南的营部和一个连，又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人枪扩大到五十余。

七月八日，在安定县的阳道峁，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指挥一、二、五支队三百余人，并动员了赤卫大队（大队长薛兰斌）四、五百名，于七月十七日攻克安定县，占领县政府，打开监狱，释放犯人，救出许多革命同志，歼敌十余人，镇压了一批坏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这是第一次攻占县城，扩大了政治影响。七月二十三日，谢子长、郭洪涛同志率领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南下陕甘边，与红二十六军会师。

## （二）绥、清地区建立第二支队

陕北特委六月扩大会议之后，绥（德）、清（涧）中心区委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在清涧县苏家渠附近石窑洞内召开了扩大会议，吸收部分支部书记和积极分子参加，其中有：张承忠、李树椿（李景林）、贺生春（唐洪尘）、崔文运（崔田夫之兄）、张家修（张爱民）、张绍修、苏耀亮、康润民、苏保全、李相海、王尚业等十几位同志。崔逢吉同志传达了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决议，对绥、清地区建立第二支队，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任务作了具体布置（崔文宪已去特委工作，崔正冉、王巨德同志组建二支队，他们三人没有参加）。根据形势的发展，会议决定将绥、清中心区委改为中心县委，不久又分组为绥、清两个县委。绥德县委书记是崔文运，张爱民、李相海、王士英、高农夫（高承训）、罗文（王学善）等同志先后参加过县委的领导工作；清涧县委书记是刘玉春，贺生春、李树椿同志为委

员。绥、清地区党的活动，从这次会议后，就由秘密走向公开，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特委六月扩大会之前，崔正冉、王巨德二同志根据区委的决定，搞到土匪的三支驳壳枪。特委六月扩大会之后，他们首先在绥德县南区郭家坪，镇压了群众最痛恨的包收粮款的高正东，接着又在安沟一带镇压了催收粮款的衙役数人。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在清涧县的王家山，由崔田民根据特委的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指定高朗亭、崔正冉、王巨德同志负责。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镇压了绥德南区区长薛运统（区公所在薛家峁）。预先在铁茄坪写好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的布告，历数薛运统的罪状，宣布没收其财产，处以死刑。没收的银元、元宝等财物，一半上送特委作活动费，一半留支队买武器弹药，扩大游击队。

以后，改由白雪山任二支队队长，王怀德任政委。当时采取白天隐蔽宣传群众、晚间行动的方针。在绥德地区打了土豪劣绅，就秘密转移到清涧地区隐蔽休息，在清涧地区打了地主土豪，又秘密转移到绥德地区隐蔽休息。就这样，在绥德、清涧的结合部，一方面打击地主豪绅、摧毁国民党的农村统治，一方面建立贫民会、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公开我们控制的村庄（清涧县东区王家山，是绥、清地区第一个先公开的村庄），从而使革命迅速发展。一九三三年十月间，特委将二支队的三支驳壳枪调给特委，成立特务队，队长是樊文德，任务是保护特委机关（以后取消特务队，又将这三支驳壳枪调到神、府成立三

支队)。二支队又先后搞到驳壳枪、冲锋枪、手枪各一支，步枪两支，坚持游击活动。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在一支队的配合下，于清涧东区的解家沟镇压了地主兼高利贷者高潘和收款衙役九个半(镇压十个，一个未死，故称九个半)。这天是解家沟镇一年一度的腊八大会。绥德、清涧交界的广大群众以及山西邻县商人都来赶会。镇压地主兼高利贷者高潘和九个半的消息，迅速传遍晋陕黄河两岸的广大群众，从而扩大了红军、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一月下旬，郭洪涛同志和杨璞(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政治特派员)决定，动员四、五百名赤卫队，配合二、四支队，袭击清涧县店子沟李成善民团(人枪三十余)。因杨璞被捕(以后叛变)，提前行动，歼其一部，缴枪十余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二支队长白雪山、政委张毅忱同志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党委指示，积极发展壮大游击队和游击区。在特委和绥德县委的领导下，三月在绥德王家沟组建了五支队，由崔正冉、王子文同志先后任支队长，马万里、王再兴、张毅忱先后任政委。

四月五日，二支队在清涧城区小岔子(距县城十余里)与敌军一个连遭遇，打了个消耗战。六日在小岔子伏击敌人，歼敌民团团总贺金瑞等数人。敌正规军一个连进到大岔子，听到枪声即逃回清涧县城。从此，以小岔子为中心向四面开展工作，迅速扩大了游击区。五月，二支队打开樊家寨子，缴获民团枪支数支。下旬去安定与一、五支队会合，参加七月十七日攻克安定县的战斗，下旬，南下陕

甘边南梁堡根据地，与红二十六军会师。

### （三）神（木）、府（谷）地区建立第三支队

一九三三年九月间，贾怀光同志在神木地区尚家崾村组成七个人的特务队，队长李成兰，政委王兆相。特委先后派张承忠、高朗亭、韩生杰、雷合等同志去神府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扩大了特务队。至十一月，特委又派马万里（惠世温）、马丕勋、张衡等同志给神府地区送去驳壳枪三支。贾怀光同志于十一月七日在神木县南区尚家崾村将特务队改为陕北工农红军第三支队。原特务队长李成兰因马丕勋手枪失火打伤了腿，在养伤中与乔十六同志一同被捕牺牲，其弟李成荣同志也被捕牺牲。第三支队新任队长是王兆相，政委是马万里，部队扩大到十八、九人，枪五、六支。十二月下旬，特委曾计划调王兆相、马万里另行分配工作，任命高朗亭为队长，刘晓春（张毅忱）为政委。不久高朗亭病休，王兆相继续担任队长。刘晓春调回特委，贾怀光任政委，不久又调杨文谋任政委。

在此期间，经过九洼村战斗，歼敌贾怀德民团一部，缴枪五支；太和寨战斗，歼敌王进成民团二十人，缴枪二十支。六月二十八日，三支队出击盘塘，在菜园沟战斗中，敌军第二排排长、共产党员刘振西同志率领全排战场起义，参加三支队，并缴获敌第一排的三十二支枪。三支队得到迅速发展扩大。一九三四年九月，特委派崔田民去神府地区，十八日，在王家庄（或叫王家洼）将三支队扩编为陕北工农红军第三团，团长为王兆相，政委为杨文

谋，参谋长为刘洪飞(即刘振西)，辖步兵三个连，骑兵一个连，全团二百余人，枪百余支。同时成立神府地区革命委员会。以后又成立神府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呼子威，副主席是王恩惠。不久，万户峪敌军第八连(张孝贤部)由共产党员张德超同志率领起义，虽因未配合好，只带了关子明、许林贤等二、三十人出来，但政治影响却很大。神、府地区的游击队和游击区迅速扩大，到年底，新建了七支队、十一支队、二十一支队。游击区北至府谷、庙门沟、麻镇、黄甫；南到佳县的高起家洼、朱营寨、榆林的双山堡一带；东至黄河罗峪口——黑峪口之间，西北至长城内，为比较巩固的根据地。长城外大草原准格尔旗，乌审旗地区也有游击队活动。神、府、佳、榆边区，南北约五百华里，东西约二百华里，人口约有十四万。中心地区分配了土地，各种群众组织也都建立了起来。

一九三五年底，杨和亭等同志到神府苏区建立神府特区，成立特委，杨和亭任书记，直接归中央领导。红三团积极作战，先在申家里歼灭了万户峪出扰的一个骑兵连的大部，俘获人马枪支各三、四十。在乔家山击溃陈家坪据点出扰的步兵一个连，使其撤离陈家坪。又歼敌香水梁民团三十余人。歼灭建安堡敌步兵连之一部，俘获人、枪各十余。不久，中央派张秀山等同志到神府苏区，传达了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进行统一战线教育。王兆相调神府特委军事部任副部长。

一九三六年的四、五月间，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打到神府苏区，先在杨家塬歼敌八十六师两个连，

俘副营长一名。再袭罗峪口、黑峪口，歼敌一个营，俘营长一名，胜利地东渡天险黄河，配合红军主力东征作战。神、府、佳、榆边区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后以三支队为基础扩编为红四团。团长为王兆相，政委为贺伟，下辖两个连，一百四、五十人。八月一日，在花石崖将红三团、红四团编为独立师，师长为王兆相，政委为张秀山，参谋长为李治州，政治部主任为王国昌。红三团改为红一团，团长为刘明山，政委先后为邓万祥、陈进堂、许培仁。红四团改为红二团，团长为贾兰枝，政委为贺伟（以后将小组游击队，独立营编为红三团，团长为刘崇德，政委为许法善，不久改为骑兵团。后取消骑兵团，又成立第三团，团长为刘明山，政委为王右）。每团四个连，每连百余人。师领导机关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师直属连队有警卫连、侦察连、骑兵连，全师近千人，机枪二十余支。

神、府地区的革命武装由特务队到三支队、红三团、独立师，始终坚持了神、府、佳、榆边区的游击战争，创造和保卫了神、府、佳、榆边区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独立师整编为留守兵团警备六团。七七事变后开赴晋西北，归一二〇师指挥，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 **（四）佳、吴地区建立第四支队**

佳(县)、吴(堡县)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工作都很好。特委机关在米脂被破坏后，迅速转移到了佳、吴地区。六月特委扩大会议对佳、吴地区虽然没有提出建立游击队、



创造游击区的具体要求，但这个地区同志的工作很积极，主动成立了抗日义勇队。早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初，马丕勋同志和刘子仪同志就准备组织佳县木头峪暴动，因为民团的枪支还未发下来，故推迟举行。于是马丕勋同志去吴堡县宋家川联系，经胡海江同志协助，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成立了抗日义勇队，当时的武器只有两支手枪，薛俊山任队长，马丕勋任政委。

不久，刘子仪（苗从模）同志得悉：一九三四年二月二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左右，佳县国民党准备在木头峪召开全县士绅大会，一是动员全县衙警、民团配合各乡士绅催收年终捐税欠款；二是要在除夕晚上以螞镇驻军为主，全县衙警、民团协助，在木头峪、吉镇、神堂沟一带捕杀共产党员。根据这个情报，特委、县委决定，在士绅大会期间袭击木头峪，一举消灭敌人。于是将抗日义勇队秘密调到木头峪附近隐蔽待命。二月一日晚，在刘子仪同志策应配合下，抗日义勇队袭击木头峪，除螞镇驻军代表（团参谋长）和聚丰源老板张宗矩二人逃走外，其余团总张东郊等全部被俘，缴枪数支，还没收了一部分现款、大烟土，第二天转移到吴堡县樊家疙塔一带休整。高长久同志按特委决定，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四日将抗日义勇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队长为薛俊山，政委为马丕勋，经济员兼支部书记为刘子仪。当时支队有二十余人，长短枪十四、五支，经过休整和训练，发展了新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加强了党的领导。三月六日晚，二次进袭木头峪，镇压了团总张东郊的老婆和坏分子，号召

群众组织起来打倒国民党，帮助红军，参加红军，建立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此后，党在佳、吴地区的活动由秘密逐步走向公开。佳县南区、吴堡全县、米东、绥东大片地区的群众革命斗争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四支队二次进袭木头峪后，转移到绥、清地区活动，三月上旬协同二支队和四百余名赤卫队袭击清涧县店子沟李成善民团。因杨璞（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政治特派员）被捕（以后叛变），提前两天行动，歼敌大部，缴枪十余支。

## 五、粉碎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

### （一）国民党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实行第一次“围剿”

在一九三三年六月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安定、延川地区，绥德、清涧地区，神木、府谷地区，佳县、吴堡等地区，广泛地开展了抗粮、抗税、抗租、抗债、抗捐斗争和游击战争，创造了游击根据地。在游击根据地的广大乡村，推翻了国民党、地主豪绅的统治，普遍建立了贫农会、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财物，废除了粮、租、捐、税、债，并对城市实行粮食封锁，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和威胁。

陕北军阀井岳秀八十六师及各县民团共一万五千余

人，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于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组织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围剿”的中心在安定、绥清、佳吴、神府地区。敌人以连排为单位，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在根据地烧杀抢劫，捕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破坏群众革命组织，企图消灭游击队，摧毁游击根据地。

## **(二) 胜利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围剿”， 扩大了红军游击队和陕北根据地**

陕北特委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号召游击区的贫农会、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在军事上诱敌深入，适时集中力量配合赤卫队、游击小组各个歼灭敌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

“围剿”绥德、清涧、安定地区的敌军、民团，活动十分嚣张，白天以连排分散活动，夜间集中于较大的村镇据守，对麦收影响很大。为了打击敌人，保护麦收，六月特委将四支队从佳、吴调到绥、清地区，配合游击小组、赤卫队实行坚壁清野，各村巡逻放哨，封锁敌人；组织土枪、土炮、“响鞭队”，各山头设置岗哨，组织成“无线电话网”，监视敌人。四支队和游击小组、赤卫队白天保护群众进行麦收，夜晚袭扰敌人，并在绥德县韩家山等地伏击了敌人，使敌人十分疲惫和恐慌。历时一个多月，胜利完成了保卫麦收的任务。

八月中旬，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

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等同志，率领二十六军红三团（约三百人，团长为王世泰，政委为黄罗斌）及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返回陕北根据地。八月十七日首战安定县西区金吴塌，歼敌八十六师一个连，缴枪百余支，俘敌八十余人。继续东进，经过南沟岔、老君殿，于八月二十二日在清涧县张家疙台歼敌八十六师某连的两个排，缴枪四十余支，残部逃往薛家峁。我军乘胜向东南前进，经下武村、白家川，于八月二十六日奔袭河口镇，将守敌八十六师五一五团三营十一连及民团共一百五、六十人击溃，歼敌一部分，其余敌人放弃据点逃回清涧县城。我军转向西北至横山董家寺，击溃敌军一个营。经过这些战斗，拔掉三个据点，歼敌二百余人，俘敌百余名，缴获步枪、驳壳枪一百六七十支。在胜利的形势下，白军中不断发生哗变与起义。在神府、佳吴地区，由于红三团三、四支队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斗争，至此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不幸的是，陕甘、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谢子长同志在河口战斗中负伤。

粉碎第一次“围剿”之后，谢子长同志带伤坚持工作，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清涧县东区惠（“惠”，读“四”）焉里参加了陕北特委会议。会议号召陕北军民积极扩大红军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动员准备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并决定组建府谷七支队，支队长为韩峰；组建延川第九支队，支队长为高朗亭，政委为王文良，副支队长为王保民。会后，红二十六军三团返回陕甘革命根据地。一、二、五支队仍回安定、绥德、清涧、延川地区活动，

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扩大红军游击队，扩大游击根据地。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是一九三四年八月、陕北特委在清涧县东区惠焉里会议后开始的。首先在清涧县东区袁家沟试分土地，试建革命委员会。经过短期集训和试分试建，取得了一些经验，培训了一批干部。接着，特委组成工作组分赴各县基本区，进行分配土地和建立乡、区、县革命委员会。到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各县基本区的土地已基本分配完毕，并开始了查田运动。革命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获得了土地之后，踊跃参军，新建立了靖边十支队、安塞十一支队、绥德十二支队、安定十三支队、米东十四支队、米西十五支队、横山十六支队、府谷骑兵游击队等。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特委在安定县西崖窑畔将一支队扩编为红一团，共有百余人，团长为贺晋年，政委为马丕勋，参谋长为路文昌。十月底，在清涧县马安山将二支队扩编为红二团，共三百余人，团长为任山、政委为马万里、参谋长为马山（惠世良）。九月十八日，在神木县王家庄将神、府三支队扩编为红三团，团长为王兆相，政委为杨文模。佳、吴四支队编为红四团，团长为王士杰、政委为王国昌、参谋长为范文德。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李启贤同志根据吴堡县委书记慕生忠同志的指示，领导王子崇保安队中的二十七名士兵起义，进入游击区，和绥德县东区义合镇的起义士兵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五支队，支队长为李启贤、政委为慕生忠。一九三五年农历正月初六，吴堡县慕

家原驻军张得胜同志领导白军一排起义；初八，石堆山驻军杨××同志领导白军十五人起义，先后参加了十五支队。十五支队人枪扩大到八十余人，并有了轻机枪一挺。正月十二日，在佳县下焉村和六支队合编为红五团。副团长为李启贤、政委为慕生忠。不久，红五团到清涧和红四团合编为红三团，团长为王士杰，政委为王国昌，教练为李启贤，归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建制。原红五团政委慕生忠率新编六支队回佳、吴地区活动。一九三五年二月，地委将四、五、六支队，十四、十五支队编为二纵队，队长为岳山，政委为慕生忠，以后编为战斗团，最后编为红二十八军的一个团。以上扩编团的各支队，都重新组织了游击队。

至一九三四年底，陕北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二十六个支队，分布在陕北各县，具体活动地区是：

第一、十三支队，在安定地区。

第二、五、十二支队，在绥、清地区。

第三、七、十一、十七支队，在神、府地区。

第四、六支队，在佳、吴地区。

第十四支队，在米东地区，十五、二十三支队，在米西地区。

第十五支队，在佳西、米东地区，二十一支队，在佳、米、榆边界地区。

第九、十七支队，在延川地区。

第八、十六支队，在横山地区。

第十、十五支队，在靖边地区。

第十一支队，在安塞地区。

第十八支队，在延安地区。

第十九支队，在延长地区。

第二十支队，在宜川地区。

第二十二支队，是蒙古骑兵游击队，队长为曹动之，在内蒙地区活动。

以上各支队的番号，只编到二十三，其中有两个十一支队，三个十五支队，两个十七支队，实有二十七支队。

一九三五年五、六月，吴堡曾组建三个晋西游击队，共十七人，九支枪，由慕生忠同志负责，于五月初十由军渡以南过黄河到吕梁山，在中阳、孝义、汾阳、离石一带山中活动。因没有找到党的关系，没有群众基础，在敌人六个团的兵力搜剿中，于六月初二日由孟门镇回陕北苏区。

红军游击队的迅猛发展和壮大，使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各级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也迅速地普遍建立起来。

一九三四年的八月，在李家岔成立安定县（曾称赤源县，现称子长县）临时革命委员会。九月十二日，在袁家沟成立清涧县临时革命委员会。九月在宋家坡成立吴堡县临时革命委员会。九月十八日，在神木王家庄成立神、府临时革命委员会（管辖神木、府谷两县）。十月在贺家沟（可能是脖牛沟）成立佳县临时革命委员会……。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了

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称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当时称苏维埃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百余人，大会开了三天，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选举马明方为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为副主席。省苏维埃设有：

秘书处：秘书长为惠子明，秘书为张毅忱、吴居第；

土地部：辛兰亭、王海山先后为部长；

粮食部：高旭光任部长；

劳动部：齐明珍、马生海先后任部长；

财经部：艾楚南任部长；

经济部：惠子明任部长；

文教部：陈蓬飞任部长；

保卫局：刘子仪、崔正冉任副局长；

贸易局：负责人白树标。

开始，省苏维埃土地、粮食、劳动、财经、文教等都是委员会，不久改为部。

大会通过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法、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令。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管辖的十七个县是：安定、秀延、绥德、清涧、吴堡、佳县、米东、米西（即将米脂县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县）、延川、延水、延长、安塞、靖边、横山、神木、府谷、佳芦。



## 六、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 “围剿”，陕北与陕甘 根据地联成一片

### (一)敌高桂滋部开进陕北，对陕北 根据地实行第二次“围剿”

敌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陕北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有了迅猛的发展，对敌人的威胁更大了。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国民党蒋介石增调兵力，调整部署，组织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将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从河南调进陕北，接收八十六师井岳秀在绥德、清涧、延长、延川、子长（安定）、子洲（由绥德、米脂、子长三县辖区新划）、安塞、延安等县的防务。原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缩小防区，分布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两线，驻于府谷、神木、榆林、米脂、佳县、横山、靖边、定边、保安（志丹）等县。南面有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分驻甘泉、富县、洛川及其以南地区。东边调晋军孙楚的三十三军和李生达的十九军各一个师，驻吴堡、宋家川、枣林坪、定仙焉，界首之线。调傅作义一个骑兵师，集结于府谷至横山沿长城一线。共计敌军六个师，加各县民团地方武装共五、六万人。

高桂滋在接防中向蒋介石报捷：“一弹未发，赤匪已平”。接防后深入根据地，分割“围剿”，各个击破，合并

村庄，建立据点，修寨筑堡，并加强地主武装民团、还乡团，建立剿共义勇队，进行抢劫烧杀，在政治上进行反共宣传，推行保甲制度，建立肃反会，实行连坐法，破坏我党、团和群众组织，实行自首、策反政策，妄图摧毁游击根据地 and 消灭陕北游击队。

## (二)我八十四师三战三捷，揭开了 反二次“围剿”斗争的序幕

为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陕北特委领导机关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由清涧地区转移到安定地区。各县游击队于十一、十二月间带领突击队、赤卫队，配合群众斗争，实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分散敌人。与此同时，特委将较有战斗力的一、二、三支队整编为三个团（红一、二、三团），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日在安定西区白庙岔成立了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为杨琪，政委为张达志（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成立红十五军团时改为八十一师，师长为贺晋年，政委仍为张达志）。八十四师成立后，首先集中红一、二团（三团在神、府未集中）和几支游击队，共计七百余人，枪三百余支（一、二团五百余人，游击队百余人），在广大赤卫队的配合下，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首战南沟岔，歼灭自老君殿出来“进剿”根据地的高桂滋部一个连，并将老君殿的援兵击溃。接着，乘胜东进，于清涧县东阎王砭消灭高桂滋部一个连的大部（系高杰村据点出来之敌）。在清涧县城南贺家湾歼敌高桂滋部一个连和民团邱树楷一个队。连续三次战斗，歼敌两个连一个排，民

团一个队，缴获轻机枪八挺、步枪一百六七十支，俘敌官兵百余名，揭开了反二次“围剿”斗争的序幕。

### **(三)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陕北、陕甘根据地联成一片**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陕甘特委和陕北特委在陕北安定县周家硷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决定：

(1)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个特委的工作。

(2)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为谢子长（谢养伤未到职，实际工作由副主席刘志丹负责。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谢子长同志因伤逝世，陕北革命根据地失去了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领袖和智勇双全的军事领导人），统一领导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红军地方武装。

(3)通过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这就是集中主力红军，坚决打击和消灭深入苏区的敌军高桂滋八十四师；对其他各师采取游击袭扰、在有利条件下则加以歼灭的方针。

西北革命军委成立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陕甘、陕北两个特委联席会议的精神，由刘志丹同志亲自起草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号召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以及边区全体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敌人二次“围剿”而英勇奋斗。同时，调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三团及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和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军委直接指挥，集中作战。陕甘苏区组

建陕甘军分会，主席为刘景范，统管南梁、照金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及军事建设。陕北苏区组建陕北军分会，主席为马义，在绥、清根据地办公，统管绥、清、佳、吴地区各县游击队地方武装和军事建设。陕北各县红军游击队，分别组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等七个游击纵队，它们的共同任务是组织发动群众，分配土地，扩大群众武装，扩大根据地；领导群众进行坚壁清野，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具体部署是：

第一纵队，以米脂西区、横山南区为根据地向东北方向神、府地区发展。

第二、五纵队，坚持绥德、清涧、佳县、吴堡根据地的斗争，沿黄河西岸向北面的神府地区发展。

第三纵队，依托吴旗地区根据地，向定边城、安边以北的长城外发展。

第四纵队，依托安塞北区根据地，向延河南岸发展，完成对延安、安塞县城的包围态势。

第六纵队，依托黄河西岸的绥、清、延根据地，相机东渡黄河，袭扰晋军，组织秘密据点、联络站，为开辟根据地创造条件，同时向驻定仙焉、枣林坪之晋军据点袭扰，或伏击其往来分队。

第七纵队，依托延川东南区、延长北区根据地，向延长南区、宜川方向开辟根据地，对延长、宜川县城形成包围态势。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为杨森、政委为张秀山，

红十五军团成立时改为七十八师) 红三团 (三百余人)、义勇军 (二百余人), 共计五、六百人, 于四月下旬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四月二十二日第一仗打安定西北之寺儿畔, 歼敌八十六师一个连。五月一日在白庙岔和陕北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主力会师。五月四日在玉家湾成立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部, 刘志丹同志任总指挥, 统一指挥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作战。五月七日至九日于杨家园子、吴家寨子、马家坪子先后歼敌高桂滋部两个营一个连, 缴获大量现款、武器、弹药、医药、服装等物资。安定、永坪之敌立即撤回瓦窑堡集中防守。我军继续东进, 五月二十五日在清涧县张家疙台, 歼敌高桂滋部一个连后佯言北上, 实行挥师南下, 奔袭延长, 五月二十九日攻占延长县, 歼敌高桂滋守军骑兵一个连, 人马各一百八十余, 和李鸣武民团三百余人, 缴获各种枪五百余支、战马一百八十余匹和大批财物、被服。另有延川民团高鸣歧五十余人起义, 编入红八十四师。延川守敌夤夜逃往清涧。我军又转向西南挺进, 经临真镇从甘泉县南绕过, 折而北上。六月十三日攻克安塞 (新乐寨)、高桥镇。六月二十二日攻克李家塌, 先后歼敌薛生花等民团六百余人。我军继续北上, 六月二十八日攻克靖边, 歼敌八十六师一个加强营 (曲子朋一个营, 加机炮连), 毙伤俘敌五百余名, 缴枪五百余支, 八二迫击炮六门, 及大量弹药物资。保安之敌向宁条梁方向逃去。我军又返回苏区东进。七月十七日于老君殿以西击溃高桂滋部四个营 (艾捷三团及张庭芳一个骑兵营)。此次战斗歼敌约一个营, 击伤敌团长艾捷,

其主力向老君殿溃退。我军继续东进，八月十一日全歼吴堡慕家源晋军一个连，十二日击溃晋军两路援兵，共歼敌四个连（此次战斗我军伤亡百余人，王世泰同志亦负伤）。我军随即南下，八月二十日围困定仙焉，歼敌晋军李生达援兵两个团，毙伤敌副团长齐汝英以下二百余人，俘敌一千八百余人，缴获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五十余挺，八二迫击炮六门和大量枪支弹药物资（是役在绥德县铁箴坪缴获飞机一架，活抓驾驶员两名）。至此，二次“围剿”宣告彻底粉碎。我军主力撤至延川县文安驿休整。九月十一日北上奔袭横山，未克。九月十五日返回永坪，与红二十五军会师。

经过八个月的反“围剿”斗争，共歼敌正规军折合四个团，数个民团（九百人左右），击溃敌军两旅另四个营，缴获轻重机枪百余挺，步枪四千九百八十支，子弹三十余万发，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又有很大的扩大，崔曙光、谭生彬、郝志德、常德义等同志，在延长、延安、延川、宜川等县建立了新的游击队和游击区，使陕北根据地除神、府地区尚未直接联系起来之外，各县广大苏区完全连成了一片，红军扩大了一倍多，游击队扩大了两倍多；解放了安定（子长）、延川、延长、安塞、保安（志丹）、靖边六个县，使陕北与陕甘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 七、毛主席亲临前线指挥， 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 第三次“围剿”

### (一) 东北军北进陕北，对陕北 根据地实行第三次“围剿”

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后，高桂滋惊慌失措，急电蒋介石：“防广兵单，防不胜防，若不增兵，陕北将成第二江西也”。蒋介石为了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迅速在河南举行洛阳会议，决定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除原有部队外，增调东北军两个军七个师为主力。具体部署是：东面，沿黄河之线为晋军孙楚的三十三军和李生达的十九军的各一个师；北面，仍是敌八十四师高桂滋和八十六师井岳秀两个师；西北面，宁夏交界是敌十五路军马洪逵三个骑兵团；西南面是东北军五十七军四个师和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三个骑兵师另一个骑兵团，还有三十五师马洪宾部一〇八旅；南面，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三个师和原来的四十二师冯钦哉、七十一师×××；兰州、平凉地区，蒋军嫡系毛炳文和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用在第一线兵力共十五万人左右。

东北军两个军（七个师），从西、南两路向陕北根据地挺进。南路由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领一一〇师、一二九

师、一〇七师共三个师北进。西路由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带四个师由甘肃经庆阳、合水从西向东挺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 （二）成立红十五军团，痛击来犯之敌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后，为了统一指挥作战，迅速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于九月十八日在延川县永坪镇正式成立（二十五军三千多人，二十六军二千五百多人，二十七军下辖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三个师，二千多人，共七千五百多人）。徐海东、刘志丹同志分任正副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委。陕甘边区之义勇军改编为西北义勇军，司令为郭宝山，主任为马丕勋，归七十八师指挥。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立即开赴南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九月下旬采取了围城打援战术，以八十一师（原八十四师）之二四三团围困甘泉约十华里的东西两山，截堵敌人前进，不惜一切代价顶住，不让敌人接近甘泉。七十五师埋伏在劳山以西，七十八师（原四十二师）埋伏劳山、甘泉之间，诱敌一一〇师由延安来援，聚而歼之。十月一日，敌一一〇师果进入我伏击区，下午二时许发起冲击，经六小时的激战，该师援兵全部被歼，毙敌师长何立中以下千余人，伤敌近两千人，俘敌三千七百多人，缴获七五山炮四门，八二迫击炮二十四门，重机枪二十四挺，轻机枪一百八十挺左右，长短枪五千支左右，无线电台四部。红四十二师另一路于阳泉歼敌一〇七师一个营；十月十二



日，继劳山之胜利，强攻榆林桥，歼敌一〇七师四个营，俘团长高福源以下官兵一千八百余人（我伤亡二百余人）。王以哲部经我连续几次痛击以后，即固守据点不敢出扰。西路董英斌尚未受挫，先后由庆阳、合水继续东进。为了歼灭东进之敌，开辟战场，肃清了杨家园子、张村驿，东村寨、套筒四个民团“围寨”，缴枪三百余支。

### **（三）红一、十五两个军团会师，彻底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

十月十九日，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边沿之吴旗镇（今吴旗县），二十一日歼敌国民党骑兵一个团，击溃三个团，俘虏六七百人，缴获战马千余匹。十月下旬到达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毛主席问清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情况后，决定迅速消灭西路之敌董英斌部。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员亲临战场指挥，红一、十五两个军团于直罗镇南北夹击敌人，协同作战，经一昼夜激战，歼敌董英斌一〇九师全部（师长牛元峰被打死）、一〇六师一个团，使西路之敌慌忙向来路溃退。国民党蒋介石向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至此被我彻底粉碎。

随后，红十五军团（缺七十八师）又向东逼近富县和洛川地区，相继攻克鸡子溪、牛武镇、殷县子、温和驿、相士杰等敌民团据点（围子），消灭民团二百余人，并在洛川县城东打垮东北军一个团，将敌一〇五师压缩在富县和洛川城内。同时派七十八师北上，和红二十八军组成北路

军，由总指挥刘志丹、政委宋任穷指挥，在横山、米脂、榆林地区作战，肃清北线出扰之敌。

#### **（四）陕甘、陕北和关中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建设巩固的抗日前进阵地**

经过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个大胜仗，歼敌正规军两个师、一个团另五个营，民团数百人，将陕甘、陕北和关中革命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成为巩固的抗日前进阵地。

党中央、毛主席进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瓦窑堡后，首先纠正了错误的肃反，为刘志丹等同志的冤案平了反，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不久，中央把陕甘和陕北两个特委改为陕甘和陕北两个省委。陕甘省委书记为朱理治，以后为李富春。陕西省委书记为郭洪涛。关中划为特区，书记为习仲勋。神、府也划为特区，杨和亭、张秀山先后任书记。

政府方面，十一月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统一领导陕甘、陕北苏维埃政府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的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设八个部、一个局：

秦邦宪（博古）同志任西北办事处主任兼外交部长；  
林伯渠同志任财政部长；  
邓发同志任粮食部长；  
王观澜同志任土地部长；  
毛泽民同志任经济部长，崔田民同志任副部长（当时

在红十五军团二十六军七十八师任师政委，未到职)；

徐特立同志任教育部长；

蔡树藩同志任司法内政部长；

王振珣同志任劳动部长；

罗梓铭同志任工农检查局局长。

军事方面，设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周恩来同志兼主席，聂洪钧同志兼副主席，张云逸同志兼参谋长，统一领导陕甘、陕北地方武装，扩大红军工作（陕北地区四十天扩大红军八千余人）。十一月下旬将陕北地方游击队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纵队，独立三团战斗团，升级扩编为红二十八，三十军。将陕甘游击队第二、三纵队、抗日义勇军扩编为红二十九军。红二十八军军长为刘志丹，后为宋时轮，政委为宋任穷。二十九军第一任军长为肖劲光，第二任军长为谢嵩，第三任军长为李仲英，政委为甘渭汉。三十军军长为阎洪彦，政委为蔡树藩。关中特区编为关中独立师，师长为白子文，政委为×××。神府特区编成神、府独立师，师长为王兆相，政委为张秀山，参谋长为李治洲，政治部主任为王国昌。

## 八、几点经验教训

### **(一) 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 建立红军、游击队**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陕北广大劳苦群众在党的领导

下，从抗粮、抗税、抗捐、抗租、抗债等日常的经济斗争到逐步开展政治斗争而发展起来的。组织了游击队，开展了游击战争，成立了红军，进行反“围剿”的斗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政权，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解放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领袖在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根据地绝不是任何个人创造的。实践证明，不搞武装斗争，没有红军、游击队，要建立、发展、巩固革命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 **（二）红军、游击队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

陕北革命根据地从游击队秘密活动到二十七军八十一师成立的实践证明，必须有党的正确领导，红军才能胜利地发展壮大；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或党的领导薄弱、不正确，就要失败。例如，第一支队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这段时间里，由于部队成员复杂，没有党的领导或党的领导薄弱，部队遭受过不少挫折。贺晋年同志担任政委后，加强了党的领导，部队就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第二、三、四、五支队以及各游击支队，一开始就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斗争就比较顺利。

## **（三）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贯彻执行 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相结合的作战 方针，进行人民战争**

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是在广泛的群众性的基础上进行的。游击队开始行动，就有赤卫队和广大群众参加，如

佳、吴地区袭击木头峪民团，绥、清地区袭击店子沟民团，一、二、五支队打安定县城。以后几次反“围剿”的作战行动，都是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相结合的人民战争，不是红军孤军作战。谢子长同志非常注意培养部队的主力 and 骨干，他回陕北不久，就把一、二、五支队集中行动，培养战斗骨干。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从一九三四年九月开始，相继组成红一、二、三、四团，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成立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即以后之八十一师），成为陕北苏区红军的主力。各县游击队就是地方武装（有的县有二到三个游击队），各村赤卫队就是民兵。事实证明，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不贯彻主力红军、各县游击队和广大赤卫队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方针，光靠主力红军孤军作战，是不可能的。

#### **（四）建立革命根据地最重要的条件是必须贯彻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陕北红军、游击队的产生和胜利发展，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健全，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形成和日益扩大、巩固，军政、军民关系的密切，党、政、军、民的团结一致，英勇对敌斗争，都是在陕北特委领导之下进行的。一九三三年六月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开展陕北革命游击战争，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于一九三三年冬先后派谢子长、郭洪涛等一批同志到陕北工作，加强了陕北特委的领导。一九三四年一月，陕北特委南洼村会议，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北方代表批评

陕北特委有富农路线的错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错误的；但是对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是正确的，促进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一九三四年四月，陕北党、团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的联席会议和五月的王家畔会议，总结和交流了一九三三年六月扩大会议以来发展群众组织，建立游击队、游击小组、突击队等方面的经验，并决定推广这些经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四年九月，陕北特委在清涧县惠焉里的会议上，决定成立红一、二、三团，组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试分土地，试建县革命委员会，筹建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五年二月，陕甘特委、陕北特委在陕北子长县周家硷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个特委的工作，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及两个边区的武装作战。历史证明，陕北特委当时执行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同时必须承认，陕北革命根据地能够迅速粉碎敌人的几次“围剿”，顺利地发展，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五军、中央红军适时到达陕北苏区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后，立即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首先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主要负责同志，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必须接受这个历史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 回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 建立的前后

马 辉 之

一九三五年，华北广大地区事实上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华北各阶层人民迫切要求抗日。平津学生在我党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五年底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但是，在当时北方党的领导机关中，历次“左”倾错误的影响还相当严重，使党的工作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一九三六年春天，刘少奇同志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后，切实纠正了北方党内的“左”倾错误，模范地贯彻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使华北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出现了新局面。

在北方局和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中共河北省委经过长时间的布置和准备，于一九三八年七月间，在八路军宋(时轮)、邓(华)四纵队的配合下，胜利地发动了有名的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又称冀东暴动）。这一斗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冀东地区的反动统治，扩大了我党我军在敌人后方的政治影响，为其后在平西、

冀东、平北广大地区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漫长的抗日战争年代里，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和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奋斗，作为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回顾这一段斗争的历史，使我们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根本保证。历史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 一、党中央关于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

冀东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北据长城，南濒渤海，西控平、津，东临山海关，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要道。塘沽是中国的重要海港之一，并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这里的物产丰富，有开滦的煤，塘沽的盐，遵化、迁安的金矿，还有广大的植棉区和产粮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早在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就千方百计地攫取了该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它的许多战略物资都是通过这里运往华北、华中、华南前线，并把从这些地区掠夺的资财运回日本。这里的党组织有悠久的斗争历史，有领导群众斗争的丰富经验。这里有久经



斗争锻炼的广大革命群众，又有较好的地形条件，南有平原，北有绵延千里的燕山山脉，可供回旋，有利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可见，在冀东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在冀东以及整个燕山山脉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抗战爆发后的国内形势，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主持制定了开辟华北敌后战场的具体计划。毛泽东同志以他的雄才大略和极其深远的战略眼光，明确地提出：“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作出了派八路军挺进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同时建立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冀热边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同志致电八路军前方总部，对此又作了具体指示：“以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且是独立作战之区域，派去干部应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党政领导人需要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应作好充分准备”。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再次论述了在燕山等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

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sup>①</sup>在敌人统治中心的华北敌后，以燕山山脉为中心，在冀东、平西、平北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是党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少奇同志主持北方局工作后，领导北方党组织为完成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实现党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九三六年四月间，少奇同志来到天津，任北方局书记。当时，党中央和北方局考虑到全国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毅然决定营救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的同志出狱。我是在这年九月出狱的。记得在十月间，党派我到天津参加北方局的工作。那时少奇同志在北平，北方局派驻天津的一个工作组（由彭真同志负责）领导天津市委、冀东特委和冀南特委。我到天津后和彭真同志接头，他叫我领导天津市委，介绍我到当时的市委书记李铁夫家接上头。当时李大章同志领导冀南特委，并负责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的工作。听彭真同志说，北方局在北平的成员中，除少奇同志外，还有柯庆施和老郑（即林枫同志）。一九三七年春，彭真和柯庆施对调：彭调北平，任北方局组织部长，柯调天津，负责工作组工作。自一九三六年以来，北方局给所属各级组织下达的党内指示和少奇同志发表在《火线》上的文章，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展农村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作了多次明确的指示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381页

和论述。一九三六年八月，北方局在给各级党部的一封指示信（题目是《华北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曾刊载于《火线》第六十期）中，就指示各级党组织：“我党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团聚与组织全民族一切抗日反汉奸的力量，来进行胜利的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战争”；“目前我党在农村中的任务，是准备力量进行广泛的抗日反汉奸的游击战争”。在这封信中，还总结了过去在冀、察、鲁许多游击运动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发动游击战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必须熟计整个抗日战争的形势，当地各方面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效，群众的决心，及地形、敌情与主观力量和领导的条件等”。洛川会议后，刘少奇同志在《为发动华北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而斗争》一文中明确指出：“在今天全华北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发动广大的反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北方局在给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因为游击战争已经成为华北全党的中心任务，所以你们必须抓紧这一点来布置工作。抗日游击战争在天津等城市是不能进行的，要在乡村中才能进行，因此，你们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乡村中去。”这些指示为我们工作重心的转移指明了方向，提高和统一了党内大多数同志对党的方针和策略的认识。

为了实现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刘少奇同志对冀东抗日武装起义作了具体的指示和部署。一九三七年春天，刘少奇和彭真、刘澜涛、高文华、李运昌等同志去延安参加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李运昌同志从延安回到天津后，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建立新的河北省委，由他任省委书记，我任组

织部长，李大章同志任宣传部长。运昌同志要我通知李大章来开个会，以便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由于在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河北党组织曾一度同从天津迁移到山西的北方局失去联系，运昌同志的到来使我很高兴。但是当时大章同志已经离开天津，经冀南到临汾向北方局汇报工作去了，会没开成。

九月间，李大章回到天津，向运昌和我传达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主要内容有：八路军已过黄河，正向太行山及北岳区进发，河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城市工作要短小精干，由公开、半公开的活动转入秘密工作，埋头苦干，积蓄力量，动员干部和群众去农村，并尽量去平津周围的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准备发动冀东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冀东不同于华北的其他地区，它是一个战略要地，又受敌人多年的统治，发动游击战争的任务将是很艰巨的，同时也有很多有利条件，冀东有我党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党组织有相当的基础，群众不堪忍受敌伪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有强烈的抗日要求，加之华北敌后我党我军已广泛行动起来，全国抗战正在开展，对冀东群众是很大的鼓舞和推动，因此，要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河北省委书记本来是由李运昌同志担任，北方局考虑到他是冀东人，比较熟悉情况，指定他去冀东组织抗日游击战争。李运昌同志走后，由马辉之任省委书记，吴德同志任组织部长，林铁任军事部长，姚依林任宣传部

长兼天津市委书记，李大章调北方局任秘书长。新的省委成立后，立即把工作重心转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方面，准备发动冀东抗日武装起义。

## 二、中共河北省委对冀东人民 抗日武装起义的准备

七七事变后，省委指导平、津市委一方面组织大批党员、学生向延安武汉撤退；另一方面又积极动员和派遣一批干部和民先队员奔赴农村，发动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时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在北平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中的党员，去争取赵同部坚持抗日，使这支队伍迅速扩大到数十人，其中通过我党派入的党员和民先队员占半数左右。在我党的推动下，这支队伍趁北平沦陷后日寇立足未稳，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以奇袭的动作打开北平第二监狱，营救了被关押的全部政治犯和普通犯七百人出狱，其中全体党员和大多数被救的非党群众，都参加了游击队，这支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上千人。党组织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改造这支武装，先后派去了上百名优秀党员干部和民先队员，如汪之力、史进前、张如三、王远音、焦若愚、贾嵩明、戴浩、苏梅、葛琛等等。一九三七年底，这支部队中的党员和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杨成武司令员取得联系。其后，接受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开到阜平整训，改编为八路军第五支队，赵同任司令员，高鹏任副司令员，汪之力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八年，部队开到宛平县斋堂一带活动。五月间，为配合宋、邓纵队挺进冀东，奉命袭击昌平、阳坊及石景山发电厂，曾于五月十三日收复昌平县城，同时抽调干部着手充实整顿地方政权和武装。赵同本是个野心家，他看到部队的政工干部和中、下级指挥员多为我党党员，极为不满，秘密同国民党拉上关系，带着其亲信二十余人投奔国民党顽固派去了。该部广大官兵在高鹏等率领下，改编为一分区杨成武所部之第三团，高被任命为一分区副司令员。河北省委还从天津派出刘建章同志到冀南南宫一带，争取了葛贵斋部地主武装数千人抗日，并配合八路军建立了冀南抗日根据地。此外，为争取团结敌后各地抗日武装坚持抗日和反汉奸的斗争，省委还派在北平的东北救亡总会的党员赵佐华同志去山东，利用他和某某的私人关系，争取其抗日。冀西、冀中、冀南等根据地的先后建立、巩固和发展，对冀东地区抗日武装起义起了直接的配合和推动作用。

省委先后派了不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到冀东去，深入农村、矿山，发动群众，做武装起义的组织与领导工作。除刘少奇同志直接指定的李运昌同志外，还有胡锡奎、周文彬、张克宇、李楚离、王仲华、赵观民等同志。为了充实起义的军事骨干力量，省委决定由林铁同志负责，在天津秘密开办了几期军事训练班，把经过训练的骨干输送到冀东斗争的第一线。另外，北方局派来的老红军干部李润民、孔庆桐等同志也经天津转往冀东。

在物质方面，省委通过朱其文同志从天津电报局搞到

几部电台送到冀东。七七事变后，北方局迁到山西临汾，河北省委通过谢普生同志（地下党员）与刘绍襄的统战关系，仍继续利用刘家里所设的秘密电台（刘少奇同志在平、津时就是使用该台和中央联系的）直接向北方局请示报告工作，北方局和中央的指示也是通过该台发来。直到一九三八年年初，省委从北平调来王士光同志，建立了自己的电台，才不使用刘家的电台（当时省委和冀东之间尚无电台联系）。记得那时和冀东联系的办法有：（一）冀东特委的重要报告由丁振军同志直接来省委口述，必要时运昌同志直接来省委商量；（二）通过宋敏之同志。当时宋家在天津意租界开的一个大商店就是省委的交通站，是一个专门和冀东联系的重要据点。（三）冀东特委专为干部往来省委设立了一条秘密交通线，经过白道子交通站（以茶馆为掩护）与省委进行联系。

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省委广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七七事变后，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华北各救”）改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当时该会主要专职负责人有我党党员李楚离、王仲华（原名董毓华，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锡奎、张洁清同志，李楚离为党组书记。另外，参加该会工作的还有许多名教授和社会名流，如杨秀峰、赵飞克、朱其文（均为我党党员）、杨十三、张申府同刘清扬、洪冲霄（洪麟阁）、高志远；还有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如蒋介石中央系的王若喜（天津电报局长），代表阎锡山系的张志岐（天津电话局长），代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宗

仁、白崇禧系的刘绍襄；还有我党领导下的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代表，如赵观民等。

为争取敌后各种抗日势力，扩大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自卫会”派王仲华到武汉国民党政府备案，以取得合法地位。备案的名称叫“华北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委员会。”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取消“抗日”两个字。王仲华同志不能决定，就去请示董必武同志（当时为我党驻武汉代表团的负责人）。董老当即指示：华北已被日本人占了，在那里搞自卫，对象自然是日本人，去掉“抗日”二字可以同意。于是就备了案，取得了合法地位。党通过“自卫会”广泛联系各个党派、各种武装和政治力量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并通过各种渠道派遣干部进入各党派、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武装力量中去，争取基层群众，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推动其上层分子坚持抗日立场。在“自卫会”天津总会的直接筹划下，成立了团结冀东各阶层抗日反汉奸自卫会冀东分会，冀东各县也相继成立了分会。经过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加入武装自卫会。据当时冀东党组织的负责人李运昌同志回忆，仅丰润、玉田、迁安（包括迁西）、遵化、昌黎、滦县、蓟县、乐亭等县的自卫会员即达一万五千人之多。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以后，在冀东党组织的领导下，冀东人民陆续开展了不同规模的抗日游击活动，打击汉奸、特务、日韩浪人，攻打敌伪税卡，收缴汉奸枪支。在斗争中，由于我们当时对执行争取伪军政人员的政策和开展武



装斗争的经验不足，特别是八路军尚未到达冀东，未能得到我军主力的支持与配合，这些斗争先后受到一些挫折，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但是，通过这些斗争，打击和镇压了汉奸、特务，锻炼了干部，教育了群众，为其后的抗日武装起义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省委还及时派干部深入开滦矿山，把矿工的罢工斗争引导到抗日武装斗争的轨道上来。由于日寇加紧侵华战争，开滦煤矿工人身受英日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生活日益恶化。在全国抗战和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作战的政治影响下，他们于一九三八年初展开了罢工斗争。唐山工委书记周文彬同志领导了这次罢工，党组织团结广大矿工，巧妙地利用了各种矛盾开展斗争，迫使英国资本家让步，取得了罢工的胜利。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工人罢工斗争夺取开滦煤矿的险恶阴谋，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发展了党的组织，锻炼和培养了斗争骨干，把不同帮会的工人团结在我党的领导之下，振奋了工人的抗日情绪。在罢工中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在其后的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中，以这支队伍为骨干在周文彬、节振国等同志的带领下参加了起义，工人群众先后参加起义者曾达三千余人。这支以工人为主体的抗日队伍，在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中发展壮大，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是深受冀东人民爱戴的勇敢善战的抗日武装。

一九三八年二月，刘少奇同志来电，指示省委派人到阜平去和聂荣臻司令员联系。省委即派楚离同志去阜平，向聂司令员汇报工作。聂司令员叫楚离转告省委：已遵照中

央指示，命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政治委员邓华同志率部抵平西活动，准备挺进冀东，配合抗日武装起义，要省委派人直接和邓华联系。省委根据聂司令员的意见又派楚离去平西，与邓华一起安排了八路军东进计划和武装起义的有关事项。考虑到充分利用青纱帐的有利时机，决定以七月十六日为起义的日期。省委还根据邓华的要求，派林铁同志随部队行动，并在省委和邓华部队间建立了直接联系。随后，省委以武装自卫会的名义，在天津召开会议，李楚离、李运昌、王仲华、朱其文和我都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国民党代表及知名人士王若喜、洪麟阁、高志远等，总计约四、五十人。在会上，我党干部对国民党顽固分子诽谤我党、破坏团结的谰言进行了严肃的批驳，团结争取了各方面抗日反汉奸的力量，对冀东抗日武装起义作了具体安排。

这样，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河北省委和冀东党组织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不仅在冀东广大农村和开滦矿山进行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而且在各阶层人民中广泛地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各种抗日反汉奸的力量团结在我党领导下的武装自卫会的周围，就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问题取得了各方面的一致赞同。我们认为，冀东武装起义的条件已逐渐成熟，会后我们把这些情况都及时向北方局作了汇报。

一九三八年四月间，刘少奇同志急电河北省委，命我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我于五月下旬到达延安。汇报由洛甫同志主持，刘少奇、张浩同志参加，康生也参加了。汇

报后，少奇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他说，起义的准备是好的。他强调指出：一定要看到，冀东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区，敌人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冀东不同于冀中、冀西、冀南。在冀东发动起义，不但要有充分的准备，还要有八路军的策应和其他根据地的密切配合，否则，即便发动起来，也难以巩固和坚持。中央已派邓华、宋时轮的部队挺进冀东，起义的时间要以八路军到达的时间为准，八路军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动。少奇同志还指示：起义后河北省委撤销，马辉之、姚依林到根据地去，接受晋察冀军区和分局的领导，负责地方党政工作。起义后，要以八路军为主，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为了团结友党友军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要在根据地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可请有影响又靠近我党的国民党员刘绍襄作政府主席。少奇同志还指出，冀东的民团、地主武装、保安队、警察部队等，其基层成分多为破产的农民，其上层人物中有的也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对他们要注意争取、教育和改造，以扩大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洛甫同志在会上作总结时，表示完全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会后，少奇同志命我尽快返回河北，贯彻上述指示。

我于五月底离开延安，绕道西安、武汉、广州、香港、上海回天津。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地扩大侵华战争，敌军锋芒直指武汉三镇，潼关铁桥遭到敌人炮击，只能晚上通行；开封、武汉、英德、广州等交通枢纽均遭到敌机狂轰滥炸；再加上国民党溃败中的散兵游勇和

乘机而起的汉奸、匪特到处骚扰，沿途铁路交通受阻，七月中旬才回到天津。姚依林同志对我说，由于原定冀东起义的时间被敌人发觉，武装起义已经提前发动。

我回到天津时，省委只有姚依林同志主持工作。我即向他谈了去延安汇报的情况，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他表示完全同意，并向我说明了冀东武装起义的情况。接着，省委立即贯彻中央的指示，要求冀东尽快成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建立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八月间，邓华、宋时轮以及冀东武装起义的领导人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等在遵化铁厂镇召开了有洪麟阁、杨十三等参加的会议，成立了我党领导下的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并推选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李钟奇任参谋长，李运昌、洪麟阁、高志远分别任副司令员。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力量接受宋时轮、邓华同志的统一指挥。

### 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历史，是在党中央和北方局领导下，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各党派武装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历史。参加起义的除基本群众外，还有地主、商人、乡保长、民团头目、国民党军政界人士以及社会名流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统一战线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国民党同我党争夺领导

权的斗争。省委在统战工作中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紧紧掌握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天津和国民党代表沈某的谈判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国民党被迫同我们联合抗战后，它只允许军队片面抗战，害怕人民组织起来抗日，想尽一切办法力图控制群众运动，对我党领导下的华北武装自卫会和参加冀东起义的武装力量，它都想加以控制。冀东抗日武装起义爆发后不久，武汉国民党政府即派沈某到天津活动，扬言他们在冀东的武装力量都被八路军“吃”掉了，无理要求李楚离向他汇报我党在华北的组织情况。对此，李楚离同志以武装自卫会负责人的身份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楚离去冀东后，在八月间，沈某找到谢普生，要求同八路军的代表谈判。我们打电报请示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复电指示：可以谈，但不以党和八路军的名义，而以第三者的名义去摸摸他们的底。省委根据上述指示，在姚依林同志家里作了研究，决定由我去和沈某见面。因为我很快就要去冀东，不影响地下党今后工作的安全；姚依林同志兼任天津市委书记，且又暂时留天津，不宜公开露面。

谈判是在王若喜家里进行的。谢普生同志和我一起到王家后，王为我们作了介绍：“这位是武汉来的沈先生；这位是吴先生（我当时化名姓吴）”，并说：“朋友之间，随便聊聊”。随后，我说：“听说沈先生有些意见需要向八路军转达，我可以帮忙”。不料，沈某一开始就盛气凌人，以质问和挑衅的口气对我说：“共产党讲国共合作，互相尊重，平等互助，团结抗日。可是我们在华北的很多武装都

由八路军加了委。我们在华北的组织也都告诉了共产党（指武装自卫会），而共产党却对我们保密，这岂不是言行不一，不讲信用吗？”他诬蔑我党和八路军破坏国共合作，没有团结抗日的诚意。对于沈某的恶毒攻击，我当即据理驳斥。我说：“据我所知，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同时也是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统辖和指挥的军队。它深入敌后，不惜牺牲，英勇抗战，功在国家，这是全国同胞有口皆碑的。而国民党军队采取不抵抗主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丧地失城，一溃千里，使大好河山沦于敌手。究竟谁个对抗日真心实意，全国人民是自有公论的。”我质问沈某：“散在华北的各种武装力量，基于民族义愤，坚持抗日，自愿接受八路军的委任和指挥，这有何不对？又怎么能说是被八路军吃掉了？至于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是经国民政府正式批准的机构，凡是爱国的各党各派、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或个人，参加华北武装自卫会，共图抗日救亡的大业，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哪个不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你自称代表国民政府，竟不顾事实，攻击友党，诬蔑八路军，究竟居心何在？”沈某被驳得哑口无言。我随即又对沈某说：“你们对共产党、八路军如果有意见，我可以转达。对这种无理的责难，恕我不能代转。”通过说理斗争，使沈某恶意攻击我党我军、破坏团结抗日的企图再次遭到了失败。同时，我们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又积极对刘绍襄进行工作。在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开始后，刘表示愿意到冀东参加抗日政权的工作。不久，就由朱其文陪同刘氏父女去了冀东。

#### 四、关于从冀东向平西转移的问题

我因去延安汇报冀东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走了两个月，回来时起义已提前举行，没赶上参加起义的直接发动和领导工作。根据党中央关于“起义后河北省委撤销”，要我和姚依林同志到根据地去的指示，我和李钟奇同志离开天津去冀东。李钟奇原是宋、邓四纵队的参谋长，在四海战斗中负伤，经组织安排，秘密送到天津治疗，那时伤势已好，要重返前线。姚依林暂留天津交代城市工作。我和李钟奇一行先到陈（群）苏（梅）支队的驻地丰润王官营，稍事停留后，就到邓华同志司令部的驻地遵化县大党峪，向邓华传达了在延安汇报时刘少奇同志的指示。邓华也向我介绍了四纵队挺进冀东及冀东武装起义的一些情况。

当时，冀东抗日武装起义的形势真是如火如荼，十分鼓舞人心。我八路军宋、邓部队于五月间奉命自平西出发，向总部指定地区前进。这支部队于六月上旬进入冀东，屡战告捷，扩大了政治影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八路军四纵队挺进冀东的有力配合下，从七月上旬开始，起义的风暴很快就席卷了整个冀东地区，参加起义的工农群众如潮水般地涌来。一些有民族意识的国民党势力、地主武装（民团）、伪政权下的保安队和警察等武装也先后参加了起义。部队迅速发展，抗日武装达十万之众。起义部队先后一度攻克卢龙、玉田、乐亭、蓟县等县城，占领了冀

东大部分村镇，使北宁路半个月不能通车，迫使敌人龟缩在各个据点里，死守待援。我军声威大振，极大地激发了冀东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热情。人民群众自动帮助我军烧水、做饭、送信、散发传单、标语、救护伤员、侦察敌情。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军英勇作战，在很短时间内，就摧毁了敌伪在冀东多年经营的反动统治基础。八月中旬，宋、邓四纵队和起义部队在遵化铁厂镇会师，成立了统一的指挥机构。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向冀东发了贺电，贺电说：“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今以十万分的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贺电指出，这一胜利，“已给日寇以严重打击，摧毁了冀东的汉奸政权，发动了广大民众，配合了全国的抗战”。

起义后，我们也遇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的确面临着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武装起义中，各地区党组织的成员，满怀抗日的激情，纷纷涌入起义部队，成为部队的各级骨干力量。部队的数量十分庞大，而地方上则基层空虚，这种情况实出于我们事先的意料。在敌伪的县、区、村政权被我摧毁后，对于迅速建立各级政权和党群组织的问题，我们不仅没有经验，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起义部队有的领导同志感到部队需要骨干，抽不出人来搞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我们这些做党的工作的同志，也未能及时有效地说服和组织一部分同志去加强地方工作。虽然也委任了少数县长，建立了一些县的游击队，但总的来看，县、区、村的党、政权和群众组织却未能迅速、普遍地建立起来。这样，就使起义部队失去了地方党



和群众的坚强的组织依靠。起义部队也未能建立自己的后勤供给制度，一切供应主要由各村进行摊派，群众负担重，浪费大。

在武装力量方面，据邓华同志说，八路军主力部队一直处在连续行军作战的环境中，部队很少有时间进行休整，抽不出干部进行地方工作，弹药消耗大，得不到必要的补充。由于部队伤亡的大都是干部和老战士，部队多为参军不久的新战士，在无根据地休整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处境困难。在我党领导下起义后新组建的部队，虽然成份较好，斗志旺盛，但缺乏政治训练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其他参加起义的武装，成份复杂，纪律松弛，虽经宋、邓加委，还未及进行很好的整顿和改造，其中有的甚至打着抗日游击队的旗号，骚扰群众，事实上难以实施统一指挥。因此，部队急需进行整顿。同时，由于我军在冀东的积极行动和民众抗日情绪的高潮，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严重注意，先后调动了大批的日、伪军部队对遵化、玉田、兴隆地区形成大包围的态势。当时，伪满部队通过喜峰口一线向我进击；唐山等地的日军也已出动。他们采用步步推进的战术，企图聚歼我军于遵化地区。当时，冀东平原的“青纱帐”正在割去，部队失去了隐蔽的屏障，而且热河山地人烟稀少，部队给养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宋时轮、邓华同志认为，大兵团在冀东活动和整训都是困难的，就决定将部队转移至平西整训，并打电报请示了晋察冀军区。在我到达邓华司令部的驻地时，只有邓华带领一个大队集结待命，等待军区复电。我

因刚到冀东，对那里的情况尚未进行调查和分析，加之长期从事白区地下党工作，缺乏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工作经验。在向邓华同志转达中央关于在燕山山脉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后，只向邓华表示：“如果部队要转移，根据中央的指示，我和姚依林要留下来坚持冀东斗争”，对部队是否转移未表示肯定意见。邓华表示，如要部队留在冀东就地整训和坚持斗争，就须把已开走的主力部队调回来，至少要调回一个大队。这样，他就再次打电报请示军区。

十月八日，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来电说：“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在主力西转时，应配备必要的基干部队及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但省委主要干部如老马、胖子（指姚依林同志）等应随主力西进”。于是，邓华着手召集起义部队的负责人到铁厂镇开会，布置向平西转移。在部队向铁厂镇进发的途中，和从铁厂出来的日军遭遇（铁厂已被敌人占领），后改在丰润县九间房开会。会议由邓华主持。在会上，分析了形势并宣读了总部的电报。统一认识后，又召开各起义部队负责人的军事会议，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向平西转移。会议商定了各部队集结、行动的时间和路线，并决定留苏（梅）陈（群）支队在丰、滦、迁腰山附近活动；包森支队在遵化、兴隆一带活动；单德贵（此人后来叛变）支队在密云、平谷一带活动，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其余部队约五万人，分三个梯队向平西转移。宋时轮司令员派肖思明同志率队在潮白河侧后接应，待西进部队前进到

昌平地区时与宋时轮的部队会师，然后进入平西。转移途中，邓支纵队的先头部队过潮白河时遭到敌人的袭击。当时，行进中的参加起义的地方武装，大部分一闻枪声就往回走；其余部分在过永定河后，再次遭到伪反动村政权伙会武装的阻击，又散去了一些，最后，到达平西的起义部队只剩数千人。

关于向平西转移的问题，最近才从历史档案材料中看到，当时中央、总部及晋察冀军区有很多重要指示，一再强调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和创造冀热边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当时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只记得在西撤途中聂荣臻同志于十月十一日致电邓、宋，指示：“关于四纵队的行动，曾由军委总部数电指示，希望你们详加考虑，坚决执行”。当时部队正在西撤，难以停止前进。为此，十月十五日我和姚依林、邓华三人联名再次致电中央，建议“还是以西撤为有利”，并且提出：如在遵、玉、丰坚持，需要上级增派兵力，增调干部，补充弹药。十月十八日，中央和总部复电说：“十五日电悉。你们既已西进，请灵活执行我们十五日电示<sup>①</sup>，在冀热察边广大地区灵活转动游击。必要时转移一部分队伍到平绥路以南来”。

后来的斗争历史证明，只是由于我们把当时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对刚暴动起来的武装长途转移的种种困难估计不足，缺乏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信心，因此在九间房会议上作出大规模西撤的错误决定。在敌人的严重进攻面

---

<sup>①</sup> 中央十五日电，我们当时没有见到，在撰写本文时才在历史档案中查到。该电指示要“坚持冀热察边长期的艰苦奋斗，创造根据地”。

前，部队在西撤途中遭受很大损失，冀东武装起义的大好形势受到了严重挫折。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我作为会议的参加者之一是有责任的。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致前总及晋察冀军区的电报中，对宋、邓四纵队挺进冀东所取得的胜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严肃指明了向平西转移受挫折应吸取的教训。电报说：“邓、宋支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至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后来，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刘少奇同志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指出：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是一次很值得研究的人民抗日大起义。我们的同志在起义前作了很好的工作，那里的国民党组织及伪政权下差不多全部的保安队（七八个旅），县政府的武装，开滦矿山的工人，农民及许多地主资本家，都联合起来参加了起义。这是真正地发动了几十万群众来进行反对日寇汉奸的武装斗争，并在起义后立即组织了联合的领导起义的政权与军事指挥机关。然而这一次起义在不久以后即遭遇到敌人很严重的进攻，受到严重的挫折。只是到后来又用了很多的办法，方把冀东游击战争组织起来。”<sup>①</sup> 我认为少奇同志的这

<sup>①</sup> 《刘少奇选集》上卷 254—255 页。

个总结是非常正确和深刻的。

## 五、重新打开平西局面与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任务的提出

我们向平西转移，行进到昌平区马刨泉时，方知平西已被敌人占领。原先，宋、邓部队挺进冀东时留在平西的一个新兵团，因敌我力量悬殊，在敌人进攻时受到很大损失，其余部和留在平西的党政干部一起，已被迫向涞源方向转移了。原在平西活动、配合宋邓东进的五支队，在赵同叛变后，改编为晋察冀第三团，划归一分区杨成武指挥，这时也调离了平西。我们到平西时，那里已成为敌占区，县、区、村都建立了伪政权，连斋堂都建立了维持会，敌伪和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因此，我们一到平西，就立即投入了紧张频繁的战斗。先后收复宛平县的镇边城、军响、青白口、杜家庄、东斋堂、西斋堂、马栏、上清水、下清水等重要村镇，重新打开了局面。

为了站稳脚跟，巩固根据地，我们以八路军邓支队政治部的名义，委任了当地地下党员魏国元为宛平县长兼县委书记和县武装大队长。魏国元同志根据上级指示率领工作队和一部分武装深入基层，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起来锄奸反霸，并负责筹粮筹款，解决部队给养和动员群众参军等事宜。部队每到一村，我们即以政治部宣传队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推选基层积极分子，建立村政权和工、农、青、妇等抗日群众组织；组织民兵站

岗放哨，协助部队维持秩序；组织担架队，支援前线，救护伤员。经过三个月左右的艰苦斗争，到一九三九年一月底，除县城以外，大股敌伪和反动地主武装基本上被肃清，群众也初步发动起来。

这时，我们实际上已控制了东起长辛店，西至紫荆关，南起高碑店，北到蔚县、宣化、怀来、涿鹿的大片地区，和晋察冀一分区紧密相连。我们先后建立了宛平、涞水、宣涿怀（宣化、涿鹿、怀来）、房良（房山、良乡）、涞涿（涞水、涿县）共五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与此同时，我们开办了县、区、村基层干部短期训练班，进行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教育。就这样，我们在平西逐步建立了县、区、村各级政权和群众组织，并成立了专员公署。

一九三九年元旦前夕，晋察冀军区和晋察冀中央分局电示我和邓华同志到军区去开会。当时，邓华正在指挥部队打房山堂上村的一股反动地主武装，难以分身，由我一个人去了。会议是在平山蛟潭庄召开的，聂荣臻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传达了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和命令。他说：中央对宋、邓四纵队挺进冀东、配合武装起义的成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你们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平西根据地，坚持冀东和开辟平北的游击战争，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为实现上述任务，中央决定成立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分别受晋察冀军区和晋察冀中央分局领导，重要报告和重大问题的请示，同时要抄报中央和总部。在会上，聂荣臻同志宣布了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的领导人

员，由萧克同志任挺进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区党委由马辉之、姚依林、萧克等组成；平西专员公署受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区党委和挺进军负责领导冀东、平西、平北三个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热河、辽宁、察哈尔挺进。中央和总部的指示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拥护。我记得，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贺龙、彭真、关向应、萧克等同志。

会后，我陪同萧克同志到达平西，召开了全体党员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八路军总部、晋察冀中央分局及军区的指示和决定。全体干部一致认为，这是中央给予的光荣任务，是中央对我们的极大信任，表示完全拥护、坚决贯彻上级的指示和决定。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迅速建立了挺进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和随营学校等机构，配备了干部，并将原宋、邓四纵队先后改编为五个主力团。其他武装，如来平西整训的冀东高志远部抗日联军和随同主力转移到平西整训的蓟县、遵化游击队等武装，经过整训、补充、扩大后，先后回到了冀东，成为坚持冀东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只有原是地主、靠办民团起家的高志远，因其个人野心未得到满足，到达平西后，与涞涿县山坡区逃亡反动地主魏福昌勾结，阴谋率领他的部队叛变投敌。正当高通过魏与日伪军取得联系，秘密商谈投降条件时，被我发觉逮捕，经公审后处决。高的罪状公布后，正在整编的高部，人人拍手称快，连被他视为亲信的人，也与其划清界限，无一人逃亡。

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创建冀热察抗日根

根据地，是在党中央关于坚持整个华北敌后抗战的总的战略任务下，在冀热察地区的具体任务。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是这一任务的三个组成部分，它们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互相配合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平西的巩固，如果在它的周围特别是东北方面，没有广泛的游击战争的发展，没有平北、冀东斗争的密切配合，仅仅依靠平西内线的巩固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困难的。所以，开辟平北，坚持冀东，对平西的巩固有很大的意义。同样，开辟平北也需要平西的巩固与冀东的坚持。因为只有平西巩固了，才能直接派遣干部和武装到平北去；冀东坚持了游击战争，就能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平北的发展。同样，坚持冀东也必须与开辟平北、巩固平西相配合。平西是冀东游击战争的后方和直接支援者，平西的巩固，可使冀东在干部方面得到调济，军事上、政治上的直接援助和精神上的鼓励。平西的主力常派去支援冀东的游击战争，冀东的地方干部和部队必要时也来平西整训。至于平北与冀东的关系，也是很明显的。平西到冀东，冀东来平西，都要经过平北。平北开辟后，就可为平西和冀东间的联系创造便利条件，成为坚持冀东的战略依托点。平西紧靠晋察冀一分区，是区党委和挺进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冀热察整个地区的战略后方。为了使党政军民正确理解三个地区斗争的相互关系，深刻认识本地区斗争对创建冀热察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一九三九年秋末，区党委和挺进军把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给我们的任务概括为“三位一体”，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同志在其《挺进军“三位一体”的任务》的报告中，还曾



对此作过全面、深刻的论述。

## 六、巩固平西

平西位于北平的西面、平绥路之南、平汉路之西北，是晋察冀边区的东北屏障。在平西建立根据地，将直接威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北平，威胁平汉、平绥两条主要铁路线，牵制敌人的兵力，直接配合边区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和扩大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平西又是我军向冀东、热河、察哈尔、辽宁挺进的前进阵地。所以，巩固平西就成为三位一体任务的中心环节。

巩固平西，我们有很多有利条件：平西和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接壤，便于晋察冀军区和晋察冀中央分局的直接领导，能及时得到干部和物质、精神等方面的帮助，又可以得到冀中、北岳地区等根据地及时的配合；平西地形险要，敌人各技术兵种的行动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便于我军迂回作战；平西有我党的政治影响，早在抗日战争前，河北省委就曾派人来平西开辟工作，七七事变后，经过平西抗日游击队和宋、邓部队先后两次开辟工作，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为其后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平西也有不少困难：正因为它直接威胁敌人的统治中心和交通要道，所以敌人不断在它周围增兵，不断向它进攻、“扫荡”；同时，它因地瘠民贫，山多田少，物产不丰，人口有限，造成了长期难以解决的供求矛盾，这就相

对地限制了我们的发展。我们从冀东转移到平西，重新打开局面，恢复了平西根据地后，一九三九年三月，召开了冀热察党政军干部扩大会议。会议提出“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展冀热察游击战争”作为党的战略任务。我们开始执行这一任务时，曾集中力量准备向冀东发展。四月间，总部指示我们应把巩固和发展平西作为目前阶段的中心任务。

为巩固平西根据地，我们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一） 武装斗争和武装建设**

武装斗争和武装建设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一九三九年一月挺进军成立后，立即执行了为期四个月的突击扩军计划，扩大了主力三千人，并发展了游击队三千多人，成立了平西各县游击大队及房、涞、涿游击支队，边沿区还建立了游击小组，一年半后共发展到二万余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又进行了整军，把第十一支队及房、涞、涿游击支队改编为第六、第七两个团，把十二支队及平西游击队一部合编为第九团，抗日联军及平西游击队另一部合编为第十团，冀东过来的八百余人编为十二团，冀东包森支队编为第十三团。部队在整编后，一边战斗、一边进行了三、四个月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普遍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建立了各种制度，加强了党的工作，从而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和组织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整训后，六团去雁北，十团去平北，十二、十三团去冀东，平西只留下第七、九两个主力团。

平西的地方武装建设，主要是扩大和巩固县、区游击队。在已巩固地区不设区游击队，在反“扫荡”时，从民兵中抽出一部精干成分组成临时性区游击队；在工作有基础的村庄，建立村游击小组，由村党支部领导。游击队的任务是侦察敌情，打击汉奸、特务，掩护县、区、村干部开展游击区工作，战时还要配合主力破坏敌人交通。从一九三九年冬季反“扫荡”开始，敌人对平西不断进攻，战争频繁，主力有较大减员。为了充实主力，除直接动员扩军外，并从各县游击队中抽调骨干加强主力部队，因而相对地削弱了县游击队的巩固和战斗力。除游击队外，各县、区、村还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有的叫民兵自卫队、模范自卫队，有的叫青抗先。专署成立武装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的民兵工作。民兵的主要任务在平时是站岗放哨，检查行人，防止敌特活动，送信，替烈军属代耕等；在战时要带领群众坚壁清野，掩护群众转移，配合主力行动，抬担架，搞运输，埋地雷，侦察敌情，袭扰敌人。他们平时受各级政府武委会的领导，战时则受主力部队的统一指挥。

我们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启发广大伪军官兵的民族意识，大力对他们进行教育和争取工作。对顽固的、甘受日寇指使和我们作对的伪军，则给以坚决的军事打击。在平西周围约有四千伪军，都是本地的汉奸武装，经过斗争和争取，大都和我们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其中表现较好的还能暗中掩护我们工作，在敌人“扫荡”根据地时，他们有时也能事先通知我们，成为我们获得

敌人情报的渠道之一。当时敌人的行动我们差不多全知道。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之所以能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主要是依靠军民团结抗战，同时做好瓦解、争取敌军的工作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互相密切配合下，经过一九三九年六月和一九四〇年三月两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终于把平西建成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

## （二） 党的建设

早在七七事变前，平西就有党的组织。如老党员魏国元在宛平青白口，康纪元在镇边城，张苏、赵振中在蔚县西河营都进行过长时间的革命活动。平西抗日游击队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开辟了以宛平县山区的斋堂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后，积极帮助地方党开展工作。但在十二月间游击队开往阜平整训，地方工作的同志也随队去阜平后，地方工作受到一定影响。一九三八年三月，宋、邓部队先后到平西征服了地主武装的抵抗，站稳了脚跟，开辟了以宛平八区为中心的房涞涿、宣怀、昌宛的工作，并成立了三个联合县政府，各县组织了救国会。党的组织也成立了三个工作委员会，作了一些党的发展工作。一九三八年六月，宋、邓纵队挺进冀东，将派出在地方工作的人员带走，并吸收了一部分原地方工作人员参加部队。我们东进纵队从冀东回到平西上清水、下清水时，从山上下来和我们接头的只有三个党员。因此，晋察冀中央分局在一九四二年《关于三年来平西工作总结的决定》中曾指出：“平西根据地

的创造，实际上是从冀热察区党委由冀东回到平西后才开始”的。

我们从冀东回到平西后，在以武装斗争重新打开平西局面的同时，即着手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并大量发展党的组织。当时极大的困难是干部缺乏，工作也极不平衡。为此，冀热察区党委首先办了党校短训班（时间为一至三个月），以后平西地委及各县县委也都举办了定期或不定期的训练班，培训党员干部和平西新成立的县、区、村政权和群众组织的非党新干部。在培训时，从非党新干部中发现较好的积极分子，指定专人负责进行培养，待回到原单位后，由县、区工作队进一步考察和培养，够条件的就发展为党员。这样，通过对敌斗争和参加其他抗日工作的考验以及办训练班的办法，迅速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党员就发展到五百人左右。在中心区七十户以上的大村中，大都建立党支部，并逐步建立了县、区党委。在此基础上，一九三九年五月前后，成立了平西地委，统一领导平西各级党、政府和群众组织，他们对平西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党组织的发展是波浪式进行的，即在一定时期内积极发展新党员，建立各级组织，紧接着进行一个时期的巩固党组织的工作，然后在此基础上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在党组织大量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党内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不纯现象。虽然当时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贫农和雇农，他们身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抗日积极性，但他们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较低，有较浓厚的农民

意识，把自私自利、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带到党内来，对党的认识及组织观念较差。在当时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大量发展党组织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使一些投机分子、流氓分子及其他不良分子混入党内。另外，我们在组织工作中，对工人工作注意不够，对有一定民族意识的中农、知识分子、商人（他们有的在当地有一定威信）有关门主义倾向，等等。这表明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后，巩固党的任务的确严肃地摆在我们面前。

根据分局指示，一九三九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主要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年底分局组织工作会议后，根据会议精神，在一九四〇年一、二月间又继续布置进行巩固党的工作。

首先是组织上的整顿，对党员普遍进行登记和审查，由区党委统一发登记表，对党员的出身、历史、政治观念、斗争中的表现及对上级的意见等进行登记。然后，由上级党委逐级进行审查。采用会议的方式审查、鉴定每一党员的各个方面。清洗那些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对那些不起作用的挂名党员，区别情况采用不同方式予以除名；有的根本不予登记，即不再通知其参加组织活动；有的经过谈话，安排其参加“同情组”，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继续进一步的考察。经过普遍的登记和审查，平西共清洗一百五十余人，其中包括四个区级干部，提拔了一批优秀党员骨干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在一九四〇年上半年中，各支部普遍进行了改选，加强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量。

在组织整顿的同时，还普遍进行了思想整顿，各级党

组织都建立了学习制度，各县还通过学习《党员须知》，办支部小报等方式进行系统的党的知识的教育，提高了党员的觉悟。在巩固和发展中，党组织注意布置了党的秘密工作，安排支部及区级领导人不承担群众团体等公开工作，以准备在某些地区一旦变成游击区或敌占区时，依靠这些党员继续领导党的秘密工作。通过整顿，纯洁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战斗力，进一步从组织上思想上巩固了党。在巩固的基础上，党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到一九四一年底统计，平西五个县共有党员三千九百多人（包括地委直属支部的党员），共有二十七个区委，仅涞水、蔚县、房涞涿三个县就有一百九十四支部。

### （三）政权建设

平西专员公署及各级政府，都是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专署和县政府设民政、财政、粮秣、教育、司法等部门，后来又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公安机构。抗日民主政府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组织根据地人民的生产，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群众生活，保护群众利益，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动员人力、物力支援抗日游击战争，镇压敌特、汉奸活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政权在处理民事纠纷、刑事案件、汉奸特务案件中，在抚恤救济工作中，处处按党的政策秉公处理，深得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在巩固区，村政权为村行政委员会。有村长和管粮秣

的办事员，群众组织如武委会、农会、妇救会、青救会的主任也都参加村政权。村政权的主要工作是动员青年参军，筹集粮款，组织站岗放哨、送信、转运物资，拥军优属以及侦察汉奸活动等。

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在根据地创办了《挺进报》。抗日民主政府还创办了专区、县、区、村各级中、小学和夜校，普遍开展了扫盲识字运动，广泛进行党的抗日政策的宣传教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和文化水平。抗日民主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各阶层人民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以集中主要精力打击敌伪顽固势力。平西的封建帮会、宗教迷信活动非常盛行。例如，在宣涿怀联合县境内的杨家坪大教堂，住有外国的神甫，权力很大（当时全国教会的中心北平西什库教堂也受它管辖）。平西信教的群众也较多。为了争取团结一切可能争取的教会人士、开明地主士绅，特别是基层信教群众同情、支持抗日，我们除通过《挺进报》和散发传单广泛宣传外，还以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同志的名义颁发了政策性的布告。这些布告、报纸和传单不仅在根据地、游击区广泛张贴，有时还散发到敌伪统治中心的北平，对团结上层进步人士，打击削弱敌伪反动势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游击区和新开辟地区，我们首先争取乡、保、甲长为我们工作，为我们征粮筹款，变敌伪政权为两面政权。以后逐步控制乡、保、甲长，使之成为听从我们指挥，保护群众利益，应付敌人的两面政权，在条件成熟时就脱离



敌人，由两面政权变为抗日政权。

为了巩固和发展平西根据地，开辟北平近郊的工作，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以后，我们先后成立了妙峰山工作委员会，昌(平)延(庆)工作委员会(葛琛、卜占洲、于化民等同志都曾在工委担负过领导工作，卜、于两同志在这里的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我们派出一个营的兵力，以连、排、班为单位组成武工队分散活动，经常到十三陵、妙峰山、卧佛寺、周家花园、潭柘寺等名胜古迹和风景区开展宣传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击汉奸特务，以教育群众，扩大游击区，缩小敌占区。特别是每逢初一、十五或星期日，游人最多的时候，是我们进行宣传的大好时机。通过上述活动，我们和各阶层人民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逐步建立了一些短小精干的秘密抗日组织和据点，变敌伪的一面政权为抗日的两面政权。(表面上是敌伪管辖区，实际上是我们的游击区)。

#### (四) 财政经济政策

平西人口最多时约三十万(巩固区二十万，游击区十万)，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专署辖五个联合县和一个办事处(后改为四个县)。根据地内没有城市，共有大小乡村一千一百多个，由我控制的约有八百左右。这些地区的物产以玉米为主，小米、麦子只有很少一部分，丰年可供部队四、五千人的粮食。其他物产以煤为大宗，其次是杏仁、核桃、栗子等土特产。

财政收入主要靠：1. 征收公粮；2. 征收田赋税；3. 征

收出口税，每年出口税约百万元左右，仅杏仁，核桃每年可征出口税约二十万元。按平西人口，只能负担脱离生产人员六千人（按巩固区总人口3%计算），而当时实际脱离生产的有一万一千人，占全人口比例百分之五强。平西大部分地区人民的负担，超过当地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个别村庄甚至达到百分之三十；抗战勤务的负担也是很繁重的。最繁忙的村庄，自卫队天天服勤务，平均每人每月在十天以上。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宣传和贯彻了晋察冀中央分局颁布的双十纲领，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实行统筹统支，精简节约，减少脱产人员，减轻抗战勤务；开辟新区，由冀中的十分区运进一部分粮食；整理乡村财政，调剂贸易等。同时我们还对游击区和敌占区的商人、小贩开展了争取、团结工作，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通过他们把平西根据地的一些土特产品，如杏仁、核桃、猪鬃、皮革、木炭、药材、荆条等运出山区，换回根据地军需民用的布匹、食盐等急需物资。这些措施对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支援抗日游击战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我们认真贯彻了中央与晋察冀分局关于创造、巩固和发展平西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方针和政策，经过全体军民三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把平西建成为巍然屹立于敌后的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二年七月，晋察冀分局《关于三年来平西工作总结的决定》指出：“三年来区党委在平西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上，得到了相当的成绩，基本

上完成了党给予的巩固平西，并以平西作为开展冀热察游击战争前进阵地的任务。”分局对平西根据地军民几年来斗争成果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平西的巩固有重要意义，因为，平西是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它对贯彻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中央分局、晋察冀军区的决定、指示，负有重大的责任。它随时都要掌握平西、平北、冀东三个地区的敌情变化，及时总结斗争经验和教训，提出自己的斗争策略和步骤，及时上报，请示。根据上级的指示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指导对敌斗争。当时，每年两次召开县团级以上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对上级的决定指示进行传达、讨论，集中大家的意见，进行部署，年终总结，上报晋察冀中央分局和军局。遇到重要情况，随时上报请示。此外，还为三个地区轮训部队，培养干部。所以平西对冀东、平北坚持抗日斗争和建立根据地，对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工作的好坏，有着重要关系。

## 七、坚持冀东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四纵主力部队向平西转移后，留在冀东的八路军三个支队分别在三个地区活动，彼此很难联络。但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处处打击敌人。例如，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包森支队在遵化地区的战斗中，曾一举俘获日本天皇的表弟赤本大佐及其随从多人，给敌人以很大的震动。他们的战斗对冀东军民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给予极大的鼓舞。

李运昌、李楚离同志领导的两支抗日联军，在向平西转移途中受阻返回冀东坚持斗争时，正值国民党丢掉武汉，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另一方面回过头来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猖狂进攻。日寇从武汉调回一个旅团（小林部队），配合当地日、伪军对冀东地区进行秋季大“扫荡”。抗联部队经过连续苦战，最后只剩一千余人，撤到迁西的柳沟峪。经过李运昌同志的动员，重新布置工作，一面进行武装游击活动，一面派出干部战士回家乡恢复地方工作，坚持斗争。当时因敌人“清剿”，实行保甲连坐法，原先那些分散回家的抗日联军战士又纷纷回来寻找部队，部队又迅速发展至四千余人。这些地方武装与八路军游击队紧密配合，与敌人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在残酷的斗争中，虽然在青纱帐起来前的一段时间内，队伍有时也遭到减员，甚至只能昼伏夜出，但仍然坚持了冀东游击战争，迫使敌人小股武装和特务汉奸不敢轻易单独外出活动。

一九三九年冀热察区党委成立以来，冀东大部分干部和部队，先后分批来到区党委、晋察冀中央分局和抗大进行轮训。李运昌、李楚离、谷云亭、阎达开、胡锡奎、朱其文、周文彬、李子光等负责同志也先后来到平西。李运昌、李楚离在向分局汇报工作后，回到了冀东。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初，阎达开、谷云亭作为“七大”代表去延安准备参加“七大”，胡锡奎调北岳区党委，朱其文留在平西区党委工作，另外，还抽调少数干部到平西游击区和平北开辟工作。除此以外，所有到区党委党校和分局党校

受训的干部和来平西整训的武装都先后派回冀东。他们回去后，加强了冀东的领导和斗争力量，使冀东武装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壮大，县、区、村政权和党群组织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冀东斗争的领导，以适应斗争环境的需要，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根据晋察冀中央分局和军区的指示精神，结合冀东的实际情况，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发出了坚持冀东的指示。指出了坚持冀东的有利条件和应当贯彻执行的一些具体方针政策。指示还强调要在斗争中扩大游击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克服部分同志对坚持冀东信心不足，要依靠主力第二次开赴冀东，进行一次大的战役来打开局面的思想。并决定成立冀东军分区和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分委，由李运昌、李楚离同志分别担任军分区司令员和分委书记，并成立了冀东抗日政权办事处。分委、军分区分别受区党委、挺进军的领导。原留在冀东的八路军三个支队和抗日联军及地方游击队一部，整编为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团。以他们为骨干，逐步建立了许多块游击根据地。随后，平西主力一部（十团）开赴平北、热河，向长城内外发展，与冀东密切配合，互相呼应。

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一九四〇年底的一段时间里，敌人集中主要兵力对付我平西根据地和冀中十分区。在敌人兵力分散的情况下，我冀东根据地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和壮大。由于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和斗争的不断深入，逐渐引起了敌人的更大重视，对冀东

的“扫荡”和“清剿”也更频繁起来，向我根据地不断蚕食。在敌人占优势的地区里，他们搞治安强化运动，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的野蛮统治，企图离间我军民关系，以孤立我抗日武装。对我中心区的“扫荡”不仅十分频繁，而且越来越残酷。例如在一九四〇年的一次“扫荡”中，包围我丰润县潘家峪的敌人，将男女老少群众一千三百余人集中起来，强迫他们供出谁是共产党员、干部和游击队员。群众都坚贞不屈，没有一个人吐露实情。最后，敌人将被包围的群众赶进一个院内，四周堆放柴草，架起机枪，然后点燃柴草，把群众全部枪杀、烧死在里面，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冀东潘家峪大惨案。

冀东军民在敌人最野蛮的镇压下，不但没有丝毫动摇，而且越战越强，斗争艺术也越来越巧妙。游击队在敌人“扫荡”时化整为零，神出鬼没，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他们处处受到广大群众的掩护和支持，敌人来了，群众就把游击队认作自己的亲人，年轻妇女甚至把游击队员认作自己的丈夫，军民之间建立了亲密无间的鱼水情谊。敌人分不出哪些是老百姓，哪些是八路军，往往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由于冀东根据地坚决贯彻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得到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巩固。到一九四〇年底，逐渐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南起乐亭、守河，北至兴隆、青龙，东至迁安，西到平谷、密云、蓟县的广大地区，并使之基本连成一片，在一百八十万人口的区域中，建立了抗日政权。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敌伪之优势和我之劣势逐渐发生着有利于我的变

化。在部分地区，如遵化、迁安、玉田一带，敌伪统治在大部分地方已不能达到，而我已开始处于优势地位。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共晋察冀分局在写给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报告中指出：“冀东目前已是大块游击根据地（东西部有葫芦形联接），各方面工作都已树立了初步坚持冀东工作的基础”。彭真同志也曾对冀东军民斗争的成绩给予热情的称赞，他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七日《对冀东、平北工作意见》中指出：“由于冀东、平北党员干部的英勇艰苦奋斗，冀东的工作已获得光荣的很大的开展与成绩，证明冀东游击战争可以坚持。”

在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我冀东军民越战越强，到一九四四年末，冀东根据地已有十万党员，三万正规部队，二十万民兵，二十五个县支队，根据地有五百六十万人口，建立了二十五个联合县，并成立了冀热辽军区、区党委和行政公署，这就为以后的收复热河、解放东北，准备了力量和前进阵地。“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冀东八路军接到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在晋察冀军区的直接指挥下，首先进入东北，配合各大解放区进入东北的各路主力部队收复东北各省。冀东军民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罪恶目的，肆意颠倒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诬蔑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为“土匪暴动”，冀东抗日武装是“地主武装”，冀东党组织是“叛徒党”、“国民党”，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及一大批参加过冀东斗争的革命干部。这种

历史的颠倒，必须重新颠倒过来。

## 八、开辟平北

开辟平北、承德、张家口之间的冀热察三省边界广大地区，将使平西和冀东联结起来，使三个地区的游击战争互相配合，成为坚持长期斗争和将来反攻的一个坚强阵地。

开展平北的游击战争，早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就开始了。那时，八路军宋、邓四纵队挺进冀东，留下四纵队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率领的一支武装在昌平、密云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在坚持三个月的游击活动中，这支武装对敌伪统治下的平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情、地理等情况作了带普遍性的调查和了解，一度开辟了昌（平）滦（平）怀（柔）地区，成立了滦昌怀联合县政府，并建立了各种抗日组织，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撤出。其后，一九三九年青纱帐季节，挺进军三十四大队奉命挺进平北，进入十三陵地区开辟工作。但是，在执行对土匪政策上有偏差，没有站住脚，只坚持了一个月即返平西。这两次开辟平北虽然没有成功，但取得了一些经验教训。同时，这几次的活动，在平北人民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种子，使这个地区的群众对我党我军有所了解，这些都给以后的开辟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九年秋末，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提出了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三位一体的任务，确定了平北在冀热



察的战略地位，指明了开辟平北的重要性、开辟平北的困难和克服的方法。由于平北地区是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统治较久、并建成一套较严密的统治机构的地区，同时又紧靠伪华北政府统治中心北平。当时抗战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人增强了他们的后方统治力量，这是我开辟平北工作的不利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里地处伪满、伪蒙疆政府、伪华北政府的结合部，使我有隙可乘；敌人对这里残酷的掠夺和奴役，激发了广大人民对敌人的仇恨和抗日的要求，以及有平西和冀东人民的斗争为依托，这又是开辟工作的有利条件。因此，要开辟平北，必须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采取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在战术上只能梯次用兵，发动和依靠群众，用分散、隐蔽的办法，先开辟小块根据地，随着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和根据地的发展巩固，进而逐步连成大块根据地。一九四〇年间，挺进军和区党委根据中央和晋察冀军区关于开辟平北的指示精神，先后派了武装工作队，并派遣了程世才、段苏权同志率领主力团进入平北，相继建立了平北工委，苏梅任书记；平北军分区司令部由程世才任司令员，分区政治部由段苏权任主任。月余，程世才调回平西，由覃国翰接任司令员，段苏权任政委；并建立了平北办事处，张致祥任主任。

挺进军主力到达平北后，紧紧抓住武装斗争这个中心环节，积极向敌伪展开游击战争，连续取得战斗的胜利。至一九四二年春，我军在冯家峪、东山庙、鹿皮关、阎家坪、一撮毛山、谷水峪等战斗中，粉碎了敌人八次较大的

“扫荡”。在实战中，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一九四一年底，平北主力部队已有十团、四十团达二千多人。同时在武装力量掩护下，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进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工作，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争取有民族意识的上层分子，在群众中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先后实行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镇压了罪大恶极、一心事敌的汉奸、特务，摧毁了部分的敌伪村政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站住了脚跟。至一九四一年六月，相继成立了昌（平）延（庆）、龙（关）赤（城）、龙（关）崇（礼）赤（城）、龙（关）延（庆）怀（来）、丰（宁）滦（平）密（云）五个联合县政府和滦（平）昌（平）怀（柔）办事处。到一九四一年底，在二百四十二个村中，发展了二千二百五十名党员，并建立了民兵、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正如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晋察冀中央分局《关于平北二年来工作的指示》中所指出的：“平北两年来在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根据地。”

后来，在一九四三年，随着形势的好转，根据地日趋扩大，又建立了滦（平）昌（平）怀（柔）顺（义）和龙（关）崇（礼）宣（化）两个联合县。一九四四年，解放区更加扩大与巩固，取消了原县治划分，划成昌平、怀顺、赤原、崇礼、宣怀、龙关、赤城、延庆等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在晋察冀军区的直接领导下，我察北骑兵支队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到达多伦南部与苏蒙联军会师。八月二十三日，我平北部队解放了华北重镇张家口市。

从一九三八年八路军宋、邓四纵队东进配合冀东武装起义，到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在这一段时间内，我广大军民经过同敌人的反复斗争，消灭了不少敌伪武装的有生力量。在平西、平北、冀东的广大地区内，基本上摧毁了敌伪的区村政权，迫使敌人龟缩到大中小城市和重要集镇，敌伪军的小股武装和汉奸特务也不敢轻易出来活动。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在晋察冀中央分局和军区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共同努力，基本上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实现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建立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九四一年六月，晋察冀分局在《关于冀热察形势及今后任务向北方局、中央的报告》中，对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在这一时期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报告说：“以冀热察边区为中心，创造大块游击根据地的任务，目前基本上已经实现。因此，冀热察党目前工作中心，应放在巩固现有阵地，在巩固中向前发展。”

在回顾这段斗争历史的时候，应当看到，当时区党委在领导工作上也有着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例如，我们十分注意迅速发展和扩大主力部队，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对地方武装的巩固与扩大却注意不够，往往地方武装刚刚动员起来，即不断地被过渡到主力部队中去，以致有时不得不再以主力部队分散活动的方式来掩护地方工作的开展，使主力过于分散和疲劳，同时又削弱了地方游击队，使之不能起应有的作用。另外，党组织的发展不够广泛，党员数量少，分布也不平衡。在政权和群众工作

方面，有的地区未能及时建立正规的财政经济制度，造成物力、财力的浪费；有的地区群众工作还较薄弱；除领导群众对敌斗争外，对减轻群众负担、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注意不够。这些缺点，后来在晋察冀分局的领导下，逐步得到了克服。

## 九、反“扫荡”、反蚕食 斗争和精兵简政

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直接威胁着敌人在华北的心脏和交通命脉，因此，从发动游击战争以来，敌我斗争一直十分尖锐、残酷。可以说，从建立游击根据地之日起，敌人的进攻与“扫荡”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对平西根据地的进攻更为频繁。除定期集中兵力向我根据地“扫荡”外，有时也经常乘我之隙向我工作薄弱的地区进行突袭。敌人在南苑建立的飞行基地也经常出动飞机轰炸、扫射我平西根据地，以平西作为他们训练、演习的靶场。

一九四〇年上半年以前，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式是全面、多路向我中心区围攻“扫荡”，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我们则动员军民坚壁清野，在敌人分进合击时，留少数精干主力以营连为单位，配合地方武装与敌人周旋。主力部队则转到外线向游击区和敌占区敌人兵力空虚的后方进攻，打击敌人的运输队，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攻打敌人兵力薄弱的据点，迫使敌人撤退。在敌人撤退

时，我们又迅速返回根据地，集结兵力，追击已在撤退的敌人，并以优势兵力包围未撤完的小股敌人，给以歼灭性的打击。例如，我们在一次反“扫荡”中，在宛平县清水和塔河之间，就曾一举歼灭日军的一个中队，使之无一人漏网。敌人每次“扫荡”都给我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但每次“扫荡”最后也均以失败告终。

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起，敌人改变策略，以蚕食政策为主，每次向我根据地进攻和“扫荡”时，都要建立一些据点，以此分割和缩小我根据地。例如，在宛平等县，敌人首先在军响、镇边城、青白口、东斋堂、西斋堂、十字道等重要村庄建立据点，强迫群众在各据点间修筑公路，然后把各据点附近的小村庄全部烧毁，把所有群众赶入据点，修筑碉堡，建立战略村，实行联保连坐制度。敌人不断蚕食、缩小我根据地，扩大敌占区，妄图实现其最后消灭我根据地的罪恶阴谋。在此情况下，我平西根据地巩固区逐渐缩小，困难也越来越大。随着对敌斗争的日趋频繁和残酷，部队伤亡、减员数字也越来越大，兵员的补充难以满足战争的需要，部队的给养也越来越困难。尽管巩固区的群众宁肯自己吃树叶，尽最大的努力交售公粮，仍难于解决越来越尖锐的供求矛盾，部队时常得不到粮食供应，被服、弹药的补充也越来越困难，大部分轻伤员也要依靠群众掩护和照顾。为了减轻巩固区群众的负担，解决部队的给养困难，部队不得被迫到敌占区或边沿区去就食或补充兵员，这样又加重了游击区人民的负担。

在此情况下，晋察冀中央分局和军区决定，为解决平

西的给养问题，将冀中十分区划归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领导。虽然冀中十分区物产丰富，但该区地处平津两大城市之间，包括北宁铁路与平汉铁路北段两侧，东起武清县，西至容城县，南从文安县，北到大兴县的大片地区，对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很大。因此，敌人对冀中十分区也象对平西一样，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进行了频繁的“扫荡”和蚕食。十分区被划归平西领导时，已开始逐步由根据地变为游击区，这个地区的三个主力团（每团约三千人）和地区部队（约一千人），经常有一个团以及党、政和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的部分机关人员，被迫转到平西根据地东南地区进行培训和补充。在此情况下，十分区划归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领导以后，供求矛盾未能解决，加之指挥又不统一，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敌人对我冀热察抗日根据地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妄图最后消灭冀热察抗日根据地。

当时，敌人在冀东和平北之间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在冀东和平北、平北和平西之间的沿平古路、平绥路及永定河一线，以及平西与晋察冀军区之间从涞源到徐水、易县一带的主要交通线上（如紫荆关等地），敌人都构筑了一系列的碉堡，在平西与十分区之间沿平汉路两侧，敌人搞得深沟高垒，碉堡林立，并实行联防联保制度，对根据地加以严密封锁分割。在斗争最尖锐的区域和时间里，真是“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遍地是狼烟”，呈现出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根据地军民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区党委起初对敌人的以分割蚕食为主的策略上的变化

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斗争形势的演变估计和预见不足，在贯彻上级各项指示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点，以致在斗争策略上未能及时进行适合当时斗争形势的改变。一段时间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民关系。一九四〇年，日寇不仅对我平西频繁“扫荡”，还曾指使特务武装对我汤各庄实行奔袭。他们勾结暗藏的汉奸分子，利用少数群众对某些干部在扩军和征收公粮中强迫命令的不满情绪，煽动暴乱，绑架和杀害我区村干部。我们通过打击首恶，争取胁从，揭露敌人阴谋，教育受欺骗群众，很快恢复了秩序，处理了善后。事后，我们作了认真的总结，接受教训，改进了工作作风。

一九四一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指示，各根据地党政军所有脱产人员，不得超过根据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三。我们遵照上级的决定和指示精神，结合冀热察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反复认真的讨论，认识到设在平西的冀热察党政军机构已不适应新的斗争环境的需要，提出撤销区党委和挺进军这一级机构，把这一级机构的全体干部和各种人员，以及警卫部队，都充实到基层单位和战斗部队中去。这样，就减少了层次，缩小了目标，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能够减轻人民的负担，有利于部队灵活地深入敌后，打击敌人，变被动为主动。我们提出，将这一级机构撤销后，成立平西军分区；原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分委改为冀热边区党委；平西、平北、冀东三个军分区和三个地区的党政机构，除平西、平北地委受北岳区党委领导外，分别直接受晋察冀军区、中

央分局和晋察冀边区政府的领导，十分区仍划归冀中区党委领导。区党委将上述打算向党政军县、团级以上干部征求意见时，得到了一致的赞同，随后上报了晋察冀中央分局和军区，抄报了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很快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彭真同志自延安拍来的复电指出：平西的问题基本上是“鱼大水小”（指平西根据地人少，负担不了那么多脱产人员），同意我们的意见。

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向所属各地区党政军民进行动员，并部署了今后的斗争任务，于一九四二年春天结束了区党委和挺进军的工作。经过精兵简政，人民群众的负担减轻了，得到了休养生息，抗日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党、政、军、民的基层组织得到充实，各级机关的工作效率和部队的战斗力进一步提高和加强。这时冀热察地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各地区积极开展了对敌斗争。在平西，地委召开了会议，制定了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向东北方向推进，夹击平绥路的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经过各地区军民的共同斗争，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到一九四三年，又使平西、平北和冀东连成一片。斗争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用精兵简政来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sup>①</sup>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83 页



## 十、城市工作——点线委员会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白区的党组织在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作为中国革命力量的一翼，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曾经发挥过不可磨灭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城市中的党组织，曾积极地配合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冀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的故乡，北京地区是大钊同志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他就着手在北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兵运和农民运动。北方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失败后，白区党组织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它革命组织，开展了群众革命斗争”。但由于党内历次“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失败，致使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摧残。河北省委及平津等城市中的党的领导机关，一再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关、被杀。但是，敌人的疯狂镇压并不能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在城市、乡村乃至敌人的军队中仍有党的组织或党员，他们从未停止过革命活动和斗争。他们一旦被捕，落入敌手，在监狱里、法庭上仍与敌人进行着顽强英勇的斗争，表现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和崇高的革命气节。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北方党组织领导各阶层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广泛的抗日群众运动。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坚持内战的反动统治，北方党曾先后多次组织和领导过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武装暴动及张垣武装起义，至于工人罢工、农民抗税、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更是不断发生。一九三五年，平、津爆发了有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次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形成了反内战、反投降、要抗日的怒潮，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党组织抓住一二九运动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将运动继续推向深入，从学校到工厂，从城市到农村，从平津到全国，把工农商学各阶层人民动员起来，参加各种救亡运动，吸收先进分子参加各种抗日团体和发展党的组织。

当时党的干部异常缺乏，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更是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少奇同志果断地提出要从北平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院营救那些被关押的、久经考验的党员出狱，认为与其让他们长期关在狱中，不如让他们出来工作对革命有利。北方局对此作出决定，并得到中央批准。监狱党支部执行了这一决定。出狱后，根据北方局的指示，薄一波、杨献珍等大部分同志去了山西。他们在那里为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武装，作了大量的工作，为以后的反顽斗争、坚持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留在北平分配工作的十余人，其中有殷鉴、李楚离、胡锡奎、刘澜涛、刘慎之、朱则民、唐方雷、刘昭、赵博、马辉之等。

北方局为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工作重心转向基层，将李楚离、胡锡奎派往华北“各救”；刘澜涛派到天津市委任副书记；刘慎之、朱则民派往北京市委；赵搏派往冀南特委。我被派到北方局天津工作组工作。北方局除加强对学生运动和华北“各救”的领导外，还选派党员和可靠群众打入各军队、各党派和群众团体中去，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七七事变后，平、津形势发生了突变，各大学纷纷南迁，所有上层名流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也纷纷离开平、津南下。当时因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已不通车，绝大部分北平学生来到天津，准备南下。党组织为争取他们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和送往延安培养，经姚依林、李楚离通过统战关系，争取了天津英国的轮船公司为我们把这些学生和天津的学生分批送往青岛，转赴冀南、山西、延安和武汉。总之，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八月，特别是七七事变后的七、八月间，我们将很大一批学生（其中包括党、团员和民先队员）送去了延安等地，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以后成为坚持抗战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

一九三七年春，刘少奇和彭真同志到延安参加会议，尚未返回平津，就爆发了七七事变。这时留在平、津工作的柯庆施、林枫两同志也先后去了山西临汾（当时北方局设在临汾），只剩下李大章和我仍留在天津，负责领导平、津两市委和冀东，以及冀南两个特委的工作。同年八月，北方局指示成立河北省委，负责领导平、津、唐三个市委，

冀东特委及群众团体等工作。冀南特委划归北方局直接领导。省委成立后，除坚持平、津、唐等城市工作，深入工矿企业进行隐蔽的组织活动外，仍继续向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各地农村输送干部，发动和组织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冀东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时，少奇同志除对起义的有关问题作了部署外，对平、津、唐的城市工作也作了明确指示，指出：城市工作成立点线委员会，由吴德具体负责，划归长江局领导。城市中的党组织要短小精干，坚持秘密工作，利用各种渠道了解敌情，向根据地输送人员和物资，聚积力量，准备配合将来反攻收复失地。

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于五月底离开延安，取道西安去武汉，当时恩来同志不在武汉，我通过夏之栩同志找到博古同志，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平、津、唐点线委员会归长江局领导的决定。博古同志表示同意中央的决定，指示平津可与武汉、香港间建立电台联系。他叫我与长江局订立了电台呼号与密码，然后到香港，找廖承志同志确定与香港的电台联系办法，再取道上海返回天津。回到天津后，我即将从延安、武汉、香港带回的电报密码和电台呼号交给了姚依林同志。当时因吴德不在天津，省委研究决定点线委员会的工作改由葛琛同志暂时负责，姚依林暂留天津向葛琛交代工作后再去冀东。

一九三九年一月初在蛟潭庄开会时，聂荣臻同志传达中央决定：平、津、唐点线委员会划归晋察冀中央分局领导。他说：由于分局机构尚不健全，马辉之长期搞城市工

作，情况比较熟悉，平、津、唐点线委员会暂时由马代管，城市中的其他一些工作，也由马保持联系。

我们从冀东刚到平西时，处于连续行军作战的环境中，忙于重新打开平西的局面，尚未及建立专门与城市联系的电台。冀热察区党委成立后，自己设了电台，才开始与点线委员会在天津的电台发生联系。后来，为了加强挺进军的电讯工作，从挺进军选拔适合城市工作的电讯人员，派到天津去接替负责点线委员会电台工作的王士光同志。王到根据地后，对提高部队的电讯技术起了一定作用。我们在平西站稳脚跟后，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在边沿地区创造了广大的游击区，沟通了根据地——游击区——城市之间的联系，扩建了来往于敌占区的秘密交通线，更便利了我们与平、津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和干部的往来。主要秘密交通线有四条：一是田家庄——妙峰山——北平；二是镇边城——北平；三是天津——北平——松林店——张坊——平西；四是北平——三家店——平西。

当时，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是严格分开的。城市工作的任务仍然是在人员和物资上充实根据地，配合和支持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争。同时，我们也先后调进了少数能适应秘密工作的干部去平、津工作。从一九三九年初到一九四〇年上半年的一段时间内，通过平、津、唐点线委员会所属的平、津党的市委等城市中党的组织，先后输送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到根据地去参加对敌斗争。同时，还护送了一些国际友人到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如奥地利的某医学家、英国某学者等，就是经过平西，转往晋察冀军

区参加抗日工作的，其中有的同志至今仍在北京，热情地帮助我国四化建设。这一时期，我们通过城市党组织，从平、津等大城市采集各类军需物资，如军工、电讯器材、医药、布匹、食盐等。

一九四〇年，我将平、津城市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先后分别移交给晋察冀中央分局刘仁同志和许建国同志领导。据我所知，平、津、唐点线委员会及三个市委等党的组织，在一九四〇年向分局移交前，从未撤销过。一九四〇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经过几年来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获得了巩固和发展。为了敌后城市工作的更大开展，也为后来的反攻和收复失地作好战略上的准备，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城工部的指示，从根据地选拔一批适合城市工作的干部，经过训练，派往敌人占领的城市中去，加强党在城市中的工作。

平、津、唐点线委员会领导着广大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敌人的心脏里，在极其险恶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为抗日战争和其后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存在，直接威胁着当时被敌人占领的华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平、津、唐三大城市和北宁、平绥两条铁路干线，起到了保卫和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东部屏障作用，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起到了配合作用。在开辟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成千上万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

宝贵的生命。如平西专员公署专员杜伯华，冀东抗联原高志远部政委（后兼司令员）董毓华，晋察冀银行平西办事处主任庄敬山，十团团团长白乙化，挺进军机要科长张振元，还有从延安派到冀东的军事干部李润民，曾从天津派往冀东直接负责领导一九三八年开滦煤矿大罢工的周文彬，开滦五矿赵各庄矿工人领袖节振国，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冀热边特委委员丁振军，冀东区党委委员苏林燕，八路军陈苏支队队长陈群，八路军包森支队支队长包森，冀热察区党委交通大队长郝立本，平西专区武委会主任王治良，地委书记赵观民，挺进军民运部长谭志诚，冀热察区党委秘书长卞振东，平北昌延县委书记徐智甫、县长胡瑛，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城光，冀东军分区参谋长方山，冀东十四专署专员杨大章等同志。抗日战争时英勇牺牲在平西，冀东和平北的县团级以上干部不下数百人。此外，胡锡奎、刘慎之、李子光等同志，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他们没死于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和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而在康生、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下含冤牺牲。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如日月经天，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里。回忆往事，缅怀先烈，让我们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一九八〇年十月于北京

一九八一年八月修改于北戴河

一九八二年五月修改于北京

（袁璞、梁湘汉等同志参与本文查阅资料及文字整理）

# 金粉泪五十六首

陈独秀

编者按：《金粉泪五十六首》是陈独秀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中所作。一九三六年或一九三七年，原上海亚东图书馆负责人汪孟邹去狱中看望陈时，陈将此诗出示于汪并为汪所索得。一九五九年由汪孟邹之侄汪原放捐献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这份资料对研究陈独秀当时的思想和政治态度颇具参考价值。这次发表时，编者加了标点，并特请陈旭麓同志作了简释。

## 金粉泪五十六首

(一)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二)

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



金瓶梅 卷之六

故奈這書中幾句話都說得

倚重結出身子來也

莫不說在強盜

要人既娶對牛作合

同此

着故風

清堂公堂一

太平武

實例

移為民與

廣名

師之

也

青白

意地

物小

爾不

記

五

法

時

一

若

家国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

(三)

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  
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蓝衫吴秀才。<sup>①</sup>

(四)

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  
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

(五)

世事由来似奕棋，黄龙青白耍斯梯(swastika)。  
红袍不及蓝袍好，行酒青衣古有之。

(六)

抽水马桶少不了，洋房汽车溯不行。  
此外摩登齐破坏，长袍骑射庆昇平。

(七)

五四五卅亡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  
微笑捋须张大辩，石头城畔日徘徊。<sup>②</sup>

---

① 杨永泰以拥蒋倒党取悦于蒋。

② 蒋介石谓五四运动为亡国祸。

(八)

一国三公赣港宁，可怜诸葛竟分身。  
党中无派缘清党，阿斗先生双眼明。

(九)

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销沉受品弹。  
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十)

兵车方过忍朝饥，租吏追呼乌夜啼。  
壮者逃亡老者泣，将军救国要飞机。①

(十一)

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  
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

(十二)

批颊何颜见妇人，妇人忍辱重黄金。  
高官我做他何恤，廉耻声声教国民。②

(十三)

士气嚣张应付难，读书救国最平安。

---

① 广东湖南皆以飞机捐榨取民间巨款。

② 蒋曾因事批邵元冲之颊。

埋头学得胡儿语，好待荣膺甲必丹。

(十四)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  
赢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十五)

木鞋踏破黄河北，救国三民有万能。  
革命维新皆反动，祭陵保基建中兴。

(十六)

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  
国削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十七)

人以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罢兵。  
中国圣人长训政，紫金山色万年青。

(十八)

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  
忤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

(十九)

宝华山上暗生春，春满书斋不二门。

妒病难医今有药，老僧同榻尔何能。①

(二十)

艮兑成名老运亨，不虞落水仗天星。  
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②

(二十一)

保墓贤人别有思，痛心考古播邪辞。  
三皇五帝推翻后，稻桶(道统)灰飞大圣悲。

(二十二)

两载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sup>1</sup>  
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

(二十三)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  
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二十四)

苏马幽居蒋蔡逃，胡儿拍手汉号啣。  
儿皇忠悃应无失，毋事皇军汗马劳。

---

① 戴传贤有惧内癖，营金屋于宝华山僧舍，颜曰：不二书斋，以与僧同宿诳其妻。

② 吴敬恒以子有恶疾，绕室长叹曰：吴氏之祀斩矣。

(二十五)

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忧。  
幸有安排谢邻国，首宜统一庆车邮。

(二十六)

关东少帅如兄弟，淮上勋臣师道尊。  
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①

(二十七)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  
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二十八)

低头分取一杯羹，实业宣传花样新。  
机器农场偷卖尽，增加生产厚民生。②

(二十九)

分肥不及暗生填，蹙脚先生老气横。  
唯一辉煌新建设，前朝灯火万家明。③

---

① 何应钦在天津宴客语。

② 谓陈公博长实业部时事。

③ 张人杰长建设委员会所建设者，李纯遗留之电灯公司而已。

(三十)

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  
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

(三十一)

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雕残国脉衰。  
孕妇婴儿甘并命，血腥吹满雨花台。

(三十二)

关门闭户两争持，佝偻主人佯不知。  
幸有雄兵过百万，威加百姓不迟疑。<sup>①</sup>

(三十三)

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  
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

(三十四)

麻雀乌鸦总祸胎，投机彩票禁难开。  
检查毒品官家利，奖券航空大发财。

(三十五)

故宫春色悄然去，无饰王冠只一端。

---

① 开门闭户谓英美与日本之争持也。

南下明珠三百篋，满朝元老面团团。①

(三十六)

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冗性真。  
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②

(三十七)

拳乱偿金万民血，故宫宝器尽连城。  
要人垄断伶人喜，一掷缠头十万金。③

(三十八)

十三万万债台高，破产惊呼路政糟。  
太子叨光三百万，宗臣外府大荷包。④

(三十九)

萧何立法身难免，嗾杀陈郎道路哀。  
司马家儿同眷属，祝君终老妙高台。⑤

(四十)

凛凛威风御史台，三光荫下集群才。

---

① 故宫盗宝案乃李石曾、吴敬恒、张人杰合伙为之。

② 谓汪兆铭也。

③ 李石曾垄断庚款及故宫财物，以十万元赠程艳秋出洋。

④ 孙科长铁道部时侵吞三百万元，汪兆铭任行政院长以铁道部为外府。

⑤ 胡汉民嗾陈济棠杀陈树人之子。



狐狸暗笑苍蝇拍，心眼歪时嘴亦歪。①

(四十一)

一门亲贵人称羨，宋玉高唐结主欢。  
几见司农轻授受，乃知裙带胜衣冠。②

(四十二)

党权为重国权轻，破碎山河万众惊。  
弃地丧权非细事，庙谟密定两三人。

(四十三)

严惩鸦片不容情，高坐唐皇国法尊。  
为免欠呻濒掩袖，好将烟泡暗中吞。

(四十四)

鸦片专营陆海军，明严烟禁暗销行。  
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

(四十五)

嫌疑反动日惊心，拱默公卿致太平。  
干事委员资笑谑，女权不重重花瓶。③

---

① 世谓监察院委员为苍蝇拍。

② 谓宋、孔相继为财长。

③ 男干事女干事干事干干事，大委员小委员委员委委员，彼中自嘲之词也。

(四十六)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百人。  
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四十七)

皇皇大典枉抡才，官运高低靠后台。  
封锁未成民已苦，七分政治费疑猜。

(四十八)

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雕残袖手看。  
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寒。

(四十九)

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  
白发媪翁双跪泣，乞留敝絮过冬天。

(五十)

委员提款联翩至，心软州官挂印逃。  
入室无人拘妇去，婴儿索乳苦哀号。

(五十一)

垣墙属耳党先生，士气消沉官运亨。  
闭户闭心兼闭口，莫伤亡国且偷生。

(五十二)

虏民夺地数千里，使节依然笑语迎。  
无力复仇应抱恨，如何握手进香苹。

(五十三)

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  
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

(五十四)

嫩江血战惊强敌，爱国男儿自主张。  
雪地冰天谁管得，东风吹暖半闲堂。

(五十五)

专制难期政令宽，每因功业震人寰。  
未闻辱国儿皇帝，亦欲伊周一例看。<sup>①</sup>

(五十六)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所谓民国二十三年书

---

① 陈立夫谓国民党为伊尹周公。

附：

## 简释陈独秀《金粉泪五十六首》

陈 旭 麓

一九三四年，陈独秀在南京狱中以七言绝句的形式写了一组诗，共五十六首，题曰《金粉泪》。

南京旧称“六朝金粉”之地，是个繁华古都。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国民党官僚们歌舞升平，过着豪华腐朽的生活，而全国人民在他们的暴虐统治下，水深火热，血泪和流，这就是《金粉泪》命题的旨意。末署“所谓民国二十三年书”，表示不承认蒋介石的“民国”。原稿是汪孟邹探监时携出，经辗转秘藏，一九五九年始归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汪籍安徽，原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是个出版商，与陈独秀为同乡好友。《独秀文存》就是由“亚东”出版的。

全诗是感时伤事之作。那时，中国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划为“满洲国”后，又于一九三三年占领热河，向绥东、察北、冀东进犯，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而蒋介石挟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百般屈从，相继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对爱国人民则残暴镇压，无所不用其极。当时，他们调动百万大军，两百架飞机，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又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开始在全国玩弄“新生活运动”的花招，宣称“国民军事化”，要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还规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尊孔读经，借以掩饰他们穷凶极恶的法西斯面目，如此等等。在狱中的陈独秀，据报刊及与人接触中的所见所闻，感慨万端地写下了这组诗。

诗中涉及的面颇广，有军政大事，有生民命脉，有要人隐私，探幽阐微，言之有物有据，可以当史诗读。就诗的内容来说，反映了陈独秀虽历经艰险，失去自由，但字里行间仍流露着早年爱国革命的豪情：一、宣示了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华北，国民党反动派毫不抵抗的危险局势；二、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厉行法西斯和“新生活运动”的倒行逆施；三、斥责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迫害和压榨；四、揭发了国民党反动头目的无耻行径。全诗所陈者，皆国家民族的安危所系，一无个人的失意呻吟，语不求工，娓娓道来，发自内心，不难窥见作者自诩“依然白发老书生”的意态。现依次诠释每首的大意，供研究陈独秀晚年思想生活的参考。释诗甚难，失误和不妥之处，阅后请指正。

①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燕，河北。云，大同。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这里借指国民党断送了东北、华北等地。天骄，汉时匈奴自称是“天之骄子”，这里借指日本。两句是说，自从放弃燕、云大片国土后，敌人如醉如狂不可一世。概括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进犯的形势。“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作者说自己并没有衰老，梦里还想踏过辽河的冰霜去抗日。颇有陆游“夜阑卧听萧萧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之慨。

② 这首是说，要人们玩弄了“新生活”的花招，但这些腐败官僚哪能招回已逝的国魂！不过是把“国家兴亡”当作儿戏罢了。“满城争看放风筝”，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等曾在南京组织大放风筝。

③ “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清党，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进行的清党活动；倒党，指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以拥蒋倒党取悦于蒋。这两句是说，你们干的清党、倒党和复古勾当，难道天下就此太平了吗？“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

蓝衫吴秀才。”蓝衫，秀才的穿着。吴秀才，指北洋军阀吴佩孚，他是秀才出身。两句是说，照你们今天这样的所作所为，当年的北伐看来是多此一举，这可要笑煞了吴佩孚。

④ “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这里的“经正”、“礼教尊”、“旧文明”，都是指“尊孔读经”等复古活动。“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投壶，我国古代宴会中的礼制，也是一种游戏，以盛酒的壶口为目标，用矢投射，以投中多少决胜负。孙联帅，指孙传芳，一九二五年称五省联军司令，正当北伐军挺进韶关的时候，他在南京邀集社会名流搞投壶古礼。末一句是说孙传芳不愧为你们国民党的先辈。

⑤ “世事由来似奕棋，黄龙青白耍斯梯(swastika)。”黄龙，指清朝的黄龙旗。青白，指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耍斯梯，指德国纳粹标徽。这两句是说，世局好象下棋一样变幻，由黄龙旗变为青天白日旗，现在又要变为纳粹旗了。“红袍不及蓝袍好，行酒青衣古有之。”红袍，指古时以大红袍为高官礼服。蓝袍，国民党官僚以蓝袍、黑马褂为礼服。青衣，贱服，晋愍帝被匈奴军掳去，叫他着青衣行酒。两句是说国民党官僚政权厉行特务统治，青衣行酒的臣虏命运正等待着他们。

⑥ 抽水马桶、汽车洋房是你们少不了的，其他“摩登”(现代化)都可以破坏(当年四月南京等地出现“摩登破坏团”)。只要穿上古色古香的长袍马褂，表演中世纪的骑射(当年九月十一日报载张学良、何成濬、张群等发起“武汉骑射会”)，就是一派升平气象了。

⑦ “微笑撚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张大辫，指辫帅张勋。石头城，即南京城。这首诗是说，“五四”、“五卅”既然是“亡国祸”，武昌起义也就更不应该了。如果这样，当年在长江顽抗辛亥革命的辫帅张勋，倒可悠然自得地徘徊于石头城上了。

⑧ “一国三公赣港宁，可怜诸葛竟分身。”赣、港、宁，是指

当时蒋介石在南昌行营、胡汉民在香港、汪精卫在南京主持行政院。诸葛，即诸葛亮，这里可能借喻蒋介石。两句是说国民党政府的三个首脑各有势力，可怜那个梦想统一的“诸葛亮”到处分身应付弄得晕头转向。后两句是说经过“清党”应该是“党中无派”了，可是仍然是“一国三公”，这一点阿斗先生看得最清楚。阿斗，这里指老百姓。

⑨ 这首是说老百姓议论政治就会触犯刑典，民气在受弹压中消沉了。不要瞎说官家不好说话，老百姓本来是当牛马的啊！

⑩ “兵车方过忍朝饥，租吏追呼乌夜啼。”乌夜啼，乐府曲名，这里借喻老百姓的悲苦作乌夜啼。两句是说早上方忍饥挨饿地躲过了兵，跟着又是吏胥来催收飞机捐。

⑪ “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这里似指米春霖在锦州成立辽宁政府，日本派飞机轰炸，遂失关外战略要地，日军随之进迫长城。所以后面两句说，敌人快要饮马黄河，而临河还是一片沉寂，因为蒋家王朝在实行“怀柔”的投降政策。

⑫ “批颊何颜见妇人，妇人忍辱重黄金。”批颊，打耳光。妇人，指邵元冲之妻张默君，国民党中央委员。蒋曾因事打过邵元冲的耳光。这首是说蒋家王朝高唱“礼义廉耻”，其实都是些寡廉鲜耻之徒。“高官我做他何恤，廉耻声声教国民”二语道破。

⑬ “士气嚣张应付难，读书救国最平安。”这两句指出，自“九一八”起，学生爱国运动高涨，国民党反动派穷于应付，通过胡适之流叫嚷“读书救国”，想把学生禁锢在书斋里。“埋头学得胡儿语，好待荣膺甲必丹。”胡儿语，外国语。甲必丹(captain)，船长，海陆军尉校级军衔，这里指做官。意谓学会了外国语，就好去充当买办官员，与“读书救国最平安”相呼应。

⑭ 这首指蒋介石压抑民权，摧残民智，全是赢家(秦始皇姓嬴，这里是双关语)帝王万世之业的愚民政策。

⑮ “木鞋踏破黄河北，救国三民有万能。”木鞋，日本人习穿

木屐，这里代称日本。两句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已深入华北，国民党反动派只知空喊三民主义。“革命维新皆反动，祭陵保基建中兴。”祭陵，当年四月十三日报载戴传贤等赴陕西谒周陵（周文王墓）、茂陵（汉武帝墓）。保墓，同日报载戴传贤指责考古学家发掘古墓是“自伤其祖先之德，败其同胞之行”，应严禁，犯者当判刑。两句是说革命、维新都是反动，只有祭陵、保墓才能使中国中兴。反话。

①⑥ “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修庙，当时报载要筹一百万元以修复孔庙和作祀孔基金。扶乩，请神预卜吉凶的迷信，当时国民党一些军政要员多借扶乩决策。念经，当时报载戴传贤在北京雍和宫举行“时轮金刚法会”，邀请班禅主坛念经。意思是说，四边烽火告急，国民党的要员们却一味尊孔、崇道、念佛，在他们看来，做亡国奴是小事，头等要紧的是复古正人心。

①⑦ “人以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罢兵。”一正，双关语，指“正人心”，也指蒋中正其人。四裔，四方边远地区。两句是说，只要人人从正，样样复古，四方国家的头目就会自动罢兵言好。“中国圣人长训政，紫金山色万年青。”中国圣人，指蒋介石；训政，孙中山规定建设“民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训政为三阶段之一，谓人民须经过教育训练才能实行宪政，蒋介石借此剥夺人民自由，长期实行独裁统治。紫金山，在南京市东，孙中山陵园所在地。这两句是说，你蒋介石对人民长期训政下去，就会象中山陵一样万年长青了。反话。

①⑧ “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德，德谟克拉西（民主）；赛，赛因斯（科学）。两句是说，民主与科学是互相依存的，事功与道德怎能分开？“忏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金刚法会，讲经奉佛活动。除①⑥所注外，当年四月，国民党要人和社会人士在报上刊出大幅《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将定期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法会，“切望十方善信如期到会恭候大法”。这两句是



说，为了忏悔“犯上作乱”，“目无领袖”的罪恶，都要到金刚法会上来听法修行。

①⑨ “宝华山上暗生春，春满书斋不二门。”宝华山，在江苏句容县北，离南京约九十里。不二门，即不二法门，佛教语。二门，指不是两个极端。法门，指修行入道的门径。这首揭露戴传贤一伙假道学的丑行，看原注自明。

②⑩ “艮兑成名老运亨，不虞落水仗天星。”艮、兑，八卦中的两个卦名，这里指宦侍妇妾之行。落水，指吴稚晖早年在日本投水获救的事。两句是说，吴稚晖仗着运气好早年没有溺死，便以钻营成名，到老官运亨通。下二句是说他的儿子染上了花柳病，吴家的“烟火”就将断绝了。

②⑪ 这首是专讽戴传贤保护古墓事。大意是：保墓贤人别有考虑，所以痛恨考古学家散播发掘古墓的邪说；古墓发掘了，三皇五帝和他们的道统（“稻桶”的谐音，指饭碗）岂不都荡然无存了，所以死去的大圣都那样悲痛。

②⑫ “两载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忘，疑亡字之误。四省，指东三省和热河。两句是说，匆匆两年中就丢失了四省神圣领土，“三民主义万岁”倒是叫得怪响。“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海底，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告热河将士书中说：“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哪里，诸君打到天上，子文跟到天上，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纪念周，国民党规定各机关、学校每星期一早上集合诵读孙中山遗嘱和负责人讲话的仪式。后两句是说，中国终归有一条新的生路，那就是到海里去大做纪念周。反语。

②⑬ 这首讽刺国民党的逃跑主义。意思是说，长城以外已经丢了，万里黄河也已黯然失色，但还有长江的天险，国民党的官老爷尽可高枕无忧。反语。

②⑭ “苏马幽居蒋蔡逃，胡儿拍手汉号陶。”苏、马，指东北义

勇军将领苏炳文、马占山；蒋、蔡，指当时主张联共、抗日、反蒋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胡儿，指日本帝国主义；汉，指中华民族。两句是说，苏炳文、马占山投闲置散了，蒋光鼐、蔡廷锴被赶跑了，亲者痛仇者快。“儿皇忠悃应无失，毋事皇军汗马劳。”这两句是说蒋介石有了石敬瑭做儿皇帝的忠诚，就不用再为日本皇军去打仗了。

②⑤ “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忧。”中夏即中国；亡君，意即无主。“幸有安排谢邻国，首宜统一庆车邮。”邻国，指日本。庆车邮，指北平政治分会派殷同与伪“满洲国”签订与关内通车、通邮协定。这无异是对伪“满洲国”的承认。所以作者讽刺说：多谢邻邦的好安排，首先应为关内外统一庆祝通车、通邮。

②⑥ “关东少帅如兄弟，淮上勋臣师道尊。”关东少帅，指张学良；淮上勋臣，指段祺瑞（段为安徽合肥人）。段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曾肄业于该校，故段由天津南下至浦口时蒋前往迎接，执弟子礼。后两句看原注自明。

②⑦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虎狼，指贪官污吏；兴复农村，指国民党设置的“农村复兴委员会”。作者讽刺国民党搞的“复兴农村”花招，不过是“虎狼百万”、“苛捐三百种”，把农民的血肉变为他们的黄金。

②⑧ 这首看原注自明。

②⑨ “分肥不及暗生填，蹙脚先生老气横。”这首是讽刺张人杰（张静江）的。一九二六年张在广州一度任国民党主席。北伐期间宣布为浙江省主席，未到任。在南京政府的分赃中，因争监察院长不得而发怒。张早年跛足，人称“张跛子”，故诗中称“蹙脚先生”。后两句看原注自明。

③⑩ “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唐皇，即“唐哉皇哉”；炮烙、凌迟，皆酷刑。大方，这里作大道理理解。两句是说，严刑重典做得很堂皇，炮烙、凌迟也有大道理。“暴虐秦皇绝千

古，未闻博浪狙张良。”秦皇，这里借喻蒋介石。博浪狙张良，张良曾遣人用铁锥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这两句是说，秦始皇（指蒋介石）的暴虐真是千古少有，却没有听到象张良这样的人去刺杀他。

③① “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雕残国脉衰。”朝右，古代习惯尚右座，这里指权贵。两句是说国民党满朝文武都是贪夫，有作为的人才却横遭摧残，国家的命脉越来越衰微了。“孕妇婴儿甘并命，血腥吹满雨花台。”甘并命，愿意一块儿死。雨花台，在南京市中华门外，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屠杀革命志士，解放后辟为烈士陵园。

③② “关门闭户两争持，佝偻主人佯不知。”关门，开门之误；佝偻，病名；主人，指国民党政府。两句是说，任英美和日本互相争持——一方要门户开放，一方要闭户独占，害了佝偻病的国民党政府却装聋作哑。后两句则说，国民党拥有的百万雄兵不去抗日，“围剿”革命人民却毫不迟疑。

③③ “感恩党国诚宽大”，反话。“宽大”何在？“并未焚书只禁书”。但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一次就查禁了文学书刊一百四十九种，进步人士还常以言论获罪，所以后两句说民国政府也公然屡兴文学狱，民主共和早就一命呜呼了。

③④ “麻雀乌鸦总祸胎，投机彩票禁难开。”麻雀、赌具；乌鸦，指鸦片。两句是说，烟赌是祸根要严禁，投机彩票也不能随便开放。后两句则说，官家却借禁赌禁烟恣意勒索，开办航空奖券大发横财（当时在报上刊登“航空救国，储蓄致富”的巨幅广告）。

③⑤ “故宫春色悄然去，无饰王冠只一端。”故宫，北京故宫博物院；春色，指宝物；无饰王冠，镶嵌的珠饰被拆偷了的王冠。两句是说，故宫博物院的宝物悄然失踪，无饰的王冠只是其中的一件。后两句是说，还有三百箱宝物被运往南方，国民党元老们的乘机扒窃，使他们都成了面团团的富家翁。

③⑥ “珊珊媚骨吴兴体”，珊珊，妇女衣裾玉佩的声音；吴兴体，浙江吴兴赵孟頫的书法，形态妩媚，称吴兴体。这首是借以讽刺汪精卫毫无骨气。

③⑦ “拳乱偿金万民血，故宫宝器尽连城。”拳乱偿金，指义和团运动中的庚子赔款，后来帝国主义者部分归还，设立庚款委员会，指明用途。连城，即和氏璧，价值连城。两句是说，庚款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故宫宝物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要人垄断伶人喜，一掷缠头十万金。”要人，指李石曾，李曾是法国庚款委员；伶人，戏曲演员；缠头，古时歌舞者作为妆饰缠在头上的锦帛，也作赠与伶人的锦帛或财物。两句是说，要人垄断庚款和故宫宝物，伶人很高兴，因为一次就获得了十万元。

③⑧ “十三万万债台高”，指南京政府当时欠的外债。“太子叨光三百万”，指孙科任铁道部长贪污了三百万。“宗臣外府大荷包”，宗臣，位极群臣的大官，这里指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这句是说，铁道部不仅是孙科的金窟，也是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外库大荷包。

③⑨ “萧何立法身难免，嗾杀陈郎道路哀。”萧何为西汉制订法制的大臣，曾被刘邦猜疑，遭囚禁。这里借指曾任国民党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因与蒋介石争权，一度被囚禁于南京汤山，故说“身难免”；陈郎，指陈树人之子。两句是说，立法的萧何也公然违法，指使别人杀害陈家的儿郎，大家都很惊讶。“司马家儿同眷属”，司马家儿，晋朝皇帝姓司马，永嘉五年，匈奴军刘曜攻洛阳，掳晋惠帝羊皇后，不久刘曜僭位立羊氏为皇后，因问曰：“吾何如司马家儿？”后曰：“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这是说刘曜与晋惠帝司马衷同一个皇后。这里暗指陈树人之子与胡家眷属有暧昧事，所以胡汉民要指使人加以杀害。“祝君终老妙高台”，君，似指胡汉民；妙高台，在金山上，僧了元建。这句的意思是说，你还是到妙高台去修行养老吧！

④⑩ “凛凛威风御史台，三光荫下集群才。”御史台，谏官，这里指国民党监察委员。三光，日、月、星。两句是说，威风凛凛的监察委员，是在三光照耀之下汇集的人才。反话。“狐狸暗笑苍蝇拍，心眼歪时嘴亦歪。”这两句是说有些狡猾的人讥笑监察委员只是拍拍苍蝇，因为这些谏官老爷心眼长歪了，话也是歪着说的。

④⑪ “一门亲贵人称羨，宋玉高唐结主欢。”一门亲贵，指蒋、宋、孔；宋玉，战国楚人，善词赋，有《高唐赋》、《神女赋》等名篇。这里指宋子文以女宠为蒋介石所宠信。“几见司农轻授受，乃知裙带胜衣冠。”司农，财政部；衣冠，指士人，知识分子。这两句是说何曾见过财政部长竟可私相授受，原来裙带关系胜过发愤读书。

④⑫ “党权为重国权轻，破碎山河万众惊。”是说国民党以一党的私利为重、国家民族的公利为轻，祖国的大好山河任敌人蹂躏谁不愤慨！“弃地丧权非细事，庙谟密定两三人。”庙谟，朝廷决策，国家大计；两三人，指蒋、宋、孔等。丢弃国土、丧失主权不是小事，现在糟到这步田地是由两三个人的谋划。

④⑬ “严惩鸦片不容情，高坐唐皇国法尊。”两句是说国民党要人冠冕堂皇地坐在那里发号施令，口口声声要严禁鸦片。“为免欠呻濒掩袖，好将烟泡暗中吞。”欠呻，疲倦，这里指烟瘾发了。这两句是说惟恐被人看到烟瘾发作、眼泪鼻涕一大包，偷偷用衣袖遮盖脸面吞下烟泡。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陈布雷就是这样的人。

④⑭ 这首诗仍是揭示国民党禁烟中的丑剧的，且丑剧已变为暴行。据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报载，皖北强行铲毁烟苗，巢县农民不服，群起反抗，官兵竟纵火焚烧，“十里方圆，惟见峰烟蔽天”，“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两句，就是指的这件事。

④⑮ “嫌疑反动日惊心，拱默公卿致太平。”国民党诬革命为“反动”，略涉嫌疑，即遭迫害。拱默，两手拱着默不吱声；公卿，文

武百官。两句是说“嫌疑”、“反动”令人胆战心惊，人人自危，满朝文武都默不吱声，好一副太平景象！后面的两句讽喻国民党官员们醉生梦死，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④⑥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百人。”前一句指南京政府的法律外还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国民党中还有CC和蓝衣社；后一句的“黑百人”，指沙皇时代的反动帮派组织“黑百党”。意思是说国民党效法沙俄的特务统治，所以“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一片白色恐怖。

④⑦ “皇皇大典枉抡才”，指国民党煞有介事地举行高等文官考试，不过是虚张声势，实际是“官运高低靠后台”。后两句的意思是，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徒然苦了老百姓，你们叫嚣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又有什么用！

④⑧ 这首诗的背景是世界经济恐慌袭击到中国，白银源源外流，百业萧条，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诗中指责国民党当局对此袖手不顾，苛捐杂税有加无已，以致民不聊生。“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寒”，是说工商业家不懂得他们说唱的美妙“遗教”，只怕歇业破产后饥寒交迫。

④⑨ “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是说国民党对外为粉饰太平费尽了心机，对内则象索命一样催逼建设捐，造成“白发媪翁双跪泣，乞留敝絮过冬天”的悲惨情景。

④⑩ 这首和上一首的意境近似：委员接二连三地向州县提款，好心的州官无法应付弃官而去。恶吏闯入民家找不到男主人就抓走妇女，留下了婴儿要吃奶的哀号声。

④⑪ 这首写的是人们相戒“莫谈国事”的“万马齐喑”局面。所以说墙垣有耳，谨防国民党特务窃听惹祸，他们是借此摧残士气，使自己官运亨通的。大家只有：“闭户闭心兼闭口，莫伤亡国且偷生”。

④⑫ 这首写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屈辱外交。意思是说，东北、

热河几千里的国土和人民被夺走了，使节还在那里打躬作揖。你们没有能力报仇也应憎恨敌人，怎能向侵略者握手言欢和敬香槟酒。

⑤③ “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是说军队布防疆场而不御敌等于是废物，多少老百姓在逃亡中死伤。“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回銮，帝王车驾称銮，出巡返回称回銮。这里指蒋介石在“一二八”战起的第三天宣布迁都洛阳，《淞沪协定》签字后回到南京。这两句是说临阵脱逃原就够可耻的了，回来时居然还有脸大摆威风。

⑤④ 开头两句指出，在嫩江与强敌血战的义勇军是自己主动采取行动的。“雪地冰天谁管得，东风吹暖半闲堂。”半闲堂，是南宋宰相贾似道在西湖葛岭建立的豪华庭园。这两句是说，有谁去关心在冰天雪地里打仗的义勇军？蒋介石等权贵们的豪华公馆里依然温暖如春。

⑤⑤ “专制难期政令宽，每因功业震人寰。”两句是说很难期望专制王朝的政令宽大，每每却有功业彪炳、震动人寰的英雄人物。“未闻辱国儿皇帝，亦欲伊周一例看。”伊，商初政治家伊尹；周，西周政治家周公。这两句说，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向敌国屈辱投降的儿皇帝，也可同伊尹、周公一样看待。

⑤⑥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妖孽，古人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里指国民党反动派；一世，一代，这里作当代讲。两句是说，国民党这些妖孽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当代的兴衰早已逃不掉我的眼睛。接下去的两句则说，我幸喜从艰难险阻中得到了磨炼，依然是个不改初衷的老书生。这最后一首又落到作者自己身上，与第一首相呼应。如果说第一首是作者在寇深国危中抒发自己的胸臆，那末，这最后一首则表明了作者的境遇和意志。

一九八〇年一月稿

一九八二年三月修改

（本文系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史资料》编辑部供稿）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 第四辑

作者 =

页数 = 3 3 9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